西方新闻传播学经典文库

KEY CONCEPTS IN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STUDIES (2nd ed)

关键概念

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第二版）

［美］约翰·费斯克等 编撰
John Fiske et al.
李 彬 译注

新华出版社

西方新闻
传播学
经典文库

KEY CONCEPTS IN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STUDIES

关键概念（第二版）

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

[美] 约翰·费斯克等 编撰
John Fiske et al.
李彬 译注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第二版）/〔美〕费斯克等编撰；李彬译注．—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12

（西方新闻传播学经典文库）

ISBN 7-5011-6460-6

Ⅰ．关…　Ⅱ．①费…②李…　Ⅲ．传播学—词典　Ⅳ．G206-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11384 号

京权图字：01-2003-6936 号

西方新闻传播学经典文库

关　键　概　念

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第二版）

〔美〕约翰·费斯克等　编撰

李　彬　译注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邮编：100043）

新华出版社网址：http：//www.xinhuapub.com

中国新闻书店：(010)63072012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新华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照排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787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22.5 印张　插页 2 张　350 千字

2004 年 1 月第一版　2004 年 1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6460-6/G·2350　定价：35.00 元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010) 65895562　65897685

总　序

李良荣

中国的新闻改革已历经 25 个年头。25 年来，中国新闻媒体获得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也带来新闻传播学空前的繁荣。有幸经历 25 年新闻改革的人都不会忘记，中国新闻媒体的发展、学术的繁荣从世界各国、尤其西方新闻传播学中得益良多。西方新闻传播学引入中国，给中国的新闻界带来一股清新的风，它们的许多理论、观点、概念都让人耳目一新。这些理论、观点、概念对更新我们的新闻观念、改进新闻业务、改善媒体经营发挥过积极的影响。

进入新世纪，中国正式加入 WTO。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西方各国超级大媒体纷纷抢滩中国。中国的媒体同样在跃跃欲试进入世界各国，媒体国际化已成不可阻挡之势。在这样背景下，中国传媒界对于世界各国、尤其对西方传媒的理念、法则、规范以及操作方法的学习、研究正掀起新一轮热潮。

这新一轮的学习、研究热潮比起上世纪 80 年代末，跃上了一个新的层次。那时，中国的国门刚刚打开。西方的新闻传播学让急于寻求发展新思路的中国媒体大开

眼界，他们以一种饥不择食的状态把西方新闻传播学的一切新理论、新概念、新提法搬到中国来，甚至简单地模仿西方媒体的许多具体操作方法。但近10年来，尤其进入新世纪，中国的新闻界，无论是业界还是学界，已日趋成熟，他们理性地审视西方的新闻传播学。他们还在努力地学习，但为我所用——只吸收适合中国国情的理论和方法；然后更多的是研究、思考，寻找做大做强中国媒体的道路，以便有朝一日能够在国际舞台上和西方超级媒体展开真正意义上的竞争。

中国媒体发展的进程需要更系统、更全面地翻译、出版西方新闻传播学的经典著作。为此，我们在翻译本套译本之前，特地聘请美国、英国、日本等国12位知名教授、学者推荐当代西方新闻传播学的代表作，并从上百本的推荐书目中精益求精，遴选出二十多本著作，涉及到新闻传播界理论、实务、法规、经营管理等诸多领域，并由新闻传播学、外文专业的教授、博士生、博士后担纲翻译，力求翻译的准确、规范和文字的流畅。为了便于读者更好地了解译著，我们特地聘请相关专家来评述译著的基本观点和学术地位。

2003年10月

译　序

《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Key Concepts in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Studies*)，是一部别具匠心的传播学"名著"。其名望不仅源于别出机杼的学术内涵，同时也出自别出心裁的表述形式。

它既像辞典，又不是辞典。一方面，它具有辞典的形式。比如，全书由一个个的辞条及其解释所构成，而且所有辞条均按音序排列等。准此，中译本的书名才冠以"辞典"。另一方面，它又不同于一般的辞典，作者其实是以辞典形式构建一套立体的、交叉的、开放的理论话语，由此形成一个互文参照、彼此应和、勾联繁复、层出不穷的思想场域。准此，作者才在"本书前言"里特意说明："本书不是一部辞典"(the book is not a dictionary)。

一

这种形式，有点类似于米洛拉德·帕维奇的《哈扎尔辞典》(*Le Dictionnaire Khazar*)与韩少功的《马桥词典》。这两部知名的小说都号称"辞典/词典"，也都具有辞典的形式，韩少功甚至还专门编出一个"《马桥词典》条目首字笔画索引"。而事实上，它们同一般辞典大相径庭，甚至风马牛不相及。其间的明显差异在于，作为工具书，辞典上的辞条都是各自独立了不相干的，如《现代汉语词典》对"文化"与"传播"的解释；而《哈扎尔辞典》与《马桥词典》中的一个个辞条却是血脉相通有机关联的，犹如206块骨节构成一个完美人体。

以《马桥词典》为例，书中集录的是马桥这个地方的115个日常用语，比如"龙"、"公家"、"科学"、"清明雨"、"模范"、"贱"、"甜"等。乍一看，这些用语似乎平淡无奇，各不相属，但作者却用这些元素精心绘制出一幅有声有色的马桥"清明上河图"，"讲述了古往今来一个又一个丰富生动的故事，引人

人胜，回味无穷”，借用冰心如诗如歌的话来说：“其中有天意，有人情，有生死流转，有地久天长。”通读全书才发现，原来每个辞条都与其他辞条构成一种应答、对话及呼应的多重关系，就像被喻为“院士中院士”的苏联学者巴赫金所论述的“复调小说”。

这种形式确实与众不同，令人耳目一新。如果说以往小说基本上遵循着一条起承转合的单一线索，犹如音乐中的独奏或绘画上的焦点透视，那么《马桥词典》则是复线交织盘根错节，犹如交响乐队参差错落的协奏。另外，由于传统或正统的小说是按一条不可逆的时间方向展开，所以读者只能从头至尾按部就班地阅读。而《马桥词典》由于采用散点透视，则使人们可从任何一点介入，然后向前后左右随意延伸，形成横看成岭侧成峰的流动意象。

这种形式大大丰富了现实的表现力。因为，在传统或正统小说中，主人公以及其他的人物事件都被置于单一的叙事线索，读者也只能围绕这一线索而不可能顾及其他。然而，众所周知现实世界怎么可能如此单一，如此井然有序呢？大千世界，万类霜天，何时何地不都呈现着形形色色的“人”与纷纷扬扬的“事”吗？对此，20世纪末兴起的网络不失为一个颇具象征意味的隐喻。网络世界同样没有“主线”、“核心”、“主人公”等，只有五花八门的“辞条”及其勾联繁复的关系，而且人们也能从任何一个“辞条”进入，然后向四面八方任意扩展。就此而言，《哈扎尔辞典》(1984)、《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1992)、《马桥词典》(1996)等，在20世纪末相继问世就不仅仅是偶然巧合，而应具有更深刻的历史蕴涵。

二

《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即属这样一部别开生面的传播学经典，尽管其问世才不过十余年。这部学术力著以辞典形式，将传播与文化领域的所有重要概念、范畴、理论、观点、问题及研究等等汇集起来，然后加以凝练的论述与有机的链接，从而汇成一曲“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思想交响。

通常，习得一种语言——不管汉语还是蒙古语，不管英语还是斯瓦希里语(Swahili)，无非把握两点，一是词汇，一是语法。如果说词汇属于某种语言的构成元素，那么语法就属于这些元素之间的各种关系。与此相似，掌握一套学术话语包括传播与文化研究话语，也得从这两个方面入手。一者，自然得明

了它的每个关键概念或者说核心概念；再者，更重要的是洞悉这些概念的内在关系。由此说来，我们不妨将本书当做一整套传播学的词汇与语法。其中的词汇就相当于书中的一个个辞条，而语法则相当于这些辞条的网络式链接。用本书前言里的话说：

> 一方面，这些概念可被视为一个个具有某种特定内容与公认价值的金块式信息(*information*)；另一方面，它们又可被当做可能具有的种种意义(*meaning*)。
>
> ……
>
> 如果你用本书的目的仅仅是为自己提供现成的、自恰的、零碎的信息，那么你完全可以把它们用做单篇文章，但它们自身不会包含很多的意义。如果你想充分利用它们，那么你就需要注意它们的关系以及针对多样的、时或变化和矛盾的意义所具有的潜能。

所以，这部著作的主要特点与功能，也就体现在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首先，本书共有大小 286 个涉及传播与文化研究的辞条，几乎囊括这个学科的所有重要知识点，它们犹如 286 个战略高地或制高点，一旦掌握它们也就无异于控制了传播与文化研究的整个领域。其次，更重要的还在于这些辞条不是孤立的、自恰的、各行其是的，而是由网络式链接形成“勾心斗角”、“相依为命”的血肉关系，即所谓立体的、交叉的、开放的理论话语。这套独特话语与其他同类著述的最大不同是：一般常见的理论著述就像传统小说或焦点透视，由一条逻辑主线贯穿始终，包括核心概念、基本范畴、体系架构、最后结论等等；而这套话语及其架构则类似“复调小说”或散点透视——无始无终而又浑然一体、斑驳陆离而又和谐统一、各自独立而又互相唱和，仿佛一脉生生不息、源源不断的思想涌流。

具体来说，书中的每个“关键概念”（key concepts）先以一个概括性的“定义”予以界定（这个定义性句子的前后分别打上“*”号以作标识）。然后，再从不同角度对这个概念进行解说。其中，所有黑体显示的词语，均表示书里另有同名的概念条目可以参阅。最后，每个概念后面差不多都列出“互文参阅”与“深入阅读”，前者表示循此进一步查阅的相关概念，后者表示有关的参考书目（这些书目都列在书后的“推荐书目”中）。

三

中国大陆自1980年代初开始进行传播学研究，迄今已有20余年的历史。其间形成两次译介国外著作的高潮。第一次在80年代中后期，其中较有影响的代表性译著有如下四部：

1. W·施拉姆等人的《传播学概论》（陈亮等译，新华出版社1984）

2. W·赛佛林等人的《传播学的起源、研究与应用》（陈韵昭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

3. D·麦奎尔等人的《大众传播模式论》（祝建华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4. M·德弗勒等人的《大众传播通论》（颜建军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

第二次译介高潮，出现在新旧世纪之交。这一次与上一次相比，有两个显著特点。第一个特点是从单兵作战向集团作战转变，这方面目前比较突出的是如下四套译丛：

1. 周宪、许均主编的“文化与传播译丛”（商务印书馆）

2. 常昌富主编的“传播与文化译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3. 刘继南主编的“高校经典教材译丛·传播学”（华夏出版社）

4. 熊澄宇主编的“清华传播译丛”（清华大学出版社）

另外，单兵作战也时有佳作，如A·马特拉的《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陈卫星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E·M·罗杰斯的《传播学史》（殷晓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等均属著译上品。

第二个特点是研究范围大大拓展，概括地说就是从第一次高潮对美国经验学派的青睐而向欧洲批判学派延伸，从第一次高潮对“传播”的专注而向更广泛的“文化”领域拓展。

在这一背景下，最早致力传播学译介的新华出版社策划了这套“西方新闻传播学经典文库”。作为这套译丛的首批书目之一，《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的价值是为新闻传播学科以及其他相关学科，提供一部系统的、完备的、基础的理论研究著作。尤其是它以辞典形式将这个学科所有重要概念及范畴加以条分缕析的论列，包括基本含义、历史由来、主要焦点、现存问题以及相关书目等，无论对初学者还是对研究者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案头参考。比如，“传播”（communication）辞条的第一段，即言简意赅地概括了两种有关

传播的研究传统：

> 大致说来有两种关于传播的定义。第一种定义将传播视为一个过程：通过这个过程，A 送给 B 一个讯息，并对其产生一种效果。第二种定义则将传播看做一种意义的协商与交换过程，通过这个过程，讯息、文化中人（people-in-cultures）以及“真实”之间发生互动，从而使意义得以形成或使理解得以完成。

而这两种传统，恰恰代表着美国经验学派与欧洲批判学派对传播这个核心问题的不同理解。简言之，经验学派倾向于将传播看做一种影响他人的过程，所以致力于探讨左右传播效果的一系列因素，像竞选活动或广告策略如何才能产生广泛的宣传效用等；而批判学派则一向将传播视为意义生成的源泉，视为人生在世及人之为人的根本所在，所以总是追问传播的意义与价值。如果说前者关心的是“如何”传播，那么后者考虑的就是“为何”传播。虽然这里并未给传播下个结论性的“定义”，但显然使人思路敞开，憬然而悟。

四

正因为本书具有如此价值，正因为它是学习与研究中引经据典的“经”“典”，所以，当 2002 年的某天新华出版社故交黄春峰先生来电话，同我谈起本书的翻译事宜时，我心里一时颇为踌躇。一方面，我深知这样一部高水平、高纯度的学术理论著作对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基础性意义，倘能翻译出来将对学科的健康有序发展产生不言而喻的作用。另一方面，又觉得这样一部“经”“典”著作的翻译不容稍有差池与纰漏，否则很可能导致差之毫厘而谬以千里的后果，所以又恐自己万一才力不逮，不仅贻笑方家，而且贻误众生。

不过，也正由于心存这样的体认，一年来除了大量日常的教学科研工作外，译者可谓朝乾夕惕，夙兴夜寐，孜孜矻矻，战战兢兢。严复的“信达雅”是通行的译事准则，而拙译的准则只是准确、准确、再准确。为此，甚至不惜尽力保持原著的句子结构与层次，精通英文的读者或许都能由此大致复原本文。另外，细心者可能会留意书后所标的三个通译全书的时间，它既记录工作的进程，也等于表明拙译至少“三易其稿”。

当然，由于本书内容高度浓缩，涉及领域又非常广泛——除传播与文化研

究，还包括哲学、语言学、符号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新闻学、信息科学、文艺理论等学科，涵盖从马克思主义到后现代主义、从精神分析到东方学、从田野调查到人种志、从经验学派到批判学派等领域，所以即使力求尽善尽美，但一人的才力与精力毕竟有限，在满打满算不过半年的时间里翻译这样一部力著，不如人意之处在所难免。比如，我曾想对书中一些过于浓缩而让初学者可能难以把握的内容略加阐释，即所谓“译注”之注。但是，后来发现这个设想在目前情况下不啻为奢望，因为每个问题展开来谈差不多都可成为一篇小文章。于是，后来只得将计划中的论述性“详注”，变成现在的说明性“简注”了。还需要说明一下，中文版本中的注释，除标明“原注”外，皆为译者所加，不再一一注明。

最后，需要特别感谢几位热心的老师与同学。首先，是李竹润教授与范红教授。李竹润教授是新华社名记者，曾任中东总分社高级编辑，另兼原中国新闻学院教授、厦门大学新闻传播系教授和英国威尔士大学新闻、传媒与文化研究院海外研究员。作为改革开放后最早介绍西方新闻传播理念的先驱，他在1980年代曾以笔名“黎信”发表过一系列短小精悍、生动有趣的文章，向重新睁眼看世界的国人系统介绍了许多西方新闻传播方面的有益经验，如现在人们耳熟能详的多用动词而少用形容词、多用短句而少用长句等。当年，笔者也从这些文章中获得许多教益，并由此激发对新闻传播学的浓厚兴趣。所以，我一直将黎信先生看做自己的发蒙老师。范红教授是清华大学外语系原副系主任，2002年转入新闻与传播学院，现在正在英国牛津大学攻读语言学博士学位。承蒙两位教授在本书翻译过程中不断给以指点与启发，帮助解决了一系列疑难问题。

另外，我院研究生徐博和尹丽娟也以不同的方式，为本书付出心血。徐博原为清华大学外语系高才生，曾赴美留学一年，书稿完成后，我请他再仔细通读一遍，以期消弭我已熟视无睹的差错。尹丽娟则帮助绘制了本书的所有图表。

在此，谨向这些老师与同学致谢！当然，毋庸赘言，拙译的一切问题均由本人负责。

韩少功在《马桥词典》最后写到：“这当然只是我个人的一部词典，对于他人来说，不具有任何规范的意义。”无独有偶，《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一书的作者也在前言中特意强调：“这些辞条不是定义（本书不是一部

辞典)，也就是说我们并未宣称自己享有特权接近每个概念的‘真正’意义。它们不是定义，而是下一步理论与实践工作的起点。”希望这部既像辞典又不是辞典的著作，也能对中国读者的“下一步”学习与研究有所助益。

李　彬

2003年8月于清华园

原丛书序

这套丛书[①]涉及传播学的不同方面，意在满足日渐增多的学子初次接触并研习这门学科的需要。丛书的作者都是经验丰富的教师或讲师，他们力求将适于高年级学生的大量研究内容变成新生人门所需的东西。

传播学最具特色的特征，也许就是它的多样性：它的领域从大众媒介到流行文化，从语言到个体行为与社会行为。但在这种多样性中，传播学仍显示着其连贯性与一致性。这套丛书即反映着传播学的研究框架。其中，有的属于通论性的基础著作，试图建立适用广泛的理论与研究方法；有的则将这些理论与方法用于某个专门课题的研究。但是即使是这些专注某个课题的著作也是相互关联的，正如它们与通论性著作相互关联一样。某个专门的课题，比如广告、新闻或语言，只有当它们与其他共同构成这门多样性学科的课题相互关联并相互区别之际，才能得到理解。

于是，这套丛书就有两个密切相连的目的。第一，为读者介绍当代有关传播研究的最重要成果，以及试图解释传播的理论。第二，为读者提供他们能够直接用于自己日常传播经验的、恰当的研究与调查方法。

如果读者读过这些书后，能够写出更好的作业、完成更好的课题、获得更好的成绩，那么我将不胜欣慰；当然，如果他们对传播如何建构与形成我们的社会生活，如何整合与创造工业化社会的经验等问题获得一点新的洞见，那么我将十分高兴。因为，当我们应该仔细研究传播现象时，它总是被人看做不言而喻的事情。

约翰·费斯克

---

① 指由约翰·费斯克主编的一套“文化与传播研究丛书”（*Studies in Cultural and Communication*），其中包括他的《传播研究引论》（*An Introduction to Communication Studies*；*Second Edition*）和这部《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

第二版序

这一版增加了一位新作者，补充了60个新辞条。它比第一版多出90页，参考文献也从13页扩充到21页，并在原来的书名"传播研究"中加入"文化研究"。与此同时，删去原来的14个辞条，还对个别辞条进行重新改写。另外，全书从头至尾都根据需要做了适当的编辑加工。

这一回，我们五位作者决定在每个辞条后面都附上各自姓名的首字母①，以"标明"哪个辞条由谁撰写。我们认为，这样做有助于读者明了这些概念的写作，是出自不同的学科与个性化的视角。这种差异是文化与传播研究越来越多元化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更何况第一版问世以来，我们已在地理上分布于三大洲（澳大利亚、英格兰、苏格兰、美国和威尔士）。

本书第一版问世以来的10年间，传播与文化研究作为知识探究的领域已经发生变化与进展，无论对本科生的课程设置还是对公认的研究领域来说，其学科地位都在世界各大学得到进一步确立。我们希望《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对那些深入探究者而言会继续证明是有用的、激发思考的。

① 五位编撰者的姓名首字母分别为：蒂姆·奥沙利文（Tim O'Sullivan）——TO，约翰·哈特利（John Hartley）——JH，丹尼·桑德斯（Danny Saunders）——DS，马丁·蒙哥马利（Martin Montgomery）——MM，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JF。

本书前言

诺克斯堡[①]以堆满金块而著称。这些金块的形状几乎一致，难分彼此。尽管它们看起来价值连城，但实际上本身却毫无用处。它们的价值就在于其潜在的可能性——在交换过程中你能用它得到什么，或者说用你自己的资源与技能而使它们成为什么。本书也是如此。这里提供的都是格式统一的辞条，而它们本身毫无用处。如果任它们像你发现时那样待着，则你将一无所获——它们的价值也在于它们的潜能，在于你用它们做什么。

这么说的意思在于本书的这种差异：一方面，这些概念可被视为一个个具有某种特定内容与公认价值的金块式*信息*(*information*)；另一方面，它们又可被当做可能具有的种种*意义*(*meaning*)。概念无论多么流行，都不可能“包含”(contain) 零零碎碎的意义。它们的价值与意义也无需完全依赖特定的或“明显的”内容——正如众所周知的，诗歌中的关联环节 (link) 既可由涵理 (reason) 亦可由韵味 (rhyme) 所打造；而含义 (sense) 得以形成与其说是由于充足的信息，不如说更有可能取决于隐喻 (透过不同的词语传达意义)。

在传播与文化研究领域，留心潜在意义 (即使它们是相反的) 与寻求准确信息都同样重要。这是因为这种研究的对象，是我们所栖身的社会化世界——我们不是在同一门“精确科学”打交道。本书的基本信条之一 (源于结构主义) 就在于，没有*差异*就没有意义。也就是说，符号 (比如一般的词语和后面的特殊概念) 只有与同一系统的其他符号相互参照才能得到理解。“它们最精确的特征就是其他符号所不具有的特征” (Saussure 1976, P. 117)。这个原则，也适用于这些概念。其中每个概念的意义，都仅仅取决于它与其他概念在本书之内与之外的关联程度。它们没有什么内在的、固有的意义，而只有建构起来的关联意义，而且其中大部分概念都有不止一层意义。

① (诺克斯堡 (Fort Knox)，位于美国肯塔基州北部的一个军用基地，为美国联邦政府黄金储备的贮存处。

如果你用本书的目的仅仅是为自己提供现成的、自恰的、零碎的信息，那么你完全可以把它们用做单篇文章，但它们自身不会包含很多的意义。如果你想充分利用它们，那么你就需要注意它们的关系以及针对多样的、时或变化和矛盾的意义所具有的潜能。这种情况常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出现。你可能发现，某些辞条似乎与其他辞条的解释不一致，而就在这种未加说明的差别中可能存在相当重要的问题。因此，我们希望你能发现，这些辞条作为一个整体要大于各部分相加的总和：整体的意味大于个体的言说。但它们究竟意味什么，最终将取决于你对它们的使用。《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中的“关键”(key)一词，是用来打开事物的锁钥，从而使你能够将它们带走，然后加以利用。

作为全新的研究领域，传播与文化研究的特征是其研究工作的变化迅疾、创新不断，在于它总想以新的方式说出新的东西。与此同时，它们向各种成熟学科与学术话语进行广泛的借鉴。因此，对传播与文化研究的初学者来说，经常会有一段摇摆不定的时期；研究者与初学者之间常常缺乏不同程度的沟通。所有的知识领域当然都以其专业的术语与关怀而独具特征，但许多情况下这些知识是由于经年累月才变得为人所熟知，或者说某个学科领域是得益于概论性的书籍和使之为人熟知的课程。传播与文化研究属于多学科交叉的领域，没有统一的、“正宗的”(orthodox) 内容与术语。虽然变动不居，但它也是最具吸引力的研究领域之一。因为传播与文化研究发展了新的话语、新的理论、新的研究方法，甚至新的研究、辩论与分析的焦点（“错综复杂的问题群”[problematics]）。在这个进程中，我们自己某些最根深蒂固的假设与信念都受到质疑，包括所谓“显而易见”和“常识”的东西完全如其所呈现的那么简单、那么无可争议这类假设。

我们从事传播与文化研究的经验以及相关经验，乃是促使本书问世的直接原因。我们认为，一旦你熟悉这部书，那么它会给你提供许多东西。但与此同时，我们自己的日常工作也清楚表明，开始阶段如果见木不见林，那么即使最富热情的初学者也会觉得心烦意乱。所以，后面的内容就像一个野外向导，帮助你确认某些林木以及它们在树林中的位置。其用意是以便利的形式将某些你会遇到的最重要概念汇集起来，然后将这些概念的使用情况（或可能使用的情况）显示出来。既然传播与文化研究是跨学科的、国际化的，那么我们就尽量对已在这个领域成型或流行的术语及其来源与范围做出解释。许多术语是从成熟的学科直接借用的，例如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文艺理论等，尽管其涵义用于传播与文化研究领域可能多少有所改变。其他一些术语现在还比较陌生(foreign)，它

们或是出自最初以法语、俄语、德语或意大利语出版的著作，或是出自对许多学科仍属于“异质的”(foreign)著作(比如，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传播与文化研究中还有相当多的术语在“日常语言”里也很常见，但经过某种理论化过程的检视，它们几乎都被消解(destruction)，从而使我们不可能再以通常惯用的熟语形式识别它们(就像传播与文化研究这两个词语)。

类似这样的一部著作，对作者和读者来说都具有风险。对作者具有风险，是因为需要为每个概念提供简短的、概括性的辞条，而这些概念可能使用得很宽泛，不可能被“固定”在规范性的定义中。这个风险就是某种抽象的说明不可能充分顾及某个特定概念的所有潜在意义，因为一旦将某个概念同其特殊的使用情景相剥离（抽象过程），就需要将它同其本身所由决定的和由其本身所决定的社会与政治关系相剥离。因此，虽然为了解释的目的而将单独的概念剥离开来可能有所助益，但可以肯定其中每个概念都能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侧重与不同的假设而重新撰写。

同样，类似这样的著作对读者来说也不是没有风险的。这些辞条不是定义(本书不是一部辞典)，也就是说我们并未宣称自己享有特权接近每个概念的“真正”意义。它们不是定义，而是下一步理论与实践工作的起点。我们勾画了有关问题的框架，为你指出如何通过“深入阅读”和“互文参照”而追寻特定的思考路线。① 如果你对其他概念或不同解释方式有什么建议，那么我们很乐意听取你的意见(通过出版商)。同时，看过我们的引领文字后，我们将最有趣的工作留给你：不断接触文化实践、社会实践与政治实践，这些实践是借助话语与语言实施的，而我们都不得不用这些话语与语言来理解 20 世纪末的传播与文化。

蒂姆·奥沙利文（Tim O'Sullivan）
约翰·哈特利（John Hartley）
丹尼·桑德斯（Danny Saunders）
马丁·蒙哥马利（Martin Montgomery）
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
1992 年 5 月

① 每个概念均以一个解释性、互文性或提示性的句子引入，该句的前后以两个星号予以标记。黑体字表示在本书里另有专门解释的概念，而所有这些概念几乎都有按首字母排列的辞条。——原注

目　录

辞 条 目 次

A

B

C

D

E

F

G

H

I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A

自行解码（aberrant decoding） ＊这个术语被艾柯[①]（1965）用来说明用某一符码进行编码的讯息（message）被以另一符码加以解码的情形。＊因此，最后接收的**意义**不同于本欲传达的意义。自行解码理论对传播意图的作用，以及意义包含于**讯息**之中的观念提出质疑。

艾柯列举了多种自行解码，如对原初**符码**的忽略（就像希腊征服者误读克里特人的象征符号一样），或将自己的**符码**加诸一种讯息（就像早期的基督徒把基督教的意义加诸异教徒的符码或**礼仪**，或者像后一浪漫主义的学者在一位古代诗人当做哲学象征而构思的形象上发现色情的想像）。

不过，这个概念的主要用途，还在于当代大众媒介。种种**文化**和**亚文化**只要接受某种典型的大众媒介化讯息，就表明该讯息如欲对接受它的种种**文化**具有意义，就不可避免地受制于种种自行解码。一条财经新闻，在一个英格兰萨里郡的股票经纪人、一个南威尔士的炼钢工人或一个航空工程师那里会得到不同的解读。这就为该术语赋予新的向度，正如艾柯所言，"自行解码是大众媒介的通则"。由此导致这样的观念，即影响意义的主要因素在于读者或**接收者**所能接触的符码。因此，按照艾柯的看法，大众媒介的**文本**总是闭合的。也就是说，它们倾向于某种特别的解读，而非其他可能的解读。他的自行解码理论认为，这种**闭合**对那些按照解码中所用的主流符码对文本进行解码的人可能更为有效。

JF[②]

---

① 艾柯（Umberto Eco，1932～　），意大利当代著名学者、作家，波洛尼亚大学教授，以符号学的研究与理论著称于世。另外，他的第一部小说《玫瑰之名》自1980年出版以来，风行世界，畅销不衰。

② JF即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意为本条目由其撰写，下同。

互文参阅：闭合（closure），话语（discourse），意义体系（meaning system），倾向性解读（preferred reading），文本（text）。

深入阅读：Eco（1965）；Morley（1980，1986）；Gray（1987）。

缺席(absence) ＊ 一个出自**符号学**与**结构主义**的概念，指某个**符号**或元素(element)从其本应占据的某一**组合关系**的位置上遭到有意义的排除(the significant exclusion)。＊ 这样一来，选出的(在场)元素表示什么意思，就只有同缺席的潜在价值(它们即根据这些潜在价值而选出)进行比较才能确定。因此，缺席对各种层面的**意指**过程都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主要因素。

JH[①]

互文参阅：闭合（closure），换码测验（commutation text），隐匿（exnomination），联想关系（paradigm），倾向性解读（preferred reading）。

口音(accent) ＊ 由地域或社会**阶级**所界定的、某个特定社会**群体**的成员，在某种语言的发音上面所具有的独特方式。＊ 多数**语言**在发音方面都会有一些地域方面的差异，而且某种语言在地域上分布得越广，其语音出现差异的可能性就越大。于是，魁北克的法语在法国本土人听来，就与巴黎的法语大不相同；对土生土长的葡萄牙人来说，在巴西说的葡萄牙语听起来就与在葡萄牙说的葡萄牙语大不相同。这方面，英语可以说是个突出的例子，因为它有一系列不同的、与某个特定国家相关的口音，比如，爱尔兰、印度、美国、尼日利亚、澳大利亚的英语口音等。当然，口音的变化并不局限在这种差异层面。以英国英语为例，其国内口音差异就形成一整套谱系，从地域鲜明的乡村与城市口音（就像萨默塞特口音、利物浦口音或泰恩赛德口音等），进而到那种被视为标准发音（Received Pronunciation）的典范口音，这种口音在 BBC 的“世界报道”（World Service）、司法系统、公学[②]以及诸如此类的地方可以经常听到。从这个意义讲，每个讲话的人都有“一个口音”，包括习惯使用标准发音者。尽管标准口音现在基本上属于一种基于阶级地位的口音，但历史上它却一度

---

① JH 即约翰·哈特利（John Hartley），意为本条目由其撰写，下同。

② 所谓公学（public school），乃指英国一种贵族化的私立付费学校，实行寄宿制，属于“上流社会”的组成部分。

与中古时期英格兰中部方言区的东南一带具有很强的地域关联，注意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对它的专门提倡，比如19世纪的英语公学以及BBC早期电台**广播**，有助于解释标准口音在今日联合王国的支配性社会地位，在那里它似乎成为中立的或通行的英语口音，甚至达到这种程度，即它已被当做讲英语的“自然”与“正确”方式。现在，它可能是联合王国得到最广泛理解与使用的口音，迄今为止它也是英语的外语教学中最通用的口音。

但是，这并不能使标准发音（RP）比其他英语口音的发音方式更加正确。它可能博得更多的权威，但值得记住的是一切口音都将根据不同人群的不同标准而招致社会的诋毁与认可。虽然对联合王国口音的反应所做的经验性研究表明，使用标准口音的人比使用地域性口音的人在一般能力方面得分较高；但是，同样是这些研究也表明，使用标准口音的人比使用地域性口音的人在个人的诚恳度与社会的吸引度上就处于下风。这类判断最终涉及的是一种社会准则而非语言准则。针对特定发音类型进行正误判断与审美诉求，就像针对声音本身的内在属性进行辩护一样难乎其难。它们是由社会性因素——如果是无意识的话——所激发的。

MM[①]

互文参阅：态度（attitude），方言（dialect），刻板印象（stereotype），语言变体（variety）。

深入阅读：Hughes and Trudgill（1979）；Wells（1982）。

享用（accessing） ＊对来自非由媒介组织所直接雇用的人们或群体的引语、录像/录音访谈或陈述（在新闻/时事报道中）予以包含的行为。＊享用在用法上是个有趣的术语，因为它仅在缺席之际才作为一个重要问题而浮现出来。所以，你会更经常地遇到针对享用的诉求而非有关享用的分析。

针对享用的诉求，是基于一种媒介的**反映论**——就是说，媒介应该反映社会生活中外在于媒介而存在的众多不同的**群体**、政治或**生活方式**。许多群体抗议说，他们在电视上的享用遭到封锁，使他们不能在公众头脑里确立自己的观点。这种意见往往隐含着一种假设，那就是这种封锁多少是由媒介欲将他们排除在外的人为**阴谋**所导致的。

即使享用得到落实，“少数群体”也常为其所得到的报道而失望。这

① *MM* 即马丁·蒙哥马利（Martin Montgomery），意为本条目由其撰写，下同。

是因为作为具有十分精细的劳动分工与**专业主义**之**职业观**的产业组织，媒介不会允许你随意出现在电视或广播上，陈述你的情况或讲述你的故事。你所说的都是被专业人员**中介**化的东西，而你最终是否能够出镜将取决于你自己的专业性或表述性**地位**。

不过，得到享用的声音经过专业化的**中介**甚至会变得更离谱。它伸延到讯息本身。即使你已在电视上露了面说了话，你也并不能为自己说话。你说的成了电视说的，而电视的话语有其自身的特性。当一位新闻播音员引用你的话时，或者当一位记者询问你时，你说的话就成为一种话语元素而附属于作为整体的那则新闻之**叙事**过程与视觉**符码**。其意义不是包含于自身，而是取决于此前此后的所言所见。实际上，你成为一出戏里的一个演员，哪怕你有幸扮演主角，情况依然是你说的话之所以重要，仅仅因为它处于所有其他人说话的语境以及这出戏所涉及的语境之中。进而言之，你所扮演**角色**的某个方面，甚至可能与你自己的目的完全龃龉。因为，允许你进入媒介并不费事，而体制化的**话语**却能由此声称自己的真实性与可信性。你成为一种工具，媒介表述的合法性由此得以确立——不管它是不是你实际想说的。

于是，在专业化的媒介话语与各种群体希望达到的享用诉求之间，便存在一种利益冲突。实践中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有两种。一是新闻与事实都遵从**公正**的原则，从而保证在任何一个话题上，一系列（细微而"平衡"）的声音都能享用媒介。二是许多电视网都开办了专门的"媒介享用节目"。在这些非黄金时段的节目中，媒介专业人员会放弃对节目内容的控制，但依然保持对生产过程的控制。不幸的是，这两种用意良好的实践都有负面效果。公正使政治上占主流的两党制形式合法化，代价是牺牲各种单一问题群体（环保运动等）、"少数"民族群体、社会主义或女权主义群体以及社区群体，这些群体往往被归入边缘的享用时段。对这些群体来说，正是赢得媒介享用这个事实，反而形成仿佛是"自然而然"地坐实其边缘地位的**表述**。

JH

互文参阅：另类媒介（alternative media），游吟职能（bardic function）。
深入阅读：Hartley（1982，1992）；Glasgow Media Group（1980），Willis and Wollen（1990）。

实况（actuality） * 专业术语，指以胶片/胶带拍摄的、用于新闻与时事播报

的镜头，它记录的是正在发生的事件。* 它与演播室的表述方式（头像特写）及档案（存储）镜头形成对照。

在**符号学**分析中，实况被视为产生意识形态**闭合**的关键性技法，它将**倾向性解读锚定**在显而易见的、无可争辩的、来自被摄事件的“事实”之上。事实作为显而易见的东西得到呈现；其产生过程几乎没有表现出来，所以就促使观众按照事件本身而不是按照表述事件的方式去理解镜头。然而，如果没有相应的评说——如果不是为了“方便”观众而用许多专业技巧对实况进行来龙去脉的背景化加工，那么事实几乎不可能呈现在荧屏上面。正如英国一位新闻主持人Peter Sissons所说的：

> 让我们记住这一点，尽管一幅画面能够讲述故事，但是惟有一个词语才能将它置于历史的情景之中，才能提醒人们避免陷入轻信，才能衡量这个事件的真正意义。
>
> （*Independent Broadcasting*，1982）

总之，实况是一种将意义**自然化**的技法（它将文化的东西作为自然的东西予以呈现）；它为评说提供了一个理由。

JH

互文参阅：闭合（closure），自然化（naturalizing），现实主义（realism）。

美学（aesthetics） * 一个源于唯心主义哲学的概念，指涉有关品味特别是高雅品味的原则以及与此相关的美的原则。* 作为一个流行于 19 世纪末的概念，美学受到“为艺术而艺术”话语的青睐，从而与艺术上对美的“精致”欣赏相关联。不过，美学上的唯心主义所隐含的意图，始终是把这一有关品位的所谓原则精心解释成超越性的，即超越任何时代、文化或媒介，并超越任何人的**主体**反应。美学的研究对象，是从历史、**文化**与生产方式的语境中剥离出来的艺术一客体本身。这种研究涉及的是它与其他艺术客体的关系，以及它与既定美学**话语**的关系，其目的是将那些据说使之成其为美的文本化属性分离出来。当然，这种研究取向的困难在于完全无法在品味及美的自我生成语境中为其“确定”评判标准——它们被断定存在于艺术客体的“某处”。这自然招致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与其他批评家的批评。在他们看来，美学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话语，旨在把某个特殊阶级及

其派系的品味“客观化”（具体化）、使之看上去俨然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具有普适性与抽象性的东西。

然而，一旦承认它是一种意识形态话语，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美学本身就成为一种有趣的研究对象，从而引发有关特殊的社会形构（formations）与其更微妙的种种**文化生产**间的关系问题。当然，主要的问题在于能否可能存在一种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或女性主义的美学，它又如何区别于业已存在的美学？

美学(*aesthetic*)这个术语在**符号学**中，特别是在某种*美学符码*的观念中获得一定的流行。它被视为这样一种**符码**，其间按照公认的(约定俗成的)表述所生成的意义不是特定讯息的终点而是起点。它强调的是**能指**而非**所指**，它试图拓展而非加固这种符码借以运作之形式、**类型**或惯例(convention)的界限与限定。因此，美学符码刺激了以原始的**意指**素材进行的创新、墒及实验，并由此被认为引发愉悦的反应。符号学或许可以声称已与唯心主义美学分道扬镳，因为它旨在为美学符码寻求一种摆脱**价值**的、文化上的具体描写，从而去发现那种运作于通常与“艺术”范畴无关之话语的符码：比如，广告招贴、政治口号、乱涂乱画、大宗商品的出现与大众媒介的生产。

JH

互文参阅：符码（code）。

深入阅读：Bennett(1979)；Lovell(1981)；Wolff(1981)；Bourdieu(1984)；Felski(1989)。

余象(after image)　＊观众或听众接受一种**刺激**后形成的视觉或听觉上的延续效果。＊这种延续效果虽然一般比较短暂，但却可能有效地干扰与/或补充在相同或相似语境中得到呈现的其他信息。

余象延续的确切时间取决于许多因素：比如，呈现的速度、接受者的注意程度以及已成为历史组成部分的原初**形象**所处的那种感知场(perceptual field）等。但一般来说，我们所说的余象最多在实际影像之后延续半分钟。你可能会想到，尽管余象涉及**知觉**，但这种形象（image）是否构成感觉（sensation）。

DS①

① DS即丹尼·桑德斯（Danny Saunders），意为本条目由其撰写，下同。

互文参阅：形象（image），知觉（perception），下意识（subliminal）。

议程设置（agenda setting） * 一个用来说明媒介有意无意地建构公共讨论与关注的术语。* 一个委员会通常都有一个议程，它是一系列按轻重缓急的顺序进行讨论的话题。任何未列入这个议程的话题，都得不到正式的讨论。媒介的议程设置指的就是这一情形，即媒介特别是新闻、时事与评论的生产有能力将公众的注意力聚焦于一系列获得解释与受到限制的、经过选择的问题，同时忽略其他的问题。其结果就是某些话题在超越媒介的公共领域得到广泛讨论，而其他的话题则被忽略。

首先，议程设置说的是媒介向**受众**提供了什么话题这样的问题，其次，有关这些话题的信息是如何进行呈现的。这关系到报道的力度。比如，多大范围的观点、象征、问题等被选择出来以建构一则具体的新闻或纪实性节目，尤为重要的是它们是如何排序或被赋予合法性与重要性的。这个过程的意义在于议程被受众所内化，它涉及媒介在解释社会现实中的角色及其作为意识形态**权力**的中介角色等普遍问题。

TO[①]

互文参阅：异端行为扩大化（amplification），框架（frame），道德恐慌（moral panic），新闻价值（news values），初始解释者（primary definers）。

深入阅读：Cohen and Young(eds)(1980)；McQuail and Windahl(1981)[②]；Philo（1990）。

异化（alienation） * 一个主要从马克思的著述中发展出来的术语，指的是个体与其社会生活的核心方面逐渐疏离的过程，其间他们被无法控制的“异己”力量所控制。* 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是生产活动涉及的社会与经济组织所具有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特征，其根源在于社会关系受制于和响应于经济力量的方式。这些力量，例如工资、利润、需求、供应等，似乎成为一种独立的存在，对个体施加压迫与控制。

处于这种力量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中的劳动行为与工作行为，是发

① TO即蒂姆·奥沙利文（Tim O'Sullivan），意为本条目由其撰写，下同。

② 即D·麦奎尔等《大众传播模式论》（*Communication Models*），中译本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1987）。

生异化的主要领域。马克思确定了异化的四个主要方面：

第一，*生产活动与生产过程*本身被分割成片段，然后强加到工人身上，成为不完整的生产过程，因而也就无所谓成就感。积极的、创造性的生产与劳动——理想状态应以其自身为目的——变得毫无意义，甚至被当做手段而不是目的。

第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与其*劳动产品*发生异化。这些产品成为商品，生产它们不是为了工人自己，而是为了市场、为了消费、为了利润。所以，工人是在为他人进行生产，由此直接导致不平等的贫富阶级关系，而这种关系则确保工人始终处于依附性的地位。

第三，随着社会关系受到经济力量的决定与制约，人们与他人也发生异化。于是，社会生活方面潜在的合作性基础，被工人、雇主与业主等群体之间剥削的、矛盾的、对立的关系所取代。竞争与自私遮蔽了团结与合作。

第四，由此一来，个体就与*自身*及其独一无二的潜能发生异化，与马克思所说的他们的"类存在物"（species being）[①]，即他们从事创造性生产（包括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所具备的独特能力发生异化。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通过将完整统一的生产分割成智力与体力的角色而使个体发生异化，从而压抑个体的创造性与成就感。

尽管异化常被用于描述某种厌倦与迷惑的主体状态，特别是面对机器与技术时的此类感受，但更准确地说它是被看做一个分析性的概念，指涉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生活的客观性状态。它强调的是这种需要，即承认经济关系在决定互动与传播的特定社会形式与文化形式上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TO

互文参阅：基础（base），阶级（class），霸权（hegemony），意识形态（ideology）。

深入阅读：Guff *et al.* (eds) (1979)；Worsley (ed.) (1977)；Bilton *et al.* (1981)；Lukes (1969)。

另类媒介(alternative media) * 对既定的、体制化的政治事务公开表示拒绝或公然

① 类存在物：马克思在其《1844年政治经济学和哲学手稿》里使用的术语，指人们不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也是为自身存在的、能动地改造对象世界的有意识的存在物，因而是类存在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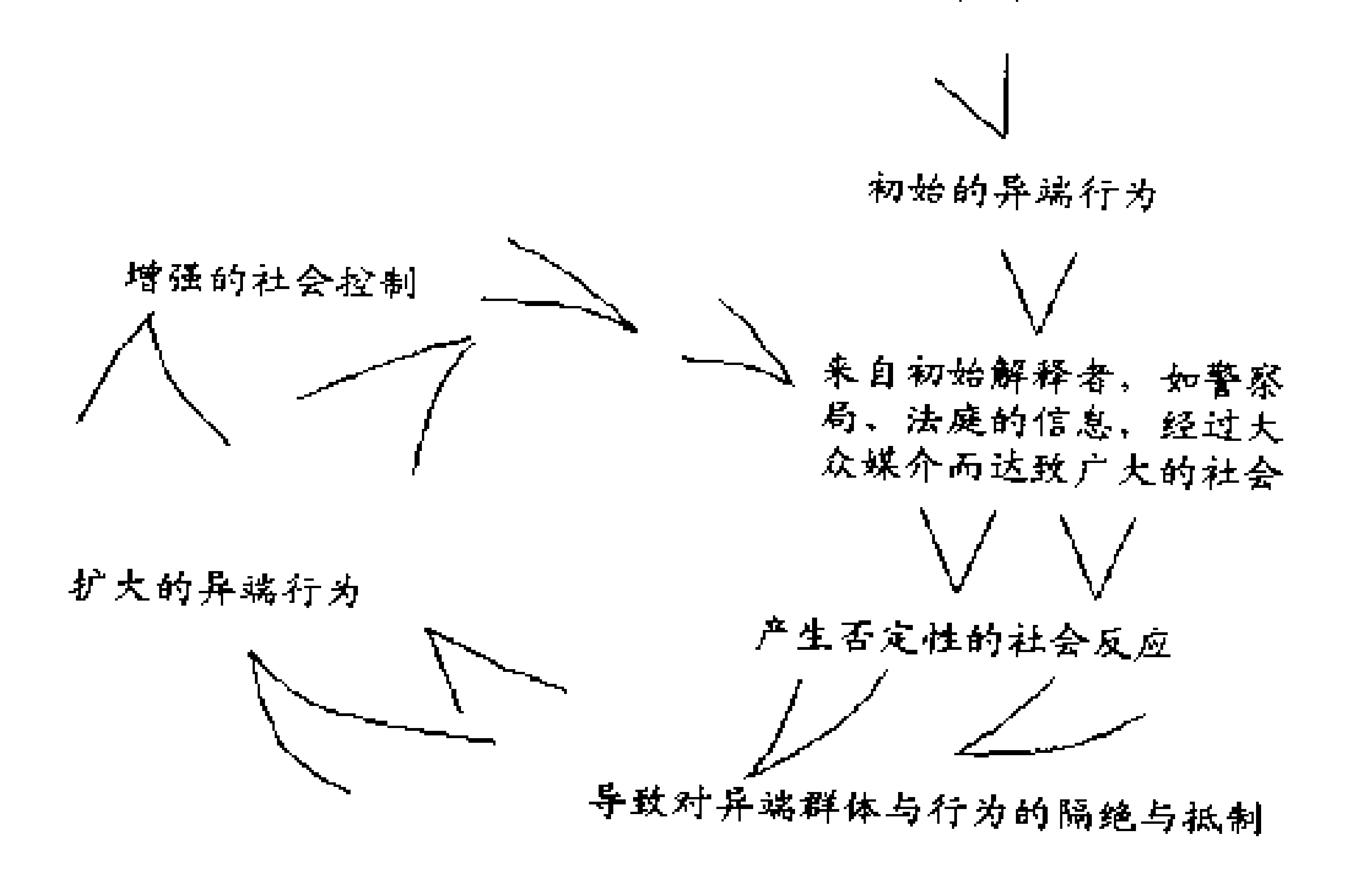
发起挑战的那些大众传播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们无不倡导社会的变革，或至少对传统的价值进行批判性的重估。＊ 它们也指“激进”(radical)媒介或“地下”(underground)媒介，这些媒介由于表达了超越议会共识与议会辩论之确定范围的政治与社会主张，从而与主流媒介的产品相对立。社区媒介有时也可归入另类之列，它们经常代表那些感觉自己的观点与考虑在现有的地方媒介与全国媒介上没有得到足够体现的群体。另类媒介往往是为了开展**运动**以解决某个特殊问题而创建的，鉴于它们总是财力不足及对广告客户与大众化商业市场缺乏吸引力，另类媒介面临许多生存问题。

TO

互文参阅：享用（accessing），集中（concentration），独立(independence)，表述（representation）。

深入阅读：Minority Press Group（1980）vols 1 and 2；Royal Commision on the Press（1977）；Noyce（1976）；Fountain（1988）。

异端行为扩大化(amplification of deviance) ＊ 主要由于大众媒介加以协调和充分表达的某种社会反应，被冠以异端的初始行为愈发增加或“放大”的过程。＊ Wilkins(1964)对这个概念做过深入阐述。他力主在某些情况下，如果一个社会听信那些针对被贴上**异端行为之标签**的群体与行为的简化的、**刻板印象**的、常常是误导性的信息，那么它就以产生更多异端行为这一方式对此做出**反应**。初始信息引发一种激动不宁的社会反应，这种反应反过来又发现并可能激发更多的异端行为。这种循环一般可用一个螺旋的形式来表示：



这里强调的是大众媒介提供信息的作用，特别是在提供有关异端行为的标签与解释上的作用。Young（1980）指出，它们是“共识的卫士”（guardians of deviancy），在关于使用违禁药物之情景的研究中（1971），他曾对这个螺旋的不同变化做出全面论述。1973年，Rock又对这个自成一体的循环过程提出别样的解释，其中包括下列步骤：

（1）由于大众媒介的精心编排而引起不断强化的公众关注，一个显而易见的“犯罪浪潮”就出现了。

（2）由大众媒介、压力集团与政治诉求所表达与呈现的公众关注，聚焦于警方与控制机构针对异端行为的警觉之上。

（3）这种持续增强的警觉由于发现越来越大或越来越多的明显异端行为而提高了捕人率。

（4）这样又加剧了犯罪浪潮，进一步激起公众的情绪与关注（返回第一个步骤）。

这个概念对透视与分析具体实例提供了一条有用的途径。

TO

互文参阅：议程设置（agenda setting），异端行为（deviance），标签理论（labelling），道德恐慌（moral panic），初始解释者（primary definers）。

深入阅读：Yong(1971)；Cohen and Young(eds)(1981)；Rock(1973)；Hall *et al*.(1978)。

相似/类比（analogue/analogy） ＊客体的形式或状貌得以再现的一种不能切分的表述或符码。＊相似/类比常常与数码（一种被切分的符码）或同构（结构的一种复制）相反。于是，在表示时间的流逝上，一个模拟指针式的表是通过指针的持续运动，一个数字显示的表是借助时间的片段（通常为1秒）。根据罗兰·巴尔特[①]的分析（1977），一幅照片是现实的一种相似物，空间关系学的符码是一种相似符码。实际上，正如我们在钟表上为

① 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法国结构主义思想家，著名作家、文艺批评家、符号学家，对符号学理论颇多建树，1976年任法兰西学院符号学讲座教授，成为该讲座的第一位学者。主要著作有《神话集》（1957）、《符号学原理》（1964）、《S/Z》（1970）、《罗兰·巴尔特论罗兰·巴尔特》（1975）、《恋人絮语》（1977）等，这些著作均有中译本。

每分钟标上刻度一样，我们也需要把片段加诸一种相似物，以便使之更容易理解或至少按照片段来知觉相似物（在空间关系学里，我们把大约18英寸到3英尺作为亲密距离进行感知，把3英尺到8英尺作为私人或个人距离，超过8英尺就作为公共距离了）。"解读"一幅照片时，切分同时出现在**意指**的第一与第二序列上。如此一来，在第一序列上，一幅由不常见的角度或距离拍摄的常见物体的照片就不能得到"解读"，除非我们知道**能指**的什么刻度（mark）被化人其他刻度以使我们能形成一个**所指**。[①] 我们不得不在（暂时）毫无意义的能指上对类比性的、不能切分的刻度进行分类，以便理解这幅照片的意谓。当然，对更常见的照片来说，这个过程是无意识的，显然也是不成问题的，但它依然发生。在第二个序列上，我们需要对照片的各个部分进行分类，以便根据那种涉及我们文化地位的**符码与惯例**（这是我们能够理解它们的惟一途径）理解它们。举例来说，一幅表现政治示威者的照片，经过某位读者的解码可能成为一群胡子拉碴游手好闲的暴民，而另一位读者的解码则可能把他们看做是所有年龄、男女两性以及一系列阶级与种族的代表。这里的第二位读者就对这幅照片做了不同的切分，因此为它达成一组不同的意义。多数照片都有说明文字（词语不是类比），以便在这个过程中引导读者。罗兰·巴尔特称这种方式为**锚定**。

JF

互文参阅：锚定（anchorage），符码（code），倾向性解读（preferred reading）。

锚定（anchorage） * 这个术语被罗兰·巴尔特（1977）用来解说词语借以影

① 这段话以及这个辞条，涉及符号学的一系列的核心思想与基本理论。比如，一个符号是由能指与所指构成的，这个符号的表意过程就是意指。再如，由能指与所指构成的是符号的第一序列，这个序列相对于更深层次的意义即第二序列又是一个能指（也就是说，这个能指是由第一序列的能指与所指构成的），这个能指又有自己的所指。举例来说，一幅照片的能指是光线、构图、呈像技术等，其所指就是画面表现出来的内容。而这只是就第一序列而言的。这个序列的能指与所指构成的这幅照片，又成为第二序列比如隐秘的意识形态的一个能指，而其所指则是这种意识形态的蕴涵。总之，如想透彻理解这段话以及这个辞条，就需对符号学有所了解。这方面最基本、最通俗的著作，是罗兰·巴尔特的《符号学原理》（原著书名为"符号学基础"或"符号学入门"）。

响视觉形象——通常指广告与新闻照片——的主要方式。* 照片属于潜在的开放文本，而词语则用来引导读者对其画面进行特定的**倾向性解读**。词语"锚定了所指的浮动链条"，巴尔特以一幅表现几个水果散布于一个梯子周围的广告对其理论进行了解说。这个画面可能意味着收获不好、风雨造成的损失或水果的新鲜水灵等意义。而"好像产自你的果园"这些词语，则一举封闭了不想要的其他解读，并明显趋向"新鲜水灵"的那种解读。写下或说出的词语总是用来封闭广告画面所提示的一系列潜在意义，近年来它们常以一种反身（reflexive）或玩笑方式达此目的。新闻照片与画像，也被说明文字、解说词或旁白按照常规所锚定。这种方法可以减少影像的潜在"开放性"，通过对其意义寻求解释与自然化可能成为读者或观众的一个向导。罗兰·巴尔特解释说，无论如何词语都确立了人们想要的那种影像含义："（词语）文本加诸画面，给它添加了一种文化、道德、想像的重负。"他得出结论，锚定的最终功能属于意识形态。

JF

互文参阅：闭合（closure），倾向性解读（preferred reading）。

失范（anomie） * 一个出自杜尔凯姆（1858～1917）① 著述中的概念，指个体与群体被剥夺或失去那些规范其预期及行为的、确定无疑而富有意义之规范时的状态。* 失范是恰当的社会与道德规范出现缺位的结果，它可能导致忧郁、异端行为以及极端情况下的自杀与杀人。这个概念表明，所谓明显属于个体的"精神状态"（states of mind），实际上应理解为广泛的社会与文化状况之产物与反应（比如，参阅杜尔凯姆有关自杀的研究）。

在许多意义上，这个概念都被用于描述无能为力与茫然无知的社会经

① 杜尔凯姆（Emile Durkheim，1858～1917），又译涂尔干，法国社会学家，社会学法国学派的奠基人，主要著作包括博士论文《社会分工论》（1893）、《社会学方法论》（1895）、《论自杀》（1897）等。其外甥莫斯（Marcel Mauss）、弟子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等，都曾任法兰西学院社会学讲座教授，同样声名卓著。

验。在罗伯特·K·默顿[①]的著作（1957）中，它被拓展来解释**异端行为**。他指出，失范为某些群体赋予特征，他们经历着一种由广大社会所界定的目标（即物质方面的成功）与实现这种目标的可能或方法间的冲突。所以，异端行为（比如抢劫银行）被看做失范性张力或“紧张”的一种结果。

由于剧变与不稳定状况下的社会关系之性质，杜尔凯姆把失范视为现代生活日渐突出的一个典型特征。

TO

互文参阅：异化（alienation），规范（norm）。

深入阅读：Lukes（1969）；Giddens（1978）；Worsley（ed.）（1977）；Bilton *et al.*（1981）；Thompson（1982）；Mestrovic（1991）。

反-语言（anti-language） * 这个术语用于描述那些表达同主流语言秩序相反的、多少是存心制造并维持的语言。* 就此而言，它们表现了语言领域的种种反抗情形。正如Halliday（1978）所言，反—语言植根于诸如**异端行为**式或作奸犯科式亚文化等“反—社会”之中，其功能在于表达对主流秩序的反抗，并保持和增加其成员的凝聚力。通过这种方式，他们设法同圈外人拉开距离，使之成为表达边缘**群体**之现实与主流**霸权**之秩序彼此紧张与互相对抗的一种手段。

反—语言的例子包括：伊丽莎白女王一世时代的“pelting speech”及维多利亚时代的同类语言“gobbledygook”，二者均为流浪汉与罪犯的语言；波兰囚犯间的反—语言“Grypserka”；以及伦敦土话中的同韵俚语（cockney rhyming slang），这种俚语用于表达某种特殊的地域认同与价值

---

① 罗伯特·默顿（Rorbert Merton，1910～2003），声名卓著的美国社会学家，早年在哈佛大学科学史家萨顿指导下完成的博士论文《17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1938），被视为科学社会学的先驱性著作。此外，主要著作还有《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1949）、《理论社会学》（1967）、《科学社会学》（1973）等。他曾长期担任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还做过美国社会学会的主席。他与拉扎斯菲尔德（Paul Felix Lazarsfeld）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多年合作，不仅为社会学研究开宗立派，同时也对传播学研究产生深刻影响。另外，其独子罗伯特·C·默顿（Rorbert C. Merton）曾与M·S·斯科尔斯共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1997）。

体系，恰似拉斯塔法里教[①]信徒（Rastafarian）这种**亚文化**群落，以同样的方式阐明某些西印度群岛年轻黑人对立的认同感与价值观。Rap音乐与文化中的语言，又提供了一个新近的反—语言例证。

TO

互文参阅：异端行为（deviance），语言（language），亚文化（subculture）。
深入阅读：Halliday（1978）。

原型（archetype） ＊一种决定意象（imagery）与象征（symbolism）之形式（尽管不必决定其内容）的潜在过程。＊这个概念得到荣格[②]（多年来都是弗洛伊德最亲近的学生和同事）的特别强调，并在后来的精神分析学派中占据核心位置。原型乃由大批**象征**与**形象**所暗示，这些象征与形象似乎具有某些共同的属性或共有的特征，从而使它们得以归结为更简单但更有力的**符号**。就其本身而论，一个原型形象拥有强烈的感召力与高度的能动性，它可能超逾文化与历史的限界。荣格（1969）带读者做过一次穿越**民族**、宗教与时代的旅行，在整个过程中他将那些一直得到各种社会高度珍视的象征性**表述**加以比较和对照。他指出，许多文化的内涵应追溯其最早的原始性开端：由此形成的基本原型包括，"阴影"（shadow）（一个道德问题，显示个体比较阴暗的一面）；"（男性的）女性意向"（anima）（那种由女人气给予最佳表现的、可能最受压抑的内在男性面孔）；"（女性人格的）男性意向"（animus）（那种由男人气给予最佳表现的，可能最受压抑的内在女性面孔）。其他原型还有——如"人格面貌"（persona）、"智叟"（the old wise man）、"母亲"及"恶作剧精灵"（trickster）等，但从这些提到的词语中，人们就能看到那种针对所有社会所有人来划分意象的野心了。为具体说明这一点，我们以女性意向/男性意向为例，荣格

① 拉斯特法里教，是流行于牙买加等地一部分黑人中间的一种政治与宗教运动。该教崇拜埃塞俄比亚前皇帝海尔·塞拉西（Haile Selassie），他在登基前称塔法里亲王（Ras［亲王］Tafari），教名即由此而来。该教信奉黑人终将得到救赎，并重返人间天堂——非洲。这种信仰于1953年公诸于世，发端于几位独立运动的领导人。在生活方式方面讲究素食，禁止理发，吸食大麻。

② 荣格（Carl Jung，1875～1961），又译容格，瑞士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曾与弗洛伊德合作研究达5年（1907～1912），后因性情与思想不同而分道扬镳。他是弗洛伊德之后最重要的心理学家，他提出的集体无意识、原型等概念对现代学术思想影响甚大。

（1969）曾简洁明了地说："一个非常女性化的女子具有一个男性的灵魂，而一个非常男性化的男子具有一个女性的灵魂。"原型这个概念的问题是，它涉及如此普遍化的事项，以至于不可能按照内容下一个近似的定义：因为内容太驳杂而不能得到科学的确证。相反，正如Storr（1983）所强调的，原型通过这样的能力而显露自己，即在以后某日可能偶然察觉的一种无意识层面组织意象与观念。荣格自己青睐的类比同晶体的轴线系统相关：离子与分子按照特定的系统聚集起来，但是由此产生的晶体块却可能大小不一，形状各异——这里恒定不变的就是每个晶体单元的几何比例。

于是，荣格对象征世界中潜在类型（patterns）的寻求就补充了一门符号科学，正如他力图为文化的意象确认大规模的范式一样。所以，多少带点讽刺意味的是，在荣格的著作里很少提及索绪尔或**符号学**——而后来的**结构主义**者与符号学理论家也不承认荣格的解说。这可能是由于某些决定荣格许多著述的心理动力假说：比如，对于不同的社会群体来说，有可能存在一种沿袭的**集体无意识**，而这可能暗示着有一种针对意识与无意识的基因模型（特别是当荣格讨论**种族**的概念时，正如Billig在1976年所言）。有时，关于原型的讨论成为确定性的纯理论思辨，认为某种潜在的类型有可能存在，而它决定了想像事件与真实事件之间的关联——比如，刚梦见一个久已忘记的朋友，接着很快就真的听到有关他的事情。在荣格看来，这是一个意味丰富的巧合；其间，在独立的个体生命之中的象征同时出现（尽管有大众传播的介入），凸显了与某种集体无意识相系的共有巧合的重要性。这种讨论接近于灵性世界与通灵现象：如此一来，荣格的著作便常常被边缘化地置于心理学的学科之内。

我们也会怀疑这么一个野心勃勃的计划，它在如此众多的文化与时代中间检视**所指**/**能指**的关系：如果历史证据能如此东拼西凑，如果这般千差万别的语言、宗教与艺术形式都得通晓，那么实现这个计划还有可能吗？即使如此，对"乱七八糟"的形象进行分析还是得到原型概念的帮助，因为它强调的是一种象征世界，而这个世界超逾了电视荧屏或报纸广告的流行意象，拓展到梦幻世界与**记忆**领域。

DS

互文参阅：浓缩（condensation），形象（image），精神分析理论（psychoanalytical theory），下意识（subconscious），象征（symbol），无意识（unconscious）。

深入阅读：Samuels (1985)；Storr (1983)；Jung (1969)。

咬合(articulation) * 在文化研究中，“咬合”不再带有最为人熟知的“发音清晰”之意。其用法可从“铰接式卡车”(articulated lorry)的意义上进行识别——这里的咬合意味着将两样东西合为一体。在**文化研究**中，被咬合的不是一辆卡车的两个部分，而是大规模的社会力量(特别是*生产方式*)，它们以某种特殊的构造或形构(*formation*)、在某个特殊的时刻即所谓*时机*被咬合在一起，从而为任何特定的实践、文本或事件提供结构性的决定因素。* 就像一辆铰接式卡车总有一个主驱动器和一个拖车(主驱动器虽然较小较轻，但决定着拖车的运动——*它为*拖车提供驱动力)，咬合所描述的也不仅仅是力量的合并，而是力量间的等级关系。力量并非简单地连接或接合在一起，它们是“*按支配性关系构建的*”。

这个术语出自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原指不同*生产方式*的咬合。一个社会在特定时代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会显示一种不同生产方式的咬合——比如资本的、封建的、甚至公有的生产方式同时并存——不过，这些生产方式中的某一种是*按支配（其他生产方式的）关系构建的*，或者说“凌驾于”其他生产方式并强迫它们进行调整以适应其需求，或者将它们整合到它的再生产体制中。因此，*封建的*贵族制依然存活于资本主义时代，但调整得适合于资本主义的意志；某个行业比如出版，在纯属资本主义的书籍生产方式之内保持着**作者**与出版者的封建关系；某种社会制度比如家庭，允许公有的生产方式为某种资本主义经济所利用。

但是，这个术语的使用范围已扩展到涵盖其他社会力量的咬合。比如，在一篇分析**亚文化**音乐的文章里，你可能读到有关**种族**与**阶级**如何咬合的论述；或者在一篇分析体育的文章中，读到有关**性别**与**民族**如何咬合的分析。

对那些既是马克思主义者又属于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①]的学者来说，这个术语遍布其著述。另外，它还被用于解释文化人类学的某些问题，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框架（即欧洲中心主义与现代性的框架）内，解释诸如亚洲或被征服前的美洲生产方式的具体形态。

JH

互文参阅：文化再生产（cultural reproduction），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召唤（interpellation）。

态度（attitude） * 一种基于经验或共有知识的意见、信念或**价值**判断。* 这些倾向或形成于直接经验，或通过**社会化**过程而习得于他人。在对**刻板印象**、**偏差**、**偏见**、**说服**以及调查素材进行评估时，有关态度的研究尤为重要。特别是涉及对人的态度，承认我们如何常常针对那些很少或从未接触的新**群体**表现态度就非常重要。比如，我们对记者可能形成这种刻板印象，认为他们雄心勃勃、游历广泛、坚韧顽强、愤世嫉俗等，即使我们从未见过一个记者。就此而言有一种一律化（generalization）的过程，其间从某种类型的特例中所形成的某种态度，被推而广之地涵盖这个类型的所有成员。

态度可以说由三种主要成分所构成：**认知**的或知识的成分（关于对象的既有信息）；情绪的或情感的成分（针对这种信息的"内心反应"）；行为的成分（我们采取行动时所知所敢的力度）。比如，按照这三个方面来说，一位足球球迷对其球队的历史既有丰富的了解、又喜欢这项运动，并愿意参加一些体育活动。描述知识与情感成分的性质比较困难，因为它们通常只能从行为成分上进行推断。面对调查**问卷**，人们通常给出的都是他们认为**遵从**他人对自己期待的回答，所以也就是社会认可的回答。这样一来，针对态度测验所做的反应，可能恰恰提供确证性的答案。因为存在这

① 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简称CCCS），是传播与文化研究的一方重镇，对这个学科特别是其中的批判性研究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其代表人物有S·霍尔、R·威廉斯、R·霍加特、D·莫利、J·费斯克、J·哈特利等（J·费斯克与J·哈特利也都是本书的作者）。该中心成立于1964年，后与社会学系合并，改称"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系"（CCS）。2002年6月，该系被伯明翰大学撤消，一时引起国际传播学界的震动。

种可能性，许多问卷就提些似乎迂回曲折的问题，从而希望人们识别不出测验的真实目的，从而能够提供“真实”而自然的答案。

于是，态度的测验若以答案的可靠性与有效性以及欺骗参与者的伦理而言，都被认为是很成问题的。当我们解读来自态度测验研究（特别是民意测验与市场调研）的数据时，这些都是需要留意的重要考量因素。

DS

互文参阅：偏差（bias），方法论（methodology），说服（persuasion），偏见（prejudice），问卷（questionnaire）。

深入阅读：Tajfel and Fraser（1978），McCroskey and Wheeless（1976）；Eiser（1986）。

受众（audience） * 大众传播所面对发言的无名**个体**与**群体**。* 在其早期意义中，这个术语指人数虽然较少，但却属于公众性的听众群体，他们能置身于听力所及的演出场合。戈夫曼[①]（1974）以及其他致力于**拟剧论**研究的一脉学者，使用这个术语分析了日常的互动行为，将**接触**活动分解为男演员、女演员与受众。受众的初始用法经过扩展之后，被用来描述发达工业社会中的所有成员，他们对媒介产品的使用以及同媒介产品的互动，构成“现代社会成员的一个起码标记，甚至可能是一种需求”（McQuail 1969，p. 3）。

毫不奇怪，对**大众传播**方面的研究来说，受众问题传统上形成一个首屈一指的——如果不是压倒一切的——核心，尽管优先的考虑往往被置于对直接的、非中介化的**效果**进行分析的框架内。按照早期的研究，大众媒介的受众形象都被说成是分离的、消极的、非个人化的，由此凸显出大众中的个体在强大媒介刺激下的软弱无力。这种观点现已被有关受众社会构成性质的、更复杂更有创造性的种种视野以不同形式所取代，特别是被社会化文本的因果关系所取代，这种关系（consequences）针对的是建立在

① E·戈夫曼（Erving Goffman，1922～1982），美国社会学家，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拟剧论的提出者。按照拟剧论，人生犹如演戏，社会好似舞台，每个人都分别扮演一定的角色。其间，又有“前台”（front stage）与“后台”（back stage）之分。活动在前台的是主我（I），退到后台的是宾我（me），主我演绎着人生的戏剧，宾我则从这出戏剧中抽身出来，获得片刻的休整。

不同社会群体成员与大众媒介文本间的解释性关系。

TO

互文参阅：话语（discourse），效果（effect），意义系统（meaning system），倾向性解读（preferred reading）。

深入阅读：Ang（1991）；Morley（1992）；Seiter *et al*.（eds）（1989）；Moores（1992）；Fiske（1989a①，1989b）。

作者/出处（author/ship） * 将意义归于某个具有创造性的个体化源头，以此解说意义的常识性概念。* 通常认为，作者意图制约并赋予**文本**以特定的、理当如此的解读，其**意义**被视为某种私有财产而归属于作者（尽管文本本身在某部书中可能归属于读者）。意义被看做一种个人的天资或**经验**的创造，它被径直归入作者的大脑。而解读行为被降到接受者的地步，好赖都得认真捡拾由作者通过**信道**传送来的、业已确定的意义。这种看待作者的**常识**性态度，在近来的文本批评理论中变成有争议的问题，因为它抓住一个明显的事实，即文本是由能动的人（或人们）写作或编写的，它以这个事实确证上述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意义理论。

一个作者并非"一个写作的人"。只有某些作者与作品可用于"说明"作者的意图。比如，私人的、临时的、实用的书写物通常就不被当做创造性的：书信、日记、购物清单、学校作业、书页空白处的批注、通话时随手记下的讯息、甚至"有创意的书写物"——大多数人实际所写的大多数东西。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公共领域。我们难以为下列东西找到一个作者：标签、广告、新闻、海报、街道与商店的名称、墙壁上涂写的文字、大量邮寄的广告宣传品、技术说明书等等——我们日常接触的大多数读物或许都属此类。

在创造性和虚构性的作品中，也不见得更容易找到作者。当代社会流行的许多小说都源于电视与电影，其间的作者很难确证，因为在其生产过程中有那么多人参与创作。其他创造性的作品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进行传播——故事、笑话、歌曲。这些东西也都摆脱作者的传统定义，甚至即便能将它们追溯到某个具体的作者身上。

① 即J·费斯克的《理解大众文化》（*Understanding Popular Culture*），中译本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2001）。

作者身份是文学文化与商业活动的产物；它是与**“大众”文化**相对而与“高雅”相关的杰出标识之一，被援引来说明不仅意义而且价值——除金钱外的**美学**价值或道德价值——都属于文艺批评家（以及市场经纪人）所确认的“重要”作品与作者。一旦某位作者的声名得到确立，那么任何冠以这个名字的书写物都被当做创作——这种情形甚至适用于货物清单．假定人们偶然发现一份货物清单，上面比如说签着莎士比亚的名字。这种情形是对“意味”（significance）的反讽。

所以，作者身份是加诸写作领域的一种社会制度；它不是书写的行为或职业。它是在该领域产生等级制的一种制度。作者是劳动的一种社会分工的产物，而作者身份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观念，其功能不仅在于赋予某些作品与作家以特权，而且更重要的是赋予某些思考文本意义的方式以特权。

作者身份的意识形态意味，不仅将文学质量的本源归于作品本身的各个方面——对**类型**、**习俗**、**修辞学**、互文（intertextuality）等方面的开掘，而且归于作者本身。创造性、灵感、经验、“表达”思想的能力、激情与真实：这些人的特质被视为源自一种个体的、自由流淌的意识，这种意识被假定为意义的来源，而作品仅仅是个传输的媒介，通过这个媒介伟大的思想才能流淌到读者那同样自由流淌的意识之中。

作者身份的意识形态意味，导致人们对比如“莎士比亚的真正用意何在”等问题的徒劳追问——这是一种不可能获得答案的追问，它势必导致由某位试图把某种解读确定为惟一或**真正**解读的批评家将作者的意义强加于特定的作品。换言之，任何针对“作者意图”的诉求都带有强制性与抑制性——它力图将**意识形态闭合**加诸某个文本，力图将**多义性**的潜能减到最低程度。这种诉求也是不诚实的，因为它所归因的作者意义必然属于批评家的创造。“唯意图论”的批评沦为猜测恰好不在且常已去世的作者之意，所以也就不可能核实其意图何在。

进而言之，作者的意图也不能用于说明某个文本的意义。即使能够询问作者，比如通过采访，那么出自这个过程的结果也不是有关其意图的直接说明，而仅仅是另一个文本。作者总是工作在写作领域，这是一个具有自身历史、生产方式、类型、习俗以及既定实践的自为领域。作者很大程度上是受制于他能利用的话语资源，创造性不是来自抽象的“天资”而是来自开发这些资源的能力。文本一旦写就便具有自己的生命，它的意义取

决于流传的条件以及它在不同空间与时间中的使用情况。它的意义总是多重的，总是超出作者自认为如何的范围，不管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

然而，一旦作者身份的概念这样确立起来，那么它就获得某种**霸权**。它似乎表现出一种针对终极根源，即针对一个终将限定意义方面无限可能性之偶像的病态欲望。

这种为意义确定性一根源的欲望非常强烈，以至于渗透到迄被看做过于缺乏品位而不能证明其作者的文化领域，特别是影视领域，其间“作者”（auteur）取向力图通过赋予导演以作者地位来解释某些影片。自然，“作者”导演被视为拥有在许多影片上都可看到的“意味”，而其“天资”被视为某种个人的“视像”（vision）。然而，众所周知，影片意义的根源难以确定，也就是说不存在一个根源，甚至在生产之际都不存在，更不用说一部影片大规模进入文化领域。但是，“作者”理论却认定只有一个人可以表达所有演员与剧组人员的创造性投入——这些成百上千的人经常是来来回回工作几个月甚至几年，而所有这些人都可能改变那个导演的下一步计划。而且，在一部影片的历史上，从来不清楚所有这些人中谁应该被当成作者看待——编剧绝不可能享有这个地位，这项工作不仅需要商议于导演，而且需要商议于演员，甚至近来还需要商议于制片。

电影界就像文学界一样，作者身份似乎更像是一种规划市场战略以及根据智力资产而赋予价值的途径，而不是说明意义的途径。

普通读者或观众与作者打交道时，完全不是把他们作为人而是作为文本化的东西；不管他们是仅仅接触某个文本，还是通过*互文方式*获得有关作者的知识。作者“隐含”于作品本身。所以，对读者来说，作者并非属于个人，而是属于**修辞**与**叙事**技巧的总和，这些技巧被用于勾引和吸引读者进入作品。在任何话语性文本或虚构性故事中，都有“导引”读者趋向其**倾向性解读**的技巧。这种技巧也能具有较强的干扰性与强制性——作者的序言告诉读者如何阅读书中的内容，护封上的吹捧性简介借助作者声名、营销技巧或传记的可信度以兜售这部作品。

JH

互文参阅：文化生产（cultural production），差异（difference），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发送者/接收者（sender/receiver），主体性（subjectivity），文本（text）。

深入阅读：Wolff (1981)；Barthes (1977)[①]。

自主/相对自主（autonomy/relative autonomy） * **个体**(agents)与**制度**(agencies)受制于宏大的社会—历史结构与过程之际，依然自行控制、自行决断以及能独立于那些外在力量而自行其是的程度。* 这个术语引发社会、文化及传播研究中的一个普遍性问题，它在三个不同的分析层面上被提出：

(1) *结构*（structural）*层面*：这里的问题涉及社会结构的要素或"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即它们可能借以整合的方式，或者说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它们尤同社会变迁或社会转型的问题相关联的方式。比如，进行讨论的一个持续焦点是，相对于其他结构性的力量如经济、政治、技术所产生和所塑造的意识、**意识形态**或文化运动，它们可从这些力量中获得多大的自治程度。

(2) *制度*（*institutional*）*层面*：这里所关注的问题，涉及社会组织的机构与过程之间/之内的权力关系。**广播**制度及其人员能够摆脱国家与商业化控制而自行其是的程度，为这个层面的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有用的例证。

(3) *互动*（interactive）*层面*：这里的焦点在于个人的身份、历史与行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被视为由宏大的社会、心理与历史的过程及结构所决定的产物，这同视个体为独立、自发、富有创新精神的观点相对立。

在所有这些层面以及围绕它们所提问题面展开的辩论上，同绝对的决定论相对，核心问题很少涉及绝对自主或不受约束的自由。恰恰相反，重要的问题在于特定现象上*相对自主*的程度，这里的自主在某些限定或结构之内得到重新解释。

TO

互文参阅：限定（determination），决定论（determinism），意识形态(ideology)。

① 即L·巴尔特的《神话》(*Mythologies*)，中译本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9）。

B

游吟职能（bardic function） ＊认为电视的社会角色与传统凯尔特①社会中游吟体制的社会角色具有相似性的一个比较概念。＊这个概念由费斯克与哈特利②提出（1978），以强调电视那活跃而多产的**意指**工作。这种想法认为，同中世纪凯尔特社会中那些早期的游吟诗人（bard）一样，电视媒介也是一种独特而又证明是同一的社会制度，其作用是在准许与赞助他们的统治者及庇护人（patron）同广大社会之间进行中介（mediate），并将其言其行变成一种专门的**修辞学**语言，然后向社会播报。这个概念似乎有必要取代以往的媒介观，后者所强调的是媒介过去/现在都应反映其社会。游吟职能观超越这种媒介观，首先在于它坚持将媒介的角色定为语言的操纵者，其次在于它强调媒介以积极的姿态承担**中介**的角色——既非简单地复制其业主的思想，亦非简单地重现其观众的"**经验**"。相反，这种"游吟"媒介从其呈现的社会获得表意的"原材料"，再将它们加工成独特的形式，而这些形式看似"可靠"、"忠实于生活"，并不是因为事实如此，而是由于游吟诗人的专业技巧以及逐渐同游吟演出相联系的人们的熟稔与快乐。

这种观念的一个含义表明，游吟诗人式的电视一旦确立，它就能在调

① 凯尔特（Celt），欧洲古代的一个民族，分布范围西起不列颠，东至黑海。在长期的攻掠迁徙过程中，凯尔特人逐渐融入罗马帝国，成为高卢人、不列颠人、伊比利亚人等。现代的Breton、Irish、Weish等，即为他们的后裔。其语言文化、宗教信仰、典章制度、生活习俗等，在欧洲历史上曾发生深远影响。

② J·费斯克与J·哈特利，均为英美著名的传播与文化研究学者，与S·霍尔、R·威廉斯、R·霍加特、D·莫利等同属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即CCCS）。1978年，二人曾合作出版了《解读电视》（*Reading Television*）一书，他们也是本书的作者。

解社会冲突与处理文化变迁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它所承担的意识形态工作，主要是将陌生的变成熟稔的或变成“常识”，就像它在处理表意行为（signification）——**表述**与**神话**时那样。它将根据这类熟稔化策略，尽力为冲突与变化赋予意义。因此，游吟式电视对其“母邦”（home）文化来说，是一种强大的保守力量或社会中坚（socio-central）力量。它用**隐喻**使新奇而陌生的事情具有熟稔的形式和意义。它以**二元对立**而将对立或边缘群体呈现为异端（deviant）或“异质”（foreign）。因为，它力图将所有的社会与文化行为都包括在一个共识框架之内。当它无法（正如它肯定无法）为任何已经具有某种共识与熟稔形式的群体或事情提供“补偿”（claw back）之际，其惟一的选择就是把它们表述为名副其实的希奇古怪与毫无意义。于是，游吟式电视不仅为世界赋予意义，而且标明意义的边界，并为我们展示超越那条界限的一切无谓之物（nonsense）。

JH

深入阅读：Fiske and Hartley（1978）；Hartley（1982，1992）；Williams（1981）；Turner（1990）。

基础（base） * 这个概念源于马克思对社会及社会变迁的分析，**隐喻**式地指称特定社会的基本经济结构或“物质基础”。* 其用法也暗示着马克思在这些“基础”与社会其他部分即他说的*上层建筑*之间，所区分的那种多少具有决定意义的关系：

> *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
> （Marx 1971，pp. 20～1）①

马克思力倡一种唯物史观，其中社会的变迁以及社会结构的某些关键维度如**阶级**划分，被视为源出于和发端于经济基础中的变动关系。马克思针对经济**生产**的特定社会组织而提出的概念是*生产方式*。马克思主张应将历史分为不同的时期，而每个时期的特征都取决于不同的生产方式。他把

① 译文出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页82。

这些历史时期称为原始共产主义（比如，部落社会）、古代奴隶制（比如，古罗马）、封建制（比如，欧洲中世纪）、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某种特殊的生产方式，在整合特定的生产力与特定的社会性生产关系方面总是独特的。

由生产力这个概念，马克思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塑造每个社会生产能力的物质因素与社会因素之综合运动。这些因素包括，被组织到生产过程中的原材料、劳动力、技术知识以及机器设备。而生产关系指的是，任何社会内生产力与生产手段之所有权的社会分布，以及由此导致的经济产品被分配的方式。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些关系由生产手段与生产力的私有制所建构，而这又决定了拥有与不拥有财产以及创造财富之手段的那些不同群体与个体之间的社会阶级关系。

这里需要注意的要点是，包括政治、教育、家庭与文化的上层建筑，实际上是由经济基础塑造与决定的。正如Williams（1977）所指出的：

> 对马克思文化理论的任何现代理解，都必须首先考虑那种有关决定性的基础与被决定性的上层建筑的思想观点。

所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经济基础是个构造整体所必需的概念，它能将有关传播、文化与社会的研究整合起来并赋予其方向。这个概念应仔细对待。

TO

互文参阅：阶级（class），限定（determination），霸权（hegemony），意识形态（ideology），权力（power），生产（production）。

深入阅读：Cuff *et al.*（eds）（1979）；Williams（1977）；Worsley（1982）；McLellan（1975）；Turner（1990）。

行为主义（behaviourism） * 社会科学特别是心理学方面的一种哲学，强调对行为（相对于不可见的心理过程——如思想、感情与记忆）进行观察实验的重要性。* Skinner（1974）等学者都重视研究环境影响力的重要意义，这可从刺激引发人与动物行为主义的“反应”上得到理解。行为主义理论的主要特征在于，它们始终与个体以及对个体的控制性观察——常常涉及实验室的实验——相关联。由于科学上严格的可重复性构成这种研究

的基础，因此实验过程就需要得到控制而实验数据就需要可靠确凿，这样一来不仅要对个体加以分离，而且要从老鼠或鸽子行为到人类行为进行类推（generalization）。通过行为主义的研究，据称有关行为的普遍法则也就得到确立。的确，行为主义的刺激反应模式证实了许多有关说服的研究，以及大众媒介影响受众的效果。

行为主义对其他方法的批评，如价值意味过浓、不科学、充满偏差等，招致那些强调主体性之重要与质疑个体研究之科学的研究者的睥睨。基于实验室的研究与“真实生活”存在相关性的假定受到严肃的质疑。进而言之，研究社会与社会关系的学者如果普遍仿效科学的方法，将会对行为主义的基本信条构成一种质疑。社会现象的复杂状况能以同样的方式和同样程度的自信进行分析，就像研究老鼠如何应对迷宫一样吗？

尽管存在这样的质疑，行为主义取向的研究还是不断获得许多传播研究上的资助——特别是由于它们能够提供有关社会影响与社会控制的实际建议。行为主义文献中的关键词之一是“塑型”（shaping）——即各种反应（responses）都得到其他一些人的循循诱导，这些人有选择地对“正确”行为给予表彰而对“错误”行为进行惩罚。塑型原则被用于学校、精神病院、监狱以及某些情形中的影视受众。

DS

互文参阅：观察实验法（empiricism），方法论（methodology），客观性（objectivity），实证主义（positivism），反应（response）。

深入阅读：Skinner（1974）；McQuail and Windahl（1981）①；Hall（1983）。

偏差（**bias**） * 用以说明媒介表述中假定的歪曲情形的一个常识性术语，这种歪曲情形源于对某篇报道或某个有关派别的某个方面（1）有意的偏见或（2）无意的忽略。 * 在涉及媒介，特别是涉及新闻的公开争议中，偏差的说法颇具影响力。但是，就媒介进行表述的方式而言，其实这并不是一个十分有用的隐喻。它假定，这些表述仅“反映”一个既定的、“真实的”（“自然的”）世界；它还假定，这个世界天生具有一种本质的真实，若无偏差则这种真实即可显现。这两种假定都经不住仔细推敲。事件与对事件

① 即D·麦奎尔等《大众传播模式论》（*Communication Models*），中译本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1987）。

的表述截然不同。所以，这些表述并不能单纯地反映事件；认为一个事件中仅有一种真实或一种表述的观点，通常肯定属于某种特定诉求的标志——其间某人自己的观点被归于事件本身。

与偏差这个概念相关的问题，既不在于媒介有没有特殊的兴趣或**意识形态**，也不在于它们能不能摆脱这种指责即它们对某些观点比对其他观点的表达更频繁、更系统。与偏差这个概念相关的问题在于，它过于简单化，无法解释媒介产品值得描述的真实特征。如果你把媒介想像成保龄球，若非“固有的偏斜倾向”（这个隐喻源于保龄球游戏），它会在球道里径直向前滚动，那么你势必误解媒介。进而言之，针对偏差问题的讨论多少都难免导致这样的问题，即如何确认媒介偏差所针对或所反对的那些人的身份——于是你也不得不考虑自己有没有堕入**阴谋论**。

如果完全避开这个术语，对分析的目的来说可能更有帮助——偏差本身作为一个研究对象更为合适；即把“偏差”作为媒介**话语**一个部分，而不是作为对它们的一种解释。替代偏差的分析方法与术语，可参见后面的辞条。

JH

互文参阅：意识工业（consciousness industry），文化再生产（cultural reproduction），话语（discourse），霸权（hegemony），意识形态（ideology），公正（impartiality），新闻价值（news values）。

深入阅读：Philo（1990）。

二元对立（binary opposition） * 一个源于**结构主义**的分析性范畴，用来说明意义如何在二元对立的词语系列中产生。* 基本观点如下所述：

（1）*意义产生于对立* 这是索绪尔（Saussure）[1] 语言学的一个原则，在他看来符号或词语的意义仅仅在于它与其他符号或词语相对立——其最确定的特征就是其他符号或词语所不具备的特征。二元对立是可能存在的表意差异的极端形式。在一个二元对立系统中，只存在两个符号或词语。因此，在陆地/海洋这组对立中，两个词语便互相排斥，但它们又共同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地球的表面。同样，小孩/成人也是一个二元对立的系统。这两个词语相互排斥，但在一起又涵盖了世上每个人。当然，每个人也能由其他二元对立的方式去把握，比如，在我们/他们的对立系列中——每个人要么属于要么不属于“我们的民族”。

这种二元对立，是一种文化的而非自然的特征；它们产生于表意系统及其功能，即把我们对自然与人类世界的感知经验建构得有条有理并富有意义。你或许已经发现报纸新闻与电视报道所隐含的对立关系，它们把比如卷入一场冲突或纠纷的有关各方分离出来，然后使之形成具有意义的对立。

（2）*模棱两可既形成于对立逻辑，又对它构成一种挑战* 看看我们迄今提到的对立的词语：

陆地/海洋

小孩/成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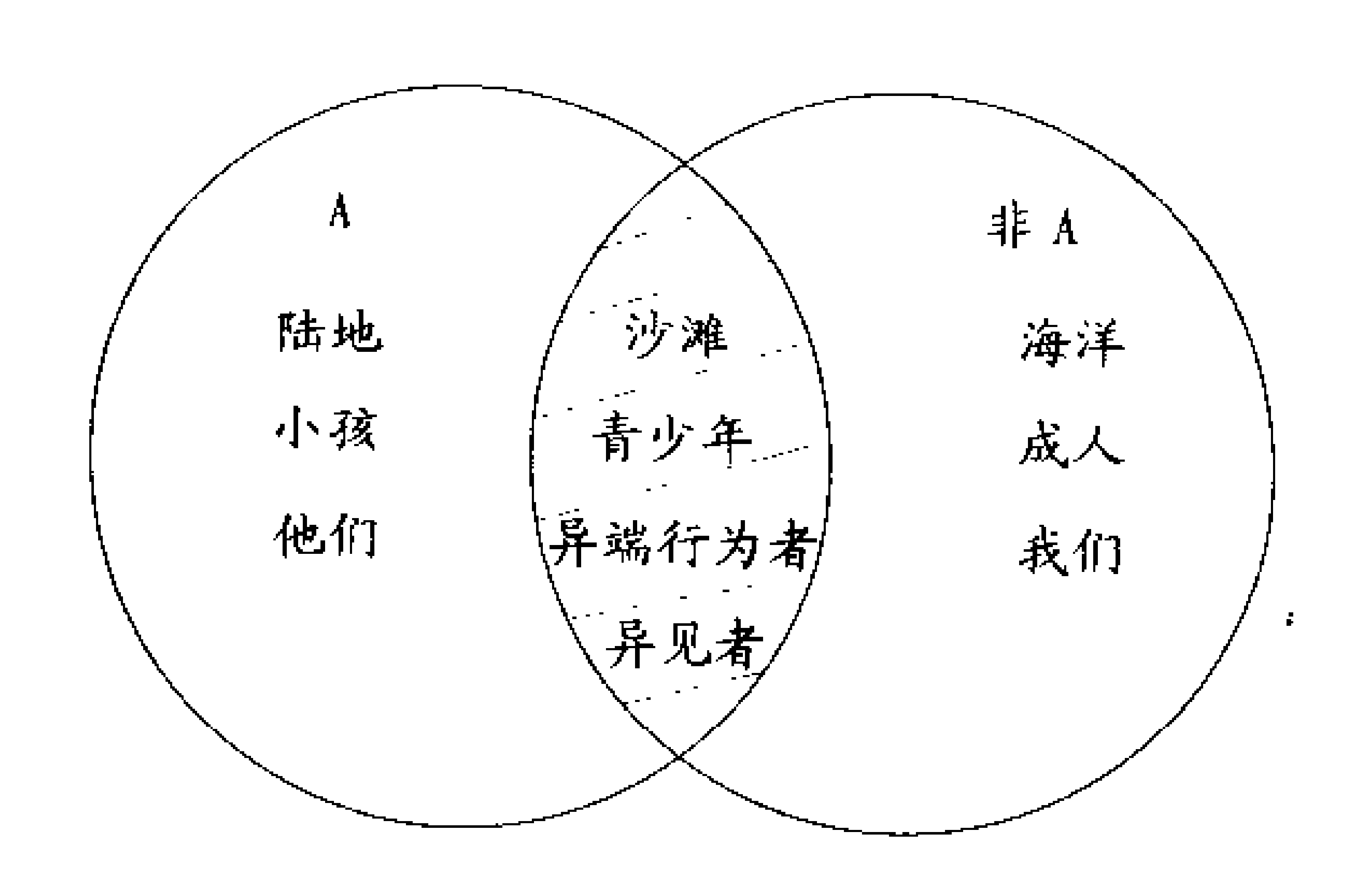
我们/他们

这些鲜明的对立，有效抑制了对立类型之间的模棱两可或重叠交集。而在陆地与海洋之间还有一个*模棱两可的类型*，即海滩——有时是陆地，有时是海洋。它的意义含糊不清，既是这个又是那个，既不是这个又不是

[1] 索绪尔（Ferdinand Saussure，1857～1913），瑞士杰出的语言学家、现代符号学先驱，其代表作《普通语言学教程》（1916）是他去世后学生们根据笔记以及他的一些手稿等材料编辑整理的。这部里程碑式的著作不仅对现代语言学具有首屈一指的意义，而且对20世纪以来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都产生深远的影响。本辞典所涉及的一系列辞条，特别是结构主义与符号学方面的辞条均与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相关。其中较常见的有“语言/言语”、“能指/所指”、“组合关系/联想关系”、“共时态/历时态”等。这里的“二元对立”即出自索绪尔的这一观点——词语的意义不是它所固有的，而是在与其他词语的相互关系中确立的。“我”之所以指自身，不是由于这个词天然具有这样的意义，而是由于“我”在与“你”、“他/她”、“它”、“你们”、“我们”、“他们/她们”、“它们”等一系列词语的对比中，形成自己独一无二的、其他词语所不包含的内容。

那个。同样，在小孩与成人之间也有另外一个模棱两可的类型：青少年。在我们与他们之间，则有**异端行为者**、异见者（dissidents）等。

按照对立逻辑，上图所示的重叠区域不可能存在。理论上讲，这是一个不应有的、让人犯难的类型。按照人类学的说法，两个公认类型间模棱两可的区域，就是可望禁忌产生之处。也就是说，任何不适于二元对立的行为或状态，都将受制于压抑或**礼仪**。比如，就像人类学家埃德蒙·利奇[1]所言，已婚状态与单身状态构成二元对立。它们是正常的、受制时间的，处于**经验**与世俗生活的中心。但是，从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转变（结婚/离婚），就成为两个类型之间的一个*过渡礼仪*（*rite of passage*）。这种类型是反常的、脱离时间的（"一生的片刻时光"），处于经验的边缘，用人类学的术语说是*神圣的*（sacred）。青少年在结构方面的模棱两可，是媒介将它作为一种反感类型而对待的原因——它也属于一个过渡礼仪而归入压抑与禁忌。



新闻常常把世界建构成二元对立的类型（我们/他们）。但是，如此一来，它就得应对不能归入这些纯粹类型的人与事。本国的对立群体与人群

① 埃德蒙·利奇（Edmund Leach，1910～1989），英国结构主义人类学家，长期执教于剑桥大学，曾任剑桥大学国王学院院长。1937年，曾在我国台湾做过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工作。在《列维-斯特劳斯》（1970）、《文化与传播》（1976）、《社会人类学》（1982）等著作中，他系统而清晰地阐述了结构主义人类学理论，并为传播学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在结构方面就模棱两可，他们既与同心同德的“我们”构成对立，但又不能总用外国人或“他们”来确认。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便常常被当做恶人、病人、异端行为者或疯子加以表述——他们是遭到禁忌的。

(3) *二元对立在结构上相互关联* 二元对立的功能使各种意义条理化，你可能会发现贯穿某篇报道的某种潜在对立所具有的种种变体(transformations)。比如，男性/女性的对立在一篇报道中可能转化为若干其他类型的对立：

男性/女性
外界/家庭
公共/私人
社会/个人
生产/消费
男人/女人

一开始，男性与女性先被视为彼此对立，互相排斥。这就立刻形成一种模棱两可或“让人反感”遭到禁忌的重叠类型。接着，我们又读到各种同样的二元对立，比如男人与女人相对就像生产与消费相对，或男人/女人：生产/消费。上列每边的每个术语的性质，都由另一边的其他术语的性质所赋予。如你所见，对立的特性能大量产生意识形态化的意义——它们都不是什么自然的东西，都难以逃脱二元的逻辑。

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生成性(productivity)，由于相互对立的术语被赋予肯定/否定的价值而得到进一步的强化。于是，在1979年国民保健计划(National Health Service)的一次行业纠纷中，电视新闻就将冲突各方建构成二元对立的，然后赋予肯定与否定的价值。这么做的简便手法，就是将冲突的一方确认为医院病人，再表现其中的儿童病号而非其他类型的病号。将价值如此赋予对立双方便建构起整篇报道，而每个人也由此具有其蕴涵：

肯定/否定
护士—儿童病人/罢工者
政府/工会
管理阶层/公务人员
“适可而止的工会成员”/“不负责任的少数分子”
我们/他们

JH

互文参阅：游吟职能（bardic function），东方学（orientalism）。

深入阅读：Hartley（1982，1992）；Leach（1976，1982）；Leymore（1975）。

拼贴/拼装（bricolage） ＊一种即兴或改编的文化过程，客体、**符号**或行为由此被移植到不同的意义系统与文化背景之中，从而获得新的意味。＊这个概念源于法国结构主义人类学家的著作，但用于晚近的**亚文化**与**生活方式**的研究中。在这个意义上，Hebdige提供了一系列有用的例证，如意大利小轮摩托车、安全别针与联合王国国旗（Union Jack）等所象征的变动时运，它们作为英国战后文化中不同青年群体的标志而被改编、被赋予变动的意味。在这些以及其他情形中，有一种趋势强调拼贴的颠覆功能。借助这些功能，主流文化或天然文化的元素被赋予新的批判性意味，并常常被冷嘲而怪诞地并置在一起。这个概念的有用之处在于，它将注意力引向构成**方式/样式**的客体、**礼仪**与意义。而且，它还要求我们把这些作为动态的历史与文化过程中的元素。

TO

互文参阅：生活方式（lifestyle），方式/样式（style），亚文化（subculture）。

深入阅读：Hebdige（1979，1988）。

广播（broadcasting） ＊通过电视媒介或广播媒介传送讯息而对接受讯息者无法施加技术性控制的过程。＊任何人只要拥有适当的接收机，并处在传送的范围之内，都能收到这些讯息。（与**窄播**相对）。从广义上讲，这个概念意味着通过电波向一种大众**受众**传送讯息的过程，因此就得用广播的**符码**与**惯例**以吸引这种大众化的受众。

JF

互文参阅：受众（audience），精致符码与限制符码（elaborated and restricted codes），大众传播（mass communication），窄播（narrowcasting）。

C

运动(campaign) * 通常借助大众媒介予以实施与统筹的一种组织化与协调化的**说服**过程，针对着公共舆论与行为以求实现--系列确定目标。* 运动可能由千差万别的**制度、群体**与**个体**为追求各自的特殊利益而发起。最出色、最明显的运动大概是政治上的运动，其目标可能包括政治上的当选，或者对某些原则或政策给予拒绝或采纳。广告方面的运动同样属于明显的例子。这一运动所考虑的目标通常在于售出产品或服务，或至少使消费者的积极态度以及由此形成的氛围得以保持。

在这两种情况下，规则一般都制约着运动的方式方法、时间安排或经费开支。运动及其组织者主要关注并据以判断的是**效果**。对这种效果进行检测与分析，既构成**大众传播**研究的--个重要问题，又成为开展这种研究的一个原由。从方法论上看，针对种种广告促销或投票选举的直接媒介效果，事实证明是个令人困惑的、难以确定的领域，极难同广泛的社会与政治环境剥离开来。

在某些情况下，媒介自身也可能发起与展开运动。由于媒介在表达“舆论”、代表“人民”即其读者或观众发言方面拥有专业能力，媒介运动总是构成广泛的社会政治冲突与社会政治进程的组成部分。

TO

互文参阅：议程设置(agenda setting)，异端行为扩大化(amplification)，道德恐慌(moral panic)，说服(persuasion)，宣传(propaganda)。

深入阅读：Hall *et al.*（1978）；Dyer（1982）；Seymour-Ure（1974）；Negrine（1989）。

个案研究（case study） * 具有深度分析、访谈及详尽经验研究等特征，针对某个特殊的个人、过程或社会事件所做的详尽观察。* 个案研究提供

的是某个情景或事件的详尽而具体的信息，并为这一研究素材（material）和广泛问题提供普遍性的关联。所以，个案研究能够同时提供说明性与比较性的资料。比如，针对1981年发生于英国Toxteth的一系列骚乱所做的个案研究（Tumber 1982），既为理解那些特定的骚乱提供了途径，又为理解其他城市甚至其他社会的其他骚乱提供了指导。

某些时候，个案研究试图将不同的视角与考虑加以整合。而在更多的情况下，它们呈现的是某个特定的视角。它们通常都承认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比如，以上面所举的个案研究为例，它仅对参与骚乱的青年人做了少之又少的访谈。一般来说，明确这种局限性，可防止研究者由于私利或**方法论**的缺陷而歪曲材料。由于涉及**参与式观察**，个案研究提供了许多可能性，但对其进行概括之际必须谨慎。个案研究的典范有Festinger等人的《*When Prophesy Fails*》（1956）与Elliott的《*The Making of a Televison Series：A Case Study in the Sociology of Culture*》（1972）。

DS

互文参阅：方法论（methodology）。

深入阅读：Tumber（1982）；Elliott（1972）；Festinger *et al.*（1956）；McKeown（1982）；Stempel and Westley(eds)（1981）。

宣泄(catharsis)　＊通过他人的经验以使欲望、恐惧与激情得到消除的过程。＊宣泄通常是指针对**受众**的一种象征净化过程，这个过程最初出自剧场，其间表演的某种悲剧情景使我们自己的忧愁获得象征化的表达与化解。据认为，这种净化过程实际上可使受众摆脱悲伤或痛苦，尽管有关这个过程如何发生或为何发生的解释依然常常含混不清。

某些有关电视**暴力**的研究得出结论，宣泄可以作为一种“安全阀”（safety valve）发挥作用，从而可以减少社会中的暴力。这些研究通常称为“宣泄研究”，但它们所青睐的证据并不令人十分信服（Howitt and Cumberbatch 1975）。

在**精神分析理论**中，宣泄更多是指受到压抑的**记忆**被释放到**意识**层面的过程，它常常通过催眠或自由联想的方式进行。这个过程可能有益于健康：因为受到压抑的记忆一旦被察觉，并被公开化，这种记忆与欲望就不难得到承认与讨论——这个过程被说成道德消毒。于是，宣泄就包含激情的释放——一个被弗洛伊德称为精神发泄的过程。

DS

互文参阅：受众（audience），精神分析理论（psychoanalytical theory），暴力（violence）。

深入阅读：Stafford-Clarke（1967）；Mortensen(ed.)（1979）；DeFleur and Ball-Rokeach（1975）[①]；Howitt and Cumberbatch（1975）。

检查(censorship)　＊对某些初始讯息进行全部或部分的封锁、管制与操纵的过程。＊检查在不同的社会与心理层面或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展开。也许，最明显的制度化与组织化的检查，都与大众媒介有关。这里，这个术语一般指那种通常由国家实施的信息管制。它表示这个过程根据某种往往并不明言的标准与**价值**而对信息进行控制与选择。这样就导致对来自一般公众的信息，或来自公众中某些特别**群体**的信息进行有意的排斥或抑制。对检查以及达到这种控制局面的法典与实践（英国的《国防机密通知》[②]、《公务员保密法》及诽谤与淫秽法等），可以进行种种不同的解释。一般来说，检查是以某种必要的安全名义提出的，它被视为一种保护“国家利益”的方式，或是为了那些易受伤害群体的道德与社会福祉。另一种解释则认为，检查不可避免地与**权力**与**作者**相联系。有能力实施检查，就意味着拥有法律资格以解释什么是恰当的而什么是不恰当的，从而对公共信息直接进行操纵与控制。这两种观点的紧张关系，在影视色情与**暴力**的争论上得到充分体现。检查的问题，对分析国家、政治与大众媒介间正常与非正常关系也是极其重要的。

在**精神分析理论**中，弗洛伊德最初曾指出一种强大的、精神方面的中介机制——“检查员”（censor），它负责将存身于无意识中的、不被社会所接受的记忆或对这种记忆的痛苦联想压抑下去，或使之在梦境中以变形的形式出现。由于持续地压抑甚或消除这种信息比较困难，于是检查员就把它转换为一种较为疏离、较少嫌恶的形式。

在无意识的检查所维持的语境中，我们可能受到意外、威胁或嫌恶的

① 即M·德弗勒等《大众传播诸论》(*Theories of Mass Communication*)，中译本由新华出版社出版（1990）。

② 《国防机密通知》(D notice)，英国政府要求舆论工具为了国家安全不要发表某些机密情况的备忘录。

震慑。我们可能拒绝承认目睹事件，或虽然承认，但拒绝承认其意义。至于这种勉强态度的原因是由于某种个人的自信，还是由于**他人**的反应而认识到公开承认不太合适，往往并不清楚。

DS

互文参阅：议程设置（agenda setting），宣传（propaganda），精神分析理论（psychoanalytical theory）。

深入阅读：(media)May and Rowan(eds)（1983）；Schlesinger（1987）。

信道(channel) * 一个源于**传播论**的术语，指的是运载**信号**的物理方式。* 光波运载的是视觉信号，电波运载的是声音信号。信道主要是物理学家与工程师考虑的问题，它与意义无关，尽管信道的物理特性对媒介及其所能运载的符码构成限制。甚至某些符码如莫尔斯电码或旗语，就是为了适应有关信道的物理特性而发展出来的。传播论关注的是对运载**信息**的特定信道进行测量的方法，以及使这种运载能力达到最大化的方法。必须把信道同**媒介**与**符码**认真地加以区分，对研习传播学的学生来说，媒介与符码属于更具生成性的概念。

JF

互文参阅：符码（code），传播论（communication theory），媒介（medium），信号（signal）。

选择(choice)① * "哪里有选择，哪里才有意义"，这是传播的一个基本规律。* 所有的符码都涉及**联想关系**上的选择，其间被选定的意义仅同本来可能入选而没有入选的意义进行比较才能确定。选择常与*连锁*(*chain*)（**组合关系**）相配合以表示**语言**的运作。

---

① 这个辞条虽短，却包含符号学的一个核心理论，展开来谈殊为不易。好在本书前后有许多辞条都从不同方面涉及这个理论，从而提供了"互文参照"。这里，仅举一例，以帮助读者理解这个辞条的意思。按照符号学的思想，任何表达式都有两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即所谓组合关系与联想关系。比如，"我读书"这个句子里的我、读、书三个文字符号的前后相续，就是一种组合关系。与此同时，"我"又同没有出现在这个句子里的"你"、"他"、"他们"等构成联想关系，而"我"的意义也只有在同这些没有出现的意义相比较才有可能。其他符号也是如此，如"书"可以同"报刊"、"文件"、"电影"等构成联想关系。详见拙著《符号透视：传播内容的本体诠释》（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

JF

互文参阅：缺席（absence），二元对立（binary opposition），换码测验（commutation text），差异（difference），语言（language），联想关系（paradigm）。

阶级/社会阶级（class/social class） * 所谓社会阶级，就是那些区别性的社会形构（sociel formations），它们由种种人群所组成，这些人群与社会的**生产**资料具有相似的关系，因而在某种关乎财产所有、**权力**及物质报酬的不平等制度之内具有共同的社会与文化地位。* 鉴于这个术语涉及现代工业社会中**社会分层**的**决定论**要素，人们会经常与之打交道。

社会阶级的基本理论即规范后来所有言说的理论，在卡尔·马克思（1818～1883）的著作中得到论述。在马克思所确立的思想传统中，社会阶级为理解社会、文化与历史的核心内容提供了锁钥。按照这种探究方向，阶级必须被理解成同特定经济生产方式和组织方式相联系的社会关系之基础。对马克思来说，社会关系与经济关系的历史发展可以划分为不同的时期，每个时期的特征都源于不同的生产方式。物品的生产与分配被解释为任何社会所必需的生存条件。马克思认为，只要某个社会被组织起来生产多于维持其生计所需的最低限度的物品，那么不同社会阶级的出现就具有历史的可能性。这里区分了两种基本的生产方式与所有制形式，区分了两种基本的社会：一种的特征在于生产资料共同拥有（共产主义方式），另一种的特征在于生产资料并非公有，而是体现为不平等分配，即一方面集中到某些群体（所有者）手中，而另一方面其他的群体（非所有者）则被排除在外。

后一类型的社会属于阶级分化（*class divided*）的社会，其首要特征在于其中的剥削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支配关系与隶属关系。马克思将它们划分为不同的历史时期，即古代奴隶制时期、封建主义时期与资本主义时期，尽管他还对它们做出了细分。在古代文明时期，主导性的生产方式可用奴隶制加以描述，其生产资料是奴隶。在封建主义时期，生产方式是农业，生产资料是土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主要的生产方式是工业，生产资料就其所有众多形式而言是资本。

从最广泛的意义讲，这种分期意味着这些社会里意义最大的社会分野在于多数阶级与少数阶级之间，前者（奴隶、农奴或无产阶级/工人阶级）

从事生产性劳动，而后者（拥有土地的公民、贵族或资产阶级/资本家阶级）则私人占有生产资料，并由于这种占有而能够侵占与控制由这种劳动所生产的剩余物品与财富。换句话说，最主要的利益冲突发生在拥有生产资料的阶级与不拥有生产资料的阶级之间。在封建社会中，这种冲突发生在拥有土地的人与不拥有土地的人之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冲突最终是在资本的拥有者与非拥有者之间发生。因此，拥有生产资料的阶级与不拥有生产资料的阶级之关系，就被解释为基本上属于剥削性与对抗性的，正如他们的*阶级利益*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一样。这些冲突构成基本的历史矛盾，这种矛盾只有通过生产方式的彻底变革才能解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马克思来说阶级冲突成为社会历史与社会变迁的“电动机”与“火车头”。历史发展的大致轮廓取决于支配阶级或统治阶级与隶属阶级的斗争，前者的利益在于保持现存的经济与政治关系及不平等状态，与之相反的后者利益则在于对此进行挑战与变革。

虽然在阶级社会中基本的社会分野在于所有者阶级与生产性阶级之间，但马克思也的确承认还存在其他阶级（比如，“小资产阶级”：店主与资本主义小型企业的所有者等）。此外，强调下面这一点也很重要，即无论所有者阶级或支配性阶级，还是非所有者阶级都不能理解为铁板一块。在某些条件下，每个阶级都可以划分为在阶级范围内拥有不同利益的*阶级群体*(class fractions)。比如，技术工人与非技术工人的关系，或者产业“集团”与金融“集团”或产业“集团”与资本家阶级代言人的关系。

于是，首先把社会阶级当做一种生产过程中社会化组织化的种种关系就颇有助益。不同的阶级地位凭经验就能得到确认，只要它们赋予个体以韦伯[①]所说的不同“生活机会”(life chances)。它们制约着获得各种社会稀缺资源与昂贵产品及服务的途径。这里说的产品包括诸如食物及所有种类的消费品，这里说的服务涵盖诸如医疗护理、教育或法律代理。由于这个原因，许多研究与检验社会阶级的努力都倾向于将阶级拆解为产品；这样就可用职业与财富作为确切表明社会阶级地位的基本标志。

超越这一点是非常重要，不把阶级局限为一种描绘社会类别（由不同类型的工作、不同水准的财富、财产、权力及地位所构成）的便利方式非常重要。对阶

①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哲学家。其学说对当代社会科学产生巨大影响，代表作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经济与社会》等。

级进行全面考量上同样成问题的，还有在**文化**范围里对阶级的确认、理解及回应。马克思提出，不同社会阶级的特征取决于不同的**意识形态**，即与特定阶级地位相应的那些“社会意识的确定形式”（1971，p.425）。而且，马克思在他所说的*自在阶级*（*class in itself*）与*自为阶级*（*class for itself*）之间做了重要划分。这种划分取决于对生产资料具有共同关系者（某个自在阶级）所形成的某种*阶级意识与阶级认同*的程度，而这种意识与认同确认了他们共遭盘剥的处境与利益。在某些历史条件下，这种阶级意识刺激了某个自为阶级有组织的社会与政治活动。在这方面，阶级就不仅像通常认为的指涉经济或金钱关系，而且对文化与文化关系的分析来说也构成核心。文化成为阶级关系获得意义的领域，在这个领域支配阶级与隶属阶级都在争夺**霸权**。近来传播与文化研究的大量工作，都能够被视为对阶级、文化与传播的相互关系所予以的共同关注。这类工作有许多都在力图分析社会阶级之间与之内那种潜在的物质或经济冲突与不平等状态，如何在文化关系与表述中得到表达与复制。

TO

互文参阅：基础（base），霸权（hegemony），意识形态（ideology），意义系统（meaning system），权力（power）。

深入阅读：Bilton *et al.*（1981）；Williams（1976a）；Giddens and Held（eds）（1982）；Giddens（1982）；Turner（1990）。

闭合（closure）　＊ 常称**意识形态**闭合。这个概念指的是种种文本策略，借助这种策略一位观众或读者被鼓励按照某种特定途径或遵循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框架，去理解一个真实的或虚构的**叙事**。＊ 意识形态闭合是所有文本的固有属性，但这个术语更经常地用于分析报纸、电视或其他主旨在于讲述有关政治、行业、社会或文化等公共事务的**表述**。闭合是**文本**的固有属性——这就是说，它不属于生产者的意图或观众/读者的意见——所以，其技巧归根结底是**修辞性**的。

闭合在媒介分析中是个有用的概念，因为它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这个方面，即种种故事都被建构得激发或鼓励某种意义，而其他理解事件或行为的可能途径则要么**缺席**，要么被阻止或被排斥。

闭合既在**符号**层面也在更高的文本层面发挥作用。就符号的情形而言，其**多重意义**由此得到“固定”，好像本该如此，所以当一个符号仅被用于（常常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暗示其诸多可能意义中的某一意义而非其

他意义时，似乎这个符号总是而且必须只能具有这个意义。比如，媒介这样闭合“青年”（youth）这个概念：往往它所暗示的不是年青的人，而是年青的男人，不是任何一个年青的男人，而是那些表现出“反社会”行为的男人。因此，“青年”的意义使由一系列共同“闭合”我们观念中那种年青人的**能指**所赋予：它以看似自然的方式所指的**意义**，乃是抢劫犯、光头党、流氓团伙、暴力行为、乱涂乱画、足球流氓等。假如我们想指“年青的人”而非与社会格格不入的人，那么我们根本不能轻易使用“青年”这个符号。媒介本身已在“青年”和诸如“小伙子”（kids）、“年轻人”（youngers）之间做了清晰的划分。

闭合也是完形心理学家所用的一个术语。这里，它是指人们的这种知觉方式，即在作为整体而被感知的范围内闭合其断层，忽略其实际缺口。

JH

互文参阅：完形（Gestalt），倾向性解读（preferred reading）。

符码（code） ＊一种符码就是一套受制于使用它的**文化**成员所（明确或不明确）赞同之规则的**符号**系统。＊这是对表意符码（signifying code）的解释，这种符码是本书读者最感兴趣的类型，但是还有种种行为符码（behavioural code），比如法律符码或英式橄榄球的两种符码（Union与League）。高速公路符码既是表意符码，又是行为符码。而表意符码具有如下特征：

（1）它们有若干按**联想关系**排列的最小单元（units），某个最小单元即由此选出。

（2）这些选出的最小单元按照**组合关系**被合成一个**讯息**或**文本**。

（3）这些讯息或文本传达的意义，是从其使用者相互赞同与彼此分享的文化经验中获得的。

（4）经由适当的传播**媒介**，它们能被传输。

（5）它们能成为对素材进行分类、组织与理解的方式，同时也能成为传输或传播素材的方式。

我们所有的社会与文化活动或产品都被转换为符码。

具有最简单形式的符码是**二元对立**符码，其中最小单元的联想关系

（paradigm）被限于两个极端：是/否、开/关、加/减或 1/0。这种对立仍可形成复杂的组合关系；事实上，最复杂的计算机就是通过二进制符码进行工作的。

相似符码（analogue code）是由自身不能区分而只能通过对其进行解释的最小单元所组成（比如，嘴的形状从微笑到咧嘴笑再到大笑的变化幅度）。*数字*（*digital*）符码的最小单元彼此能清楚区分（比如，文字、数学或音乐的成套记号——它将数字式差异加诸声音的持续过程）。数字符码较易理解与讨论，这也是它为科学所采用的原因，而美学（aesthetic）符码或感情（emotive）符码则往往更属于相似符码。

就其最小单元的联想关系而言，*逻辑*（*logical*）符码在意义上有一种公认的、解释精确的联想关系。它们仅在**意指**的第一序列（外延序列）发挥作用，并尽可能远地排斥第二序列的内涵意义（connotation）与神话（myth）意义①。数学（5-3=2）或化学方程式（H_2O）的语言，均属纯粹的逻辑符码。科学作品与客观报道都追求语言的逻辑符码。

另一方面，美学符码更多在意指的第二序列发挥作用（事实上，许多美学符码完全没有外延意义）；它们没有精确解释的意义，而是更倾向于主观性或**主体间性**。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既定的**惯例**，但也依赖自身将供其解码的线索具体化的能力。所以，美学**文本**所用的符码在某种范围对其自身而言是独一无二的，因而这种符码只有密切注意文本本身才能得到解码。

表现（*presentational*）符码使用身体作为传输工具，从而受制于当下情形；它们更像是表现发送者内在状态或社会状态的**标志**（indexical）。这种表现符码主要包括身体接触、身体距离、身体方位、外表、点头、面部表情、姿势、姿态、视线的移动与接触、讲话的非语言内容（语调、音量）。它们常被称为**非语言传播**符码（或简称 NVC）。*表现符码*产生能脱

① 这里涉及符号学的一个理论。简单说，一个符号或表达式的意义分为两个层次，一是表面的意思，二是内在的含义。所谓第一序列（the first order）即针对表面的意思，它由能指与所指所构成，这种意义又称外延（denotation）。所谓第二序列（the second order）则针对内在的含义，它也由能指与所指所构成，不过其能指是第一序列（能指加所指），而其所指就是内涵（connotation）与神话（myth）。比如，一则新闻报道的第一序列就是它所说的"事"，而第二序列就是它所含的"义"。详见拙著《符号透视：传播内容的本体诠释》（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

离其传送者的独立文本；它们能够应对抽象、缺席及泛化；用皮尔士[①]的术语说，它们更属于“**肖像**”（iconic）或“**象征**”（symbolic）。它们产生了图书、绘画、电影等。

在每个媒介中都有一系列技术（technical）符码，它们常用于表达第二序列的意义，特别是内涵意义。摄影上，我们能用聚焦、光线、**框架**与相机角度等符码去产生内涵意义；影视中，剪辑、淡入淡出与叠化等符码能起同样作用（或者说它们能表达叙事中的关系）；音乐里，意大利语的演奏演唱提示，如*活泼的*（*allegro*）、*慢*（*lento*）、*断奏*（*staccato*）等均为一种技术符码，表示的是取决于这段音乐如何演奏演唱的内涵意义。

在意指的第二序列上，还有**神话**得以表达的*文化*（*cultural*）符码。这些文化符码在某种文化的文本中是显而易见的，但在我们对自身的社会化世界加以概念化或理解的方式中也能看到这些符码的运作。

JF

互文参阅：惯例（convention），话语（discourse），精致符码与限制符码（elaborated and restricted codes）。

深入阅读：Fiske（1982）[②]；Turner（1990）。

认知（cognition/cognitive）　＊ 认知是指个体对知识的获得与使用；通过这个过程我们得以对事件与关系方面的信息加以吸收与组织，从而可被笼统地说成“知晓”这个世界。＊ 在早期心理学中，认知研究领域所吸引的学者大都对**知觉**、记忆、思考及**语言**感兴趣。其主要研究方法是内省（introspection），即一种向内审视、研究自我的主观性方法。这种研究提

① 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1839～1914），又译皮尔斯，美国哲学家、科学家、逻辑学家，实用主义的初始人，被视为美国最有创建和最多才多艺的学者，尽管他生前并不得志。在发展现代逻辑中，皮尔士曾对符号问题做过深刻而独到的论述，为现代符号学与传播学提供了影响深远的思想。比如，他曾经将符号（sign）分为三种，即肖像（icon）、标志（index）与象征（symbol）。

② 即J·费斯克的《传播研究引论》（*Introduction to Communication Studies*），中译本收入台湾远流出版公司的“传播学名著译丛”（1995），名为《传播符号学理论》（张锦华译）。

供了一些有关观察"内心世界"传播活动的有趣资料——比如，詹姆斯[1]曾针对"口将言而嗫嚅"（tip-of-tongue）现象所做的观察就是一例，即你好像忘了谁谁的名字，可又知道自己记得它。这种现象对说明记忆问题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实际练习：找来虽有名而名不大者的新闻与媒介照片，然后请一帮人说说他们的名字。面对每张作品，其中总会有一两个人出现"口将言而嗫嚅"的感觉。如果你让其他人提供暗示——比如姓名里的音节数或照片里那些名人拍摄的电影与录制的磁带，那么这种明明知道可又记不清楚的沮丧感就会强化。这一信息常常构成回忆，那些身处"口将言而嗫嚅"状态者会突然戏剧性地说出一直在寻找的字眼。这种练习可使我们观察和讨论记忆的策略——它实际上是将记忆变成慢动作，因为一般来说认知过程发生得太快，不允许对它们进行分析。

随着**行为主义**的问世，内省与认知方面的学术兴趣由于追求科学意味的**观察实验法**而衰减。这一兴趣的衰减过程延续到1960年代，其后由于用行为主义方法分析复杂的人类行为开始捉襟见肘，同时更高级的**方法论**技术也已出现，于是又把认知确立为一个基本的研究领域。正如Neisser（1976）所指出的，传播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促使人们将**信息处理**模式运用于认知活动。这种理论化进程远远超越早期内省式研究，为理解人内传播（intrapersonal communication）提供了许多思想。其他研究兴趣一直更多地指向语言的发展，比如Piaget与Vygotsky对思想与语言的关系提供了富有价值的洞见——这一个离开另一个还有可能吗？

DS

互文参阅：信息处理（information processing），人际传播（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记忆（memory），模式（model），知觉（perception），图式/基模（schema）。

深入阅读：Miller（1966）；Neisser（1976）；Phillips（1981）；Green and Hicks（1984）；Eiser（1986）。

---

① 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1910），美国哲学家、心理学家，实用主义与功能主义心理学的领袖人物，代表作有《心理学原理》（1890）、《实用主义》（1907）等。其弟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是美国著名的小说家，也是意识流运动的先驱，有《贵妇画像》（1881）等作品传世。

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 * 在个体的认知系统内，井然的态度、信仰与价值间出现的一种失衡、矛盾或冲突的状态。* 认知失调论是Festinger（1957）提出的。在这个理论看来，人们具有通过减少这种冲突以求恢复平衡、均衡或协调的**动机**。它从非常静止的视角指出，我们都在心理上尽力对世界保持一种有效的、平衡的、井然有序的看法。

一个有名的例子就是瘾君子。他/她读到一篇吸烟同肺癌有关的医学报道，由此产生焦虑，因为她/他喜欢吸烟，但又不想冒如此不快的早逝风险。认知失调论预计，这种冲突会迫使他/她设法减轻由冲突的经验所引发的焦虑。他采取的若干策略如下所示：

(1) 寻求能够支持现存**态度**的信息（她/他可能去读那些认为吸烟同肺癌没有关联的其他报道）。

(2) 直接否认或贬低与其认知相冲突的新信息（自信地断言医学界不断出现不确切的报告）。

(3) 通过质疑那些关乎世界的终极性信仰、**价值**与规定（比如，宣称一切死亡都不舒服、都不可避免，所以肺癌又怎么样?），以减轻整个失调问题的重要性。

(4) 接受失调信息，放弃对这一问题的现存**认知**——对最终的*态度改变*（比如停止吸烟）来说，这个过程可能是关键之所在。

认知失调论还认为，我们总是不断将自己的行为加以合理化与理性化，即使它们显得无理性、不相关或不必要。因此，Festinger与Carsmith得出结论（1959），报酬低而非报酬高的被试反而觉得单调乏味的实验比较有趣。① 同样，Aronson与Mills也声称（1959），当每个会员都得经历一个窘迫的人会仪式时，某个特定**群体**的会员资格就具有更高的价值。由

① 这里指的是费斯廷格所做的一项有名的心理学实验。他先让被试干一桩单调乏味的事情——翻来覆去地拧螺丝，一直拧一个小时。为此，其中一些被试得到20美元的报酬，另外一些被试则只有1美元。然后问他们对这一无聊事情的态度，结果出人意料地发现，认为这件事情颇有意思的是得到1美元的被试，而不是得到20美元的被试。简言之，报偿越少，态度改变的可能性反而越大。详见拙著《传播学引论》（增补版，新华出版社2003）。

于提出一切冲突都令人避之犹恐不及这种简易假设，认知失调论就可能遭到批评；有种种明显事实表明，人们有意去寻求冒险、动荡及产生失调的情景。为减轻冲突有些人何以采取某种策略而其他的人何以追随另外的人，对此的解释一般也是不成立的—— 可能是因为这种解释忽略了社会或文化的互动语境。

DS

互文参阅：态度（attitude），说服（persuasion）。
深入阅读：Festinger（1957）；Billig（1982）。

搭配(collocation) ＊ 日常话语中的词语连用趋势。＊ 比如，*黑暗*与*夜晚*密切搭配，它们总是一起连用。同样，*致命*(*deadly*) 与*颠茄*(*nightshade*)或*原子*与*武器*，也可以说具有同样关系。采用这种方法对意义的研究，就是按照一个词语的搭配形式考察其意义，其原则（由最早阐明搭配观的英国语言学家J. R. Firth提出）是："认识一个词语的常见搭配，也就能懂得这个词语"（对比一下维特根斯坦①的论述："一个词语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使用。"）。然而，搭配确实包含连用类型的数据统计表。事实证明要获得这些统计表非常困难，直至最近尖端计算机技术用于处理大批量数据才有可能。近来的一些字典——如《*Collins Cobuild English language Dictionary*》——就是采用这种技术编撰而成的。

MM

互文参阅：语义学（semantics）。
深入阅读：Halliday and Hasan（1975）。

常识(common sense) ＊ 其"真实性"(truth)被认为是显而易见的、自然而然的、必然如此的、永恒不变的、无可争辩的以及"我们总是/已经知道的"—

① 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1889～1951），20世纪杰出的哲学家，生于奥地利，后半生执教于剑桥大学。他一生创立两套各自独立甚至彼此对立的哲学体系，而每一体系都具有精深博大的风格，并极大影响了当代西方哲学。前期的代表作是《逻辑哲学论》(1921)，后期的代表作是《哲学研究》(1953)。就影响20世纪各种思潮的"语言"问题而论，如果说他前期的思考着眼于"体系"，那么后期的探讨则转向了"实践"—— 这也正是这里提到的这句名言所概括的精髓。

种知识类型。因此，常识也就成为非政治与非哲学的政治哲学。 *

历史上，“常识”的概念曾被用于针对教会或国家所倡导的官方既定知识而展开的激烈论辩中。它被看做一种比传统教条更具强迫性的知识类型，它所依据的论点是，如果个体的经验与信仰同教会的教诲相矛盾，那么个体经验的律令就应优先考虑。所以，常识在论辩中是一种非常有用的修辞技巧，新教徒曾用它来对抗中世纪反动的天主教会，19 世纪的政治激进人士则用它来反对既定的世俗国家。比如，以国王、贵族及中产阶级为一方而以劳动者与穷人为另一方的财富不平等分配，在宪章运动（Chartist）的宣传小册子中就被表述为一种违反常识的现象。

然而，这个例子表明常识里没有“内容”——它是一个范畴（category）而不是一套曲目（repertoire）。就现代社会而言，大众媒介尤其对这个概念加以殖民化（colonized），然后以之“证明”财富的不平等分配根本不违反常识，实际上这种现象只有作为常识才可以解释——事情本来如此，更何况其他“常识”性观念如“人性（人类本质）”（被解释为贪婪、争强好胜、不可信赖等）也表明事情确实如此。

所以，常识成为社会斗争的一个领域；互相争斗的社会群体都力图将自己看待事物的方式表述为常识性的。一旦某个群体或“集团”成功地将自己确定为常识的源头与知己，它就可能保持自己凌驾于其他群体的霸权，而其他群体的“识见”（sense）就可能成为边缘性的、陌生化的、对于同真实事物天然关联的“我们”来说甚或是危险的。

JH

互文参阅：经验（experience），霸权（hegemony），自然化（naturalizing）。

深入阅读：Bennett *et al.* (eds)(1981b)；Hartley(1982)；Fiske(1989a[1]，1989b)

传播（communication） * 大致说来有两种关于传播的定义。第一种定义将传播视为一个过程：通过这个过程，A 送给 B 一个讯息，并对其产生一种效果。第二种定义则将传播看做一种意义的协商与交换过程，通过这个过程，讯息、文化中人（people-in-cultures）以及“真实”之间发生互

---

① 即 J·费斯克的《理解大众文化》(*Understanding Popular Culture*)，中译本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2001)。

动，从而使意义得以形成或使理解得以完成。*

第一种定义的目的是确认传播过程从始至终的每个步骤，以使每个步骤都能得到恰当的研究，并使每个步骤在整个传播过程中的作用以及对整个传播过程的影响都能得到明晰的确认。拉斯韦尔①（1948）的传播模式就是如此——“*谁、说什么、通过什么信道说、对谁说、生产什么效果*”。以这种方式探究传播自然难免异议：一种异议就虑及传播意向的重要性。MacKay（1972）说道，地质学家能从岩石中获取大量信息，但是，岩石并不传播，因为它没有意向，也没有选择的权力。其他研究者把某人（或其他有机体）借以影响另外一个人的所有象征方法（symbolic means）都包括在内。对此，可参阅Sereno与Mortensen所编《传播理论基础》（1970）一书中Nilson所做的精辟概述。

第二种定义属于结构主义，它所关注的焦点是对意义形成所必需的构成因素之间的关系。这些因素分为三个主要部分：

（1）文本及其符号与符码；

（2）文本的“解读”者、形成文本与其解读者的文化与社会经验以及他们所用的符号/符码；

（3）对文本及其解读者所指涉的“*外在真实*”（external reality）之意识（我们用“外在真实”，是指一个文本指涉着其他而非自身）。

---

① 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1902～1978），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与社会学家拉扎斯菲尔德（Paul Felix Lazarsfeld）、社会心理学家卢因（Kurt Lewin）和霍夫兰（Carl Hovland）并称传播学“四大先驱”（W·施拉姆语）。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世界大战的宣传技巧》（1927），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宣传问题做了集中论述，从而与李普曼的《舆论》（1922）一起成为传播研究的开山之作。另外，他在1948年提出的所谓“5W”模式即“Who/Says What/In Which Channal/To whom/With What Effect”，以及与之相应的五类传播研究，即所谓“控制分析/内容分析/媒介分析/受众分析/效果分析”，是传播学最早也最有影响的理论模式，对传播研究特别是美国的经验式研究产生首屈一指的影响。

有些权威论者如索绪尔[①]强调“文本”部分（符号/符码/语言），其他权威论者如罗兰·巴尔特[②]专注于文本与文化的互动部分，而那些更具哲学意向者，如皮尔士[③]或奥格登与里查兹[④]则关注“外在真实”——他们称之为**对象**或**所指对象**。意义由这三部分之间的互动而产生，就是**符号学**的主要研究内容。

JF

传播论（communication theory） ＊欲将信息论的适用范围从其工程基础上拓展到一般人类传播领域的一种早期努力。＊它将传播塑造成这一过程：一个信源经过**编码**，成为一则讯息，然后沿着一条信道传输。这则讯息被其信宿接受与**解码**，从而产生一种效果。

---

① 索绪尔（Ferdinand Saussure，1857～1913），瑞士杰出的语言学家、现代符号学先驱，其代表作《普通语言学教程》（1916）是他去世后学生们根据笔记以及他的一些手稿等材料编辑整理的。这部里程碑式的著作不仅对现代语言学具有首屈一指的意义，而且对20世纪以来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都产生深远的影响。本辞典所涉及的一系列辞条，特别是结构主义与符号学方面的辞条均与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相关。其中较常见的有“语言/言语”、“能指/所指”、“组合关系/联想关系”、“共时态/历时态”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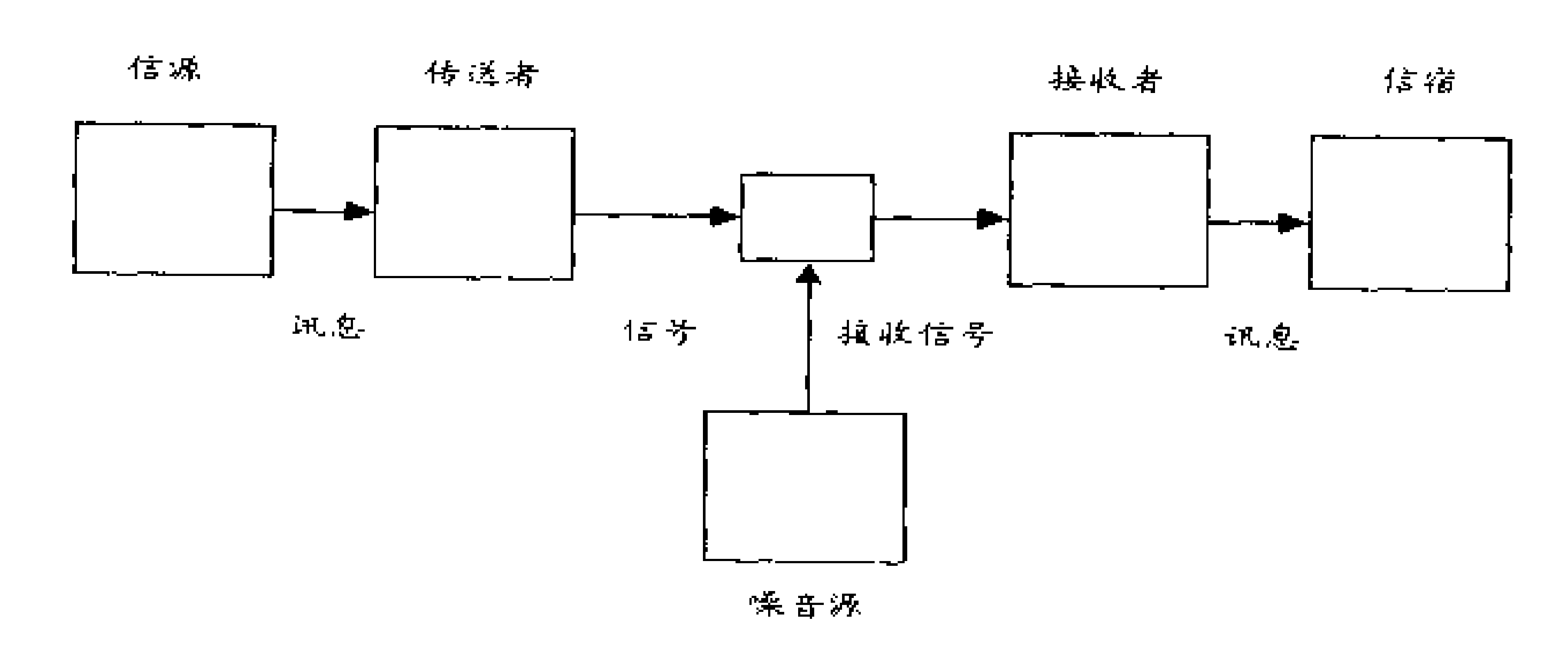
② 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法国结构主义思想家，著名作家、文艺批评家、符号学家，对符号学理论颇多建树，1976年任法兰西学院符号学讲座教授，成为该讲座的第一位学者。主要著作有《神话集》（1957）、《符号学原理》（1964）、《S/Z》（1970）、《罗兰·巴尔特论罗兰·巴尔特》（1975）、《恋人絮语》（1977）等，这些著作均有中译本。

③ 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1839～1914），又译皮尔斯，美国哲学家、科学家、逻辑学家，实用主义的初始人，被视为美国最具创建和最多才多艺的学者，尽管他生前并不得志。在发展现代逻辑中，皮尔士曾对符号问题做过深刻而独到的论述，为现代符号学与传播学提供了影响深远的思想。比如，他曾经将符号（sign）分为三种，即肖像（icon）、标志（index）与象征（symbol）。

④ 奥格登（C. K. Ogden，1989～1957），英国作家、语言学家，Basic English的创始人。里查兹（I. A. Richards，1893～1979），英国评论家、诗人。他们曾合著《意义的意义》（1923）。

1949年，香农[①]与韦弗（Weaver）最早给予这种理论以系统阐述，提出他们的基本模式：

1956年，格伯纳（Gerbner）提出一种香农、韦弗之后应予关注的更复杂、更精深的传播论。其基本假定是：传播的目的在于取得效果，如果信宿按照信源的编码对同一讯息进行解码，那么这个目的就达到了。达不到这一点的原因是，传播过程的某个步骤发生障碍或不尽完善，因此，只要使它们恢复正常就能改善效果。



1949年以来，传播论一直面临许多批评。批评者指责它是干涉主义，因为其目的似乎就是为了加强传播者对**接收者**的生活进行干涉或控制的能力。它也暗含着这样的意思，即接受者是被动的，完全受制于此前传播过程的每个步骤，因此它不能说明影响接受者讯息效果的其他因素。它强调传播的技巧、技术与过程，因此得到媒介专业人士的青睐。它自身不能谈论讯息的意义问题，也不能解释社会语境或参与传播者的关系。它是一种机械模式，而不是**符号学**模式或社会模式。不过，后来尊奉这个模式的研究者，或含蓄或明确地对这些基本缺陷做了一些弥补。拉斯韦尔的文字模式“*谁，说什么，通过什么信道说，对谁说，产生什么效果*”，建构了大多数暗自遵循这一模式的社会学与心理学方面的传播研究。**内容分析**本质

① 香农（Glaude Shannon，1916～19），旧译申农，美国应用数学家、信息论的奠基人。1941年，在美国贝尔电话实验室工作，1957年任MIT（麻省理工学院）通讯与数学教授。另外，他还是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美国科学院院士。1948年，他提出著名的信息论，翌年与W·韦弗出版《通讯的数学理论》，对此进行详细论述，从而为现代通讯与现代传播的研究奠定科学的基础，在诸多学科领域均产生巨大影响。

上也属于传播论的讯息观。重视人际技巧的许多**行为主义**心理学，是这个模式的另一种派生物。

JF

互文参阅：符码(code)，传播(communication)，控制论(cybernetics)，熵(entropy)，反馈(feedback)，信息论(information theory)，媒介(medium)，讯息(message)，冗余信息(redundancy)，发送者/接收者(sender/receiver)，信号(signal)，象征(symbol)，文本(text)。

换码测验(commutation test)　＊ 用于探究一个**组合关系**的某个特定单元(unit)是否包含意义，以及如果包含意义那么意义为何的一种检测。＊ 这种检测方式，是把同属一个**联想关系**的某个单元换成另一个单元：这种替换可以是想像的，也可以是实际的。比如，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在1982年出版的《传播研究引论》(*Introduction to Communication Studies*)中，分析过一张黑人与警察在一条城市街道发生冲突的照片，他通过想像把这条城市街道替换为开阔的城外郊区。他的结论是，这种替换改变了这个组合关系的**意义**，于是，"城市街道"这一单元便是有意义的。然而，如果将停在附近的那辆载重车替换成一辆小车，那么并不会改变这个组合关系的意义，所以，载重车就不被视为意义的承载者。通过对比"城市街道"与"开阔的城外郊区"，我们就开始探究作为一个意义单元的"城市街道"之意义。组合关系中的替换也能是实际发生的，由此导致的意义变化可以通过受众研究进行**观察实验法**式的探究。

JF

互文参阅：选择(choice)，联想关系(paradigm)，组合关系(syntagm)。

语言能力(competence)　＊ 这个词语在语言学中有专门的含义，它用于指称操

持母语者所具有的（并不明言的、直觉的）语言知识。* 诺姆·乔姆斯基[①]发展了这个术语的技能性蕴涵，以此挑战1950年代美国语言学界的学术潮流，这种潮流宣称**语言**（language）能作为独立于**意义**与潜在心理结构的纯粹行为现象而得到研究。乔姆斯基将研究的基本点，从言说行为转向我们的语言本能——特别是那些能使任何操持母语者将其母语里合乎语法与不合语法的句子区别开来的本能。以这些本能为焦点，语言学的目标就成为描述或**模式化**那些潜在地构成母语的言说语法之规则。这些规则是描述性的，但最终却等同于母语操持者之语言能力的一种正式而明确的模式。乔姆斯基特别强调到，这些规则——语法——等同于一套知识的陈述，它们必须同人们在说这种语言时的实际表现进行明晰的区分，他把这种表现称为**语言行为**。他认为既然语言的操持者说话时难免说错，如句子不全、辞不达意以及其他失误等，那么仅仅是语言行为并不能对潜在的语言能力提供可靠的指南。因此，如果你想发现人们的所知，那么研究人们的所为就毫无用处。相反，这种知识是行为必要的先决条件。

乔姆斯基把语言能力作为语言学的描述性目标分离出来，就使他陷人某种相当人为化的理想状态。语言能力属于"同类言语共同体中理想的言说者与倾听者"。因此，无论如何它都不取决于社会--文化，而是取决于一种心理上的基本官能，从而完全属于和部分属于我们的基因遗传。就此而言，乔姆斯基强调的是人类在语言中的统一性——对他来说，这是抵达言说权力的共同通道。但是，由于有意忽略语言从这种情景到那种情景的变化，他使自己面临这样的批评，即他使语言脱离社会语境，避开不同言说方式的社会评价中所存在的制度化不平等问题。同时，他对语言能力的强调也使他忽略在语言行为上明显的表达不畅及其重要规律，而近来更多的研究（参见**交谈分析**）都认为这是言说的部分社会性目的。

MM

---

① 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1928～　），美国语言学家、政治活动家，语言学上著名的"转换生成理论"的创始人，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代表作《句法结构》(1957)已成为语言学经典。同索绪尔的"语言"（langue）与"言语"（parole）的划分相似，他也提出"语言能力"（competence）与"语言行为"（performance）的对立——前者是隐含的语言知识而后者是具体的言说行为。另外，自1960年代以来，他始终反对美国以越战为开端的一系列侵略、扩张及霸权行径，由此赢得广泛的国际声誉。

互文参阅：交谈分析（conversation analysis），制度（institutions），语言（langue），言语（parole），语言行为（performance）。

深入阅读：Chomsky（1965）；Hymes（1971）。

集中（concentration） * 这个术语指的是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下所有权的日趋分散，其间生产资料的市场份额为越来越少又越来越大的集团所拥有。* 这个过程在大众传播行业的动态与结果，形成最近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焦点。大众传播行业中的这种高度集中的结构由*集中率*（*concentration ratio*）予以显示，它表示五个打头企业拥有与控制的市场份额之比例。正如Murdock与Golding（1977）所指出的："截止1970年代初，五个不同方面的打头企业分别占据了71%的日报发行量、74%的商业电视的收视人家、78%的电影市场准入份额、70%的平装书市场和65%的音像销售。"（p. 75）

涉及这一普遍趋势的过程包含整合营销、多样化经营以及国际化（Golding 1974），而所有这些均属媒介公司为保持——如果不是增强——其市场控制及其潜在利润而采取的经济战略。以*多媒介联合大企业*（*multi media conglomerates*）闻名的大型合股组织——其利益遍布英国与国际经济领域的媒介及其他部门，就是这种集中过程的必然结果，如Thorn/EMI与ACC均为这类组织的典范。这种集中的结果构成若干相关争论的基础，其核心在于**自由多元论**者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对立视角。针对媒介组织之内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动态与结果，他们形成截然不同的看法。

概而言之，马克思主义者以这种高度集中的所有权模式作为其立论的根据，认为**文化**的生产与分配取决于支配性的资本家**阶级**。因此，他们指出，大众媒介的生产最终由这个阶级的利益所控制，用以将他们那些同被统治阶级相对的**意识形态**、利益与**权力**进行合法化和再生产。自由多元论者反对这种观点，认为它富有阴谋味，过于整齐划一。在他们看来，媒介所有权在经济上集中化的权力，不再使拥有所有权的集团或**精英**拥有对媒介生产的全面控制。按照他们的观点，这些集团的权力被互相竞争的多元化利益所抵消，代表这些利益的各种**群体**包括股东与消费者、专业管理人员与制作人员、广告商与行业工会等，所有这些群体均为多元论所涵盖。

TO

互文参阅：文化生产（cultural production），多元论/自由多元论

(pluralism)，权力（power），表述（representation）。

深入阅读：Murdock and Golding（1977）；Curran and Seaton（1991）；Negrine（1989）。

浓缩(condensation) ＊两个或多个思想、欲望或记忆合为一个单独的经历、形象、象征或符号的过程。＊这个混合过程意味着给一个有待浓缩的符号增加意义与**动机**。这是**精神分析理论**的常用概念，在分析梦境与**象征**的形成方面承担重要**角色**。弗洛伊德认为，人们实际所记的梦中情景（显性内容），可能表达若干不同而又同受压抑的潜在愿望与**记忆**（隐性内容）。因此，浓缩便涉及**无意识**与意识的关联。

比如，我们可能记得梦见一个门锁。再一想，可能会联想起很久以前曾被锁在一间屋子里，感到非常恐惧。锁（借助暗示，还有钥匙）的显性内容还可能带有性的联想。这可能使我们进而想起自己最近企图开启拉康[1]的著作。所有这些隐性**意义**，都浓缩于某个记起的显性经历。

这个概念的另一适用范围是影射与双关，其间某个单独的词语或陈述可能导致两种解释——一种是公开的、可以接受的，另一种是隐秘的、遭到禁忌的。这个未予答复的问题在于，为什么我们发现它很有趣？

DS

互文参阅：动机（符号的）（motivation, of the sign），精神分析理论（psychoanalytical theory），礼仪浓缩（ritual condensation）。

深入阅读：Stafford-Clarke（1967）。

遵从(conformity) ＊对其他群体所定之规则、标准及准则的内在赞同。＊比如，我们对群体、刻板印象、法律规范、宗教教义等的遵从。遵从应区别于*顺从*(*compliance*)。遵从意味着对**他人**更强烈、更“内在”的认同，而顺从则意味着一种表面化的赞同，它很可能是基于对不赞同的直接后果所做的预期。顺从常与对权威的服从相关，正如 Milgram（1974）所做的

---

① 拉康（Jacques Lacan, 1901～1981），法国精神分析学家、结构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因对弗洛伊德的独创性解释而获得国际声誉。他强调语言的意义，认为语言最能反映无意识心灵，所以力图将语言研究特别是结构语言学引入精神分析学说。其理论与著作向以艰涩著称，故这里有所谓“开启”（unlock）之说。

详尽讨论，它也可能作为久而久之的经验化结果而形成未来遵从的基础。

研究**说服**、**社会化**、**群体**动力学及组织间关系的传播学者，一直对分析遵从问题抱有特别兴趣。遵从可能是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遵从的个体可能意识到或意识不到非遵从者（参阅**异端行为**）的**态度**。大众媒介很可能只表达遵从者的信仰、意见与**价值**，这些乃为暗指的大多数观众所持有，如此一来则进一步强化遵从。这类研究近来大多集中在有关媒介的**刻板印象**化的内容与效果上。

DS

互文参阅：态度（attitude），共识（consensus），异端行为（deviance），说服（persuasion），刻板印象（stereotype）。

深入阅读：Milgram（1974）；Aronson（1980）[①]；Rosenbaum（1983）；Brown（1986）。

意识（consciousness） * 从社会与心理的分析层面上，对情景、形象、感觉或记忆的知觉。* 讨论有关社会与文化的形成以及对社会进程的感知等内容时，这个术语被广泛地用于社会科学领域。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中，意识可能是指对有关权力关系与支配关系之“真实”事态的知觉，或是指“虚假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即同统治阶级所操控的利益与**意识形态**相联系的歪曲形态或**神话**形态。这方面的一大兴趣在于，主要的社会**制度**是同日常的、“常识”性的**价值**体系相关，甚至对关乎社会不平等的潜在问题或是歪曲，或是认为理所当然：“事物本来如此，总是如此，永远如此。”

由于无意识的作用，伴随有效的神秘化过程，资本的所有者就继续拥有资本，而资本的生产者则继续生产资本。因此，对现状的任何改变都牵涉否认神话的真实性，揭露其虚假的承诺以唤醒人们的意识。

在个人意识层面，心理学用这个概念没有多少公开的政治意味。其关键特征在于关注思想、感情或想像，而不是展开详谈细论的过程。心理学的语境中存在多种意识活动，包括白日梦、记得夜梦以及算计。就每种活动而言，那时个人总是拥有至少某种知识。关于消极意识与积极意识的区

① 即 E·阿伦森的《社会性动物》（*The Sociel Animal*），中译本由新华出版社出版（2002）。

别，Hilgard等《心理学引论》（1979）提供了有用的探讨：前者指个人从周围环境接受信息（就像我们坐在人群里观看板球比赛），而后者则涉及创造性的心理活动（就像我们在板球场考虑回家的事情）。但是，即使如此区分也依然存在问题，特别是让你把某人想像成完全顺从而毫不质疑之际。

对意识之状态的观察常常涉及使用语言、自我报告（self-report）与内省等。这体现于乔伊斯[①] 1916 年提出的*意识流*（*stream of consciousness*）概念，或弗洛伊德的*自由联想*（*free association*）技术。后者基于精神分析的兴趣而关注由意识提供的、有关遭到压抑的重要信息之线索，这种信息处于由意识而推断的相反领域：**无意识**。的确，**精神分析理论**由于总是强调无意识事件决定所有意识活动而可能遭致批评。为许多正统的精神分析学家所采纳的简单化立场，低估语言与社会结构在塑造、指引或在不同层面提供意识的力量。正因如此，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源于（反过来控制）经济不平等的解释，成为最恰当的批评思路。

DS

互文参阅：原型（archetype），咬合（articulation），霸权（hegemony），神秘化（mystification），神话（myth），知觉（perception），宣传（propaganda），精神分析理论（psychoanalytical theory），下意识（subconscious），无意识（unconscious）。

意识工业/文化工业（consciousness/culture industry） * 最终产品在于意义的大规模社会机构、组织与实践；一个针对现代大众媒介的总括性术语。* 这个有用的概念意味着，个人意识不是一种属于个人的先在或自然属性，至少就其"内容"或其特有的形式与实践而言并非如此。意识是一种社会化产物，源于意义形成的社会化与组织化资源之中。简言之，"一个时代的意识"来自特定的制度与实践。意识工业通常可涵盖**大众传播**媒介，但也可以包括诸如教育、宗教等**制度**。这些公共机构一同承担着对意识的形式、等级关系与既定感觉的再生产，而我们每个个体都以自我身份

① 詹姆斯·乔伊斯（1882～1941），爱尔兰小说家、现代派文学的代表，在名著《尤利西斯》（1922）等作品中，对语言与文学形式进行了探索，开创了"意识流"手法，从而获得世界性声望。

“栖居”（inhabit）其中。

这个术语是由Enzensberger发明的，它与**法兰克福学派**提出的文化工业（其中一个范例是黄金时代的好莱坞）观相似。

JH

互文参阅：阶级（class），意识（consciousness），霸权（hegemony），意识形态（ideology），主体性（subjectivity）。

深入阅读：Enzensberger（1970）。

共识（consensus） * 一个用来表示社会与文化经由彼此认同（agreement）特别是那些集体层面的认同而形成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是处于种种社会群体以及作为一个整体的广大社会中的人们通过论辩、努力与协商而形成的。* 没有某种程度的共识，传播活动在其所有的文化形式里都是不可能的，因为传播要求对有关表意（significtion）的**符号**及其**符码**具备最低限度的认同。作为社会群体、文化及社会的成员，“我们”在某些范围之内接受或修改各自的共识框架，由此进行传播、表现及获得各自的身份（identity）。就此而言，共识作为社会统一与团结的一种基本根源而一直得到强调。对共识的分析与阐述，为社会、文化及政治研究上的论争提供了一个敏感的焦点。

有关共识的讨论一向分为两种宽泛的立场或**联想关系**，即常说的“共识”视角与“冲突”视角。前一视角强调高度的社会共识、合作与稳定，这些都被当做自然的、正常的、对社会生活实在必不可少的条件。它还假定，作为同一社会的成员，一切人都应该赞同同样的文化，分享与遵从同样的“核心**价值**体系”或共识。因此它宣称，大家都可分享基本相同的利益，在保持现存社会与政治制度方面具有相同的利害关系。由此一来，社会共识的观念就发展为一种政治共识，既然社会作为一个固定的、和谐的整体而得到理想化的表述，既然不同的社会群体与**阶级**不存在突出的、普遍的冲突而理论上不存在**异端行为**与反抗。若真发生不一致的情况，那么它也认为有适当的、可从共识方面解释的体制化手段，以表达和总括性地解决这种“缺乏共识”（disensus）。如国家与政治制度就被解释为这个过程的核心，正像人们所看到的它们最终以共识的名义运作，一方面确保社会所有群体在做出集体决定的程序上具有同样的机会与权重，另一方面在管制与控制威胁共识价值或目标的行为上发挥作用。

社会与政治共识的观念在相反的冲突视角里并没有被抛弃，但受到巨大挑战，得到重新解释。从这一视角看，理解社会的主要术语是社会群体与阶级之间的冲突，它们的利益远非一致的、共同的，而是对立的、不相容的。其中，某些群体遭受压迫、受制于人，处于劣势，相反，另外的群体则操控权力，拥有物质与文化上的优越地位与特权地位。与其说存在某种遍及一切的社会共识，不如说不同群体的形成完全是由于它们具有不同的、往往相互对立的经验、利益以及由此引发的迥异价值体系。因此，一致性与社会团结所依据的价值，只在拥有确认共同利益的群体内得以分享与发展，而且必须置于统治阶级或集团与附属性或对立性集团之间更为广泛的历史冲突语境中才能被理解，前者希望保持与复制现存不平等的社会与政治关系，而后者可能希望彻底改变这些关系。按照这种视角，共识便难免同拥有物质与文化权力相关，尤其是同统治行为相关——在这个范围中，共识便使得并允许统治集团把自己的具体利益与价值解释为放之四海而皆准，把它们表述得仿佛具有普适而“共识”的权威性。换言之，共识远非社会认同、团结与稳定的一种自然而必然的根源，它被视为一种经由建构、引导与强加而形成的“协同”（agreement），它用来使某些统治集团受益而使那些居于附属性社会地位的群体受损。

总之，在“共识”问题不存在什么共识，这是一个颇具争议的术语，需要在它引起的争论语境中仔细考量。

TO

互文参阅：遵从(conformity)，功能论(functionalism)，霸权(hegemony)，意识形态(ideology)，制度(institutions)，意义系统(meaning system)，多元论(pluralism)，权力(power)，规则(rule)。

深入阅读：Cuff and Payne(eds)（1979）；Worsley(ed.)（1977）；Bilton *et al.*（1981）。

阴谋论（conspiracy theory） ＊一种看待**权力**关系的建构与运作的观点，它将发生于组织、**制度**及广大社会中的活动视为由某些高度协调而未必可见的少数精英所直接与有意控制的过程。＊这个**精英**集团的“隐秘”动机，一般在于将自身利益与各种确保其统治的社会与政治条件之实施结合起来。由于总是强调社会控制方面直接的**人际传播**网络，强调“阴谋”的“大战略”而不顾及其他的视角，这一理论受到严重损害。比如，从这个

视角看，大众媒介就被理解为强大的自动中转机器，直接控制在某个阴谋集团的某些强力成员手中，他们能够影响与说服轻信的受众被动地遵从其阴谋。这是一个很少或没有可信性的理论。

TO

互文参阅：权力（power）。

内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 * 以确定与计算内容的关键单元（key units）为其方法论基础而对讯息中显性内容的出现频率所做的分析。* 它注重其方法的**客观性**与可重复性，让**观察实验法**的资料本身来解释自己，从而同更具阐述性的内容研究方法形成对照。它无所偏私，它针对的是整个讯息或讯息系统，或者说针对的是统计学上的构成样本。

它是一种统计学方法，其最佳状态就是覆盖最大数量的统计单元，或整个讯息系统（比如，某次特定选举之前三周内的电视广告、大众化报刊或出版的政治漫画）。它不应该用来分析某个单独的**文本**（参阅 Fiske，1982）。

其结果可能体现为原始数据，但更经常更有用的是给出百分比。通常情况下，有必要对两组数据进行比较——电视广告上有 38％的女人是在家庭中得到表现这个事实，只有当我们把它同男人的同类数据——14％（参阅下表）进行比较才有意义。同样，一份注重质量的报刊在诸如政治或娱乐栏目上的比例关系，只有同一份通俗小报（tabloid）的同类数据进行比较才有意思。

内容分析方法最成问题的部分在于划分关键单元，也就是说，如何选择与划分用于计算的统计单元。典型的样本是——词语；栏目长度；电视剧里杀人者与受害者的种族、阶级及年龄；流行小说里已婚、未婚及订婚的男性与女性；电视剧里的职业等等。在对任何讯息进行统计学的分析之前，都必须从中划分出这样的单元，而正因如此，内容分析所声称的客观性显得最为脆弱。文本的划分方式可能无穷无尽，选择何种有意味的划分单元都不可避免地牵涉某种价值判断，而这种价值判断是内容分析方法认为应该禁止的。

下例是一个内容分析之结果的典型样本：

电视广告中男女人物出现的场景

场景	男性(n=462)	女性(n=235)
	%	%
室内（不含厨房）	11	24
厨房	3	14
户外	44	19
企业	14	7
监狱	12	10
学校	1	4
(n=统计单元的总数)	Dominick与Rauch（1972）	

语境/社会语境（context/social context） ＊ 这是一个很常用的术语，被用在两个主要方面：第一，它可能指某种社会情景或环境的直接而具体的特征，某种特定的互动行为或传播交流就处于这种情景或环境之中；第二，在某种包罗万象的意味上，它可能用于描述更大的社会、政治与历史的情势与条件，某些行为、过程或事件就处于这些情势与条件之中，并被赋予意义。＊ 就两者而言，这个术语都把注意力引向构成与制约社会活动的、虽不必然可见但仍属**限定**的力量。

JF

互文参阅：限定（determination）。

情景语境（context of situation） ＊ 这个术语由英国语言学家M. A. K. Halliday赋予异常突出的地位，以帮助说明语言据其使用情景而变化的方式。＊ 按照Halliday的说法，针对某一言语（utterance）而对语言形式的选择，部分取决于超语言的语境特征或曰情景语境。虽然语境的相关特征通常不止表示物质环境或言语场景，但它更突出地是包括这类因素，如社会关系之类型、使用媒介之性质、言语所依行为之种类以及讨论之话题等。因此，作为语言的操持者，我们不断根据情景语境而在语言的选择上做出并确认细微的调整。类似“我看见嫌疑犯沿着某大街继续往东走”这种说法，离开法庭作证的语境是不可能出现的；而在不太正式的情景语境中，同样的意思可能说成“我见他正往城里去”。

情景语境千差万别，从那些比较具有开放性与协商性的情景语境（如

家庭或同辈的交谈），到那些更具有制度化与封闭性的情景语境（如法庭程序、媒介对话、课堂讲授等）。任何社会或社会形构（formation）都势必以若干共同的、反复而突出的情景语境为特色，Halliday称之为典型情景语境。这些语境的总和，就构成社会的文化语境。就此而言，这个术语证实了Halliday著作的社会学与人类学倾向，情景语境成为语言秩序与社会秩序间一个至关重要的中介性概念。实际上，Halliday本人也承认，在提出这个概念时受惠于语言学家弗思①和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②。

作为概念，情景语境的解释力由于难于把握语言与情景的辨证关系而受到限制。一方面，语言随其情景语境而变化。另一方面，语言又主动界定与构成这一情景语境。同时持有这两种洞见而不感到循环论证就显得非常困难。

MM

互文参阅：语用学（pragmatics），语域（register），言语事件（speech event）。

深入阅读：Halliday（1978）；Gregory and Carroll（1978）；Montgomery（1986）。

惯例（convention）　＊由某一文化或亚文化的成员所共有的文本化或社会化习俗。＊惯例往往（当然也不是必须的）并不明说，它被人们视为理所当然。它们是实践与认识的习惯方式得以在某种**文化**中进行普及的途径；因此，它们来自采纳它们的成员所共有的经验，并形成大家共有的文化预期。惯例以同样的方式在**文本**与社会中发挥作用：遵从惯例的某个文本或某项行为就容易得到理解和大家认可。相反，无论是社会方面还是文本方面对惯例的破坏，都会导致他人的误解或怨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因常常破坏惯例，惯例本身才变得愈加明显。惯例属于**冗余信息**，属于**社交传播**，容易解码，对**群体**成员或文化成员构成压力。

---

① 弗思（John Firth，1890～1960），英国语言学家，以意义的语境理论著称，创立伦敦语言学派。重要论文汇集于《语言学论文集》（1957）。

② 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1884～1942），20世纪杰出的人类学家，社会人类学奠基人，以对大洋洲诸民族的田野调查及其成果著称。曾执教于伦敦大学与耶鲁大学。

JF

互文参阅：符码（code），规范（norm），现实主义（realism）。

交谈分析（conversation analysis） ＊针对交谈行为的细节而寻求模仿规律的研究。＊这种研究植根于社会学的一个特殊分支——民族志（ethnomethodology），它所关注的主要问题是确认社会成员用以理解自己日常生活的理性之基本类型与形式。就此而论，它部分属于人文社会科学对抗轻率与轻信地采用定量与统计法而进行的持续反应。

与其社会学来源完全相同，交谈分析也对基本处于社会秩序中的言谈性互动行为感兴趣。进行交谈分析的研究者，以交谈作为丰富的观察资料来研究社会成员如何通过日常的互动而获得秩序。他们把交谈视为合作建构的实践性成果，想通过仔细分析写下的谈话内容来揭示交谈者为获得这种秩序——交谈者所专注的交谈结构与他们所承担的解释工作——而采用的方法。同这一课题相一致，交谈分析详尽说明了交谈过程中如何接茬，以及茬口如何按连贯的方式加以衔接。某些类型的谈话之彼此相关，在诸如请求＋应答、询问＋回答或问候＋问候这样的对答中是可以预料的，类似这种彼此相关的对答为前后相续的谈话及其构成部分提供了牢固衔接的样本。

MM

互文参阅：话语互动/社会互动（discourse interaction/social interaction），语用学（pragmatics）。

深入阅读：Atkinson and Heritage (eds)（1984）；Levinson（1983）。

反文化（counterculture） ＊一个总括性的标签，用于表示1960年代与1970年代早期那种政治化的、基本属于中产阶级的、另类或"革命"的青年亚文化。＊这个术语为美国的马尔库塞①（1972）与Roszak（1971）等理论家所采用，它将诸如嬉皮士与学生激进运动的意识形态、实践与目标整

① 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家、社会学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流亡美国，先后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与加州大学，著有《爱欲与文明》（1955）、《单面人》（1964）。以对资本主义文明的犀利批判而著称，与马克思、毛泽东一起被1960年代反叛的青年学生奉为"三M"。

合为一个宽泛的统一表述，说明年轻一代在政治上对大西洋两岸陈旧的既定秩序所做的反抗与抵抗。与工人阶级的青年亚文化所摆出的伪装而零散的抵抗姿态不同，凭借某种中产阶级父辈文化的反文化群体，特别是其中具有良好教育背景者则明确有力地表达了一种更具条理、才智与政治意味的挑战，在对抗权威面前他们显然联为一体。

就此而言，围绕不同的社会阶级地位在决定青年人亚文化的反应方面到底孰重孰轻的论争上，这个术语占据重要而不稳定的位置。

TO

互文参阅：阶级（class），文化（culture），亚文化（subculture）。

深入阅读：Clarke *et al.*（1976）；Brake（1980）；Middleton and Muncie（1981）；Gordon（1986）。

混血语（creole）① ＊混血语就是从某种洋泾浜（pidgin）语言发展为某个群体之母语（native language）的语言。＊比如，当做奴隶劳工被捕获并运到“新世界”的非洲人，就逐渐形成一种同白人奴隶贩子与种植园主打交道的*洋泾浜语言*。不过，对他们来说十分常见的是彼此间缺乏一种共同的语言，其中部分原因在于其西部非洲的故土存在多种多样的语言，部分原因在于将个体从同一语言群体中隔离开来的人为强制政策。虽然这种洋泾浜在主人–奴隶打交道上可能敷用，但要满足非洲人之间所有的传播需求则又过于简单。这种情况下，洋泾浜的简单结构迅速精致化，特别是当小孩把它作为第一语言学习之际。事实上，在亲密而家常环境中以及为了维持非洲人自己的共同生活而对这种语言的广泛使用，促成一种*混血语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种简化的接触性语言吸取了某种既定语言的所有复杂内涵，而这个过程往往需要一代人的时间。

混血语的实际过程无法密切观察，部分原因在于它更多是同下层群体的语言相关。但是，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这个过程可能涉及语言发展与言语变化的一个极为普遍的特征。这种想法并非奇思怪想：既然英语本身源于诺曼征服者与撒克逊农奴的主仆关系，那么它也是经过一种混血语化的过

① 直译是“克里奥耳语”。克里奥耳人是指生于美洲的欧洲人及其后裔，也指这些人与黑人的混血儿以及路易斯安那人。克里奥耳语即为这些人所用的一种不同语言的混合语，如路易斯安那人和海地人讲的法语。

程才形成如今这种混合杂交的形态（随着它对法国诺曼人与盎格鲁－撒克逊人双方的作用而形成）。

MM

互文参阅：历时态（diachronic），洋泾浜（pidgin）。
深入阅读：Mulhausler（1986）；Todd（1984）。

跨文化（cross culture） ＊一种注重文化活动之相对性的比较分析。＊这种方法始于社会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旨在将你的特殊研究对象与其他**文化**的视角进行对比。于是，就有婚姻礼仪的跨文化研究、亲属关系的跨文化研究、视觉错觉的跨文化研究等。一种发人深省的跨文化比较研究表明，诸如魔法与巫术等显而易见的“原始”文化形式相对于媒介表述或科学**意识形态**等所谓“高级”形式，实际上可能并非多么格格不入。

事实证明，对专注于社会**规范**、**价值**、**规则**与**角色**之相对基础的研究者来说，跨文化分析十分通行。以分析**异端行为**为例，如下这点就值得注意：在某种文化中可能是不可接受的，在另外的文化中则是可以接受的。然而，一旦意识到研究者个人的文化视角会干扰对某个“异己”**群体**的观察与分析时，就会出现重大困难。当观察者与被观察者的**语言**明显不同之际，这个问题就尤为突出。

JH/DS

互文参阅：方法论（methodology），参与式观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
深入阅读：Beattie（1966）；Harris（1977）；Leach（1982）。

文化（culture） ＊感觉、意义与意识的社会化生产与再生产。将生产领域（经济）与社会关系领域（政治）联系起来的意义领域。＊你若以文化作为分析性概念，或者说同其用法打交道，那么不可能仅用一个定义解释所有此类问题。

不过，我们可能会经常确定地、毫无争议地用到或读到这个词：威尔士文化、青年文化、一位文化人、维多利亚文化、工人阶级文化、知识分子文化；甚或人工养殖珠（cultured pearl）、人工培育菌（bacterial culture）、农业（agriculture）、土地耕作（cultivation）等。如果你留意即使在这些例子里，文化一词似乎都意味着若干不同的事物，那么问题也就在所难免。被这个单独术语所包含的所有这些名堂，到底有什么共同之处？

很奇怪，回答是没有什么共同之处。文化一词属于**多重话语**：它能在若干不同的**话语**中游走。这意味着你不能将某个固定定义引入任何文本与所有文本，并指望都讲得通。你不得不做的，就是识别话语性的文本本身。它可能是民族主义的话语、时尚的话语、人类学的话语、文学批评的话语、葡萄栽培（viti-culture）的话语、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女权主义的话语、**文化研究**的话语、甚或常识的话语。对每种话语来说，文化的**意义**都取决于关系，或者说取决于否定性，即取决于它在特定话语中同其他意义的差异，而不是取决于肯定性，即取决于什么内在的或不言而喻的、永远都被指认为文化本质的属性。进而言之，文化这个概念的意义也不能用不关话语的现象、行为或客体予以"确证"。这个术语指涉什么（其**所指对象而非所指**），取决于话语性文本中的这个术语本身而不是其他什么。

有鉴于此，得知文化的确切含义与用法源于它在不同话语中的使用历史，也就不足为奇了。最初，它产生于某种纯粹的农业文明；文化被当做耕作土地、耕耘植物，文化就是耕种。由此引申，它又包括从牡蛎到细菌的生物文化。类似这种培育性的活动不仅意味着自然生长，而且还意味着对"自然"物种的人为调理，使之变成一种期望的"培育品种"——具有选择、提炼或改良等特性的品种。

若将所有这些意思都用于人，那么显然这个术语可为心智的耕耘提供一个内涵丰富的隐喻——文化就是具有出产优异统治者之"自然"能力的人为农业。文化一词的这种用法与现代市场经济的第一个阶段——17与18世纪农业资本主义的确立基本上同时出现，不是没有意味的。对那种并非由于"天然"缘故（借助世袭的神授权利）而胜任统治但却拥有强力的人而言，弄懂他们的产生情形需依据他们本身以及他人的利益，依据对文化的这种隐喻所做的系统散布。

然而，早期依靠土地的贵族资本家所拥有的霸权，到19世纪就受制于更加分崩离析的都市化、工业化及商业资本的进程。文化刚被确立为一个可以任意指称统治者而不会得到底层反对的术语，经济与政治的变革就开始挑战这种自然化、文化化的统治权利。企业式资本主义与帝国式资本主义，似乎都不对文化心存敬意。相反，这个术语遭到马克思的指责（对富人来说文化意味着神奇美妙的作品，而对穷人来说就意味着垃圾与腐朽），显然同样也受到资本家与中产阶级的轻略。接下来就由知识阶层，特别是其中自由—保守的、道德主义—人文主义的文人雅士来捡起这个概

念了。此时即19世纪中叶，文化开始被研磨成一个相当精确的概念，直到今天依然在发生影响。

特别是经过马修·阿诺德[①]及其信徒的努力，文化不仅成为对物质完美的追求，而且成为经由“伟大”文学、“精美”艺术与“严肃”音乐等知识与实践而对精神完美的追寻。既然目标是完美而不仅仅是理解，在于精神化而不在于物质化，那么文化也就被视为对“辨别力”与“欣赏力”的培养，这些能力都植根于对“世上最佳思考与言说”的敏感。于是，文化批评家便力图准确描述与确定何为“最佳”。但是，这类批评家也总想把自己视为严阵以待的共同体，对抗物质化文明与科学化技术的侵蚀，从而保全文化的“芬芳与光芒”，并向**大众社会**中愚昧无知的民众传播文化。在这样的情形下，发现文化的“宝库”被假定为一种属于前一工业化的历史与非一工业化的意识也就不足为奇了。将文化作为严阵以待捍卫完美这种观念的当代倡导者，在为政府、管理层、知识界、甚至**广播**界中（由此他们的特殊兴趣可以表述为普遍兴趣）位居高层的**精英**提供一种意识形态方面一直颇有影响。

文化尚未从这一历史中恢复。这个概念本身经历了一段非殖民化(decolonization)的时期。那些反对文化的精英观者认为，这种观念排斥大众，只余一个“文化的”少数和一个“非文化的”多数。而且，在这种文化分野与其他社会分野——比如**阶级**、**性别**与**种族**之间，似乎某种程度上存在奇怪的一致性。似乎文化批评家的“精英”话语不仅竭力保全永恒普适的珍宝，而且，虽不明显但很直接地将阶级与其他类型的社会精英等同于**文化资本**。消解这种精英而高雅的英国文化及其优越性的斗争，最早

① 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1822～1888），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诗人、文学与社会评论家，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1869）等著作中，对当时英国人的自满、庸俗与拜金主义进行了著名的抨击。他把英国人分为“野蛮人”（贵族）、“市侩”（中产阶级）和“平民”，其中市侩是最具影响的主导力量，他们粗野则民族粗野，因此必须以高雅脱俗的文化对他们进行感化。

是由霍加特（1957）与威廉斯（1958）[1] 发起的。一开始它被纳入文化研究的形态，其间文化这个概念经历了重大转变，即趋向本辞条开头所提供的那种解释。1960 年代后半期以来，文化的观念主要在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的框架中得到修订。尽管这些问题还远未澄清，更不用说解决，但它们可以得到陈述。现在，文化被视为社会活动中的一个决定性部分而不仅仅是一个被决定的部分，所以，对社会权力不平等状态的再生产而言文化是个重要领域。

JH

互文参阅：阶级（class），差异（difference），话语（discourse），霸权（hegemony），意识形态（ideology），语言（language），自然/本质（nature），大众（popular），现实（reality），意指（signification），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主体性（subjectivity）。

深入阅读：Williams（1981）；Turner（1990）。

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 * 文化研究一直专注于社会关系与意义之间的关系——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专注于社会划分（social divisions）被赋予意义的方式。* 一般来说，文化被看做这样一种领域，其间**阶级**、**性别**、**种族**和其他方面的不平等都被**自然化**，都以（尽可能）隔断这些不平等与经济—政治不平等之联系的方式被**表述**。反过来说，文化也是不同的附属群体（subordinate groups）借以和由以生存以及抗拒其附属地位的方式。于是，文化成为争夺与确立**霸权**的地带，所以是"文化斗争"的场所。

显然，这种文化研究的取向迥异于"文化批评家"，因为他们所说的文化属于艺术、美学与道德性/创造性价值的领域。最重要的是，文化研究不是参照内在或永恒的价值（怎么好?），而是参照社会关系的全景图

---

① 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威廉斯（Ramond Williams），均为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奠基人与代表人物。以他们为核心的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中心，一直致力于当代文化与社会生活的研究，其间尤以关注工人阶级及普通人而引人注目。霍加特的《文化知识的用途》（*The Uses of Literacy*）、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Culture and Society: 1780 – 1950*）』与《漫长的革命》（*The Long Revolution*）、E·P·汤普森（Edward Palmer Thompson）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等，均为这方面研究的代表作。

（谁的利益？）来说明文化的差异与实践。因此，任何从文化批评的**精英**传统上对“文化”与“非文化”的人或事进行区分，现在都被按照**阶级**的话语来对待。这种区分本身以及与之相关的评价和歧视，都被分析为（而非假定为）：意识形态的表述。

这种文化研究受到这样一种斗争的直接影响，即对这个传统意义上的概念进行非殖民化，并对其隐瞒自己在复制阶级与其他不平等状态上的角色这一倾向进行批判。因此，文化研究领域陆续出现一批著作，力图恢复与评定那些迄今为止被忽略群体的文化。这种研究最初需要将注意力放在工人阶级文化的历史发展与形态方面，以及对当代各种**大众文化**与媒介的分析方面。

与传统的学院化学科不同，文化研究没有（或者说不寻求）界限分明的知识领域或学科领域。它是在各种学院化**话语**的边缘地带兴起的，同时也是借助同这些话语的不断交叉而兴起的，特别是那些文学、社会学与历史学的话语；等而次之也包括语言学、**符号学**、人类学及**精神分析理论**的话语。一来是作为 1960 年代（这个年代曾目睹**结构主义**、**符号学**、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在国际上的迅速发展）思想剧变与政治动荡的一种结果，一来也是作为对此的反应，文化研究由此进入一个理论著述的繁荣时期。其目的在于弄清文化（感觉与意识的社会化生产）本身应该如何解说，以及文化与经济（生产）和政治（社会关系）的关系应该如何解说。

这就需要对基于历史的确定理论**模式**进行详尽阐发，需要对某些组织化的核心概念（比如，**阶级**、**意识形态**、**霸权**、**语言**、**主体性**）进行重新定义。同时，经验层面的注意力被聚焦在对如下这些文化实践与形式的人种志研究与文本化研究上：这些实践与形式似乎显示着人们如何利用身边现成的文化话语以抗拒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尤其是引人注目的青年**亚文化**（1950 年代穿得花里胡哨热中摇滚乐的男阿飞［teds］、飙车族［bike-boys］、嬉皮士、光头党［skinheads］、朋客），作为“借助**礼仪**进行反抗”的案例而得到研究。

随后，女性主义理论与政治的发展对专注于男性亚文化（male subcultural）行为的研究偏向提出挑战。眼下，文化研究正进入将女性主义与**多元一文化主义**相结合的阶段。这些结合的结果尚未完全显示出来。

通观其不长的发展历史，文化研究一直兼具关注研究方法与学院化学科之政治性的特征。它对**客观性**与**观察实验法**的**意识形态**不断进行批判，并将其他学院化学科常常任其暧昧的事情明朗化——知识的生产总是按照

那些掌控权力者或那些争夺这一掌控者的利益进行。

JH

深入阅读：Hall *et al*. (eds)（1980）；Turner（1990）；Carey（1989）；Grossberg *et al*. (eds)（1992）。

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　* 这个术语最早是在皮埃尔·布尔迪厄[①]的著作中得到专门论述，用以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实践、价值及语言特征的不平等分布。* 正如不同的社会**阶级**与**群体**可以用他们占据经济资本从而占据物质**权力**的差异进行解释，布尔迪厄同样认为，他们必须被视为相应地拥有不平等的文化资本与象征权力（symbolic power）。布尔迪厄最关注的焦点一直是教育体系，在他看来它是作为形形色色的文化资本得以分布、交换与分类的"集市"而发挥作用，因此它在繁育（reproducing）潜在的阶级关系。这个术语为这些复杂的问题提供了一种有用而简略的表达方式；它能够并应该被扩展来讨论**性别**、**种族**与其他社会划分。

TO

互文参阅：阶级（class），文化（culture），文化再生产（cultural reproduction），话语（discourse），霸权（hegemony），生活方式（lifestyle）。
深入阅读：Bourdieu（1984）；Garnham and Williams（1980）；Featherstone（1987）；Robbins（1991）；Murdock（1989）。

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　* 既属于更普遍的帝国主义进程之组成部分，又属于这个进程之产物，通过这个进程某些经济上的主控国家便系统地发展与扩展了对其他国家的经济控制、政治控制与文化控制。* 从直接意义上讲，它导致有钱有势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和西欧）与相对贫弱的欠发达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和南美、亚洲、非洲的民

① 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1981 年以惟一的社会学院士入选法兰西学院。一生著述颇丰，计有 30 多部专著和 300 多篇论文，译成中文的有《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自由交流》、《关于电视》、《实践与反思》、《艺术的法则》等。他曾提出三种主要的资本形式，即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而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又是两种最主要的资本类型。虽然文化资本具有相对的自主性，但归根结底还是受制于经济资本。每个人所占有的资本决定了他在社会中的位置，而这一位置又塑造了他的文化习性。

族国家）之间形成支配、附属和依附的全球关系。文化帝国主义指称的就是这一进程的重要方面，即来自支配性国家的某些产品、时尚及风格样式（style）得以向依附性市场进行传输，从而产生特定的需求与消费形态的运行方式；这些特定的需求与消费形态既得到其主控性来源的文化价值、观念和经验的支持，又对这些文化价值、观念和经验予以认同。在这种方式下，发展中国家的本土文化越来越遭到外国文化，常常是西方文化的控制以及不同程度的侵犯、取代和挑战。跨国公司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因为其目标就在于通过全球化经济以助长其产品的扩散，而这终将使那些符合资本主义体制的意识形态在国际间获得传播。

大众媒介是最具影响力的制度化方式之一，通过大众媒介这一普遍的进程才得以组织和实现，而媒介帝国主义（*media imperialism*）这个术语常被用于凸显其特殊作用。对世界范围的媒介关系所做的分析，显示了 Boyd-Barrett（1977）说的"国际媒介流的单向性"。这就使诸如电影、电视节目、音像制品、新闻及广告等媒介产品，永远成为由极少数国际媒介产品的主控来源（最突出的是美国）向发展中国家与文化语境中的媒介体系进行的单向出口。

TO

互文参阅：全球化（globalization）。

深入阅读：Boyd-Barrett（1977）；Tunstall（1977）；Smith（1980）；Tomlinson（1991）[①]。

文化生产（cultural production）　＊感觉、意义或意识的社会化生产。文化商品的工业化生产。＊文化生产这个流行开来的术语，是强调**文化**的制度化特征与社会化特征，从而相对于那种广泛持有的信仰即文化源于**个体**的灵感与想像。（参见 Wolff，1981）

有关这个术语在分析广播电视与电影方面的特定用途，请参阅 Ellis（1982）。

JM

---

① 即 J·汤林森的《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中译本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9）。

文化再生产（cultural reproduction）　＊文化再生产是某种社会形构（formation）力图保持与永远保持其意义生产（sense-making）之结构、形式与既定主体的总体过程：它力图把持并确定某个社会的未来表述与话语，以便对现存权力关系进行再生产（reproduce）。＊这个术语十分普遍地用于**文化研究**，表示文化领域作为一个为争夺社会利益而在**意指**方面进行不断斗争的竞争场所发挥作用的方式。其结果在任何时代都或隐或显地有利于解释支配阶级的利益，有利于他们的表意实践（signifying practices）。于是，文化再生产就是力图使统治集团利益（一般按照**阶级/种族/性别**的语言来理解）的社会权威**自然化**与合法化的过程。然而，文化再生产也包括对意义生产的这种合法化之形式与实践的反应与抵制，以及对这些形式与实践的背离。因此，这种语境下的再生产就是一个关系化的术语，它所指的不是预先确定的或没有矛盾的、由现在到未来的一脉直线传送，而是一种复杂的个人化与制度化的关系网络，它们既相互冲突，又相互一致。于是，什么能够得到再生产不是一个预知的结论，而是特定空间与时间中运行的文化力量此消彼长的结果。

JH

互文参阅：社会化（socialization）。

控制论（cybernetics）　＊对自动调节系统的研究，某个动作的结果通过这个系统被反馈到其源头，以便使动作的发动者能对随后的动作进行必要的调整。＊因此，一个恒温器能将信息反馈到中心供暖锅炉，然后锅炉根据室内温度调节其输出，或是机器人胳膊上的一个传感器将信息反馈到控制系统。**接收者**针对**发送者**的反应（reaction）这种反馈，对传播研究来说是最相关的控制论概念。

JF

互文参阅：反馈（feedback）。

D

深层结构（deep structure） ＊以尽可能抽象的形式表现某个句子结构的一种方式。＊对任何语言来说，句子结构都可以在两个层面上得到表现——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对表层结构的表现更接近于句子的使用形式。对深层结构的表现则比较抽象，它试图获得句子构造中更基本更普遍的特征。这一区分出自诺姆·乔姆斯基①的著作。他认为，如果一方面是模棱两可的表达，另一方面是结构不同而意思相同的句子，那么对于这种相差悬殊的表层现象就有必要用深层结构进行说明，他由此证明这种区分的正当性。

在模棱两可的情况下，一个句子比如“猎人射中太糟了”(the shooting of the hunters was terrible)的表层结构，至少可以按两种方式来理解——或是“猎人的射击技术太糟了”，或是“猎人被射一事太糟了”。这两种理解句子的方式，对应着嵌人表层结构的两种非此即彼的深层结构。在一种深层结构里，猎人是射击行为的主语；而在另一种深层结构里，猎人则是射击行为的宾语。因此，这个句子至少具有两种深层结构。

对结构似乎不同的句子来说，其中可能有一个共同的模式。比如，“政府禁止这个节目”的句子，表面上不同于“这个节目被政府禁止”的句子。但尽管这两个句子的成分排列非常不同，基本意思却是相同的。这

① 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1928～　），美国语言学家、政治活动家，语言学上著名的“生成转换理论”的创始人，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代表作《句法结构》(1957）已成为语言学经典。同索绪尔的“语言”（langue）与“言语”（parole）的划分相似，他也提出“语言能力”（competence）与“语言行为”（performance）的对立——前者是隐含的语言知识而后者是具体的言说行为。另外，自1960年代以来，他始终反对美国以越战为开端的一系列侵略、扩张及霸权行径，由此赢得广泛的国际声誉。

是因为，这两个不同的表层结构具有同一个嵌人其中的深层结构。

在其著作里，乔姆斯基又提出一组使两个层面的结构互相关联的具体规则。深层结构经由**转换**的**规则**而被**转换**为表层结构，由于重新安排句子成分，由于添加或删除它们，深层结构也被改变。不过，这种思路不必局限于某种语言的句子分析。它也能应用于一系列的文化问题，比如梦境、**神话**与故事。表面上看似不同的神话，可能通过某种共同的深层结构而发生关联。某个故事可以从不同的视角重新讲述，以便两个版本由于具有共同的深层结构而发生关联。

MM

互文参阅：句法（syntax），转换（transformation）。
深入阅读：Chomsky（1965，1968）。

防御机制（defence mechanism）　* 个人企图保护自己避开迫近的危险，从而保持一定安全感的某种过程或技巧。* 这个概念在**精神分析理论**中得到广泛使用，按照这种理论防御可由若干方式实现。其目的往往在于减少焦虑、避免痛苦或拒绝自我批评。防御的主要技巧包括：（1）**认同**，即个体采纳他人的目标与价值，由此获得的防御来自**群体**的支持；（2）文饰（rationalization），即通过貌似合理而可能并不总是完全切题的解释，来证明受到批评的行为是正当的；（3）回归（regression），即返回早期的心理状态（如儿童状态），这种状态的特点是易冲动与简单化；（4）**投射**，即自我那些不被接受的特性被归于——可能是虚假地归于他人。

关注**知觉**的**认知**心理学家，为此提供了实验性分析。某些证据表明，人们对短暂显现的威胁刺激或不快**刺激**要么不予理会，要么渐次承认：这种现象同**检查**和压抑问题的讨论有关。但正如Dixon（1971）所指出的，情况远未分明，因为那么多知觉性防御**实验**都要求被试报告或承认不容于社会的信息，而其间的任何拖延都可归结为迟疑或窘迫，而非真正的检查或错觉（misperception）。

DS

互文参阅：投射（projection），精神分析理论（psychoanalytical theory）。
深入阅读：Stafford-Clarke（1967）；Dixon（1971）。

指示词(deixis)　* 自身的确切意义总是依赖其特殊的**情景语境**之词语或表达。*

实际上，指示性一词就具有从文本到超语言(extra-linguistic)语境的外向指示性(指示词源于希腊语的"显示"[to show])。它们包括这种词语：这个、那个、这里、那里、我们、你们等。可以说，指示性词语有三大类型：人称指示词，如我、你、他/她/它、我们、他们、我的、我们的、他们的；时间指示词，如现在、当时、昨天、今天、明天；地点指示词，如这里、那里、别处(*away*)、此间(*this*)、彼处(*that*)。

之所以关注如此明显的常用词语，部分原因在于它们根据不同的指涉对象而使其意义游动于语境之间：例如，"我"所指涉的对象就是在说"我"之际的那个人。这里会给人的早期语言发展带来问题。正因为指涉对象总在游动，小孩就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来辨别指示词的意义，其间他们可能误用其词，颠倒其义，比如，他们说"抱抱你，爸爸"，而不是说"抱抱我，爸爸"。

关注指示词的原因也在于，它提出了涉及**语言**与**意义**的至关重要的问题。对指示词的思考，有助于揭示许多言辞的意义并不纯粹在于这些言辞本身，而是依赖说它们的**语境**。因为，只有参照语境，我们才能解释特殊的指示性词语所表达的特殊意义。

MM

互文参阅：情景语境（context of situation），语用学（pragmatics），所指意义（reference）。

深入阅读：Levinson（1983）；Lyons（1977）。

依赖论（dependency theory）　＊假定大众媒介对我们的社会至关重要，我们都依赖大众媒介以承担某些社会功能的一种理论。＊它源于**功能论**的社会观，认为我们都依赖媒介提供生存环境的信息、文化**价值**的传播、娱乐活动以及对关键性社会问题的辨别和解释。如果没有媒介来履行这些必要的功能，那么作为个体我们就将陷入一种**失范**状态或社会隔离状态，我们现在所知的社会就将崩溃。这个理论如今已经过时，证明并不真实，因为它过分突出媒介，而忽略诸如家庭、教育、宗教、政治等其他社会制度的作用。

TO

互文参阅：功能论（functionalism）。

深入阅读：DeFleur and Ball-Rokeach（1975）[①]；McOuail and Windahl（1981）[②]。

解除管制（deregulation） ＊ 1980年代源于美国的一个术语，指对种种公共服务与控制体制的系统化重建，并以直接出自商业化与市场化运作的体制取代它们。＊ 在英国与其他国家，解除管制构成那套影响广泛的修辞话语的组成部分，这套话语被用于描述和实行对主要公共事业的私有化。以往按照国家投资与控制方式组建的公众服务机构、公共事业的垄断部门、提供和确保诸如卫生、电信、天然气、电力的公共服务行业与其他服务行业等，都直接按照利润、投资与消费需求的市场力量进行重组以展开竞争。因此，解除管制的"解除"就意味着国家权力的明确解除或"出局"，意味着分割的公共权力对商业化的市场竞争"开放"。

解除管制的倡导者大都认为，最有效果与效率的公共服务是那些由商业化市场所提供的。针对这种观点，批评者指出"解除"（de）管制实际上是"重新"（re）管制，它使资产与控制从公共领域转入私人手中，同时伴随民主责任与社会责任的消失。这方面，有关解除管制的争论，常常提供的是两种涉及未来消费者与消费的对立观点。对政治右翼来说，解除管制是扩大服务的选择性与质量的关键所在。而对政治左翼来说，解除管制则使那些能够和那些不能够参与、拥有或控制的消费者之间的分野又原原本本地恢复原状。

在一种比较具体而非宽泛的层面上，就解除管制的政治与文化影响所展开的争论，涉及一系列与大众媒介有关的问题，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广播行业的组织与业务方面的进展。比如，在英国大量的争论都是由保守党政府针对电视与广播行业推行解除管制的政策所引发的。这一争论还包含卫星的发射与其他新媒体与信息技术。

TO

互文参阅：公共广播系统（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

① 即M·德弗勒等《大众传播诸论》（Theories of Mass Communication），中译本由新华出版社出版（1990）。

② 即D·麦奎尔等《大众传播模式论》（Communication Models），中译本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1987）。

深入阅读：McQuail and Siune(eds)（1986）；Negrine（1989）；Scannell（1989，1990）。

限定（determination）　＊社会与历史条件划定界限，以使文化产品与社会活动能在这种界限之内形成并获得其具体形态的过程。＊按照社会学理论，面对直接观察而自我呈现的现象（**观察实验法**中的事实）很少依表面价值被采纳，因为，观察实验法中的事实面对直接观察从来都不是*径直*呈现自我。任何行为与行为对象都存在于某种关系化的结构之中，这种关系既包括它们与同一系统其他行为与行为对象的关系，又包括它们与其他系统的关系。同时，它的存在也与先在的既定条件有关。这种使某个行为对象或行为确定的（观察实验法的）形式与内容成为可能的关系与既定条件，就被说成是对它的*限定*。

在某个社会系统与历史时期中，可以说存在种种*层面*的限定：所以，举例来说，某个特定电视**信道**（频道）实际播出的节目，就由这个频道的财力、政策、人事等所限定，并由这个频道与其他频道以及其他社会机构（如司法、政府）的关系所限定。

然而，这个频道本身以及它与其他社会机构的关系都将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被限定，比如它运行其中的社会所通行的意识形态结构与经济结构。既然我们描述的是社会行为与社会机构的关系，而不是原因与结果的线性过程，那么也就不存在*终极限定者*。

而且，限定并不等于原因，因为某个制约性的前提或结构化组织化的系统，并不生产什么必然的或不可避免的结果，而只是对可能的结果做出一种限定性（因而原则上是可预料的）选择。所以，限定不同于**决定论**。

限定的概念在**文化**与**传播**的研究领域十分重要，因为，当我们力图说明特定时空中文化生产的实际形态与实践之际，这个概念就能发挥作用。问题在于这些形态与实践是否限定了构成这个社会之特征的社会关系与政治关系，或者说社会关系、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是否限定了文化与传播的形态。或许更为有趣的问题在于，就程度与特定方式而言每一方都在限定另一方。

JH

互文参阅：咬合（articulation），基础（base）。

决定论（determinism） * 认为所有或至少大部分社会与文化现象，都从其他潜在势力或基本势力那里直接获得其形态、结构与方向的断言。* 这个概念同关乎**自主**的问题与难题形成一对关系，并成为在相似层面进行论辩的主题。在普遍的或结构的分析层面，它表现为不同的特殊形式，其中包括：

经济决定论，即所有的社会进程与文化进程，都被直接化约为潜在的经济关系与物质关系。

技术决定论，即社会变迁被视为基础性技术的发展与创新所导致的直接结果。

生物决定论，即特指的生物本能或自然的冲动与需求，作为社会互动与传播互动以及更为广泛的社会进程之决定性因素而得到过分强调。它常与社会决定论或文化决定论形成对照，为以“**自然养育**”（nature-nurture）而闻名的论辩提供基础。

就这些以及其他例子而言，这里比较为难的问题主要在于偏重的程度——所有的社会理论与文化理论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即如何把**限定**与结构的思想同自主与行动的观念协调起来。决定论具有忽略与贬抑后者的倾向，常常成为高估前者权力的结果。其他具有通用标签而得到专门使用的决定论还包括，*语言决定论*、*心理决定论*与*文化决定论*。在所有这些例子以及上述例子里，这个术语都更带有贬义。

TO

互文参阅：自主（autonomy），限定（determination）。

深入阅读：Worsley(ed.)（1977）；Williams（1974）。

异端行为（deviance） * 这个术语用来指称违反社会规则或违背他人期待，结果常常招致社会处罚或惩罚的行为。* 异端行为的发生，一般都被当做所有社会不可避免的、甚至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所谓正常行为，无非是由于犯罪行为的存在。”（Durkheim 1950, p. 50）。不过，正如许多社会人类学家所指出的，异端行为的性质在社会**文本**与历史时期之间是大相径庭的。所以，最好将异端行为看做一种社会建构。不同社会与社会环境由不同**规则**以及种种被界定为异端的不同行为赋予特征，而形成这种特征的途径一直是研究与探索的一个首要焦点。尽管每个人都会在某些时候破坏规则与违反规则，但并不是每人都因此而被视为异端者或被贴上异端

者的标签。异端者的标签或角色，如“抢劫者”、“谋杀者”、“乞讨者”、“吸毒者”等，其作用就像 Rock (1973) 所指出的，“是将这类异端者定位在同我们的社会结构截然分离的社会网络中。而且，我们大多数人都不愿意缩小这--距离”。

我们对这种角色与行为的知识以及分派给他们的意义与价值，是我们所属的社会与群体组织并控制我们的信仰和对社会化世界之理解的核心构件 (compoments)。流行的通常也是常识性的解释，总喜欢把异端行为的根源归结为异端者个人生理或心理上的不健全或“缺陷”。当代研究否定了这种对个体因素的强调，而扩大了探究的焦点以检验 Box (1971) 所称的“规则破坏者”、“规则确立者”与“规则实施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与权力关系。比如Kohen (1971) 认为，“罪行的概念之所以有意义仅仅是因为某些行为被国家所禁止，某个问题仅对某些人来说才构成问题。所以，无论何时只要看到类似异端行为与社会问题这类术语，我们都必须问一下：‘是谁说的?’” (p. 17)。

大量的大众媒介产品告诉我们种种不同的异端行为。这样一来，媒介便成为重要的参照点，为我们解释什么是“好的”、“坏的”与“丑恶的”；什么是正常与反常；什么是合法与非法，等等。毫不奇怪，媒介对异端行为与社会问题的报道与表述，构成许多近期研究的一个重要焦点。

TO

互文参阅：异端行为扩大化 (amplification)，共识 (consensus)，标签理论 (labelling theory)，道德恐慌 (moral panic)，规范 (norm)，规则 (rules)。

深入阅读：Rock (1973)；Box (1971)；Cohen and Young(eds) (1981)；Cohen (1980)；Hartley (1982)；Bilton *et al.* (1981)；Downes and Rock (1982)。

历时态 (diachronic) * 对某物的历时态研究，就是将它作为一个与时变化

的系统所做的研究。＊历时态一语同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1]的著述具有特殊的关系，他将语言学研究分为两种，一种是将语言作为时间上某一点的意义系统予以研究（*共时语言学*），一种是研究这个意义系统从某一暂定点到另一点的变化（*历时语言学*）。当他系统阐述这一区分时（首次公布是在1911年的授课中间），当时语言学研究关注的基本仍是历时性分析。因此，这种研究自然考虑的是语言的起源与语言的语族（families of language）；是发音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的变化；以及追溯个人词语与其母语来源相比在意义上的变化。索绪尔认为，这些研究具有根本性的缺陷，因为它们都将注意力集中在彼此孤立的元素上，从而惟元素是问，而忽略了它们是系统内相互关联的组成部分。在索绪尔看来，恰当的历时态语言研究应先从共时态上对语言的整体形式进行描述，进而再对其历时性变化进行描述。所以，按照索绪尔的观点，共时态研究逻辑上优先于历时态研究；后者——实际上——成为对暂不相关的共时态所做的比较研究。

在这个意义上，索绪尔并不像人们有时说的那样反对语言的历史研究。相反，他很想将语言的历史研究（*历时*）建立在一个更稳固的基础上。然而，其《普通语言学教程》的一个效果，就是重新确定语言学研究的总体方向，使之从历史演变的研究方面转移到语言的现时状态方面，所以，历史语言学（historical linguistics）直到现在一直长期被忽略。

MM

互文参阅：共时态（synchronic）。

深入阅读：Guller（1976）；Saussure（1974）[2]。

方言(dialect)　＊方言是一种以社会化或地域化为标志的某个语言的变体，它由特殊类型的句子结构、词汇及发音所组成。使用某种方言而非另一种

---

① 索绪尔（Ferdinand Saussure, 1857～1913），瑞士杰出的语言学家、现代符号学先驱，其代表作《普通语言学教程》（1916）是他去世后学生们根据笔记以及他的一些手稿等材料编辑整理的。这部里程碑式的著作不仅对现代语言学具有首屈一指的意义，而且对20世纪以来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都产生深远的影响。本辞典所涉及的一系列辞条，特别是结构主义与符号学方面的辞条均与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相关。其中较常见的有“语言/言语”、“能指/所指”、“组合关系/联想关系”、“共时态/历时态”等。

② 即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译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80）。

方言，主要取决于说话者的社会阶级与籍贯。* 英语的方言差异涉及十分广泛的现象，包括如下情形：多重否定的运用（“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依赖”），这在英语的某些方言中很常见，而对其他方言则不然[①]；词汇的变化（同样一个东西在不同的方言里可能有不同的说法，比如运动鞋在英国的不同地方就有*橡皮底帆布鞋*、*弹跳鞋*、*橡胶底浅口帆布鞋*等说法[②]）；特别的发音方式（如用一种喉部闭塞音而不是用/t/来说*bitter*、*luton*、*letter*、*bottle*、*butter*等词，在伦敦的某些地方比较常见[③]）。

后面这类纯属声音方面的变化，也称**口音**。不过，口音仅仅指涉发音问题，所以不像方言这个术语可以涵盖更为广泛的语言差异。实际上，在英国有可能发现那种带有一系列地域口音的标准方言（the standard dialect）。

每个人都在说一种方言，不管是非一标准的地域方言还是标准方言。英国的标准方言本身，就是从英格兰内陆地区东南部的某一特殊地域方言演化而来的，它获得现在这般显著地位不是因为任何语言内部固有的优越性，而仅仅因为它是一种在这个国家的那个地区通行的方言，而那个地区在现代英国作为民族国家的兴起过程中具有特别的影响力。这是一种在牛津大学与剑桥大学说的方言，是商人阶层中的重要人物说的方言。所以，这种为人青睐的方言从 19 世纪以来日渐获得广泛使用，比如在教育领域、在某些关键行业如律师、在一般的书写传播方面等，而它的广泛使用与其说是特殊的语言品质问题，不如说是历史机缘问题。

当这种方言作为标准方言被采用之后，特别是在书写传播方面被采用之后，就对其他社会地位不高的方言产生规范化的压力。反过来这又进一步加剧那种错误印象，即标准方言的规范天生就比其他方言的规范更正确——这是一种无意识地建筑在社会因素而非语言考量上的判断。从语言观上看，所有语言就其表达使用者的意图而言都是等量齐观的，哪怕某种特殊的方言被视为具有特殊的传播功能。

MM

互文参阅：口音（accent），符码（code），双言制（diglossia），标准语言

① 就像汉语的有些方言将“不知道”说成“知不道”。

② 就像汉语的不同方言把马铃薯称为“土豆”、“洋芋”、“山药蛋”等。

③ 就像北京土话大量使用的儿化音。

（standard language），语言变体（variety）。

深入阅读： Hughes and Trudgill（1979）；Montgomery（1986）。

对话性（dialogic） * 所有表意（signification）的一种属性，即按对话体（dialogue）加以建构的属性。* 这个术语由Volosinov（1973）所提出，以强调**语言**是一种连续的、互动的、生成的过程，从而相对于**索绪尔**强调的那种抽象的、结构化的**形式**。Volosinov坚持认为，所有的语言都是表现社会关系的，因而每个个体言说都是按照对话体进行建构的。也就是说，某个言说者/写作者建构言说的方式，都具有面向某个预期听者/读者之反应的**定向性**。

而且，一旦这个言说被其听者所接收，它也只有经由Volosinov所称“内在言说”的对话性互动才能产生意义与理解。所谓“内在言说”（inner speech）就是一种内心对话，它不仅使**符号**具有意义，而且同时产生一种可谓对话的下一“瞬间”这种反应而使对话过程继续进行。

Volosinov还坚持认为，**意指**的这个特征不仅附属于说话过程，而且将它赋予所有的言说过程。甚至独白或自言自语（没有听者的说话），都是内在地按照对话体进行建构的。这也同样适用于那些听者不在现场或不为言说者所知的言说——比如，书籍与媒介产品。本书就是对话性的，因为它的每个词语、句子、辞条及整部书的定位都指向一个想像的听者，因此在辞条的选择、组织与先后的编排上就得顾及预期的反应。

JH

互文参阅： 作者/出处（author/ship），多重意义（multi-accentuality），定向性（orientation）。

叙述（diegesis） * 这个字眼来自希腊语的**叙述**（narration），在文本批评中（常用其形容词——diegetic）一直是用来将任何描述或想像的事情确认为某种**叙事性**（narrative）的内容，从而同其**修辞学**特征或**形式**特征相对立；它一直是用来确认“内在于”故事中的世界而非讲述它的方式。这个术语常见于电影研究领域，以将银幕上所表现的虚构世界同任何艺术或技术特征区别开来。*

就这么多的概念而言，这个概念是最有趣的，如果你从“否定性”上思考它——如果你将任何叙事中的叙述内容与非一叙述内容加以对比，而

不管这种叙事是真实的（即新闻报道、纪实片等）还是虚构的、是用印刷媒介还是用电子媒介进行传播的。人物、情节与对话通常属于叙述，而音乐、画外音、对话字幕、影片字幕或作者名单一般属于非叙述——它们不是从虚构世界本身产生的。

说到这里，只有补充一点才公平，即没有什么东西在本质上属于叙述或非叙述。如果由一位戏中的角色来演奏，那么音乐就是叙述性的，而如果由不介入情节的一支银幕外的乐队来演奏，那么它就是非叙述性的。在《*Blazing Saddles*》中，这种对比成为一种搞笑，即显然属于非叙述的音乐突然变成叙述的——Count Basie Orchestra的全班人马都出现在"西部"的背景上，而Count本人则对着主角之一在指挥。音乐可以同时属于叙述与非叙述——比如，一个角色（在雨中）合着画外弦乐队的伴奏在唱歌。

即使像人物角色这种叙述元素，也能游动于叙述与非叙述的角色之间。电影导演戈达尔①就搞过这种对比，他使一对虚构的角色在会话中间停下来，暂时脱离角色而直接向观众介绍自己。希区柯克②在相似的搞笑中，总是作为一个小角色小心翼翼地出现在他的影片中，从而迫使陷入剧情的观众立刻注意叙述与非叙述问题。

新闻报道中的逼真，是由（叙述的）实况及现场音响同（非叙述的）画外解说进行混合而产生的。在一篇报道上，将叙述与非叙述的文本特征区分开来往往非常困难。记录片中非叙述的画外解说反过来能被重新虚构化，这在美国的警匪片里尤为突出（如电视上的《*The Untouchables*》或Roger Corman的电影《*The St Valentine's Day Massacre*》），而这种重新虚构化已变得非常必要，只得用它来使这种类型的独到处理显得"真实"（就像《*Badhands*》中Cissy Spacek的画外音）。真实与表述、实况与虚构的这种交相滋润，便使我们这个叙述化时代愈发富饶。

---

① 戈达尔（Jean-Luc Godard，1930～　），法国"新浪潮"电影流派的重要导演，1960年代后对左倾思想渐感兴趣，曾参加1968年巴黎学生造反运动。他的影片在国际"艺术电影"系统屡获成功。对其作品毁誉参半。赞扬者认为，他的影片形式灵活，以冷峻的笔调描写了西方社会的危机感。批评者认为，他的作品充满惟我主义与虚无主义。

② 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1899～1980），英国出生的大师级电影导演，以拍摄惊险悬念片著称。经典作品有《三十九级台阶》（1935）、《蝴蝶梦》（1940）、《西北偏北》（1959）、《群鸟》（1963）等。1979年被美国电影学院授予终生成就奖，1980年被英国女王封为爵士。从1940年代起，他都在自己执导的每部影片中露次面。

JH

差异(difference) * 一个出自语言哲学的概念，尤与瑞士的费尔迪南·德·索绪尔①与阿尔及利亚—法国的雅克·德里达②的著述有关，它已成为一个焦点，用以理解语言与写作在表达意义上的基本功能。 *

对索绪尔来说，差异是使语言的种种要素（elements）彼此区别以便用于**意指**之中的**语言**（language）-系统（即**langue**）的属性。就其最简单的情形而言，差异系统的作用体现在音位层面，它使有限的、彼此构成差异的声音（英语有 44 个）经过各种组合以表达潜在的无限意义。根据这个典型模式，我们有可能断言差异是意义的基础。

然而，对德里达来说，这只是问题的开端，是将差异"错误地"拼成"*différance*"（延异）并以此为标志的开端。德里达对他所谓"*在场形而上学*"（*metaphysics of presence*）作为反复出现的主题而贯穿西方哲学给予批判。这是一种理想的（形而上学的）情景，其间言说（而非写作）假定给言说者带来声音与含义之间一种纯粹而透明的一致性；即语言与意识的一致性。简言之，意义（思想）在言说（语言）中*自我呈现*（*self-present*）。德里达不同意这种认识。在他看来，赋予言说以某种源发性或纯粹性的那种言说与写作的传统区分是不能成立的。由于写作同其源头的距离（空间与时间上的距离）及其掩饰能力，而成为西方哲学的一个老问题——阻碍以语言作为思想的顺从媒介之欲望或渴望。对德里达来说，写作不是对言说的一个不纯的"*补充*"，而是言说的前提；那些让索

① 索绪尔（Ferdinand Saussure，1857～1913），瑞士杰出的语言学家、现代符号学先驱，其代表作《普通语言学教程》（1916）是他去世后学生们根据笔记以及他的一些手稿等材料编辑整理的。这部里程碑式的著作不仅对现代语言学具有首屈一指的意义，而且对 20 世纪以来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都产生深远的影响。本辞典所涉及的一系列辞条，特别是结构主义与符号学方面的辞条均与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相关。其中较常见的有"语言/言语"、"能指/所指"、"组合关系/联想关系"、"共时态/历时态"等。

② 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 ），当代著名的法国哲学家、解构主义思潮的先驱。生于阿尔及利亚，曾执教于巴黎高师、耶鲁大学、尼湾加州大学等。代表著作有博士论文《言语和现象：胡塞尔现象学中符号问题概论》（1967）、《论文字学》（1967）、《写作与差异》（1967）等。

绪尔（与现象学家埃德蒙特·胡塞尔[①]）将其从言说里分离的写作特性，正是德里达发现不可能从言说里摆脱的东西。不过，他的计划不是以写作取代言说作为意义——产生的模式：他的猎物是语言哲学中**二元对立**（*opposition*）的言说/写作模式，以及试图在这两个二元对立的术语之间进行仲裁的“形而上学”传统。

对于延异这个概念，德里达肯定不会称之为概念、关键概念或其他什么东西——他的计划不是确定或解释意义，而是使意义*不确定*。它包含后——索绪尔的差异观，其中加入德里达的差异观（推迟可能在另一时间出现的在场——意义的某种“不在场的在场”），并以这样一个词来表达这些吊诡的思想（差异表示不一致；遵从表示一致，即使是延迟，或许是无止境延迟），这个词触目惊心的“误拼”只有借助写作才能看出（因为différance一词在发音方面与那个与之不同的différence相同）。

德里达的著作在1970与1980年代初期影响尤大，其时索绪尔的一套表意概念已为人所熟知。德里达之后，就不可能再说能指指涉**所指**（某种不在场的在场）；相反，能指仅仅指涉自己，而意义就是由能指在一条无穷无尽的自我指涉链中展开一种差异性嬉戏而产生的，在此之外不可能寻求证实。也就是说，在能够测验或证明“经验”或“现实”是否真实的意指之外，不存在什么“**经验**”或“**现实**”，因为所有的“经验”或“现实”都已是**意指**的一种**表述**。表述远非对若无表述则纯而又纯的思想所做的一种文本化污染性的骗人“表达”，它就是我们所拥有的一切——**知觉**本身已经是一种表述，而纯粹的意识不可能被“表达”，因为它是构成意识之意指的区别性活动。最后，也不可能自信地断言，个人化**主体**“具有”一个认同（自我在场、自我认识），因为认同就是差异的产物——就是能指在（不在场的）语言系统中没完没了进行嬉戏（play）的产物。

德里达将世界假定为一个文本，由此为**后现代状态**（被冠以“文本主义者的复仇”这个副标题）重写脚本。他的怀疑与极端怀疑主义的哲学，导致“解构主义”运动的发生，这个运动在美国产生特别大的影响（参阅**结构主义**）。

有趣的是，就在差异的概念上带有一种“意指政治学”（politics of

---

① 胡塞尔（Edmund Husserl，1859～1938），德国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德的老师，他所创立的现象学是20世纪的一大哲学思潮，对众多学科产生广泛影响。

signification）。某些人可能认为，德里达的后一结构主义结束于一种理想主义的、唯我论的、反一唯物主义的绝境，其间唯物主义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论点被简化，从而将一脉新的生命赋予某种《爱丽丝漫游奇境记》式的批判性实践，这种实践允许世界具有批评家决定它该具有的任何意义（这是某些对解构主义进行批评的例证中一个尤其适当的批评）。另一方面，有些人则认为，德里达式的怀疑、怀疑论与自我投射，完全不是什么极端的哲学立场，因为这些特性从亚里上多德与柏拉图以来一直都是西方哲学的核心要点。事情果真如此，就会使德里达的实践吊诡性（paradoxically）地成为知识分子文化里的一种保守力量，尽管其含义并不确定。

JH

互文参阅：作者/出处（author/ship），二元对立（binary opposition），文化（culture），话语（discourse），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后现代状态（postmodernism），主体性（subjectivity）。

深入阅读：Norris（1982）；Lawson（1985）。

双言制（diglossia） ＊在某个语言共同体内存在两种相关而相对的语言——一种地位高而另一种地位低——它们用于各种相辅相成的语境。＊例如，高等语言最有可能用于新闻广播、宗教布道、报章评论及传统的诗歌，反之，低等语言则会用于日常谈话、体育评论、肥皂剧以及其他非正式的语境。双言制的典范，可在阿拉伯语世界中找到。就多数而非全部情况而言，阿拉伯国家都同时存在两种阿拉伯语——作为第一语言在家中自然习得的口头阿拉伯语与通过学校详细讲授而掌握的经典阿拉伯语。这两种阿拉伯语的语法、发音及某些词汇都不同。《可兰经》——伊斯兰教神圣文本——的语言属于经典阿拉伯语；部分由于这个缘故，高等语言——经典阿拉伯语——在整个阿拉伯世界都是相当统一的，尽管在各地阿拉伯口语中存在十分明显的地域性差异。实际上，经典阿拉伯语在整个阿拉伯世界的通用性，有助于确保两位操持迥异的阿拉伯口语者在会面时达到思想上某种程度的互相理解。其他双言制的情况可在希腊（古典希腊语与现代希腊语）与瑞士（高地德语与瑞士德语）中发现。虽然使用英语的共同体似乎没有表现出这样明显的、内部分化为两种对立语言的现象，但是人们依然有可能识别一系列在各种层面相互竞争的语言，它们被赋予不同程度的

社会位势。

MM

互文参阅：口音（accent），反一语言（anti-language），符码（code），混血语（creole），方言（dialect），洋泾浜（pidgin），标准语言（standard language）。

深入阅读：Ferguson（1972）

话语（discourse） * 一个如今常以不同目的而被广泛用于许多不同学科和思想流派的术语。就其最不易引起争议的意义而言，这个术语用在语言学中以指称比句子更重要的动词性言说（verbal utterances）。* *话语分析*关心的不仅是某个言说者的复合语句，而且更常考虑的是两个或更多言说者的交替互动，以及用来操持和控制特定语境中之话语的语言规则与社会习俗。

不过，话语这个概念也在发展，分别通过后－**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两个领域进行发展。这里，它确实体现着一种整合的意图，即把包罗万象的结构主义者早期获得的一些理论建树固定在一个术语之中。为了理解其意义，就得铭记早期的结构主义/符号学首先是一种并列的思潮，其倡导者一直想批判和扭转对意义从何而来这个问题进行思考与分析的因袭习惯。按照传统的理解，甚至按照如今最“不容置疑”的理解，意义被归结为种种“来自”大千世界的客观之物，以及内在本质和个人情感。结构主义对这些观点提出置疑，它力主**意义**是一种意指的结果，而意指既不是外在世界的属性，也不是单独个人的属性，它是语言的属性。因此，无论是外在世界还是个人意识，本身都只能作为语言/意指的*产物*而非*来源*才是可理解的。我们就是我们的语言所表达的面貌，而世界就是我们的语言所表达的面貌。但是，这个结论的问题在于太随意浮泛，太抽象空幻；它给人以这样的印象——不仅在原则上而且在实践上——世界和词语都能成为我们随心所欲的东西。

生活不是那么简单。“语言”这个抽象概念，事实证明不足以说明某些意义在历史、政治与文化上的“定型过程”，以及这些意义经由种种既定的言说、表述及特殊的制度化情景而不断进行的再生与流通过程。正是在这一点上，话语这个概念开始取代当下通行的这种无力而含糊的“语言”概念。与“语言”不同，*话语*本身兼有名词与动词的属性。所以，它

更易保持话语作为一种行为的意义，而名词性的“语言”往往好像仅仅指涉一种事物。在其确定的用法中，话语同时指涉思想和传播的交互过程与最终结果。话语是制造与再造意义的社会化过程。

话语的概念一旦被结构主义所采纳——主要经由米歇尔·福柯[①]的著述，它就表明自己无论对表达一种非常普遍的理念，还是体现许多具体的话语都是很有效用的。

这种普遍的理念认为，尽管意义仅仅出自**语言**（langue）或语言（language）的抽象系统，尽管我们仅仅通过语言系统才能理解这个世界，但事实依然表明，社会通用语的原料取决于并且总是取决于一般社会关系的历史发展与历史冲突。简言之，尽管**语言**（langue）可能是抽象的，但意义决不是抽象的。话语是社会化、历史化及制度化形构（formations）的产物，而意义就是由这些制度化的话语所产生的。因此，任何语言系统所能产生的、潜在的无限意义，总是被遍布于特定时空并且本身也经由不同话语而得以呈现的社会关系之结构所限定所固定。

因此，个人并不能简单地把语言作为抽象的技能来学习。相反，既定的话语总是先于个人而存在，在这些话语中各种**主体性**已经得到**表述**——比如，有关**阶级**、**性别**、国家、种族、年龄、家庭与个性的话语。我们“栖居”（inhabiting）于许多这类话语性**主体性**中（其中有些主体性彼此确证；而其他则远非和平共处），由此确立和**经验**我们自己的个性。话语理论认为，个性本身过去与现在都像一个平台，各种产生于社会、确定于历史的话语，都在这个平台上得到再造，受到制约。

话语的通用理念确立后，注意力就该转向*具体话语*，这里遭遇并受到检验的是经由社会化而确立的含义（sense）。这些话语包括从电视和新闻这些**媒介**话语到诸如医学、文学和科学等**制度化**的话语。话语是结构化的、相互关联的；某些话语比其他话语更具有威信、更符合正统，因此更

① 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法国当代杰出的思想家，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早年就读于著名的巴黎高师，师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1970年以后，一直任法兰西学院思想体系史教授。他的“知识考古学”、“话语/权力”等学说对20世纪末以来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产生巨大影响。著作有《疯癫与文明》（1965）、《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1966）、《知识考古学》（1969）、《规训与惩罚》（1975）、《性经验史》（1976～1984）等。

"毋庸置疑"，另一方面总有话语在为赢得任何一点承认而进行艰巨的斗争。因此，话语体现着**权力**关系。进而言之，我们所属的许多社会化的意义形成过程——在媒介中、在学校里、在交谈间——都经历了话语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一个颇能说明问题的当代例证就是，（合法化的、自然化的）父权与（新兴的、边缘化的）女权间展开的话语之争。文本分析能够用来追索这场斗争的进程，方法就是显示某一文本如何采用不同的话语元素，然后对它们进行**咬合**（也就是说，"把它们编织在一起"）。

但是，尽管话语能追溯到**文本**中，尽管文本能成为话语知识得以流传、确立或抑制的方式，话语本身却并不是文本性的。

MM

深入阅读：有关语言学的话语分析问题，可参阅Coulthard和Montgomery编辑的著作（1981）；有关后一结构主义的话语概念，可参阅Sturrock①编辑的著作（1979），特别是其导言和论述福柯的章节。

置换(displacement)　＊某物的重要性或重要意义，经过某种类似于隐喻变换的过程而被转变为（置换为）他物的过程。＊

对马克思来说，置换是**意识形态**歪曲现实的部分策略。比如，多夫曼与马特拉②（1975）的研究表明：在典型的唐老鸭动画片里不存在（或很少存在）工人阶级的角色，而那些罪犯却被赋予工人**阶级**的特征。他们指出，这些特征被置换为罪犯，他们被表现为"真正的"社会异端行为者(deviant)，从而在**下意识**层面（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层面）证明，在唐老鸭中产阶级化的资本主义世界里没有工人阶级是正当的。

对心理学家来说，研究的主要焦点在于使心理能量发生转向与改道，即从一种遭遇挫性的目标转向一种比较薄弱的目标。无论何时一旦说到象

---

① 约翰·斯特罗克（John Sturrock），英国《泰晤士文学增刊》副主编，由他所编的《结构主义以来：从列维--斯特劳斯到德里达》（牛津大学出版社 1979 年），是有关结构主义思潮发生、发展及演化的一部权威著作，1998 年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其中译本。

② 马特拉（Armand Mattelart,1936～　），法国著名的批判传播学者，巴黎第八大学传播学教授。1962 年至 1973 年曾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天主教大学任传播社会学教授和联合国社会发展专家，与传播学者 A·多夫曼（A. Dorfman）一起完成了批判传播学研究的经典之作——《如何解读唐老鸭：迪斯尼卡通片中的帝国主义》（1975）。他的《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1992）已有中译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征问题，置换都成为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因为它涉及对表面意义的置疑。置换有三种常见的用途：

（1）分析外一群体与内一群体的关系时，对受挫（frustration）与发泄（aggression）的研究集中于受挫障碍大得无法移开或避免的情形。于是，这就导致对发泄目标的置换，使之导向一种不大可能进行报复的比较薄弱的目标。比如，无权无势的“弱势群体”受到比较强大的“他人”损害，而这些他人又在更有权有势者面前遭到挤压。因此，就产生了有关偏见、歧视与委过于人（scapegoating）的解释。

（2）研究短暂记忆时，有关条目能被新近加工的信息所置换，从而可能被遗忘，可能更难回忆起来。比如，我们可能忘记一次争论的起因，如果被随后的信息所淹没。“置换”一语应称“遗忘”，因为给予适当的提示，先前遗忘的信息就能回想起来。

（3）研究**精神分析理论**时，强调的重点在于心理意象（mental imagery）以及心理能量（psychi energy）从一种**象征**到另一种象征的转换。比如，能从梦里回想起来的形象可能象征着性行为中更本原的东西，但也是更不能得到社会接受的东西。置换所导致的升华（sublimation）过程，就是相对超越的象征意象对具有原始意味的对象进行的替代。这么一来，由于象征化的对象同其更富意味的表述相疏离，相关与感性的意味就被减弱。这种理论的基本假定是，人们难于抗拒**社会化**初期遭到惩罚与压抑的享乐性本原欲望。

DS

互文参阅：认同（identification），投射（projection），窥视者（voyeur）。
深入阅读：Dorfman and Mattelart（1975）；Hilgard *et al*.（1979）。

分辨特征（distinctive feature [s]） ＊一个出自结构主义的术语，指一个符号使自身与同一联想关系中的其他符号区别开来的特征。＊对于那些相信一个符号的意义主要取决于它与其他符号之关系的学者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分辨特征同时体现在**能指**与**所指**之中。

能指的分辨特征：“last”一词中“a”的发音，根据说话者的标准口音或地区口音可有若干方式。它之所以能够被分辨出来，关键在于它与*lest*、*list*、*lost*或*lust*中元音的发音不同。只要*lest*、*list*、*lost*与*lust*的发音

具有与*last*的所有发音方式相区别的特征，那么，这五个词就都具有独特的“意义”。同样，举例来说，细条线长裤的意义存在于使它同灰色法兰绒长裤或蓝白相间条纹裤相区别的特征之中。在这些例子里，分辨特征都属于符号系统的单元（即能指）。

所指的分辨特征：比如，只有当我们辨别出那些使“年轻人”同“成年人”与“小孩子”相区别的特征，我们才能理解“年轻人”一语的意义。对城市的居民而言，“母牛”意味着“与马或猪相区别的一种农村动物”，但对农民来说，母牛（cow）则明显区别于小母牛（heifer）、小牛（calf）、公牛（bull）等等。在这些例子里，分辨特征属于那些我们借以组织、划分与理解自身社会经验的概念（即所指）。

分辨特征的重要性产生这一名言：“我们只有知道一个符号不表示什么，我们才能知道它表示什么。”

JF

互文参阅：选择（choice），联想关系（paradigm），符号（sign），能指/所指（signefier/signified），价值（value）。

拟剧论（dramaturgy） * 借助戏剧（theatre）的类比而对日常生活进行的研究。* 正如Harré（1979）提示的，拟剧论框架是观察家与分析家研究社会行为所用的最古老模式之一。表演、场景与角色等对解释生活舞台上的演员同样属于核心概念，因为他们始终按照脚本进行活动，而这些脚本来自先前的演出与演员。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米德①，1934）的**象征互动**

① Q·H·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1863～1931），美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实用主义代表人物，芝加哥学派奠基人，该学派以象征互动论著称。米德平生著述虽然不多，但身后由其学生编辑整理的《心智、自我与社会》（*Mind, Self, and Society*）却是一部社会学经典。他的主要学术贡献之一，是对自我起源的论述。他将“自我”（self）划分为“主我”（I）与“宾我”（me），而不论主我还是宾我都是在社会化的互动过程中形成的，这种互动过程主要通过象征（symbol）或符号进行的，比如语言就是一套象征系统。

论者，在其拟剧化类比研究中对此表现浓厚兴趣。戈夫曼[①]对印象管理（impression management）、公共行为及互动礼仪的解释（1971），进一步加强了这个模式的适用性：比如，不同的共同体似乎在不同的语境下排演日常行为与活动，当人种志学者力求对此寻求一种解释之际，这个模式就显得尤为突出。Scott 对赛车场观众的观察（1968）即属此例，他在实际的演出人员——加上一两个压赌的明星——支持不同的参赛者并观看其输赢之际，一直观察他们演完不同的场景。但是，如果想把这样一个过于简单的框架全都用到日常行为的解释方面，那么读者应对其在一切情景下的确当性保持警醒。一个特别突出的问题就是其描述力强而解释力弱：拟剧论者很少深究这类问题——人们为什么扮演这些角色，它们源于何处？而且，同戏剧进行类比也只有部分的适用性：比如，我们是否能自信地假定，导演、观众、舞台工作人员与批评家，同那些将某种无形的脚本表演出来的演员处在同样的语境之中？拟剧论还忽略了自发性行为的重要性与频繁性，这些行为或即兴表演，或临时插入，甚或对脚本规定的某些行为加以拒绝。尽管存在这些批评，这个模式对“场”（field）内的群体进行分析时依然十分有效——尤其是，相对于社会心理学以实验室方法对社会互动进行的经验性研究，这个模式构成了别样的选择。

DS

互文参阅：接触（encounter），人种志（ethnography），面具（facework），非语言传播（non-verbal communication），礼仪（ritual），角色（role），象征互动论（symbolic interactionism）。

深入阅读：Hare（1985）；Goffman（1971）。

对话（dyad） * 两个人的当面互动（face-to-face interaction）。* 作为最小的群体，对话的特征在于两人的对等与沟通的程度。八人组成的群体无论如何都不能视为四组对话；随着群体规模的这种扩大，传播的过程与网络

① E·戈夫曼（Erving Goffman，1922～1982），美国社会学家，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拟剧论的提出者。按照拟剧论，人生犹如演戏，社会好似舞台，每个人都分别扮演一定的角色。其间，又有“前台”（front stage）与“后台”（back stage）之分。活动在前台的是主我（I），退到后台的是宾我（me），主我演绎着人生的戏剧，宾我则从这出戏剧中抽身出来，获得片刻的休憩。

也截然不同。

对话可能包括夫妇双方、推销员与顾客、老师与学生等，而对话式传播的特征取决于双方信息的实际往返。在许多情形下显然会用到言谈，但其他非语言的暗示也可能补充甚或完全替代说出的**语言**，比如父母与新生婴儿的**互动**。正是这种对话以及**初级群体**，才使人际行为得以发展，才使由他人给出的**符号**、暗示与词语得以形成**意义**。正如 Laing（1969）所强调的，我们对**他人**行为的理解，反过来又因为他或她对我们的理解所产生的**知觉**而影响其下一步行为。因此，在对话式传播上就得承认一种**交流**的基础。让我们回到母亲－婴儿对话的例子上。母亲肯定在用许多方法对婴儿进行社会化，但我们也能说婴儿同样在对母亲进行社会化，如母亲为了保证沟通双方达到更有效的理解而脱离常规（语言与非语言）符码。将参与对话的双方置于交流的过程，而非传播的**皮下注射模**式说的那种更具线性特征的**发送者**与**接收者**，就显得更为恰当了。

DS

互文参阅：接触（encounter），面具（facework），群体（group），人际传播（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非语言传播（non-verbal communication），他人（other），初级群体（primary group）。

深入阅读：Tajfel and Fraser（1978）；Aronson（ed.）（1988）；Burton and Dimbleby（1988）。

E

效果/效果传统（effects/effects tradition） ＊ 一个内涵丰富的术语，过去与现在总是用于指称媒介讯息对个人所产生的、假定的直接后果与影响。这个术语如今也用来描述媒介研究的一种特殊传统。＊

以往，媒介一直被指控在促使人们形成一系列若非媒介则人们就不会考虑的活动与行为，促使人们接受那种若非媒介则人们就不会持有的信仰、**价值**与思想观念。值得注意的是，持这种主张的主导性成见以及由此产生的大量研究都与负面（*negtive*）效果有关，即媒介引发如下社会与心理活动，它们要么被释为要么被划入“问题”或具有某种“反社会”、“有害”抑或“危险”性质的威胁。例如，一系列**道德恐慌**在媒介自身的编排与协调下，以媒介引发暴力、青少年犯罪、放纵以及其他社会问题等说法而加剧公众对媒介效果的关注。人口中的某些**群体**与成员，一向被当做尤其易受这种直接效果的影响：比如，儿童、青少年与“未受教育者”。

各种大众媒介的介人、发达与存在，整体上对社会产生某种“效果”与“影响”——对此不会有疑义：比如教育与政治领域，比如对社会群体与个体的后果。然而，这些问题与关系的极端复杂性往往被降至最低程度，并且在这一假定前被遮蔽，即所有势力强大的媒介都能并确实引发针对个体的直接效果。围绕舆论与政见的基本情况、媒介行业与组织的关注热点以及这种狭窄的效果问题而展开的学术研究，经过互相印证、互相支撑而形成主导性的理论，被用来解释许多探讨与研究（比如，围绕1981年夏季发生在英国城市里的所谓“抄袭骚乱”所做的探讨：Tumber 1982；Herridge 1983）。

正如McQuail（1977）与其他学者所指出的，这种“效果”的焦点与传统已从媒介权力与直接效果的无疑假定——凝聚于媒介效果的**皮下注射模式**，转而专注于用**观察实验**法进行测试和对效果性传播过程进行展现。

吊诡（paradoxically）的是，正是由于启用这种观察实验的研究方法，结果反而导致了对早期假定的反拨与反思。到1960年代末，缺乏令人信服的证据以证明直接而未经人际中介的效果，促使人们对这个问题以及相关过程重新进行思考。鉴于效果研究曾明显倾向于把**受众**当孤立个体看待，割裂他们与媒介之外所有事物的联系，此后的研究便集中在将**个体**重新置于社会关系与话语关系的**语境**方面，假定这种情形塑造了个人的**解码**行为及其对媒介讯息的反应。这种转向需有一种普适的放大视野，以至涉及特定而短期效果的问题，必须纳入媒介在长期的社会再生产与**文化再生产**过程中的角色、**决定论**与**意义**建构等更为普适的考量与分析之中。Hall（1977）称之为“媒介功效”（media effectivity）。

对有关媒介产生或导致效果X或效果Y的主张必须谨慎对待；其“显面易见性”与明显的真实性，应以针对其前提假定进行严格而批判的审视予以反驳。

TO

互文参阅：受众（audience），运动（campaign），话语（discourse），皮下注射模式（hypodermic needle model），使用与满足（uses and gratifications）。

深入阅读：McQuail（1977）；Morley（1980）；Halloran（1977）；Murdock and McCron（1979）；Noble（1975）；McQuail and Windahl（1981）①；McLeod *et al.*（1991）。

精致符码与限制符码（elaborated and restricted codes） * Bernstein（1971）对用在不同社会情景的不同类型的语言所做的著名分类。*

使用*精致符码*的社会关系可能存在**个体**差异，从而激发对言说者了不相干的**意义**之表达。这种类型的意义不得不使文辞精确化与准确化，以便使之成为听者可以把握的东西，所以，精致符码就要求有大量的词汇与复杂的句法。于是，相对来说它就显得无法预料，或者说具有低度的**冗余信息**。

另一方面，*限制符码*激发的则是**群体**关系而非个体差异的表达，它依赖的是一个由共有假定、共同社会经验与共通预期所构成的语境。因此，

① 即D·麦奎尔等《大众传播模式论》（*Communication Models*），中译本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1987）。

它只需较少的词汇与较为简单的句法：它是一种具有高度冗余信息的符码。**非语言传播**（NVC）的符码与限制符码一同发挥关键性作用；事实上，Bernstein认为新信息或个人差异只有通过非语言传播的符码才能表达：在精致符码中它们并不重要，若非事实上不必要的话。

精致符码更依赖其直接语境，它能有效处理抽象、不在场（absences）和普遍事物；而限制符码则比较适于在场的和具体的事物。精致符码属于正规训练或教育的**话语**；限制符码只需普通的社会经验或背景。因此，精致符码在我们的社会里一般都被赋予较高的地位，适应上流群体的独特社会关系，得到我们教育系统的宏扬与褒奖。限制符码则相应被赋予较低的地位，适应下层群体的独特社会关系，并在多数学校中受到阻止。

不幸的是，这两种符码的区别同我们的**阶级**差异相互吻合得如此紧密，因为这一区别促使我们去探询导致它的原因，如阶级、教育与才智等因素。Bernstein尽力强调事情并非如此——这种差异是由不同类型的社会关系所产生的，而非直接源于阶级、教育等因素，无论如何不是直接源于言说者的才智。他对诸如军官食堂、公学①、司法界或宗教界这些联系密切的中等阶层群体如何使用限制符码做出说明。但是，他也确实承认受过教育的中等阶层可以同样使用限制符码与精致符码，相反，教育程度不高的工人阶级则只能使用限制符码。

将这个概念拓展到语言之外的艺术与其他文化形态也非常有趣。高雅的文化艺术作品总是使用精致符码，不管它们是文学作品、戏剧、音乐、舞蹈、绘画还是雕刻。而大众文化或流行文化的作品则总是使用限制符码，因为它们是通过共有的趣味与共同的社会联系而发挥作用，就像高雅的文化作品借助于个人的独创性与艺术家的创造力。

JF

互文参阅：广播（broadcasting），阶级（class），符码（code），文化（culture），窄播（nar-rowcasting）。

深入阅读：Atkinson（1985）。

精英（elite） ＊某个社会构成中属于支配阶层的少数人，他们凭借某些假定

① 所谓公学（public school），乃指英国一种贵族化的私立付费学校，实行寄宿制，属于“上流社会”的组成部分。

的、被认为仅仅属于他们的优异禀赋而实施或宣称对社会与文化的领导权。* 这种通常由文化领域的精英所宣称的优异禀赋（excellence），涉及智力、创造力或艺术性情；它们常常被说成是一种能比他人更好地进行辨别与判断的能力。因此，这个术语意味着某种关系——通常是精英与大众（精英宣称对其拥有领导权）的关系。大众与精英这两个术语容易使人产生误解，它们更像政治的争论而非严谨的分析。不过，这两个术语在媒介研究中都有影响，其间精英的概念既用来描述经营大众传播的媒介专业人士，又用来将大众媒介同"精英"**文化**相剥离，而这种文化本身又被用作评价（通常带着轻蔑）媒介产品的一种尺度，这就显得自相矛盾。因此，不应再把这个术语当作一个中性的描述性范畴来使用，因为它总是在繁殖研究者应予暴露而非重复的**意识形态**假设（assumptions）。

JH

互文参阅：大众社会理论（mass society theory）。

观察实验法（empiricism） * 强调可观察性、可测量性与可量化性证据之重要性的一种研究方法（approach）。* 它有三个明显的基本假设：（1）存在一种可供研究的、具有普遍性与**客观性**的现实；（2）我们能够设计出对它进行客观研究的方法；（3）解释它的假说由此能够得到证明或得到否认。正如 Fiske（1982）所指出的，观察实验法"同常识性的、基于科学的世界图景搭配得天衣无缝"（p. 119）。

因此，观察实验法寻求的证明，乃是经由控制性的、可重复性的而非公开的讨论。可想而知，观察实验者的目标在于获得毫无异议的科学支持，因为无人否认他/她的论点。换言之，所有的证据都是完全相符的。

关键问题在于这些假设几乎是不可能的，若非绝对不可能的话。诚然，在**实验**性条件下，即若干变量在严格控制的环境中得到系统操控，有可能达到可重复性的观察。但是，若以**类比**于实验的方法对复杂的真实生活情景进行解释或描述则是不可行的——特别是当实验者本人在其理论的**定向性**、**方法论**、**意识形态**及**语言**等方面，可能存在如此千差万别的情况之际。

DS

互文参阅：行为主义（behaviourism），方法论（methodology），客观性（objectivity），实证主义（positivism）。

深入阅读：Fiske（1982）[①]。

接触（encounter） ＊ 两个或更多进行互动（interaction）者的相会。＊ 对这个术语的使用总是特别青睐于其名词形式（与动词形式相对）：比如，“一次接触”（同“一次互动”相对）。接触的特征可能来自不同的**礼仪**与惯例，这些已是耳熟能详的东西，一般没有什么意义（A：“嗨，你好吗？”，B：“很好，再见”；A：“再见。”）。接触常常同那些可能不期而遇的、亲密的甚或敌对的相会联系在一起。来自不同学派的学者一直试图确认，同社会性接触有关的互动都有哪些基本的构成因素——以至他们的研究都深入到最短暂的相会，尤其当言语同体语（body language）相关之际。

同相遇这个概念密切联系的是“交心”治疗**群体**[②]，它鼓励受托的群体成员用一种坦率而直接的方式进行公开的批评——尽管这一做法据说有疗效，但对没有做好准备接受这种煎熬的人来说，它也可能是一种毁灭性的经验。

DS

互文参阅：拟剧论（dramaturgy），面具（facework），人际传播（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非语言传播（non-verbal communication），礼仪（ritual）。

深入阅读：Argyle（1987，1988）。

推断（entailment） ＊ 一个来自**符号学**的专门术语，用来表示这样一个句子，它可从另一个作为其逻辑上必然结果的句子而**推断**自身的意义。＊ 例如，从“约翰是个单身汉”这个句子，就可推出“约翰没有结婚”这个句子。

MM

互文参阅：蕴涵（implicature），符号学（semantics）。

---

① 即J·费斯克的《传播研究引论》（*Introduction to Communication Studies*），中译本收入台湾远流出版公司的“传播学名著译丛”（1995），名为《传播符号学理论》（张锦华译）。

② 交心治疗群体或交心治疗小组（encounter group），是一种精神病集体疗法，它鼓励患者同其他人进行身体上的接触并自由表现情绪，以增进对他人的敏感性，产生自我意识及了解。

娱乐（entertainment） ＊ 一个具有**意识形态**性的概念，属于20世纪比较成功的**修辞**化策略之一。它似乎将普遍接受的、源于印刷报刊与生动的电子媒介，包括视觉－听觉、叙事与表演等类型的主流产品轻而易举地归结为一种饮食起居制度（regime）。然而，它不过是个人满足、文本形态与工业组织的一种复杂的聚合过程。＊

作为一个概念，娱乐是意识形态化的，因为，它被用来证明这样一种**话语**实践的合法性与正当性，这种话语实践在追求观众数量的最大化与降低单位成本的同时，把自己作为中性的或非政治的、貌似合理（合法）的东西予以呈现，其间不提娱乐行业的商业规则，而只提虚构的**受众**或公众的假定需求。娱乐的观念被炫耀地拿来证明若据其他理由则会因**种族**主义、性别主义、都市主义以及其他主义而受到批判的表述是正当的。简言之，勿被诸如某些讨厌的东西"不过是娱乐而已"的说法所蒙骗。

JH

熵（entropy） ＊ 某个讯息的内容或形式的不可预测性：一个来自信息论的术语。＊ **内容**中的熵等于信息含量高，为了有效而自如的**传播**就需常常把**冗余信息**引入其形式。**形式**中的熵，通常是为了美学或想像的原因而打破现有**惯例**的结果。在内容的层面上，熵与**信息**相关；而在内容与形式的层面上，熵与冗余信息相对。

JF

互文参阅：信息论（information theory），冗余信息（redundancy）。

逃避（escapism） ＊ 主要用心理学术语进行解释的一种过程，它使个体借助偏爱的象征或想像的状态而从不如意的情景或威胁性的情景中摆脱出来。＊ 逃避某种特殊的语境并非总有可能。正如离开有个过程，逃避行为也产生进入某种不同参照系的联想，它为自己提供某种快乐。在**精神分析理论**中，这种逃避过程始于同不可逾越的、令人受挫的对象或事件发生的冲突。因此，这个人也许通过想像及对意象的精心处理而从那种情景与幻想中摆脱出来。

逃避可被视为一种**防御机制**，可能常常涉及同**他人**的**认同**问题，这里的他人有时是指英雄/女英雄，他们在克服令人沮丧的障碍上被视为更有力更成功。一个理想的自我形象甚至能够作为幻想中的受人尊重者而取代

他人。逃避还可得到外部暗示的帮助，如组织化的活动（像比赛）或**媒介的文本**，它们既引导想像与意象，同时又允许个人发挥创造性。

对逃避问题的普遍关注，在**媒介受众**与媒介**内容**的研究中得到明显证明。某些媒介特别是电影之所以流行，就被解释为受众需要从日常生活的种种压力与紧张之中逃避出来。比如，**使用与满足**理论的学者，通常用消遣娱乐（*diversion*）这个术语代替逃避，它意味着受众使用媒介从真实世界那平凡的例行公事、问题与挫折中逃避出来——从而得到情感上的释放。在这个意义上，媒介的**文本**被视为不同程度地提供了种种**象征化**逃避现实的途径。类似这样的研究经常受到挑战，因为他们很少追问受众逃往了何处。文本被假定为无需置疑，逃避现实被看做受众而非文本的功能。

DS

互文参阅：宣泄（catharsis），防御机制（defence mechanism），认同（identification），使用与满足（uses and gratifications），窥视者（voyeur）。

族群（ethnic） * 针对某个群体的一种描述性标识，它从种族或民族的特征上得到含蓄的界定，其强调的重点在于文化的行为与信仰。* 这个概念可以有效地用于概括这样的**少数派**，他们由于独特的文化态度与文化传统而遭到疏离或者要求疏离。另一方面，我们一般不把那种同民族的群集与认同相关的群体称为“多数派族群”——比如，难道有可能为英格兰的英国人争取“族群地位”（ethnic quality）吗？这样一个奇特的标识似乎只能贴在移居海外的民族一群体身上，而且是在这些群体尚未构成统治**精英**的组成部分时。比如，对纽约的西班牙人可用“族群”来描述——但对印度的英国人就不能这么说。

这个术语的流行掩饰了它的含糊不清——不妨留意一下，在某个族群分类与宗教、肤色（但不是**性别**）或国籍之间能够找出多少重叠的内容。在某些方面，这个术语得到政客与学者的青睐，他们都在寻求更合意的方式，以描述那些有别于所在的民族国家而又共享某些认同（既为了保护他们自己，又为了保护体现在他们身上的文化价值）的群体，比如：若想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那么说“伦敦的族群团体”就比说“生活在伦敦的巴基斯坦人、印度人、西印度群岛人与中国人”可能更便利。

与此关系密切的一个概念是*种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cism），就像Allport（1980）所论述的。它主要指某个群体专注于自身的**价值**、信仰

与历史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被外人视为一种偏狭之举。种族中心主义倾向常与迫害相关，特别是发生在压迫者与受害者层面的**种族**主义。对迫害者来说，种族中心主义一方面导致对民族认同的珍视，另一方面总是将处于那个民族中的不同文化或共同体视为下等的、威胁性的或有缺陷的。阿多诺[1]等（1950）所称权威人格（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的目标，可能也以种族中心主义为特征，但它所维护的文化在外人看来是陌生的。本质上讲，偏执者把偏狭视为一种冷落与怠慢，而忘了他或她自己的歧视与偏狭培育着疏离感与怀疑感——或干脆使沟通的机会缺失。

因此，族群价值的发展既可视为某种自我保护，又能看作社会接纳人们的某种积极行动。这里，历史进程的重要性不能轻略——今天所谓的某个族群团体，就是昨日的某个“移民问题”。而且甚至可以说，追寻“真正的”族群认同与经验，构成某种现代旅游观光业的核心。

DS

互文参阅：文化（culture），少数派（minority），偏见（prejudice），种族（race）。

深入阅读：Montgomery（1986）。

人种志（ethnography） ＊ 主要来自人类学的一种田野调查方法，研究者由此深人某个特殊群体的文化之中，“从其内部”提供有关意义与行为的解说。＊ 这种方法强调，研究者若使被研究的共同体或**群体**得到理解，就得打通文化距离。人种志学者广泛搜集材料，以描绘一个社会群体的面貌，“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介人人们的日常生活，观察情况，倾听一切，询问问题”（Hammersley and Atkinson 1983）。这个过程中，人种志特别珍视**语言**所构成的共同体——以至于这种方法也同**交谈分析**并用。尽管人种志一般同人类学或社会学的各种分支相连，比如，特别突出的是以**象征互动论**而著称的芝加哥学派，但我们还是应该注意它同心理学**参与式观察**

[1] 阿多诺（Theodor Adorno，1903～1969），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法兰克福学派中坚人物。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逃避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而赴英国，后转美国，1949 年重返法兰克福大学。他以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理论为基础，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与文化危机做了犀利的剖析与深刻的论述，尤其对所谓“文化工业”（culture industry）与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做了入木三分的批判，从而影响了整个当代西方的学术思想。

的关联。

训练有素的人种志研究者力图把握各种集体与共同体的**文化价值**，而这些文化价值只对那些群体中的人们才别有意义。他们将这些观察记述下来，使之获得进一步的传播，因为人种志的著述会以独特的方式提供原味引语、生活历史与**个案研究**：这些出版物常常对各式各样的读者都是容易理解的，因为其作者注重对实际发生的事务进行如实的、详尽的描述。

人种志研究的典范有Beynon（1985）对南威尔士中学班级的研究，Barbera-Stein（1979）对照料学龄前儿童的日托中心的研究，Saunders与Turner（1987）对赌场（betting offices）的观察。不管调查的目的何在，其职责都在于进入田野（field），获得对这种**群体**，即由于共享特定的文化价值而被界定的群体所做的定性分析。尽管这种方法对于那种没有什么成效的实验室研究方法，或那种肤浅的、定量的**问卷**调查方法来说不失为一种替代性的选择，并由此获得许多支持，但我们应该注意人种志中所隐含的潜在含意——“外部存在一个真实的世界”，而这个世界有别于社会研究者的学术框架。其实，人种志文献有时反映的只是某个研究者对**族群**身份（identity）的探求，而非对族群价值（value）的阐释。

虽然这种方法在具体阐明理论与关乎现实研究两个方面都有许多优势，但某些批评还是应该留意。观察可以是公开的，也可以是隐蔽的——后者意味着研究者对观察对象的渗透程度，以及以某种方式对可能歪曲或伤害群体成员的信息予以公开的可能性。与这种道德问题相联的，还有研究者为获取那些支持其预设假说或理论的证据而对文化进行“打劫”的可能性——定性材料是那么容易被操纵，并经过选择而被编辑。不过，即便假定研究者为人正派为学严谨，依然确实存在这样一种真实的可能性，即人种志研究者提供的是关于群体如何行事与如何感知其世界的一种功能性叙述，没有包括这一群体在某种社会秩序中的经济与政治关系方面更具结构意味的视角。基本上，人种志研究可能有大量的描述性内容，而缺少解释或理论建构。

另一个问题涉及研究者真正理解另一群体的观念与/或**语言**的难度——特别是当诸如社会**阶级**这样的屏障存在之际（注意，中产阶级几乎不可能成为人种志研究的考察对象）。最后，即使研究者与被研究群体打成一片，我们还是应该问一下，当研究者完成项目而又去进行新的研究时，那些留在其身后的人们又怎么样呢？

DS

互文参阅：方法论（methodology），言语（parole），参与式观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

深入阅读：Hammersley and Atkinson（1983）；Turner（1990）；Atkinson（1990）。

隐匿（ex-nomination） * 巴尔特[①]（1973）发明的一个术语，用来说明某个社会的决定性经济因素如何从该社会的表述中缺位——其字面意思是它们未被命名（un-named）。* 关于隐匿，巴尔特举的例子是资本主义。在西方社会的经济话语中，资本主义很容易得到命名——若说我们生活在一种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内，是不会引起争议的。然而，巴尔特指出，在政治话语中情况就不是那么简单了。即使某些政治党派与政府党派把自己视为资本主义“企业”的“支持者”，也没有这样的资本主义政党。若我们再审视**表述**中的**意识形态**话语，那么，资本主义就完全被隐匿起来了——相似的**神话**、**意义**及种种表述同资本主义之间的关联已被抹去。这些表述经过**自然化**过程而成为**常识**，以使最后谁若觉得**现实主义**应被理解为“资本主义”的**现实主义**，或者说显而易见的、不言而喻的“现实”之属性实际上源于看待现实的某种既定方式而非现实世界本身之属性，都将显得莫名其妙了。

隐匿的概念可以拓展到现代**文化**的其他方面，这样一来其深层意味就能得到显现。正如资本主义在从经济到政治再到意识形态的运动中被隐匿起来，我们也发现在涉及**性别**、**种族**与民族的表述中同样存在隐匿化的过程。女人常常首先是作为女人被表述，然后再说其他方面，而对男人就不必如此。男人是从其工作、行为、性格或其他什么方面被表述的——仿佛男人的性别处在“**话语**之外”：他的性别不需命名。所以，我们发现报纸的通栏标题上会说什么“坠机中的参议员与女孩”、“围困的美女——切

① 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法国结构主义思想家、著名作家、文艺批评家、符号学家，对符号学理论颇多建树，1976 年任法兰西学院符号学讲座教授，成为该讲座的第一位学者。主要著作有《神话集》（1957）、《符号学原理》（1964）、《S/Z》（1970）、《罗兰·巴尔特论罗兰·巴尔特》（1975）、《恋人絮语》（1977）等，这些著作均有中译本。

里·哈罗琳是救星"、"性感的安娜位居民意测验之首"云云。在这些例子里，女人是由容貌、身材或生殖力予以界定的，而男人则很少以这样的方式被"提名"（nominated）。

与此相似，隐匿化的过程在种族与民族的表述里也能见到。比如，黑人与非英格兰民族（包括威尔士、苏格兰与北爱尔兰等其他联合王国的民族），其所指就"属于"他们各自的种族或民族，而对英格兰白人来说就没有必要为这种属性命名。

于是，可以认为一旦某个修饰性形容词显得冗余，我们就面临隐匿问题——即我们提及人们的时候，不用具体说明他们的年龄、**阶级**、生活地域、**性别**、**种族**或**民族**。

JH

互文参阅：意识形态（ideology），自然化（naturalizing）。

经验(experience)　＊一个大量用于**常识**的概念化过程上的术语，这个过程表明正是经验决定着知识、表达的形式或文化。＊由于经验通常总是属于个体（然后集纳起来或许属于邻里、共同体或国家等更大的**群体**），所以它被视为**意义**的首要*来源*。

于是，普遍认为我们必须给经验以充分的尊重，不管它是我们自己的，还是我们希望研究与理解的群体的。许多有关特定**文本**（真实的或虚构的、分析的或"创造的"）的"真正意义"或"性质"之争，都集中在它是否忠实于"真正的"经验。

这个术语在**文化研究**中引发争议，因为它被用来——特别是被关注工人阶级或日常生活的历史学家用来——作为对某个群体或时期进行特定解释的正当依据；因此，也就被用来加强推进这些群体利益的不同**意识形态**立场。因此，"我们必须使我们的政治立足于我们所代表的人民的经验之上"。这种立场的问题在于，无权无势群体的"经验"既有消极的又有积极的因素，消极因素里首先就包括根深蒂固的性别主义与**种族**主义。于是，"经验"成为一把双刃剑。

其中的部分原因在于，迄今为止对这个术语的使用存在严重的理论错误。它被当作意义的*来源*——在人们与群体的经验上建构其**文化**、表达、意识形态等。而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没有文化系统与意指或**话语**系统，没有这些系统先于个人而存在，并形成个性为/被每个人所建构的资

源，那么也就不存在任何可以经验的东西了。简言之，经验不是意义的先决条件，相反，意义是经验的先决条件。作为这个结论的一个结果，人们的注意力日益集中到本身属于一种研究对象而非一个解释术语的经验之上。这种分析，涉及对这个术语在学术**话语**（如心理学）以及媒介文本、书面文本与相似文本中，作为一个理所当然（未经理论化）的概念而予以使用的关注。

JH

互文参阅：文化（culture），话语（discourse），个体/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主体性（subjectivity）。

深入阅读：Donald（1982）。

实验（experiment） * 一种科学性的控制状态或过程，由此而将经过选择的变量分离出来，然后进行实证性的研究，以便检验某种假说。* 比如，一个设计用来验证某个广告效果的项目，可将受众是否选择广告中的产品作为因变量（*dependent variable*）。因变量会受诸如产品包装的颜色与质量、接受实验的男女性别等自变量（*independent variable*）的影响。这些操纵每个变量（或变量合成）而排除其他变量（与其他变量合成）的实验，经过精心设计被用来确认究竟广告里的哪个/哪些构成因素在**说服**购买者方面最有效果。

体现于实验的设计与实施中的偏差（biases）以及随后对实验数据的解释等问题，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比如，参阅 Jung 1971）。实验室常常（虽然并非总是）作为人为场景而用于实验。这是因为自然环境下变量不是总能得到控制，这种操控效果在真实的“外部”世界中也不能得到观察。这里的问题在于实验者所设计的是一种高度人为化的状态，它有利于自信的推断而不利于实验室外的偶发情况。因此，实验就面临两个需要考虑的问题。第一，实验室中所进行的测验，在什么程度上代表“真实生活”的场景。第二，实验所用的样本，在什么程度上代表全部人口。这两个要点涉及一个普遍的问题，即在实验室中通过实验过程而产生的数据是否具有可靠性与普适性。

实验性的研究方法在**效果**研究的传统中比较通行，它与传播学**皮下注射模式**的研究关系密切。一个典型的研究方案将包括一种控制条件与一种实验条件。比如，让实验组接触“异常”条件，而向控制组提供某些平行

比较的“正常”事态。受到观察的行为模式所显示的任何差异，据称都可归于实验的控制问题。比如，我们可能对电视上的**暴力**内容影响儿童的问题感兴趣。那么，我们的研究就得设法将观看非暴力节目同观看暴力节目的不同效果区别开来，将观看非暴力节目同从不观看任何电视节目的不同效果区别开来。于是，就形成接受调查的三个**群体**：

A 组：观看暴力节目

B 组：观看非暴力节目

C 组：从不看电视节目

C 组构成一个控制组，因为它的作用是作为一个基准，我们可以用它来检测观看电视的效果，而不管所看节目的内容是什么。这些群体中的所有儿童都以某种方式接受测验——观看节目之前与之后的情况（针对 A 组与 B 组），或者某些其他行为（针对 C 组）。然后将他们的不同表现进行对比。

然而，人们在调查这种传播活动时难于控制所有可能起作用的干扰性变量。比如，仅仅是处于实验室的条件下，由于受到某些人为状态的蒙蔽，控制对象的行为就会轻易受到影响。重要的是对实验设计中包含控制组的所谓**观察实验法**与**客观性**等说法保持批判性态度。

DS

互文参阅：观察实验法（empiricism），方法论（methodology），客观性（objectivity），实证主义（positivism）。

深入阅读：Miller（1984）；Harris（1986）；Aronson(ed.)（1988）。

F

面具（facework） ＊这个术语是指社会场景中被视为演员（actors）者所表现的公开举止。＊一看到这个字眼就会想到目光对视与面部表情，但面具还应包括身体语言乃至交谈等更宽泛的方面。在这个意义上，面具的“面”（face）意味着那些活动在戈夫曼[①]（1971）所说表演“前台”的演员彼此接触的界限。比如一个餐馆女招待在顾客（或老板）面前，她的面具就包括穿着、询问某些问题而非其他问题、听从吩咐、回应某些其他要求等。但一旦离开其服务对象（进入戈夫曼所说的“后台”），互动的规则立刻发生变化——在厨房里，她们可能说些粗话，抽支烟，四处转转，开开玩笑，甚至叼块肉尝尝。

一个有用话题，需要对所选择的某社会群体进行面具分析。面具可按不同主题——如服装、姿态与流行语进行解释。许多面具都有赖同一“团队”中其他人的支持，如果事情未按计划进行，他们能给予帮助（或当表演开始乏味之际，他们能即兴发挥）。更有趣的是确认所有演员的“道具”，它们被用来强化面具与*印象管理*（*impression management*）——使用道具的范围从物品（如晚餐盘子）到比较固定的不可能马上接受或放弃的辅助物（如性格）。

尽管面具这个概念在实际中颇受青睐，但应注意某种同前台/后台划分相关的问题。如果我们假定面具与公开行为相连，那么，到后台我们依

① E·戈夫曼（Erving Goffman，1922～1982），美国社会学家，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拟剧论的提出者。按照拟剧论，人生犹如演戏，社会好似舞台，每个人都分别扮演一定的角色。其间，又有“前台”（front stage）与“后台”（back stage）之分。活动在前台的是主我（I），退到后台的是宾我（me），主我演绎着人生的戏剧，宾我则从这出戏剧中抽身出来，获得片刻的休整。

然在演出——只不过这时是面对不同的人群或**受众**，以不同的角色与规则在演出。所以，你可能会问我们是否能完全摘下这一传播的演出面具。而且，许多遵循这一**拟剧论**主题的**象征互动论**学者都给人以这一印象，即面具在分析**接触**问题上面是关键向度（dimension）：说来说去，什么是隐藏于公共自我背后的东西呢，我们总在考虑自己的举止吗？米德①（1934）对"主我"（I）与"宾我"（me）的区分，似乎使许多将戏剧作为日常生活之隐喻的人迷学者满脑子都被这个概念所占据。

DS

互文参阅：拟剧论（dramaturgy），接触（encounter），非语言传播（non-verbal communication）。

深入阅读：Goffman（1971）；Burns（1992）。

反馈（feedback） ＊ 源于**控制论**的术语，尽管现在同传播**模式**与**传播论**联系密切。它被当做解码者对讯息的反应而返回编码者的过程。＊ 于是，它就成为**编码**者借以了解**讯息**接收情况的途径。因此，通过反馈就能对传输过程——不管是编码还是**媒介**做出调整，从而获得编码者希望获得的反应。

传播过程模式往往根据获得反馈的机会而对媒介进行分类，并且一般将反馈与效率相提并论。例如，只能进行有限反馈或迟滞反馈的大众媒介、布告栏或某种扩音广播系统，在**传递**信息的方式上就被视为不如面对面传播或电话的效率高。同样，有些人认为授课不如讨论的效率高。

我们应该注意，在一个直线性的过程模式上增加一个反馈的回路，并不能使这个模式成为循环的或动态的——它只是提高直线模式的效果。

JF

互文参阅：控制论（cybernetics）。

---

① Q·H·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1863～1931），美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实用主义代表人物，芝加哥学派奠基人，该学派以象征互动论著称。米德平生著述虽然不多，但身后由其学生编辑整理的《心智、自我与社会》（*Mind，Self，and Society*）却是一部社会学经典。他的主要学术贡献之一，是对自我起源的论述。他将"自我"（self）划分为"主我"（I）与"宾我"（me），而不论主我还是宾我都是在社会化的互动过程中形成的，这种互动过程主要通过象征（symbol）或符号进行的，比如语言就是一套象征系统。

福特主义/后—福特主义（Fordism/post-Fordism） * 工业化社会的生产组织在20世纪的历史进程中所经历的不同阶段。* 这个术语通常也被用作标签，以指称在**文化**与政治关系及其进程中所发生的深刻变迁，这些变迁赋予这些术语以广泛的适用领域，而不仅仅是描述工业化的生产模式。不过，这个概念是源于亨利·福特[①]的声名，他被视为历史上第一个按可承受价而大规模生产标准化产品的实业家，他使大众消费成为可能。福特主义这种体制的特征是：大规模的工厂与投资；铁面无情的机械化生产线；劳动过程与“科学管理”上刻板重复的程式。正如福特所言，这类组织的逻辑是消费者可以得到一辆带有任何他们所需色彩的汽车——只要它是黑色的；这是一个针对体现于这种早期形态中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之关系的有效隐喻，这种形态遵循刻板的、标准化的生产规则运行，而这种规则限制了不同“消费文化”的发展。尽管福特主义时期被当做西方发达经济的特征，特别是战后时期的特征，但其某些关键信条——比如标准化与集中化——也与苏联以及其他全球性工业文化的发展有关。

后—福特主义则表明一种完全不同的历史转向，由此新的经济市场与文化便凭借以计算机为基础的新信息技术而原则上得以展开。与福特主义相比，后—福特主义时代通常与规模小、灵活性强的生产元素相联系，它能相应满足消费者十分广泛或各种各样的专门需求。后—福特主义同1980年代以来西方主要国家在政治与经济方面的变化相联系。由这个概念所确定的核心进程包括：传统的“大型”工业或“重”工业走向衰落，而新的“朝阳”式集成电路行业开始出现，它在劳动与工作组织的非中心化网络中更具灵活性，并与生产与消费的全球化趋势相一致。最后需要提及的一个关键特征是，**生活方式**多样性与不同消费活动的进展。

关于这两个概念的效用及其准确含义的争论，关于其用法中所隐含的这种转换的争论还在继续。毫无疑问，这些争论在分析与理解当代文化与传播上具有突出的相关性，可以合乎逻辑地认为它们所涉及的是历史上完全不同而意义重大的方面。

TO

---

① 福特（Henry Ford，1863～1947），美国现代企业家、工程师、福特汽车公司创始人，他使汽车成为大众消费品，他发明的T型汽车曾经占到世界汽车产量的一半，另外福特汽车厂流水作业的生产模式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我吃了什么（have I done that）
而你没有吃（You wouldn' t have）

别的不说，前四句就打乱了一个英语句子中各种元素的正常顺序，它在正常的文章里可能写作："一只中毒的老鼠从地板下面默默地凝视我（a poisoned mouse does quietly stare up at me out of the floor）。"这是诗歌破除英语正常规则的若干方式（比如，采用不同一般形式的标点符号）之一。

另一种凸显过程，则是在那些确保使人理解的规则或形式之外再加入额外的规则或形式（pattern）。使用韵脚、压头韵与韵律节奏等，大致就是诗歌在声音层面所用的这种形式化手法。

凸显还可以通过对排比句的形式化处理而获得，如下面这首雪莱的短诗：

有个字常被滥用（One word is too often profaned）
　因为我把它滥用（For me to profane it）；
有种情总被误弃（One feeling too falsely disdained）
　因为你把它摒弃（For thee to like disdain it）；
有个希望太像绝望（One hope is too like despair）
　因为审慎使它窒息（For prudence to smother）；
亲爱的，同情更多来自你（And pity from thee more dear）
　而非来自另一个（Than that from another）。

这首诗的前四行是根据下面这种简单的句式构建的：

One-X-（is）too-Y- -Z-ed
For -M-to -Z- it；

这里，X＝名词；Y＝副词；Z＝动词原形；M＝代词。这个句式在诗的开头是那么有力，以至第二对诗句完全比照第一对诗句的句法。但是，最后两行诗的修辞效果，却是由于——至少部分是由于——对前面已经固定的句型予以破除。所以，在这两种方式里，确立规则与破除规则都是凸显语言的要素。

按照形式主义者的说法，这种凸显过程比语言更能将注意力引向自身。以此方式使语言“陌生化”（making strange），实际是使日常经验由熟变生（unfamiliar）的有机构成。通过操纵语言的规则，文学得以拓展其传播的可能性，使自己从表现世界的习惯性方式中摆脱出来，获得特殊的**修辞**效果。

不过，形式主义理论的一个致命缺陷在于，它未留意某些运作于非文学文本中的同一化过程（identical processes）。比如，排比式的句子结构在政治演说、广告与其他类型的说服性话语中就十分常见。因此，Neil Kinnock（英国工党的一位政治家）在一次演说中说到下面的句子时，他所用的正是重复的句式，而这种句式在形式主义者看来是诗歌所独有的：

我们被这样一个政府所统治
其言辞充满信心而其现实却是企业的
　　毁灭，
其言辞倡导效率而其现实却是
　　崩溃，
其言辞显示德行，
其现实却是失业，而失业又使家庭破裂或溃散。

同类句型也可以在广告中看到：

香水
你们用的香水述说着许多你们的事情
我们用的香水述说着一些我们的事情。
没有什么能像香味那么强烈地触发回忆
仅仅一点相似的芳香就能唤回那个时间
　　　　　　　　　　　　　　　那个地点
　　　　　　　　　　　　　　　那个人物
名字可以忘却
甚至相片也会褪色
但芳香却永不消散

如同诗歌与演说，我们在这则广告的头两行中再次看到并列的句子结构：

The -X -Y- Z -Says -N- about -Y-

其间，X＝名词；Y＝代词；Z＝动词；N＝量词。我们在下列词语中，还发现非常明显的同声母音型："相似"（familiar)、"芳香"（fragrance)、"忘却"（forgettable)、"相片"（photo)、"褪色"（fade）以及"地点"（place)、"人物"（person)、"香水"（perfume)。由于类似这样的证据，形式主义者试图以语言的凸显化特征来界定诗（甚或"文学性"）的理论似乎就不可能一以贯之。相反，诗歌不仅涉及文本的性质，更涉及社会判断的问题。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凸显的观念因此就仅与历史的兴趣有关。比如，值得注意的是，上面那段从一篇政治演说中挑出的句子准确地说，一方面很可能是为了初次说它时引发听众的喝彩，一方面很可能是为了随后新闻广播的选用。所以，语言的凸显用法在文学之外似乎同**修辞**——言辞的**说服性**行为——密切相关，而凸显的观念作为这种宽泛研究的一部分依然保持其吸引力。

MM

互文参阅：符码(code)，隐喻(metaphor)，规则(rules)，文本(text)。

深入阅读：Atkinson (1984)；Bennett (1979)；Leech (1966)。

形式与内容（form and content） ＊一对容易产生误导的简单词语，一者指所有符号都有某种物质性实体（也就是形式），一者指某些非它们自身的东西（也就是内容）。＊这对简单词语之所以容易产生误导，因为它们能够而且常常的确导致这种误解：内容是先在的，等着被赋予某种适当的形式——即所谓"通行包装"（vulgar packaging）的传播**模式**。按照这种模式，**讯息**（或内容）经过**编码**，成为**符号**（形式），传输之后再被**解码**，也就是把形式剥去，以显示内容，就像把一个包裹的包装纸去掉。随便说一下，**内容分析**的缺陷之一，就在于它没有考虑到每一分析单元的内容都具有自己的形式。

实际上，不管是形式还是内容，都不能脱离对方而存在，它们彼此互相影响，以至在两者之间进行区分仅仅是一种（大可怀疑的）出于分析目

的的做法，而现实中是不可能存在的。因此，这些术语使可同**能指**与**所指**互相对照——能指与所指同样互相依赖，而且也仅仅是为了分析的便利而存在。不过，能指与所指具有更精确的定义，并属于一个得到详细论述的**意指**模式的组成部分。

文学批评家特别喜欢讨论“形式“，甚至当年有个风靡一时的批评流派就是“形式主义”（Formalism）。“形式”一词用得如此广泛，如此随意，现在该休息一下了，学生用它的时候应该谨慎；“内容”同样如此。

JF

互文参阅：内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符号（sign），能指/所指（signifier/signified）。

框架（frame） ＊这个概念是指对社会知识与经验所进行的建构（organization）。＊戈夫曼①（1974）的理论表明，人们是如何将日常生活的现实图景纳入框架之中，以便对社会情景进行理解与反应的。事实也证明，以框架作为**类比**在分析社会**互动**上非常有效，因为它将一次接触或事件同另外一次接触或事件区别开来。这就像一幅画的框架在墙与画之间标出清晰的界限一样。

这个术语也用于大众媒介的研究中。媒介的框架就是进行选择的原则——是强调、解释与表述的**符码**。媒介生产者常用它们建构媒介产品与**话语**，不管是文字的还是图像的。在这种背景下，媒介框架能使新闻记者，比如，对纷繁错综、常常矛盾的大量信息进行迅速而例行的加工与“打包”。因此，在对大众媒介的文本加以**编码**的过程中，这些框架就成为一个重要的**制度化**环节，而且，在形成受众的解码活动上还可能发挥某种关键性作用。

DS

互文参阅：符码（code），新闻价值（news values），倾向性解读

① E·戈夫曼（Erving Goffman，1922～1982），美国社会学家，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拟剧论的提出者。按照拟剧论，人生犹如演戏，社会好似舞台，每个人都分别扮演一定的角色。其间，又有“前台”（front stage）与“后台”（back stage）之分。活动在前台的是主我（I），退到后台的是宾我（me），主我演绎着人生的戏剧，宾我则从这出戏剧中抽身出来，获得片刻的休整。

(preferred reading)。

深入阅读：Goffman（1974）；Tuchman（1978）；Gitlin（1980）；Hall *et al*.（eds）（1980）。

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 * 一群经过松散结合而共同致力于发展以"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著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革命哲学的德国知识分子。* 其名称来自1923年成立于法兰克福①的社会研究所，1930年代这个学派被迫离开德国，移居美国，尽管1953年又在法兰克福正式重建。这个学派的重要成员包括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对哲学、社会学与社会心理学均有兴趣，阿多诺（Theodor Adorno）——专长是社会学、哲学及对音乐的批判性研究，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主攻哲学与政治学，弗洛姆（Erich Fromm）——心理学家与社会心理学家，及本雅明（Walter Benjamin）——专注于文学社会学、艺术及哲学。哲学家与社会学家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的工作，为延续与发展这个学派的传统做出新的努力。一般来说，这些思想家共同关注着同一问题并由此而结合在一起，即他们都对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各种变革之性质与意义展开分析，他们都认为这些变革对他们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他们的首要目的在于，通过自己的著述揭露阶级社会的潜在矛盾，以引发进步而积极的社会发展。

他们的**语境与经验**，对他们选来讨论的重要主题与问题是有力的证明。这些主题与问题涉及对法西斯主义崛起与革命运动衰落的解释，及对他们所认定的现代西方社会日趋明显的权威化与科层化（authoritarian and bureaucratic）趋势的焦虑。旅居美国期间，这些主题通过他们对大众媒介的分析获得发展，他们将大众媒介称为"*文化工业*"（*culture industry*）。他们认为，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里，这种文化工业合乎逻辑地浮现出来，以扮演一个高度控制性的角色，用来代表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去抑制与扰乱种种对立意识或批判意识。尽管对此以及对他们著述中

① 德国有两座以法兰克福命名的城市，一个全称为"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Frankfurt der Oder），位于柏林以东的奥得河左岸；一个全称为"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Frankfurt am Main），位于莱茵河支流美因河的下游，曾是德意志皇帝的加冕处及大诗人歌德的诞生地，法兰克福学派所属的法兰克福大学即在这里。

的其他内容存在不同解释，但多数论者都强调那种弥漫于他们论述中的悲观主义，以及这种著述中所展现的“大众”（mass）视角与“阶级”视角的潜在矛盾①。

TO

互文参阅：阶级（class），意识工业（consciousness industry），大众社会（mass society）。

深入阅读：Held(1980)；Bennett(1977)；Morley(1980)；Adorno(1991)。

功能论/结构功能论（functionalism/structural functionalism） * 将社会看做某种互相协调、和睦融洽、团结一致的“整体”或“社会系统”，其各个部分的理想功能都在于维持平衡、共识与社会秩序的一种理论视角。* 同某种有机体或身体相似，社会也可按其构成部分或“子系统”进行分析，如果这个有机体或社会要维持整体的“健康”与良好状态，那么其所有构成部分都得有效地发挥功能。因此，功能论者在看待某个社会或群体的任何构成部分时，都要追问这个部分为社会“整体”所发挥的功能。比如，语言的功能是什么，大众媒介的功能是什么，它们如何用来维持平衡与共识，它们如何同其他社会系统的功能相互关联？

结构功能论同杜尔凯姆②与帕森斯③的社会学关系密切，1940与1950年代在美国成为一种主流的社会理论，为许多传播与大众传播研究奠下牢

① 所谓“大众”视角，是将现代社会的普通民众看做被动的、盲目的、散沙一盘的个体，受到各种各样权威与科层势力包括大众媒介的操纵；而所谓“阶级”视角，是将他们视为阶级斗争中积极的、清醒的、团结一致的集体。法兰克福学派一方面力图发展一种革命哲学，另一方面又把普通大众视为大众化的“群氓”——任由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宰制。所以，这里说他们的理论存在潜在的矛盾。

② 杜尔凯姆（Emile Durkheim，1858～1917）又译涂尔干，法国社会学家，社会学法国学派的奠基人，主要著作包括博士论文《社会分工论》（1893）、《社会学方法论》（1895）、《论自杀》（1897）等。其外甥莫斯（Marcel Mauss）、弟子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等，都曾任法兰西学院社会学讲座教授，同样声名卓著。

③ 帕森斯（Talcott Parsons，1902～1979），美国社会学家，长期执教于哈佛大学，1949年任美国社会学学会主席。著述丰富，影响广泛。主要著作有《社会活动的结构》（1937）、《社会体系》（1951）、《现代社会的结构与进程》（1960）、《社会理论与现代社会》（1967）等。

固的基础。默顿[①]（1957）在许多方面深化了这种理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认为对社会的某种制度或群体有利或“功能正常”（functional）的结果，对其他人可能就成为他所说的“功能障碍”（dysfunctional）。他还区分了特殊活动与进程中的显性（社会想要的）功能与隐性（社会不想要的）功能。拉斯韦尔[②]（1948）以及拉扎斯菲尔德[③]与默顿（1948），都为传播与大众传播提供了功能论研究的有趣范例。有关大众媒介的最新一种功能观是由Wright（1975）提供的，他开列出这样一个问题清单[④]：

① 罗伯特·默顿（Rorbert Merton，1910～2003），声名卓著的美国社会学家，早年在哈佛大学科学史权威萨顿指导下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17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1938），被视为科学社会学的先驱性著作。此外，主要著作还有《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1949）、《理论社会学》（1967）、《科学社会学》（1973）等。他曾长期担任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还做过美国社会学会的主席。他与拉扎斯菲尔德（Paul Felix Lazarsfeld）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的多年合作，不仅为社会学研究开宗立派，同时也对传播学研究产生深刻影响。另外，其独子罗伯特·C·默顿（Rorbert C. Merton）曾与M·S·斯科尔斯共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1997）。

② 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1902～1978），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与社会学家拉扎斯菲尔德（Paul Felix Lazarsfeld）、社会心理学家卢因（Kurt Lewin）和霍夫兰（Carl Hovland）并称传播学“四大先驱”（W·施拉姆语）。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世界大战的宣传技巧》（1927），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宣传问题做了集中论述，从而与李普曼的《舆论》（1922）一起成为传播研究的开山之作。另外，他在1948年提出的所谓“5W”模式即“Who/Says What/In Which Channal/To whom/With What Effect”，以及与之相应的五类传播研究，即所谓“控制分析/内容分析/媒介分析/受众分析/效果分析”，是传播学最早也最有影响的理论模式，对传播研究特别是美国的经验式研究产生首屈一指的影响。

③ 拉扎斯菲尔德（Paul Felix Lazarsfeld，1901～1976），奥地利裔美国社会学家。曾就读于维也纳大学，获应用数学博士学位。1933年赴美，1940年开始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他领导的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学研究所，成为社会学实证研究的重镇。其间，他与罗伯特·默顿（Rorbert Merton）合作就大众传播问题做过一系列卓有影响的研究，从而与政治学家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社会心理学家卢因（Kurt Lewin）和霍夫兰（Carl Hovland）并称为传播学的“四大先驱”（W·施拉姆语）。

④ 这个问题清单涉及美国传播学理论的一系列经典命题，比如拉斯韦尔（1948）曾经把传播的社会功能分为三种——监视环境（如新闻报道）、联系社会（如新闻评论）、传承文明（如家庭、学校、教会等），后来赖特（C. R. Wright）又补充了一项功能——提供娱乐。

	(1) 显性的（manifest）	(3) 功能
什么是大众传播	与	与
	(2) 隐性的（latent）	(4) 功能障碍

它们如何进行

(5) 监视（新闻）	以有利于	(9) 社会
(6) 联系（选择）		(10) 个体
(7) 文化传承		(11) 次级群体（subgroups）
(8) 娱乐		(12) 文化系统?

功能论在许多方面一直受到批评，已经不再具有以往所有的主流地位。这方面尤为重要的批评意见是，作为一种视角的功能论过于强调社会各群体之间的共识，从而使源于社会关系的冲突销声匿迹。它对社会变革与转型也不能给予满意的解释。

TO

互文参阅：共识（consensus），使用与满足（uses and gratifications）。

深入阅读：Cuff and Payne(eds)（1979）；Bilton *et al.*（1981）；Cohen（1968）；Wright（1975）；Schramm and Roberts(eds)（1971）。

G

把关人（gatekeeper） * 一个源于美国社会心理学与社会学传统的术语，用以描述诸如编辑的那种人，他们在新闻媒介的组织内部占据决断性的关键位置。* 总体上讲，这个概念属于机械论**模式**的组成部分，在这个模式看来，新闻就是原始信息“流”或流经“**信道**”的原始信息，通过某个新闻机构的选择性过滤或“门区”之后的成品。根据这个模式，专业传播者按其所处的生产流程分为“新闻采集者”（news gatherers）或“新闻加工者”（news processors）。在第一个流程中，记者搜集“原始”新闻，在第个二流程中，这个素材由把关人进行选择与节略，而把关人通过选择性的控制而真正在制造新闻（make the news）。换言之，他们对部分信息“打开大门”，而对其他信息则“关上大门”。

把关人首要的专业职能是做出客观而公正的决断，这种决断对新闻的最后成品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大多数的把关人研究，都力图测量与判定那些影响这种决断或使这种决断带有偏见的压力。一般认为，这些压力来自（1）把关人主体的**价值**体系、爱好与厌恶；（2）当时的工作情景；（3）法律、机构与商业方面限制把关人决断的那些可以识别的控制因素。

如今，把关人概念通常被视为过于简单，没有多少效用。历史地看，它在分析大众媒介的传播者上确实标志着一个重要阶段。人们最常引用的范例，就是 White 的研究（1950）。

TO

深入阅读：Chibnall（1977）；Tunstall（1970）；Hall *et al.*（1978）；McQuail and Windahl（1981）①；Schudson（1991）。

① 即 D·麦奎尔等《大众传播模式论》（*Communication Models*），中译本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1987）。

性别(gender) * 男性与女性的文化区别。* 性别完全属于**文化**而同自然无关：性别中惟一属于自然的是性（*sexual*）的区别——根据这种生物学/生理学的差异，某种并不牢固但精心打造的文化差异结构才得以获得平衡，这种结构用来对人种意义上的社会关系进行分类，并使这些关系富于意义。无论何时，只要认为性的差异富于意义，我们面对的就是性而不是性别。坚持对性与性别做出区分的关键在于，短期内不可能使人类的生理状况发生多少变化，而文化却可以在短期内出现转型。所以，生物的男性（male）或女性（female）、行为的"男性"（masculine）或"女性"（feminine）"本质"为何的争论，往往将性别差异视为"仅属自然"的东西而给予合法化，而这种合法化"不过是意识形态而已"。性别属于一种人为（human）与**表意**的区分；其本质的"来源"既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

JH

深入阅读：二元对立（binary opposition），父权制（patriarchy），权力（power）。

类型(genre) * 具有**联想关系**的公认套路，某种特定媒介（电影、电视、写作）的全部作品都被分门别类地纳入其中。* 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具体的影片、电视节目或书籍被确认"属于"某种特殊类型——如电影中的西部片、恐怖片或音乐片；电视中的警匪片、情景喜剧或肥皂剧。进行这种确认的要旨在于，观众/读者/批评家可根据开始确认的类型而产生特定的预期，从而据以确定自己对它的反应。你评判一部西部片不会说其音乐分量不足，而评判一部音乐片不会说它不够恐怖。假如你看到一部警匪片而大笑，或是为一部情景喜剧中的驾车追逐情景而紧张，那么这个节目要么是按照类型化的预期有意为之，要么就是你在对它进行**自行解码**。

我们难于区分某个特定类型的确切特征，也难于获得所有不同类型的有限特征（不管是某个特定**媒介**，还是所有媒介）。而且，无法区分何种特征显示类型之间的差别——这不仅是主题问题或**方式/样式**问题，也不仅是确定同每个类型相称的不同**惯例**的问题。它涉及所有这些问题。但是，因为联想关系的作用不像货物清单，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比方说西部片中仅仅增加一部影片，就能改变整个类型——哪怕这部西部片可能并

未显示多少一贯与其类型相关而得到确认的习俗、主题或方式/样式。人们认为，《*Butch Cassidy and the Sundance Kid*》、《*The Wild Bunch and Badlands*》等影片，都对西部片类型产生了这种效果。因此，类型是动态化的联想关系而非公式化的清单，我们不能把类型当作其固有属性来描述。即使如此，它们在下面两个有关建构方面还是具有实质性的效果：一是我们对某部影片的反应，一是行业本身对其产品予以**制度化**的方式——所有制片厂都致力于某种特定的类型（比如，梅高美致力于音乐片，华纳兄弟致力于强盗片等），而每个演员、导演与编剧也往往仅以某一类型而得到总体确认——如希区柯克①、休斯顿②、贝克莱③等。

既然如此，那么各种类型实际上就属于意识形态**闭合**的手段——它们限制某个特定**文本**的潜在**意义**，限定制片公司的商业风险。当然，它们不断被新增的范例所改变，以至于最后你不得不得出结论，认为根本就没有什么"典型的"西部片这种东西，甚至即使在你看到一部西部片而能确认它之际。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需将类型作为文本关系的一个属性，因而也是**意指**的一个属性来理解。这就意味着类型仅能从否定的意义上或相对的意义上进行定义，也就是说通过所说的作品同那些(1)属于不同类型的作品与(2)属于同一类型的其他作品之间的已知差异进行定义。由此说来，在任何时间、对任何媒介或所有媒介，都不存在一套定义某个类型或所有类型的固有属性。在某个特定历史时期通行的一套类型，自会决定每种类型如何被理解，每个具体文本如何去适应现成的种类。事实上，甚至于某个文本与同一文本在不同的国家或时期，都可能属于不同的类型。这方面的一个范例可能是影片《*Double Indemnity*》，它开始被当作一部惊悚片，但现在则常常作为一部具有宿命意味的影片(film noir)被重映。

---

① 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1899～1980），英国出生的大师级电影导演，以拍摄惊险悬念片著称。经典作品有《三十九级台阶》（1935）、《蝴蝶梦》（1940）、《西北偏北》（1959）、《群鸟》（1963）等。1979年被美国电影学院授予终生成就奖，1980年被英国女王封为爵士。从1940年代起，他都在自己执导的每部影片中露次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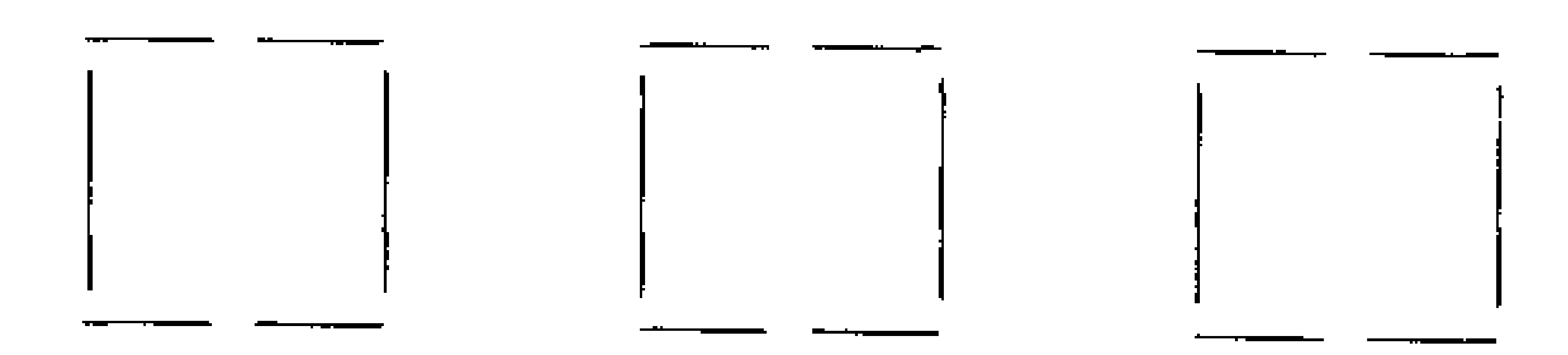
② 休斯顿（John Huston，1906～1987），美国电影导演，以执导结构严谨的情节剧著称。

③ 贝克莱（Busby Berkeley，1895～1976），美国电影导演、舞蹈编导，以在银幕上创造的众多舞女与华丽场面而闻名。评论认为，他把歌舞片从传统样式中解放出来，给大萧条时代的观众带来轻松的感觉。

JH

互文参阅：闭合（closure），联想关系（paradigm）。
深入阅读：Corner（1991）；Berger（1992）。

完形[①]**(Gestalt)** ＊对整体与总体的形状（form）而非独立的构成元素（elements）所做的识别。＊20世纪初期到20世纪中叶的完形运动强调，整体不同于各个部分的总和。其主要理论家（韦特默、苛勒、考夫卡、卢因[②]）认识到，对任何特定结构内所有组成部分的把握，并不会提供对其总体结构的完整把握。相反，意义源于那些组成部分的相互关系，以及整体的每个组成部分的相互关系。比如我们总把下面的图形看成一组豁豁牙牙的正方形，而不是看成18条直线：



同样，听人谈话时，我们听到的总是完整的句子，而不是一个个的声音。

完形理论与**群体**研究的关系尤为密切。对一群学生的**个体**化了解，并不能由此预测这些个体成员一旦聚集成某个群体时将会如何行事。在解释**受众**对媒介文本的反应方面，完形视角也能发挥效用。虽然在一出半小时的戏剧里，独立的场景都可以得到确认，但是，对这个节目综合的、全面的印象，却需依赖于每个男演员与女演员的相互关联，依赖于他们所处的

① “完形”一语来自德语的“Gestalt”，又译“格式塔”。

② 韦特默(Max Wertheimer，1880～1943)、苛勒(Wolfgang Kohler，1887～1967)、考夫卡(Kurt Koffka，1886～1941)、卢因(Kurt Lewin，1890～1947)，均为完形心理学或格式塔心理学的代表人物，其中前三人原是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的教师，1910年起密切合作，创立完形心理学派(Gestalt School)。1930年代先后移居美国，使完形心理学派在美国获得进一步的发展。而卢因不仅在心理学研究方面卓有建树，而且也在传播研究方面贡献颇多，与政治学家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社会学家拉扎斯菲尔德(Paul Felix Lazarsfeld)和社会心理学家霍夫兰(Carl Hovland)并称传播学“四大先驱”(W·施拉姆语)。

一连串总体的**叙事**场景与角色关系。进而言之，还需考虑每个具体观众的**文化**完形与语境完形之相互关联。

DS

互文参阅：闭合（closure）。

深入阅读：Schellenberg（1978）。

全球化（globalization） * 在一种世界范围和基础上运行的经济与文化网络之增长与加速过程。* 全球化与有关“世界**文化**”（World Culture）的争论密切相关，作为一个批判性概念出现在1980年代后期。这个术语是指过去20年间日益增强的一种跨国流通与进程的综合运动。“全球化文化”的兴起，在于跨国市场与跨国公司、传播与媒介技术以及对它们进行**生产**与**消费**的世界体系均出现重大的变动与发展。这个进程有别于“**文化帝国主义**”，它被理解为更具复杂性和总体性，而其结果不具多少组织性或可预见性。

对最近的某些研究者来说，全球化的文化经验以及由此产生的世界文化的大杂烩，可被视为**后现代状态**的一个显著方面。从这种观点看，20世纪末影响民族文化与经济结构的因素已发生决定性变化，国家的历史疆域与“安全”已不得不越来越面对国际化与全球化的整合这一现实。这些进程的结果，被表述为一种新的、独特的文化“空间”——全球——它侵蚀和动摇了古老的、既定的种种民族文化与民族认同。有人认为，这些文化与认同由一种“全球--地方”的向度（global-local dimension）所取代，如今地域性的日常文化已无所不在地浸润着全球化的意味。这一进程的核心在于传播技术和媒介网络的出现，它们使世界范围的交易、旅行与互动变得更快、更密集、更相互依赖。这些进程与其他进程的快速发展及互相冲撞，以及它们对各种文化生活与社会生活的冲击，为讨论与研究提供了一个可持续的、需要密切关注的平台。文化与传播研究对这些全球性的变化予以认识与反应是非常重要的。

TO

互文参阅：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福特主义/后--福特主义（Fordism/post-Fordism），后现代状态（post-modernism）。

深入阅读：Tomlinson（1991）[①]；Featherstone（ed.）（1990）；Sreberny-Mohammadi（1991）。

群体（group） ＊ 一群具有某些共同兴趣与目标的人。＊ 社会心理学家与社会学家确认了许多类型的群体。小群体（small group）的特征在于成员之间通过**角色**扮演、目标确定与情感关系的发展而保持**互动**。小群体包括家庭、朋友圈与工作群体等。对较大群体来说，少一个成员多一个成员对群体的结构与功能通常没有什么重要影响。这种群体可以包括电视的**受众**，或坐满学生的阶梯教室。

依成员的亲密程度与扮演角色，群体可分为正式群体与非正式群体（formal or informal），他们可按领导与属下的关系组成，也可不按这样严格的形式组成。其他常见的群体二分法还有**初级群体**与次级群体（primary-secondary）、临时群体与永久群体（temporary-permanent）、自主群体与依赖群体（autonomous-dependent）等。另外一种替代性的、通常更具体的分类法，涉及对不同种类的群体目标或**语境**的确认，这些目标与语境是同每个群体的全部成员相联系的。这样的群体包括同辈群体、参考群体、委员会、专门小组、陪审团、治疗小组与学校班级等。这一系列的分类表明，任何时候**个体**都不可能仅仅属于某个群体。相反，对个体的**社会化**来说，有时同时所属的种种群体都被视为必不可少。

得到群体成员与其他群体成员承认的群体认同与群体宣言，引发群体关系、群体动力与传播、以及冲突方面的大量研究。Billig（1982）集中探讨了这方面的**意识形态**基础，他强调关于群体的任何研究都必须包括社会、历史与经济的因素，同时包括社会心理的因素。因为，这种群体超出任何围绕个人对该群体发生**知觉**所做的单一分析。这样一来，针对比如说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与**阶级**意识的讨论，就可能得出更令人吃惊的认识。

DS

互文参阅：受众（audience），对话（dyad），初级群体（primary group）。
深入阅读：Tajfel and Fraser（eds）（1978）；Billig（1982）；Robinson（1984）；Burton and Dimbleby（1988）。

---

① 即 J·汤林森的《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中译本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9）。

H

霸权(hegemony) * 由葛兰西[①]在1930年代详细阐述并用于文化研究的概念，主要是指统治阶级在某些历史时期实施社会与文化领导权的能力，通过这种方式——而不是对下层阶级的直接高压统治——以保持他们在国家经济、政治与文化方面的**权力**。* 霸权概念的关键内容不在于强迫人民违背自己的清醒意志或良好判断而将权力让度给掌权者，而在于它揭示出一种情景，其间所积极寻求的乃是人们对理解世界的那些方式的认可，而这个世界"恰好"符合拥有霸权的**阶级**联盟或*权力集团*（*power bloc*）的利益。因此，我们越是积极介入对自己、对社会关系以及对广大世界的理解活动，结果我们就越是在自己的依附状态中与统治阶级形成共谋关系。

一旦明白霸权所揭示的是赢得对不平等阶级关系的认可，那么我们就需要根据这个概念进一步深究；就需要了解它在**文化**研究中的使用情况。这可能包括对诸如宣传或广告那些文化形式的关注，它们的公开意图就是宣传某个政党或产品。但是，这种对**形象与意义**的人为操纵，实际上会被当作霸权未获成功的证据，因为其间有某些明显感到的、对权势阶层所作所为进行解释的需要，而用于解释的术语是这种宣传所面对的人民无法享用的。所以，在**文化研究**中，霸权这个概念更常见于那种研究，即它们力图揭示的是日常的意义、表述与行为如何按照如下方式被组织被理解：把统治"集团"的阶级利益变成一种显然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永恒的、

① 葛兰西（Antonio Gramsci，1891～1937），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建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先驱。1921年组建意大利共产党，1926年被捕入狱，1937年因病保释，旋即去世。他在狱中写的书信，1947年以《狱中札记》结集出版，成为当代一部理论经典，产生广泛的影响。特别是他所论述的"霸权"思想，对当代学术思潮包括文化与传播研究更是构成不可或缺的核心观念。

所以也是无可争辩的共同利益，而且说成是每个人的利益。

如此一来，专注于文化的霸权内容的各种研究，就将焦点对准那些通常被视为**公正**或中立的形式与**制度**，它们被看做是代表每个人而显然不涉及阶级、**种族**或**性别**。这种制度包括国家、法律、教育制度、媒介及家庭。这些制度是观念、知识与意义的批量生产者——它们是文化的中介机构，其重要性在于它们不仅承担着个人意识与社会意识的组织者与生产者的角色，而且还发挥着更为明显的“表述性”（state）功能。尽管它们彼此**相对自主**，因为其成员是由专业技能与意识形态都不同的人所构成，但是，这些文化中介机构却共同搭建起一个霸权得以建立与实施的平台。总之，它们能被某个权力集团“占领”或“拓殖”，而构成这个集团的不仅有经济上占支配地位的阶级，而且还有其“联盟”与*下级阶级*（*subaltern classes*），包括从专业人士与管理人员到各种知识分子与一小撮下层阶级，他们认为自己的利益与统治集团自身的利益是一致的或完全相同的。

由此可见，霸权是在**意识**与**表述**的领域发挥作用；当社会、文化与个人的**经验**总和能够按照由权力集团定义、确立并付之流传的术语予以理解之际，霸权才最有可能获得成功。简言之，霸权将历史上属于某个阶级的**意识形态**予以**自然化**，使之成为一种常识。其要害在于权力不是作为强权而是作为“权威”而得到行施；生活的“文化”部分都被去政治化了。最易采用并最受官方鼓励的那些理解自己与世界的策略，不仅是作为策略而出现，而且也是作为“人性”的自然（无可争辩）属性而出现。除此之外的其他策略——基于相反的政治策略或反--霸权意识——在这种语境中则不仅是作为“非正式的”（unofficial）东西而出现，而且可能被表现为名副其实的无一意义（non-sense）；它们不可设想，不能表达。

然而，由生产的所有制形态与工业化组织形态所必然而反复导致的阶级之间持续不断的利益冲突，决定了霸权绝不可能是完全彻底的。总会出现种种被用来对抗霸权秩序的意识与表述（representation）。这就意味着许多所谓意识形态工作（*ideological labour*）介入霸权形态与反--霸权形态的斗争之中。而从长远的角度看，这场斗争的关键可能还是政治与经济权力本身。

JH

互文参阅：游吟职能（bardic function），阶级（class），文化（culture），意识形态（ideology），权力（power），社会化（socialization）。

深入阅读：Turner（1990）；Hardt（1992）。

英雄/女英雄（hero/heroine） ＊ 由于自身的美德、优异及勇敢而得到崇拜和作为偶像得到崇拜的个体。＊ 英雄/女英雄可能是真人，也可能是在文本形态中由文化复制出来的。因此，名标英雄之列者可能从贝利①到曼德拉②，从特丽萨修女③到葛丽泰·嘉宝④，从赫拉克勒斯⑤到女超人（Superwoman），从纳尔逊海军上将⑥到伯特兰·罗素⑦。不管是真实的还是想像的，这类形象面临逆境都无所畏惧，具有某种被视为显露我们自身缺陷的基本美德。多半英雄/女英雄都属于理想类型，他们由于媒介的表

① 贝利（Pele，1940～　），巴西足球运动员，当代世界最著名的球星之一，曾率巴西国家队连获三次世界杯赛冠军，号称“黑珍珠”。他脚力出众，射门准确，1969 年 11 月 20 日在其第 909 次比赛中射进 1000 个球。1978 年，获得国际和平奖，成为巴西的民族英雄。

② 曼德拉（Nelson Mandela，1918～　），南非黑人领袖、政治家，曾长期遭受监禁（1962～1990），1994 年当选南非总统。他一生都在为废除种族隔离制度而不懈努力，1993 年与南非总统德克勒克一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③ 特丽萨修女（Mother Teresa，1910～1997），1979 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以救济印度赤贫民众为宗旨的天主教仁爱传教会的创立者。该会设立许多服务所，救济盲人、老人、残疾人、麻风病人与重病患者。1963 年，印度政府授予她“莲花主”勋章。

④ 葛丽泰·嘉宝（Greta Garbo，1905～1997），20 世纪上半叶最负盛名、最有魅力的好莱坞女影星之一，生于斯德哥尔摩，曾在斯德哥尔摩皇家剧院学习，1925 年应聘到美国的米高梅电影公司。一生主演了 27 部影片，36 岁时退出演艺界，隐居纽约，闭门谢客。1954 年被授予奥斯卡特别奖。

⑤ 赫拉克勒斯（Hercules），一译海格立斯。希腊罗马神话中最著名的英雄，罗马神话称赫丘利。主神Zeus与Alcmene之子，力大无比，英勇无敌，以完成 12 项英雄业绩闻名。

⑥ 纳尔逊海军上将（Admiral Nelson，1758～1805），又称纳尔逊公爵。英国海军统帅，曾与拿破仑海军多次交战，1805 年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击败敌方，自己也中弹身亡。直到现在，还是英国最受爱戴的民族英雄。

⑦ 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20 世纪声誉卓著、影响深远的思想家之一。一生完成了 40 余部著作，涉及哲学、数学、科学、伦理学、社会学、教育、历史、宗教以及政治等广泛领域，其中最具原创性的是与哲学家怀特海共同完成的 3 卷本《数学原理》，而最具影响力的是《西方哲学史》，1950 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除了著述，还积极投身于有关人类和平与正义的社会活动，曾与爱因斯坦一同发表声明，谴责核试验与核扩散，强烈反对美国的战争行为，并与法国著名的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等组织国际战争罪犯法庭。

述（这里他们与**明星**形象十分相近）而至少得到部分夸张，但是作为一整套**文化价值**与道德信仰的缩影，他们又总是超逾**个体**的身份。这样一来，英雄/女英雄就成为社会化过程与种种认同所必需的构成。除了偶像这个概念，我们还应强调殉难，它指的是某个英雄/女英雄所遭遇的残忍而不公的死亡——比卡[①]仅为其中一例。

英雄的形象常常通过**二元对立**得到确认，即他们是在同德行败坏的恶棍相对立中凸显出来的。我们甚至可以追问一下，为了永久的存在，一方是否总是依赖另一方，纯粹的叙事是否总是依赖这种二元对立——比如，福尔摩斯对邪恶的Moriarty。除了小说，我们还在实际生活中发现二元对立的事实与英雄/邪恶这类**刻板印象**的建构：冷战时期的肯尼迪对赫鲁晓夫，最近英国煤矿罢工中的Scargill对McGregor。当然，谁好谁坏，主要取决于你站在哪一边。这类形象所必不可少的**主体性**，能进一步应用渗透到**性别**的差异之中：比如，把“金发碧眼的花瓶”这种女英雄，同那种强壮而沉默的男英雄做个对比。

最后有一点涉及反-*英雄/女英雄*的出现。严格说来，这些人由于其懦弱、堕落甚至残忍而应属邪恶角色。然而，现在有一种中间类型，它合并了英雄/邪恶的元素。你或许想探讨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有种解释可能是基于一种浸透英雄形象的市场，其中道德完美品质优异的形象已经太满太滥，甚至令人厌烦。

DS

互文参阅：原型（archetype），认同（identification），形象（image），投射（projection），明星（star），刻板印象（stereotype）。

深入阅读：Dyer（1979a，1987）。

平衡（homeostasis） ＊保持平衡；在某种最佳层面上保持平衡的状态或过程。＊经常提及的例子是恒温器，它在某个温度的阀被突破之际开始启动，而一旦达到另一更高温度的阀时又被关闭。在分析比如说**动机**、**非语言传播**、甚至**认知**性信仰体系内的**态度**构成时，平衡都证明是个有效的概念。

① 比卡（Stephen Biko，1946～1977），南非黑人觉醒运动创始人。1977年被捕，拘留期间因暴力身亡，成为南非黑人民族主义的烈士。

DS

互文参阅：阈（threshold）。

同构（homology） ＊某种结构的复制与翻版。＊伦敦地铁示意图，就是真实事物——彼此具有同样结构关系的各个车站与各条线路——的一个同构，但它不属于一张**肖像**图。一个传播过程**模式**是一个同构，它所呈现的是有关要素的关系。同构一词常与类比或**相似**相对照，后者是对**形式**而非结构的复制。在一部公式化的电视系列剧比如《*Minder or Baywatch*》中，每一集都是该系列剧其他各集的一个同构。也就是说，不管每一集的故事是什么，它们的结构都是相同的。

JF

皮下注射模式（hypodermic needle model） ＊有关媒介一受众关系的一种机械而简单的模式，认为媒介是把价值、思想与信息直接"注射"（injecting）到每个被动的、原子式的受众个体身上，从而产生一种直接的、不经任何中介环节的效果。＊伴随着电子媒介的迅速发展，特别是1930与1940年代在美国的发展而产生的忧虑与悲观是产生这个**模式**的根源。同时，它也是刺激一反应框架的一种通行的扩展形式，而这个框架支撑着大量有关受众与媒介效果的早期研究。将大众传播活动简化成一种注射器似的功能，媒介的讯息（"注射剂"）由此被直接填进大众受众的**个体**头脑这种观念，不断受到越来越多更新研究的挑战与拒绝。它带有对媒介**权力**或无限权力的负面效果深怀恐惧的烙印，在涉及大众媒介与社会暴力的讨论中依然可见。它同媒介**讯息**与"疾病"或"感染"两者间的其他**隐喻**密切相关，按照这类隐喻，讯息经过感染性的传播，就导致个体的观众或听众"健康"受损。

TO

互文参阅：受众（audience），效果（effects），麻醉（narcotization）。
深入阅读：Halloran（1977）；McQuail and Windahl（1981）①。

---

① 即D·麦奎尔等《大众传播模式论》（*Communication Models*），中译本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1987）。

I

肖像(icon/iconic) * **符号**的一种类型，在其**能指**与它所代表的事物之间存在一种明显的实体上或知觉上的相似。* 例如，某些道路标志牌上的黑色图画内容——画着一些坠落的岩石、鹿或一个带着铁锹的人——可以说是**肖像**的。但上面用的红色边框或蓝色背景则不是肖像的，因为蓝色或红色同这种颜色所表达的意思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关系。对后一种情形而言，这种关系纯属任意的、**惯例**的；而对前一种情形来说，它是**动机化**的。具象派绘画——比如，传统的肖像画——可以被视为肖像的，就像许多复制相片的形式。电影电视更是将其视觉部分基本置于肖像的表意符码之中。这样就保证它比书写的文章（其间的表意符码纯属任意的）更容易理解；但是，即使在这些最具自然而貌的媒介中，习俗依然发挥作用。只需想想影视的**方式/样式**或**类型**如何随着时代而迅速变化，对此就一目了然。这个术语在**传播研究**中特别有用，这主要是因为它成为一种对不同媒介中占主导地位的表意类型进行区分的途径。

宗教肖像——比如，基督的形象或某个圣徒的形象——提供了肖像的一个有趣特例：对某些信徒来说，它们拥有所画人物的精神化权力，而他们便凭借这种描画以一种特别具有强制性的方式"出现"（present）。

MM

互文参阅：惯例（convention），类型（genre），标志（index），动机（motivation），客体（object），符号（sign），象征（symbol）。

深入阅读：Peirce（1931-58）；Saussure（1974）[①]；Wollen（1972）。

认同(identification) * 个体将自我身份同至少另外某些身份相融合的过程。

① 即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译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80）。

* 正如Rycroft（1968）所言，认同可能包括（1）将自我延伸到某些他人；（2）从某些他人借得自我；或（3）将自我与某些他人融合。

认同可被视为一种**防御机制**，由此将自我批评导向对他人身份的采纳，因为他人似乎能够对付这一威胁。有时，我们可能仿效甚至创造某种**英雄/女英雄**，他们成功地克服日常生活中所遭遇的主要挫折。这样的认同可能与某种通过幻想而建构的**神话**实体相关，与媒介**形象**或**群体**之中他人的一手经验相关（这方面更详细的精神分析理论论述可参阅 Rank 1924）。

认同问题也深入到有关**社会化**中初级群体（primary group）与次级群体（secondary group）的讨论：就初级**群体**而言，自我同外在的**客体**之间没有多少差异；就次级群体而言，个人则是将自己同其他的客体相分离而**知觉**自我的——不过至少同这些客体的某些部分相认同。

DS

互文参阅：防御机制（defence mechanism），逃避（escapism），召唤（interpellation），社会化（socialization），窥视者（voyeur）。

深入阅读：Rank（1924）；Mortensen（ed.）（1979）；Nash（1985）；Leiss *et al.*（1986）。

意识形态（ideology） * 阶级社会中关乎表意（知识与**意识**）的社会关系。* 它常常被简化以指那些关系的产品：即具有某个**阶级**特征或符合某个阶级利益的知识与**表述**。经过拓展，它则指相同的产品，但这些产品可能被视为具有**群体**特征而非阶级特征——从**性别**（男性意识形态）到工作（**职业观**）。意识形态被看做任何一种这样的知识，即摆出自然或通行的使用架势，特别是其社会性来源被压抑、被**隐匿**或被认为了不相干之际。所以，尤其在最近的**文化/传播研究**中，意识形态被视为对**意指**与**话语**领域内不平等的社会关系进行再生产的过程。

作为一个理论性概念，意识形态源于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中，理解知识、表述与**意识的形式**、**内容**与目的，不能脱离生产的物质性与社会性活动，不能脱离阶级斗争。相反，正是生产活动直接形成有关自然的知识，而这种自然知识由于尽可能将生产的所有方面同普遍的自然“规律”相吻合，从而直接导致生产的发展与增长。

根据马克思的论点，社会知识的发生遵循同样的方式，它直接源于阶

级对抗。但是，鉴于自然知识可能（至少原则上）有利于一切阶级，社会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则有利于那些在特定时期居于社会优势地位者（统治阶级）的利益。因此，对马克思来说，社会知识有别于自然知识，它把那些实际上依据历史条件而定的社会安排作为自然的东西予以表述。这是意识形态理论的起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概念得以确立的基本假定，在马克思的两段著名论述中得到表达：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构成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也都具有意识，因而他们也思维；既然他们正是作为一个阶级而进行统治，并且决定着某一历史时代的整个面貌，不言而喻，他们在这个历史时代的一切领域中也会这样做，就是说，他们还作为思维着的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而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而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Marx 1977，pp. 176，389）①

如果统治阶级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那么，比如“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就不应仅仅理解为资产阶级个体成员的所思所想，而应理解为确立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那种理解事物的通行方式。这些理解方式的产生与扩散不仅直接源于统治阶级，而且源于相对**自主**并显然分离的群体，包括从知识分子与教师到媒介专业人士与高级理发师。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论点，引出马克思主义关于*虚假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的思想。就统治阶级自身而言，虚假意识出现在该阶级想像其社会地位取决于上帝法则或自然法则之际——就像在封建君主制度下信奉国王拥有神圣权利的信条，或像在资本主义哲学中信奉**个人主义**及把社会当作一种社会契约的信条。对被统治阶级来说，虚假意识出现在他们

① 译文分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页8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页52。

按照通行意识形态所提供的术语，而不是按照他们自身相对于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对其社会与个人状况进行理解之际。在这种语境中，意识形态就被视为对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思想进行的生产与扩散。

例如，借助意识形态这种方法，经济上的统治阶级就将他们的优势普及和扩展到社会活动的整个领域，并在这个过程中将其**自然化**，以使他们的统治作为自然而必然的、从而也是合法而必须遵守的事情被接受。

对马克思来说，并非一切社会知识都必然属于意识形态。尤其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马克思主义）本身，就不能视为一种意识形态，因为意识形态概念是指一种虚幻的知识。在改造社会与自然的斗争中获得的认识虽然是片面的、有限的，而且可能是错误的，但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自然法则与历史法则的**客观性**存在却是不容置疑的，唯物主义科学提供了使这些法则成为知识的方法这种信念也是不容置疑的。

在传播与文化研究中，意识形态的概念证明颇有影响。事实上对它的使用，甚至有点过于宽泛。尤其在一些马克思主义的通俗版本里，意识形态已被简化为仅仅是经济**基础**的**反映论**。结果，意识形态经常被局限于上层建筑方面，依据思想、信仰、意见的“正文”进行解释，而它们将意识形态从一种社会关系与社会实践的概念化过程化约成一组**观察实验法**的事物。

正像如果你只看词语而不看词语产生的法则，那么语言将难于分析一样，将意识形态化约为思想就不能解释思想的产生或形式。因此，这个概念需要重新理论化，而这就产生了*普遍意识形态*（*ideology in general*）的概念。这个概念与阿尔都塞[①]（1971）具有明确的关联，对他来说，意识形态是将个体变成**主体**的机制，而在Volosinov（1973）那里这个概念也是个体中所隐含的。它意味着一切知识——不管是科学知识还是其他知识，都是在**语言**中产生的，而语言从来都不是一个传输性的媒介，通过它就能看到真相。因此，所有的语言都被视为意识形态化的东西，而真相属于语言的产物而非语言的动因。由此可见，没有什么特殊话语（包括马克

① 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1918～1990），法国结构主义哲学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1948年，在著名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加入法国共产党。他的思想包罗广泛，影响深远，诸如“症候式阅读”、意识形态理论等，均为当代学术思想的重要发展。

思主义本身）可以脱离意识形态。相反，任何时候都有许多意识形态话语在某个全面的社会形构（formation）中互相抗争，而当它们被产生、使用、控制、制度化与遭遇抵制时，成问题的不仅是知识，而且也包括权力。

不过，在特定意识形态层面上可以清楚看到，意识形态不是一个一元化的媒介，我们栖居其间就像鱼儿游于大海的媒介。即使是在常说的所谓*主流意识形态*（*dominant ideology*）中间，也存在着互相抗争与冲突的立场——比如，就像不同的教育哲学与政策间的情形。而且，同意识形态相遇总是在制度化的形式与本地化的情景中，这就使主流的阶级利益与主流的意识形态完全一致的情况绝不可能存在。进而言之，不管主流意识形态看来如何自然、如何成功，它们都始终在同来自"底层"的抵制相互争斗，这些抵制或者采取系统化的替代形式（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或者采取日常性的调和/拒绝形式（参阅**亚文化**）。

在特殊的媒介研究与普遍的传播研究中，意识形态已成为核心概念。如果坚持认为不仅没有内在于某个事件与客体的"自然"意义，而且由事件与客体所建构的意义也总显示着社会性的定向——总以阶级、性别、种族与其他利益进行调校，那么这个概念就非常有用。进而言之，意识形态不是一组事物，而是一种能动的实践，这种实践或是致力于改变社会活动的环境，以再生产那种熟知而受控的意识，或是进行斗争以抵制既定的、自然化的意识，从而将意义生产方式转变为新的、另外的或相反的形式，这些形式将产生针对不同社会利益而进行调整的意义。

JH

深入阅读：Cormack（1992）；Hall（1982）；Larrain（1979）；Turner（1990）。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 在各种阶级社会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意识形态所采取的物质形态或制度形态。* 它以其简称 ISAs（意萨司①）而知名，并与 RSAs（力煞司②）或*国家强制机器*（*repressive state*

① 意萨司，借鉴赵一凡先生的译法。

② 力煞司，参考赵一凡先生的译法。

apparatuses）相区别，这两个术语均由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阿尔都塞①（1971）所首创。

力煞司，是听命于国家及直接受制于国家的强制性力量或管制性力量所形成的综合体系。它们包括刑罚制度、警察、军队、立法与行政部门等。这些力量的突出之处，在于它们具有依法赋予的发号施令的权威（不管我们是否喜欢）。

而另一方面，意萨司则源于公民社会（与国家相对的私人领域）的各种**社会化制度**。它们也实施管制功能，并“代表”国家繁育（reproduce）意识形态。它们包括教育、家庭、宗教、法制、政党—政治制度、**文化**以及传播等。其特征在于认同而非强制，在于摆脱经济上的统治阶级或其国家代表的**相对自主性**。

意萨司的功能，是繁育我们对生产关系的顺从——把我们规训（discipline）成那种最有助于保持与延续现存生产关系的**主体性**。为了做到这一点，意萨司将**阶级**利益当做既自然又中性的东西予以表述。它们把阶级翻成其他术语。比如，教育是中性的，因为所有人在考试面前都是平等的。但是，只有某些意识形态能够通过考试。法制是中性的，因为所有人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但是，只有某些行为被判犯法，只有某些意识形态的主体被判有罪。媒介是中性的，因为它对世界的**表述**是**公正**的。但是，只有某些意识形态作为值得公正对待的东西而得到表述，其他则不然。政党—政治制度是中性的，因为其中能够听到所有立场与观点：除了无一党派的、超逾议会政治的声音。

JH

深入阅读：Althusser（1971）。

形象（image） * 最初是指对现实的某种视觉性**表述**——或是实际的（就像在图画或照片中），或是想像的（就像在文学或音乐中）。现在一般是指为了吸引公众而非复制现实，人为创造的某种人工制品或公共印象：它意味

① 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1918～1990），法国结构主义哲学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1948 年，在著名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加入法国共产党。他的思想包罗广泛，影响深远，诸如“症候式阅读”、意识形态理论等，均为当代学术思想的重要发展

着其中具有一定程度的虚妄，以至现实难同其形象相符。*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讨论某个消费品的形象，或是某位政治人物的形象。

JF

互文参阅：肖像（icon），象征（symbol）。

公正（impartiality） * 广播（而非报纸）媒介在报道公共事务上不偏袒任何一方的戒律。* 公正是**广播界**与议会党派（特别是两个轮流执政的党派）相互调和的一种实际而实用的做法。它是一种策略，记者由此而可以顾及（1）全方位的观点与意见；（2）意见的相对分量（这意味着既定观点或正统观点优先于挑战它们的观点）；（3）随着时间而发生在“方位”与“分量”方面的变化。

以往，公正必须在节目之内实施。也就是说，如果你引用某种保守党的观点，那么就必须在同一节目中引用某种工党的观点。不过，后来在节目之间求得公正的观念越来越得到认可。这种公正是说如果选题需要，你可以在一个节目中只提供一种立场，同时明白另外的节目会在另外的时间提供相反的观点。这一变化主要出自广播界自身的压力，他们有的希望确立一种不必佯装没有自己观点的“立场鲜明的新闻”，有的则只是反对由于顾及“两面”观点的拖沓表达而打断一篇精彩报道的进程。

公正常常有别于其他两个概念，即平衡（balance）与中立（neutrality）。一般认为公正克服了平衡与中立的缺陷。平衡是将同样的时间分配给对立的观点，在这个过程中所说内容没有所占时间重要。中立是在没有任何选择标准之下，对任何观点与各种观点都一视同仁地给予**享用**。这种做法招致不满，因为议会政要不喜欢将广播时间赋予成心推翻议会政治的**群体**与党派。因此，活动在议会框架外的共产主义、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党派，还没等到广播界承认自己无法做到公正就被剥夺享用媒介的机会——广播界根本就不是中立的。结果，公正的戒律就被看成是议会（两党）制度的一根主要支柱。当然，它是由议会加诸广播界的一个法定要求。

JH

互文参阅：享用（accessing）。

蕴涵/会话蕴涵（implicature/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 * 会话蕴涵是一句话中含蓄而非明确传达的意义。* 这个术语在**语用学**里十分重要，它出

自哲学家H. P. Grice（1975）的著述，他以极端方式对比了哲学逻辑与日常会话逻辑。他特别指出，日常会话的句子意思常比实际说出的内容丰富得多。为了解释这种现象何至于此，他提出会话得以进行的一项根本原则——*合作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这项原则可以概括为下列四项会话者暗暗遵循的基本原理或基本准则：

(1) *质量原理*（the maxim of quality）：说话者说的应该是真实的，而不应该说他们确信为假的东西或者他们缺乏充分证据的东西；

(2)*数量原理*（the maxim of quantity）：根据会话的目的需要多少信息，会话者就提供多少信息，既不应说得过少，也不应说得过多；

(3) *关联原理*（the maxim of relevance）：说话者所说的话应该同当时会话的目的相符合、相关联；

(4) *方式原理*（the maxim of manner）：说话者应该避免含混不清、冗长、晦与模棱两可。

正是基于这些原理仍以某种方式被遵循这一假定——即使是在它们仿佛被“无视”的时候，我们才能弄懂会话的意思。简单地说，会话是这样发生的：如果某项基本原理显然被某句话无视之际，我们就尽力从中提取某种使这一原理与合作原则相称的意义。这表明非一显性意义就是蕴涵。例如，在下面的交谈中，B的回答表面看似乎没有应和A的问题：

A：*比尔在哪儿？*

B：*苏的房子外面有一辆黄色大众车。*

就这句话而言，显然它至少无视了质量原理与关联原理，从而不符合合作原则。但实际上我们是假定B在更深的层面上遵循合作原则，并从中寻求将B的所答与某种同A的问题显然相关与合拍的应答联系起来的意思。在这个例子里，B传达的意思其实是，“如果比尔有一辆黄色大众车，那么他可能就在苏的家里”。

会话蕴涵的概念提供了一种研究意义的重要方法，它超越了高度言辞化与严格逻辑化的方法：这种方法强调言语的意义不仅在字句之中，而且在依字句所做的演绎与推断之中。但是，这个思想并非没有问题。其中大

量争论都在探讨到底需要多少基本原理才能恰当解释合作原则。有些论者认为需要八个或更多。而其他论者则认为，它们都能化约成为一个基本原理，即“关联”。就连合作原则本身有多大说服力都不能肯定。某些说话类型——像法庭上的抗辩、电视中咄咄逼人的政要访谈或夫妻间的激烈口角——似乎都显示着对合作原则严肃的、系统的及根本的背离。然而，对有效的蕴涵理论来说，没有一个原则能够普遍适用。

MM

互文参阅：语用学（pragmatics）、符号学（semantics）。

深入阅读：Levinson（1983）；Leech（1983）；Grice（1975）。

独立（independence） ＊这个概念只关乎等级（scale）与对立（opposition）而没有固有特征。＊比如，电影与录像的生产过程就包括一系列不可比较的不同人员与活动，而其中每一项都可能解释为同某种专业主流形态相对立的独立成分。例如：不在大制片厂拍片的好莱坞导演就是独立的——比如库勃里克[①]。在重要电影生产中心（洛杉矶与孟买）之外的国家，就是以独立姿态参与国际电影市场的竞争——所以，获得数百万美元票房收入的澳大利亚影片《*Crocodile Dundee*》——在美国与世界电影市场发行的当年排名（1986）仅次于《*Top Gun*》，就是一部独立影片。

独立的类型各不相同。它们的建构是围绕着不同的鼓动性**话语**：社区、先锋派、鼓动宣传（agitprop，即 agitation and propaganda）、艺术、鉴赏家、自由经营等。每种情况下，鼓动性话语都生产一系列特有的活动。在一个国家全面的**文化生产**中，独立往往标志着一种多少是自觉地同主流**娱乐业**的气氛进行对抗的生产或实践。这种独立可能意味着：

（1）不同的、替代性的或对抗性的生产过程（比如，同传统的劳动分工和等级体制相对抗的工作方式）；

（2）不同的美学思想（在**形象**、叙事与结构上面的**实验**，促使人们关注意义的建构，而不是注重用“一对一的对话”来“展示与讲述”情节）；

① 库勃里克（Stanley Kubrick，1928～1999），美国电影导演与作家。他的影片具有冷静而严谨的画面风格，注重细节，常带讥讽。代表作有《斯巴达克思》（1960）、《洛丽塔》（1962）、《幻觉》（1980）等。

（3）对实践者的角色以及主体问题或财务收益所做的某种自我反省；

（4）与受众的不同关系（使他们不再是“椅上懒汉”，而成为以目击者或参与者的身份积极介入的受众）；

（5）服务的是某种所谓“选民”（constituency）式受众而非“大众”（如妇女、工人、某个地区或社区、涉足政治、社会及环保的人士等）。

此外，独立还被用来说明钱款来源；在英国广播界，这个术语委婉地指“资本家”或“商人”，而电视与广播的主要商业频道（ITV 即 Independent Television与 ILR 即Independent Local Radio）及其管理机构（ITC 即Independent Television Commission与Radio Authority）也都被冠以独立的名义 —大概是指独立于国家所有。与此同时，“独立制片人”（independent film sector）则用这个术语为旗号，确保自己从艺术委员会（Aarts Council）、英国电影协会（British Film Institute）及地方委员会等机构获取经费，以从事低成本的、非商业化的制作。这样一来，这个同一术语在电影界的对立两端（指艺术与商业——译者注）都非常有用。

JH

标志（index） * 皮尔士[①]划分的三类符号之一。* 标志与其对象或随意（causally）或基于经验地（existentially）结合在一起——它似乎成为所指的一个组成部分。举例来说，烟是火的标志，麻点是麻疹的标志，咆哮是愤怒的标志。Monaco（1977）指出，标志被转喻性地用于电影中。他举例说，在一位睡着的女人枕边留的一卷钞票是妓女的标志。漫画家最喜欢转喻性地使用标志——比如丘吉尔的雪茄、Ted Heath的鼻子与牙齿、希特勒的小胡子等。还有一种更具象征形式的标志，比如在一幅卡通里，一个肥胖的雇主训斥一位消瘦的雇员——肥硕的肚子是其成功与富足的标志，进而言之又成为从消瘦雇员身上榨取暴利（fat profit）的标志。

---

① 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1839～1914），又译皮尔斯，美国哲学家、科学家、逻辑学家，实用主义的初始人，被视为美国最具创建和最多才多艺的学者，尽管他生前并不得志。在发展现代逻辑中，皮尔士曾对符号问题做过深刻而独到的论述，为现代符号学与传播学提供了影响深远的思想。比如，他曾经将符号（sign）分为三种，即肖像（icon）、标志（index）与象征（symbol）。

JF

互文参阅：肖像（icon），转喻（metonymy），象征（symbol）。

个体（individual） ＊ 人（*person*）的同义词，生产于中世纪对上帝的本质——三位一体（three person but indivisible）——所做的概念化。＊ 这个概念经过发展而成为一个表示不能进一步分割（divide）之物的形容词——与各种类型的总括性术语或概括性术语相对。如果这个术语的使用不带任何同群体进行比较的意思，如果它被用来表示人民，那么它就是在以这样的方式被使用，即《牛津英语词典》（*OED*）所拒斥的"现在主要作为一种口语化的俗语，或一种受到贬低的术语"而使用。不过，毫无疑问，就此而言个体这个术语现在是最为人所熟知的。

JH

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 ＊ 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哲学的主要源泉（mainspring）；个人是人类行为的原点与根源的信条。＊ 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能力（特别是劳动的能力），不会由于这些能力而对社会（或对比如说封建领主）心存感恩。所以，为了任何由个人的劳动能力而可获得的东西，个人可以自由出卖他们的这种能力，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必要考虑其他任何人。于是，个人的这种"自由"就成为"自由的"市场经济得以运行的基础。在这个模式里，惟一抑制个人自由的因素，就是竞争（即由个人的劳动能力而可获得的东西，将受制于这种能力在一种竞争性市场中所能开出的价码）与合同（即每个个人的社会关系都采取商品交换的形式：比如，根据双方约定的条件，由劳动换取工资）。

个人主义在传播研究中很少被讨论，但是，其假定却内含于大量针对被试所做的各种各样的理论探讨中。其中最常见的就是自由个人的观念，这里的个人尤其被视为完全的个体并被当做行为与意义的根源，从而形成研究的"单元"（unit）。所以，根据这种观念，传播活动发生于个人与个人交换讯息之际（合同模式）；受众是由个人的总和所构成（超越于话语关系、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除非这些关系成为个体之内的各种变量）；将社会力量理解为来自个人行为的东西。

对个人主义的替代性视角，当然并不否认个体之人的存在或行为。然而，它却特别强调这种存在与行为是社会关系与表意系统的产物而非

根源。所以，在如**结构主义**、**符号学**、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的论述中，个人这个术语就被**主体性**这个概念所取代。

JH

互文参阅：主体性（subjectivity）。
深入阅读：Macpherson（1962）；Thomson（1977）。

信息处理（information processing） * 通常与计算机**类比**相关的一种研究取向，用以确定某一系统的某一信息流程。* 一般说来，这种信息流程包括如下可以确定的步骤：对一系列**刺激**进行扫描与选择，对这种信息、储存结构、储存过程以及检索储存的机制进行解释，并对检索或处理的信息进行表述。依据传播的**认知**性基础，这种框架往往同这样的信息处理过程相关，即在一个信息处理**模式**中又分**感觉**、**知觉**、**回忆**、思考与**语言**等步骤。比如当你读着本书这个**文本**时，感觉阶段就是"看见"许多字母。然后，你对词句产生知觉。这只有通过过去的经验才能完成，而过去的经验通过回忆才能得到识别。不过，最富有意义的潜在主题，是出现在对已经识别的陈述进行考虑与思考之际。而思考本身被假定同语言具有复杂的关系。所有这一切将决定随后的知觉活动：你可能打算重读这一页。

依据信息处理而对传播做的描述与解释往往体现为一个盒式图解（box-type diagrams），它涉及信息流程、**反馈**环节、**把关人**、储存空间及决断点。而且这个图解可能构成一种主要的不利条件，因为如果亦步亦趋地遵循这个模式，那么传播的重要方面可能都将被忽略。比如，想要持续不断地区分思考与**语言**就比较困难，尽管许多研究者都指出了它们的界限。没有语言你能思考吗？

DS

互文参阅：认知（cognition），传播论（communication theory），信息论（information theory），语言（language），记忆（memory），知觉（perception）。
深入阅读：Lindsay and Norman（1977）；McMroskey and Wheeless（1976）。

信息论（information theory） * 一种机械性的理论，用来测量某一确定**信道**所传输的信息总量，并寻求使这个过程的效率达到最大化的途径。* 信息这个术语在某种专业含义上是指信号的可预计性（predictability），即信号的物理**形式**而非**意义**。概括地讲，信息论认为，一个符号越是不可

预计，它所传达的信息就越是丰富。一个信息含量高的信号可以说成**熵**，而一个信息含量低的信号则可说成**冗余信息**。信息往往用比特（"二进制数字"［binary digit］的缩写词——bit）进行计量。一个比特，就是表示为0：1关系的基本**二元对立**。以一部250000个字的字典为例，我们可以说其中每个字都包含着18个"比特"的信息（请记住，信息是指字本身的可预计性而非字的意义）。这是因为我们需要在"它在前半"（0）与"它在后半"（1）之间做出选择。回答18次就能确定这部字典里的任何字。因此，这个字可以按照二进制进行表达——比如，"0110100……"等。信息论现在主要限于以计算机为基础的信息处理系统，尽管有些心理学家用它作为解释人类认知的一个模式。

JF

互文参阅：传播论（communication theory），控制论（cybernetics），熵（entropy），冗余信息（redundancy）。

深入阅读：Shannon and Weaver (1949)；Cherry (1957)。

制度/社会制度（institutions/social institutions） * 任何社会那些约束与控制个体与个性的、永久的管制性与组织性结构（structures）。* 一般来说，我们总把制度想像为建筑，它们常常竖在那里，让人避之犹恐不及，比如，监狱、法庭、工厂、学校或医院。尽管它们的意思可用这种房屋来说明，但准确地说这个术语是指许多社会与文化活动据以组织与协调的潜在原则与**价值**。因此，虽然我们可能进入或离开制度，就像我们日常谈话中用到这个术语的情形，但实际上它们差不多始终围绕与渗入我们，就像我们的社会存在所具有的某种（或那种）状态。比如，我们说的"我们家"本身就是一种制度。它是隐私、财产、财富、知识、亲属关系与性别关系等其他制度的交汇点，而这些制度都为"我们的"家庭生活提供了**规则**、**符码**与关系。

即使就这里写的与你们读的东西而言，我们也不能不依靠Berger与Berger（1976）所说的"凌驾于一切其他制度的社会制度"——**语言**。这是因为语言是一种本原性方法，借助这种方法滔滔的经验与感觉才能转换为一种社会实在，才能得到分类，变得井然有序，并被赋予或被拒绝意义与意味。使用语言以及其他传播方式的能力之所以如此关键，确切说来就是因为它使组织经验与动用经验成为可能。社会与物质环境经过组织而成

为可以说出的、充满意义的“事情”。语言作为社会关系的基础而发挥作用，凭借语言这种制度，社会现实得到不断的、集合式的（再）协商、（再）生产以及挑战。认识制度之间必不可少的相互联系与融合是何等的重要。没有一种制度可以在脱离其他制度的情况下运行，就好像它处在真空之中。从不同的方面思考所有的社会制度可能比较有效，因为，它们在以下层面显示出针对冲突的历史性与持续性的社会反应：

（1）*经济*，涉及物品与财富的生产与分配。
（2）*政治*，涉及**权力**的运作与社会管制的实施。
（3）*文化*，涉及意义的生产、交换与再生产。

以这种方式看待制度，就得承认它们将某些重要的识别性特征混合起来了，这些特征似乎总是外在于**个体**。比如，“语言”与“法律”似乎都处在个人的行为与要求“之外”（参阅**语言**［langue］与**言语**）。其次，这种“外在性”通过凌驾个人的约束性或强制性的权力与权威而得到部分解释。用戈夫曼①（1968）的话说，“每种制度都有囊括性趋向”。他指出，某些类似监狱与精神病院的制度，可从它们加诸“对象”（inmates）的高度权力与直接管制方面被视为*全能制度*（total institutions）。对其他制度而言，其显而易见的外在性与控制，由其显而易见的永恒性得到保证；由这个事实得到保证，即它们常常好似建筑，就在我们面前，它们可以作为貌似“自然的”、“正常的”，甚至“不变的”社会生活特征而熬过我们的生命。

鉴于制度在社会与文化中的核心地位，制度研究成为理论与**观察实验法**方面各种问题与讨论的一个包罗广泛的焦点也就不足为奇。制度的特征与功能由争论不休的理论观点给予不同的解释。三个周而复始的问题一直刺激着这一争论。

① E·戈夫曼（Erving Goffman，1922～1982），美国社会学家，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拟剧论的提出者。按照拟剧论，人生犹如演戏，社会好似舞台，每个人都分别扮演一定的角色。其间，又有“前台”（front stage）与“后台”（back stage）之分。活动在前台的是主我（I），退到后台的是宾我（me），主我演绎着人生的戏剧，宾我则从这出戏剧中抽身出来，获得片刻的休整。

第一，**限定**的问题：制度的控制在什么程度上、通过什么方式形成并从而决定所有的个体行为与传播——我们大家总是社会制度的“代表”（agents）或“对象”（inmates）吗？

第二，谁之控制的核心问题：制度在什么程度上，体现着社会主控群体或阶级的特定价值、利益与合法化的权力，从而相对于反映全面的社会共识？

第三，制度在社会变迁与文化变革中的**角色**这个更为广泛的历史问题，特别是制度的繁殖性（保守）趋向与其转换性（创新）能力之间潜在的紧张与矛盾。

总之，无论是就社会制度的物质形式还是就其话语形式而言，它们或许都应该形成文化与传播研究首屈一指的焦点。它们是**符码**、**规则**与关系的主要社会来源。

TO

互文参阅：话语（discourse），语言（language），权力（power），角色（role），规则（rules）。

深入阅读：Berger and Berger(1976)；Goffman(1968)；Douglas(1987)。

互动/社会互动（interaction/social interaction） * 处在社会语境下的两个或多个参与者彼此进行的意义交换与协商。* 社会互动的主要焦点，在于**符码**与**规则**的制定者、使用者与建构者之间的传播与交换（reciprocation）。我们在接受采访时就被定在某种互动的社会**语境**中，因为有某些其他人在场，而他们对我们所说的事情感兴趣。同样，乘坐公共汽车时，我们就在同司机与其他乘客进行信息交换。其间将不断涉及许多语言和非语言层面的符码。所以，研究社会互动不仅应考虑现有的社会语境，而且应考虑所有那些被我们带入这种情景的因素。由此一来，诸如**角色**、**规则**、**权力**、**社会化**、**群体**成员、**遵从**、**动机**、**偏见**与**知觉**等问题，也就与**非语言传播**、语言及**符码**等相关了。

在传播研究中，“社会互动”一词也许用得过于频繁——眼看就使任何得到公认的解释都变得晦暗不明。比如，把正在读书的人或正在宁静昏暗的剧场中观看哈姆雷特临死情景的人，都说成“进行社会互动”的**受众**大概是不合适的。其间可能确实存在**象征互动**，但由于难以观察到来自他者的回馈，这些社会尺度仍不令人满意。这种观点是复杂的，特别当我们

认识到**文化**语境同**意义**的交换与协商相关之际。

TO

互文参阅：对话（dyad），接触（encounter），面具（facework），群体（group），人际传播（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非语言传播（non-verval communication）。

深入阅读：Burton and Dimbleby（1988）；Forgas（1985）；Beechey and Donald（1985）；Eiser（1986）。

召唤(interpellation) * 一个出自法国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家阿尔都塞[①]著述中的术语，指他所认为的意识形态将个体作为其客体（object）予以"招呼"（hail）的过程。有时也译做"称呼"（appelation）。* 在他看来，个体为**话语**的、语言的、象征的秩序所召唤，离开这种秩序就不可能生活。因此，对阿尔都塞来说，**意识形态**无所不在，无可逃避，它是**意识国家机器**的一种物质产物。召唤就是人们受制于意识形态的那种机制（mechanism），它通常被理解为"定位**受众**"（audience positioning）的一种文本化活动。不管是召唤还是"普遍意识形态"（ideology in general）的概念，从其最具影响力的 1970 年代初期以来，就一直被批评为过于本质化和抽象化。如果把召唤理解为"招呼"（就像"嗨！你！"），那么招呼什么或谁在招呼的问题迟早会被提出。如果答案在于"普遍意识形态"，那么我们肯定避开了**阴谋论**，但对理解具体的意识形态运作，这个答案并不能给我们提供更多的解释。

不过，当召唤被用来说明具体的**话语**而非针对有关抽象**主体**的、跨越历史的普遍力量之运作时，召唤还是一个有用的概念。比如，Laclau（1977）曾论及德国战前各种话语的一场斗争，当时"古老的普鲁士主义"话语对"民族主义与权威主义的"主体进行召唤，尽管"在纳粹的话语里……受到召唤的主题是种族主义"（pp. 116-142）。按照这种用法，召唤就同**说话模式**、**定向性**及**倾向性解读**等概念具有某些共通之处，同时具有

① 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1918～1990），法国结构主义哲学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1948 年，在著名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加入法国共产党。他的思想包罗广泛，影响深远，诸如"症候式阅读"、意识形态理论等，均为当代学术思想的重要发展。

附加的概念化优势即它假定话语具有政治性。

JH

人际传播（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 不以诸如电视、印刷、广播或电影等媒介技术为中介而发生在人们之间的传播活动。 * 对**群体**之间与之内的传播活动感兴趣的社会心理学家，常常使用这个概念。人际传播理论的范围从进化论视角直到**行为主义**方法，前者为某个物种成员的群居与传播提供某种遗传学基础（如Lorenz 1966；Morris 1977）；而后者假定通过有选择的强化（reinforcement）可导致人际**反应**的频率加快（如Skinner 1953）。而对众多有关**自然**—培育（nature-nurture）的论争，陷入非此即彼的陷阱是不明智的，尤其当两边都没有多少结论性的证据之际。

另外一种通行的二分法，涉及高度结构化的传播与更具创造性或自发性的会话。前者是指许多通过**经验**与重复而形成的**规则**、**礼仪**与**符码**（Goffman 1967）。后者则是指冒险与即兴，它们特别认可某种螺旋式基础（Dance 1967），即某次相遇的结果对多数或全部参与者来说都是未知的。人际传播常与发生在个体之内的传播——人内传播（intrapersonal）形态相对比。

DS

互文参阅：拟剧论（dramaturgy），对话（dyad），面具（facework），群体（group），互动（interaction），语言（language），非语言传播（non-verval communication），规范（norm），角色（role），规则（rules），社会化（socializ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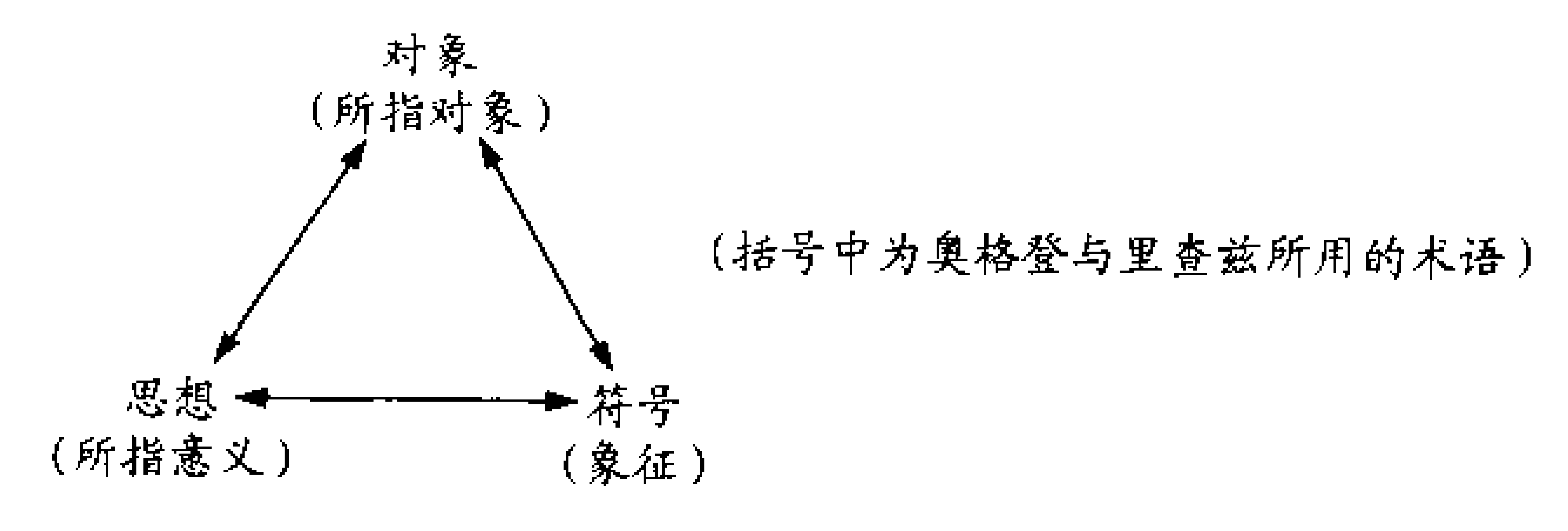
深入阅读：Roloff and Miller（1987）；Duck（1986）；Argyle（1987）；Burton and Dimbleby（1988）。

思想（**interpretant**）　* 对皮尔士[①]来说，思想是符号在其使用者心中产生的效果，他称之为“恰当的表意效果”（the proper significate effect）。它不是

---

① 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1839～1914），又译皮尔斯，美国哲学家、科学家、逻辑学家，实用主义的初始人，被视为美国最有创建和最多才多艺的学者，尽管他生前并不得志。在发展现代逻辑中，皮尔士曾对符号问题做过深刻而独到的论述，为现代符号学与传播学提供了影响深远的思想。比如，他曾经将符号（sign）分为三种，即肖像（icon）、标志（index）与象征（symbol）。

指某个人，而是指由其使用者对**符号**及其**对象**的以往经验而形成的某种心理效果（mental effect）。* 思想对应于奥格登与里查兹[①]（1949）说的**所指意义**。因此，皮尔士关于**符号**如何表意的理论可用模式表示如下：



这个模式显示皮尔士所用的术语，同奥格登与里查兹所用的术语对应得是何等严密。（奥格登与里查兹的模式可参阅**所指意义**）。

JF

互文参阅：对象（object），所指意义（reference），所指对象（referent），符号（sign），象征（symbol）。

深入阅读：Fiske（1982）[②]。

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 * 对发生于个体而本质上又看似矛盾的不属于个体的传播活动所做的那些反应。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为某个文化或亚文化的全体成员所分享。* 例如，一幅用软聚焦辅以淡红的暖色调拍的照片，可能引起**主体**多愁善感的反应，但这种反应是通过在**意指**的第二层面起作用的分享性**惯例**（此例中的内涵［connotation］）而获得的。多愁善感的主体经验对我来说可能是独一无二的，但这幅照片的内涵含义却为我的**文化**圈其他成员所分享。这种分享性主体反应的领域就是主体间性，它是某种文化影响其成员的最重要方式之一，通过这种方式文化的认同才得到确

---

① 奥格登（C. K. Ogden，1989～1957），英国作家、语言学家，Basic English的创始人。里查兹（I. A. Richards，1893～1979），英国评论家、诗人。他们曾合著《意义的意义》（1923）。

② 即J·费斯克的《传播研究引论》（*Introduction to Communication Studies*），中译本收入台湾远流出版公司的"传播学名著译丛"（1995），名为《传播符号学理论》（张锦华译）。

认。主体间性对理解内涵含义与**神话**至关重要，因为第二序列（second order）的意义是在主体间性的领域内发挥作用的。因此，它成为**意识形态**运作的平台。①

JF

互文参阅：意识形态（ideology），意指（signification），主体（subject）。

① 这个辞条的内容涉及符号学的一些基本理论，而这些理论在这里是作为不言而喻的东西。于是，在不太了解符号学的人看来，这个辞条的意思可能有点莫名其妙。所以，这里略做解释。

按照索绪尔一脉的符号学理论，任何符号都是由所谓"能指"与"所指"构成的。如果前者类似于形式，那么后者就类似于内容。"能指"与"所指"发生作用的过程，就是所谓"意指"。意指又分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即所谓"第一序列"（the first order）是符号的表面意思，而第二个层面即所谓"第二序列"（the second order）是符号的隐含意思。第一个层面的能指与所指构成第二个层面的能指，又称为外延，而第二个层面的所指就是内涵。

比如，电视的镜头、构图、灯光、角度等形式是"能指"，而由这些能指形成的一幅伊拉克儿童的哭叫画面就是"所指"。由这个能指与所指形成一个意指的过程，这个过程表达着一些意思。第一层意思是显而易见的，即儿童受伤，痛苦失声。由这个镜头（形式）与画面（内容）又共同形成第二个层面的能指，这个能指的所指就是意指的第二层意思——内涵，而这里的内涵就是对美国侵略暴行的无言控诉。详见拙著《符号透视：传播内容的本体诠释》（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

K

身势学（kinesics） * 有关动作与姿势的研究。* 对姿势、平衡与一般动作或位置变化来说，运动感（kinesthetic）都是必不可少的。动力学（kinetics）指由力引起的运动之科学，而活动艺术（kinetic art）则包括绘画与雕塑的某些部分或所有部分之间的运动。自体动作(autokinetc）指在环境中实为静止对象的变动属性。比如，自体运动的效果涉及在一间暗室里对某个固定光点产生的**知觉**。最后，身势学同视觉模式（the visual mode）的研究相关，而这种视觉模式同身体动作与**非语言传播**具有特别的关系。

DS

互文参阅：人际传播（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非语言传播（non-verval communication）。

深入阅读：Birdwhistle（1970）；McCroskey and Wheeless（1976）。

L

标签理论（labelling theory） ＊标签理论是一种视角（perspective）：它不把**异端行为**看做特定社会行为的某种固有性质，而是将它视为社会解释的结果，通过这种解释那些行为才被贴上异端的“标签”。＊这种理论取向尤与Becker的论述（1963）相关。他认为，各种社会与社会**群体**都“确立一些凡是违反它们就构成异端行为的规则，然后将它们加诸特殊的人群，给他们贴上外人的标签，由此制造异端行为”（p.9）。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被视为异端的行为之所以“错误”，就因为其他人群是这样解释的，特别是社会中那些拥有权力以确保其解释或“标签”具有最大威力与法力的群体。在某种**社会语境**或情景中，某个人或群体的所有行为都可能被贴上**异端**的标签，但在另外的社会语境或情景中则不然。所以，异端的标签只在特定的社会语境与历史情景下，适用于某些类型的行为。

对任何标签化过程来说，**语言**或许是本原性的存储器与中介体，用以构造与表现社会不同群体的道德与社会的轮廓与关系。诸如违法、犯罪、人店行窃、胆小鬼等术语，不单单是中性地暗示对某些规则的破坏，而且也在肯定某种同这些行为相反的主流或**共识**的趋向。

大众媒介是传布这类标签并使之合法化的一种主要的**制度化**根源，特别是它们经常对那些行为不符合主流社会**规范**与**价值**的群体进行**刻板印象**式的报道。聚众闹事者！行凶抢劫犯！极端分子！流氓阿飞！吸毒贩毒者！及许多其他类似的标签，均属对Cohen（1972）所谓社会“魔鬼群”频频进行戏剧化社会建构的组成部分。这些经过大众媒介的标签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们与不同的**受众**密切相关，或由不同的受众进行解码。首先，在某种直接意义上，它们通过指出“何为不当的具体例子表明‘共识’本质”（Murdock 1981，p.207）。其次，由于对它们进行**编码**与表现**定向性**，其可信度主要取决于是否接受某种基本的、常常并不说明的一套

共识或主流的假定与价值，这些假定与价值涉及社会应如何组织与控制问题。

标签化与反标签化的过程与行为，作为日常**社会互动**的核心构成而起作用。它们及其制度化形式是在同（别的且不说）大众媒介的**文本**进行互动中实现的，对于制造、保持与控制我们的理念、价值观及社会控制模式都是必不可少的。

TO

互文参阅：共识（consensus），异端行为（deviance），制度（institution），道德恐慌（moral panic），刻板印象（stereotype）。

深入阅读：Bilton *et al*.（1981）；Downes and Rock（1982）；Cohen and Young（eds）（1981）。

语言（language） ＊通常用来指某一**民族**、人民或**种族**所用的全套词语（词汇）以及将它们组合起来的方法（语法）。但在传播研究中，这个术语已同各种专门的用法与问题相关联。＊按照这个术语的一般用法，语言被假定是（1）一种特定的语言，如威尔士语或英语；（2）一种系统的命名法——为存在于世界中的客体进行命名的工具；（3）一种表达存在于头脑中各种想法的工具。

这些用法在传播研究中没有一种能完整通用。首先，语言是作为一种*普遍能力*而不是一种个体语言的集成而被研究的。其次，各种想法、词语与外在客体之间的关系是许多理论研究的焦点，而从中产生的结论至少对任何认为词语仅仅命名客体或表达思想的观念提出质疑。这两种观念都假定，语言仅仅是对某些不属于语言（由此推断）的其他东西——这里就是各种想法与客体进行反映。反对这种假定的观点认为，它否定了语言的能动力量，把语言缩减得仅仅成为一个工具，它没有想到各种想法与客体只有通过某种语言的表述才能进入为人所知的范围。

正如原子物理学开始于分离单个原子而完成于确认远为微小的粒子与力一样，语言学也是将语言确认为总括性的结构与存在于词语元素间的规则。最基本的元素是**音位**，即一门特定语言中能统计出的、可分辨的确定声音单位。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音位（威尔士语里没有/j/，英语里没有/ll/、/ch/、/rh/）。但所有语言都依据有限的音位发挥功能，这些音位组合起来以形成词语。所以，语言不再被视为“一整套词语”，*而是一种生

成性结构，或能够产生**符号**的**语言**（langue）。除了音位分析，语言学还开展了有关**语义学**与语法（组合的规则）的研究。

传统上，语言学研究集中在说话（speech）方面。而现在，**符号**学接受了索绪尔的语言模式，将它用于分析各种类型的**意指**——写作、建筑、电视、电影、食物、服装及家具等方面而不仅仅是说话。毫无疑问，这样的符号系统确实在表意（也就是说，其构成元素得以选出并被组合的方式确实在传播意义），但是，它们是否*如同*(*as*)语言或*好像*(*like*)语言那样进行表意依然是有待讨论的事情。

在传播与文化研究中，针对是否将它们作为语言或准语言即各种共有某些特征的表意系统而进行研究，存在着广泛的共识。这些共识包括（1）**意义**不是单个符号或词语固有属性的结果，而是不同元素之间系统性关系的产物；（2）语言不是一种可用**观察实验法**进行观照的东西而是一种社会化的能力；（3）**个体**不是语言的来源而是语言的产物——语言似乎在个体之内自行思考。语言总是逃避个体乃至社会的意愿（will）。与语言研究有关的某些更重要的概念与术语，可参见下列几个辞条。

JH

互文参阅：符码（code），话语（discourse），语言/言语（langue/parole），非语言传播（non-verval communication），联想关系/组合关系（paradigm/syntagm），音位/语音（phonemic/phonetic），符号学（semiotics），符号（sign），意指（signification），能指/所指（signifier/signified），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共时态/历时态（synchronic/diachronic）。

深入阅读：Culler（1976）；Halliday（1978）；Montgomery（1986）。

语言功能（language,functions of） ＊语言可在不同的情景中得到使用的意图与效用(purpose)。＊尽管我们可将语言基本上当做一种表达真假陈述的方法(*所指功能*)，或是作为一种传播思想的工具(*观念功能*)，但这只是整个图景的一部分而已。因此，尽管所指功能(the referential function)或观念功能(the ideational function)在新闻报道、科学写作、法庭作证等方面可能比较突出，但若干其他功能在语言的日常应用中也同样被视为非常重要的。

有关语言功能的一个著名理论是雅格布森[①](1960)所提出的，他辨析了同样值得注意的*交际功能*、*管理功能*(或如他说的"*增强功能*")、*情感功能*、*美学功能*(或如他所说的"*诗意功能*")及*元语言功能*。

比如，在许多情景中，使用语言都不会在乎其真假值 (truth value) 问题。不妨想像一下与朋友通电话的情景。假如你问"怎么样"或"你好吗"，你很可能得到这样的回答："很好。"当然，接下来的交谈可能表明你的朋友有条腿打着石膏，只能拄着T型拐杖走路。然而，你并不会因此就认为他开始的回答——"很好"——不真实。这是因为，通常我们使用语言不仅仅只是为了清楚地表达思想，而且也是为了营造与保持彼此之间的关系，其间常常使用具有相当礼仪化的、几乎没有什么内容的客套话。这种用法便是语言的所谓**社交传播**功能(*the phatic function*)。英国公共汽车上的陌生人彼此讨论天气，就是交际功能的精巧运用。

语言还通过命令、要求、指导以及其他更曲尽其意的言语说服活动，影响他人的行为与意向。空中交通管制的语言、广告的语言、政治竞选的语言，主要就依靠这种功能，这就是所谓*管理功能*(*the regulatory function*) 或*增强功能*(*the conative function*)。

就管理功能而言，语言的焦点在于被言及者的行为与意向。与此相反，语言可能用来表达说话者的感情与意向，而他完全不管是否有受众在场。这就是所谓*情感功能*(*the emotive function*)——用于(有时是本能地)表达感情的语言。划破你保存多年的密纹唱片，可能会导致情感功能的一次爆发。

语言还可能作为一种内在的快乐源而使用。正学说话的小孩子，可能从玩弄语言的声音特性上获得快乐——重复与改变声音的各种形态，有时不管它们是否具有传播方面的可能性，就像下面这段三个月的双胞胎的对话：

---

① 雅格布森(Roman Jakobson,1896～1982)，原籍俄国的语言学家，"布拉格学派"的主要奠基人。早年曾任莫斯科"高等戏剧学校"俄语教授，1920年代在布拉格开创了语言学研究的布拉格学派。1941年流亡美国，先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后任哈佛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与普通语言学教授(1949～1967)。他的研究不仅对现代语言学建树颇丰，而且对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也影响广泛。特别是他所创立的布拉格学派，一方面前承索绪尔的开创性工作，另一方面又后启1960年代法国结构主义的一脉思潮。

A：zacky sue

B：（笑）zacky sue zacky sue（都笑）ah

A：appy

B：olp olt olt

A：oppy oppy

B：appy appy（笑）。

(after Keenan 1974, p. 171)

这种天真自然的语言游戏不管是基于自身的好奇还是由于贯穿语言发展过程的交往愿望，都发生在小孩子中间。它不仅是第一语言的习得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环节，而且由此提出这种行为可能形成后来语言诗意用法的基础，似乎并非多么离谱。这种行为的一般名称就是*美学功能*（*the aesthetic function*）。多少属于自觉行为的语言游戏发生在语言的不同层面，不仅涉及类似压韵与压头韵的声音游戏，而且包括双关、模棱两可、违反语法规则等做法。美学功能并不限于诗本身。比如，广告就大量使用语言的美学功能，就像使用其增强功能一样。

另外还有一个有时被忽略的功能，这就是语言对其自身进行探究与反映的用法，即所谓*元语言功能*（*the metalinguistic function*）。数量惊人的日常话语，最后证明都属于元语言——从电视记者问的“你当时对总理说的是……”，到某人在争执中抱怨的“简直胡扯”。当然，语法著作与字典主要依赖元语言功能，就像我们这部书那样，特别是在它为各种术语提供解释之际。

功能观在语言研究中非常重要，这主要是因为它有助于突出这样一个领域，其中语言远不仅仅是一种用于思想的工具或传达信息的手段。在这个领域中，功能的视角倾向于强调一系列加诸语言的压力以及其他使用语言的可能性，而不是注重以严格的、可以检测其真值的逻辑形式来表达某种“命题式内容”的需要。因此，从功能的视角上可以断言，语言所做的事情远比解释与表达概念多得多。实际上，语言学家Halliday就曾指出，当儿童在学习第一语言时，他们使用语言首先不是为了传达信息，而更多的是为了影响其社会环境，并与这种环境发生互动。Halliday关于语言的论述体现着功能主义者的一般特征，这从其所宣称的如下观点即可看出：语言组织的许多方面最终都源于它所体现的功能或效用。

功能视角的主要缺陷是，它难于对语言的主要功能做出严格的界定。某些论者认为语言的功能有三项，其他的论者又认为多达七项。以**言语行为**理论著称的一种最新研究取向，更专注于对可用不同言语予以实施的行为进行具体而确切的界定。

MM

互文参阅：言语行为（speech act）。

深入阅读：Halliday（1973）；Jakobson（1960）。

语言(langue)　* 在索绪尔①的语言学中，语言是隐含于个别言说之中的一套符号与习惯（convention）的抽象系统。* 由此看来，语言的角色可与乐谱的角色或象棋的规则进行**类比**，乐谱也是隐含于一部交响乐的具体演奏中，而象棋的规则使无数不同的实际棋局成为可能。比如，这部乐曲的存在并不依赖它的每次演奏——其间某些音符的演奏可能出错，具体采用什么速度可能有所选择等。同样道理，象棋也可在许多规格的棋盘上、用不同类型的棋子、走出许多不同的棋局，然而，只要这个游戏的基本规则得到遵守，那么它就始终是象棋。与此相似，不管是英语还是斯瓦希里语（Swahili）抑或古吉拉特语（Gujarati），都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的、必要的习惯与规则，它们为操持这一语言的人在说出他们的语句时所遵循。正是这些习惯构成那种语言（language）的语言（langue）；正是由于遵循这些共有的习惯，操持那种语言的人才能确保互相理解。从这个意义讲，语言完全是一种社会性产物，为某个作为整体的社会肌体的成员所共享，不受任何个体的控制。

就现代语言学如此众多的重要术语而言，语言的概念最早在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著作中得到详细的论述。在他看来，剥离语言的探究对象需要聚焦于**制度**（语言）而非事件（言语），而在这个过程中使语言与言语

① 索绪尔（Ferdinand Saussure，1857～1913），瑞士杰出的语言学家、现代符号学先驱，其代表作《普通语言学教程》（1916）是他去世后学生们根据笔记以及他的一些手稿等材料编辑整理的。这部里程碑式的著作不仅对现代语言学具有首屈一指的意义，而且对20世纪以来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都产生深远的影响。本辞典所涉及的一系列辞条、特别是结构主义与符号学方面的辞条均与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相关。其中较常见的有“语言/言语”、“能指/所指”、“组合关系/联想关系”、“共时态/历时态”等。

形成对比是方法论上的一个重要步骤。这种区分在许多现代语言学中同样得到系统阐述，不管是乔姆斯基著作里所谈的**语言能力**与**语言行为**，还是Halliday著作里所说的潜在语言行为与实际言语行为。在**结构主义**与**符号学**中，语言这个概念经过拓展也包含其他类型的符号，而不仅仅是语言符号。例如，亲属类型以及家具、食物与服饰的社会化构成等，都被当做一些隐含的系统而予以考虑。

MM

互文参阅：符码（code），语言能力（competence），言语（parole），组合关系（syntagm）。

深入阅读：Saussure（1974）[①]；Culler（1976）。

生活方式（lifestyle） ＊文化认同与文化实践的独特形态（configurations），尤其与现代历史的条件与文化消费的形态相关。＊这个术语常以许多互相矛盾的方式被使用，尽管它为1990年代的**文化**与传播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焦点。

生活方式的概念，可用来描述在构成任何**群体**或**个体**“生活的方式”（style of life）上那些特殊类型与特别形态。就此而言，这个术语的用法具有典型的人类学风格，它表明我们的“个性”与认同是在更广大的**集体**性结构与“**选择**”中形成的。生活方式被理解为任何现代社会构成中的“片段”，显示着其中各种程度的“**选择**”、“**差异**”与创造性或抵制性的文化可能性。因此，它侧重于强调生活方式是**象征**性表达的特殊形式，而这种表达关乎某些物质化与社会化的生活情景。

与此相对，这个术语也被用来指涉施加在现代文化生活的生成或管制中的表意性**修辞**与**话语**。从这种视角看，生活方式基本上就被理解为主要由现代广告与市场营销机构及其活动所产生的东西。1950年代以来，对特殊类型“生活方式”的诉求越来越成为广告行业与消费文化崛起的核心。对此，某些批评家把“生活方式”看做社会**阶级**在当代的委婉表述，他们重申现代经济体系中物质关系与象征关系之间的矛盾。然而，对其他论者来说，这个概念具有更有效的分析价值，它可以精确凸显发达状态或**后现代状态**中的关键性生活特征。

---

① 即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译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80）。

总之，作为针对当代文化生活所面临的若干重要问题的焦点，这个术语得到最充分的使用。关键性的争论涉及在什么程度上，生活方式被认做基本的象征符码与行为，以及被理解成相对自主的东西。其次，在什么范围内，生活方式的文化允许真正的多元化表达，包括同种种“伪装的”一致性与“选择”相反的反抗性表达。反过来，这些问题又引发涉及历史“原动力”（motor）或生活方式之动力（dynamics）的基本争论——它们从何而来，它们如何被制造与使用，又如何发生变化？

TO

互文参阅：文化（culture），福特主义（Fordism），后现代状态（postmodernism），方式/样式（style），亚文化（subculture）。

深入阅读：Featherstone（1987）；Bocock（1992）；Giddens（1991）；Tomlinson（1990）[1]；Myers（1986）。

语言相对性（linguistic relativity） ＊这是一种假说（hypothesis），即不同的语言给予人们以不同的世界观。＊按照这种假设，我们并非以一种直截了当的方式感知世界。相反，我们所用的**语言**已为这种感知塑造了甚至创造了条件。在把握与表述世界上不存在完全中性与公正的方式，因为我们所习用的语言已将我们导向某种类型的观察图景，并预先设定某些可供选择的解释。

语言相对性一部分可能属于词汇问题。因此，不同语言便以不同方式切分经验范围。比如，俄语用 12 个表示颜色的基本词语切分色谱；而英语切分同一领域则用 11 个词语，其中只用一个表示“蓝色”的词，以取代俄语中两个可供选用的词。在一种被称 Pintupi 的澳大利亚土著语言中，有 10 个完全不同的指称各种洞穴的词，其中大多只能曲尽其意地被转译为英语：比如，*katarta*大致是指“goanna这种动物冬眠后破土而出留下的洞”。

不过，语言的不同更多还在于各自的词语组织方面。它们的不同也在于各自形成句子的独特方式方面——语法。某种语言的时态系统可能完全不同于另外一种语言：比如，英语语法至少提供两种时态，而霍皮语

---

① 即J·汤林森的《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中译本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9）。

（Hopi）——一种北美的语言——似乎根本不用时态就能使用。其动词形式反而可以区分何为主语与何为宾语。因此，这两种语言的不同语法，看起来似乎为其使用者提供了完全不同的时间意识。

依据这样的证据，美国语言学家 B·L·沃尔夫[①]得出结论：

> 所有的观察者并非被导向天地万物的同一画面。……使用迥异语法的人被其语法指向不同类型的观察图景，以及外在的、相似的观察行为所得出的不同评价，因此，他们是不同的观察者。
>
> （Whorf 1956，P. 214）

沃尔夫对这个假说所做的最早阐述（出于对他本人以及另外一个与他共事的著名语言人类学家——爱德华·萨丕尔[②]的尊敬，这个假说有时也被称为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大约出版于 50 年前（参阅 Whorf 1940）。但是，对其核心论断的公开辩论一直十分激烈。比如，人们不容易为语言相对性提供确定无疑的经验性证据。批评家也指出各种语言之间相互转译的事实，而如果某人的母语完全限定其思想世界，那么这种转译就不可能发生。

然而，随着对语言及语言模式的兴趣日益高涨——这在**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运动中得到证明，有关语言相对性的种种假说又被注入新的活力。如果某位后—结构主义的文学批评家——比如 Catherine Belsey——力主一部小说就是一个**话语**（语言）的人工制品，它对现实的

---

① B·L·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1897～1941），美国语言学家。他受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Edward Sapir）的影响，发展了一套以“萨丕尔—沃尔夫假说”（Sapir-Whorf hypothesis）闻名的理论。按照这个假说，不同的语言决定了不同的世界景观，从而塑造了不同的文化。

② 爱德华·萨丕尔（Edward Sapir，1884～1939），以研究北美印地安语言而闻名的美国语言学家、人类学家。他是人类文化语言学（ethnolinguistics）的创立者，也是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的代表人物。早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受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博厄斯（Franz Boas）影响开始从事语言学与人类学的研究。1931 年，任耶鲁大学教授，创建该校人类学系。他认为，人类主要通过语言感知世界，不同的语言提供不同的世界图景与理解世界的方式。根据这种思想，美国语言学家 B·L·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提出“萨丕尔—沃尔夫假说”（Sapir Whorf hypothesis）。

建构就像它做现实的中介（mediate）一样，那么她就在尊奉某种语言相对性理论。

MM

互文参阅：话语（discourse），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

深入阅读：Whorf（1956）；Belsey（1980）；Montgomery（1986）。

书写文化（literacy） * 书写活动的社会制度（institution）；广义上也指任何不用言说方式（speech）的传播社会制度。* 书写文化不是并且从来不是一种个体属性或**意识形态**上中立的“技巧”，仅仅为单独的个人所“拥有”。它也不仅仅只是一种技术，尽管它确实需要某种物质性生产方式（某种用以写作的工具与某种写于其上的材料）和社会性的生产方式（某种公认的标写法［notation］或符号系统与某种为操纵知识而传输知识的途径）。

作为一种**社会制度**，识文断字如同其他类型的制度，也是受制于对其进行分配与管制的力量。其早期的历史特征，一般说来就是严格控制能够接近这种活动的人（神职人员与经济或行政官员）及其用途（神圣事务与国家事务）。

现代社会十分倚重“普遍化”的书写文化，以之作为完全不同于言说方式的一种**自主**传播方式。这就使得许多研究者都力图借助“书写文化意识”来说明现代文化的独特性。这类批评家中首屈一指的是马歇尔·麦克卢汉[①]（1962）。近来，书写文化已成为针对教育的意识形态功能而展开重要争论的焦点，因为，人们认为书写文化是一种对有效繁殖**霸权**秩序的价值与实践（同时包括技巧）进行扩散的媒介手段（vehicle）。

虽然不能说书写活动“引发”了种种意识，并由此促成20世纪的社会组织，但依然有可能对书写文化据此（而不仅仅只是一种超然物外的技巧）展开的范围进行研究。它被赋予意识形态与政治上的责任——它不仅能用做一种社会控制或管制的手段，而且也是一种在争取解放的斗争中所

---

① 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1911～1980），加拿大传播理论家，从1946年起一直执教于多伦多大学，1952年任英语文学教授，1963年任该校文化与技术中心主任。他的传播理论以奇崛著称，如其代表作《理解媒介：人的延伸》（1964），曾提出一个著名命题——“媒介即讯息”（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

用的进步武器。不过，首要问题在于一支书写文化的劳动力是工业化生产的先决条件，而这种劳动力的再生产需要国家大规模地介入，以便将为此目的的书写文化及其适宜层面、类型与内容加以扩散。

JH

互文参阅：差异（difference），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制度（institutions），口述（orality），社会化（socialization）。

最小公分母（lowest common denominator） * 数学的一个有用术语，其中“最小”具有某种原义。* 它本来决不应该进入研习传播或文化学生的词汇。文化**精英隐喻**性地使用这个短语以排斥多数人的趣味，并利用数学的**客观性**为其偏见提供一种虚假的证明。

JF

M

大众传播（mass communication） * 一般理解为报纸、杂志、电影、电视、广播与广告；有时包括书籍出版（特别是通俗小说）和音乐（流行音乐行业）。*

使用这个术语应该谨慎小心。“大众”一词，可能激发人们不假思索地重复**大众社会理论**，而这种语境中的“传播”一词又遮蔽了媒介的社会和产业性质，结果促使人们总把它们当人**际传播**看待。既然大众传播不像一般所理解的那样——它既非大众，亦非传播，那么这个术语就应当被视为近似于一个专有名词。

大众传播不是一个能够界定的概念，而是一个属于**常识**的范畴，它被用来将许多不同的现象以不加分析的方式混为一谈。然而，想要界定它的意图总是层出不穷，但又总是归于失败。因为，这些界定要么被迫变得十分局促，从而无法公平、恰当而充分地顾及所有通常作为大众传播而理解的现象（很难将构成印刷、电影、广播和电视的多重内容囊括在一个定义之中）。要么就被迫变得过于宽泛，从而以一视同仁地对待某些人们根本不会作为大众传播来思考的现象——如教育、宗教、甚至说话本身——而告终。

说完这些，我们才能小心翼翼地来谈大众传播。大众传播，就是在现代化的印刷、银幕、音像和广播等**媒介**中，通过公司化的财务、产业化的生产、国家化的管制、高科技、私人消费化的产品等形式，向某种未知的**受众**提供休闲式**娱乐**和信息的过程与产品。

JH

深入阅读：McQuail（1987）。

大众社会/大众社会理论（mass society/mass society theory） * 针对20世纪

初工业化/资本主义化社会的社会组织而出现的一种模式（model），这种社会的特征在于拥有一支庞大的劳动大军，其成员都是原子式的、孤立无援的、没有传统地缘与亲缘纽带的个体，他们由于单调重复、无需特殊技能的趋势，由于受制于工资关系（货币关系）和市场波动的变化无常而同劳动发生异化。* 这种**个体**完全听凭（1）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和**宣传**的摆布；（2）大众媒介（当时包括新兴的电影和广播）的影响。大众社会理论是对 1930 年代政治与经济状况所做的一种可理解的反应，它在卓别林的影片《摩登时代》（1936）里得到简练概括。不过，在某种**常识**性版本中，这一理论依然延续，这种版本主要同文化与文学方面的批评家有关。在他们看来，一般所说的工业化和现代社会令人遗憾地偏离了这些作家喜欢想像的，盛行于机器、民主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发明之前的**价值**与习俗。

大众社会理论已被历史的证据所抛弃，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还在延续，其原因是那个作为大众对立面的阶层即**精英**对它频频光顾。这暗示着大众社会理论家的政治学——他们都是不同类型的文化**精英**主义的倡导者，而精英应被赋予超逾大众的特权和推崇，他们声称自己既不同于被误导的大众，又是他们的领袖。大众与精英这些术语，对**阶级**而言当然是种便利的“消解法”或委婉表达。

大众社会理论一直活跃在一种宽泛的媒介研究领域，其间它总是针对电视与电影在大众那里（但是很奇怪，从来不在批评家那里）的所作所为而产生种种启示录的见解。每当你思考何为媒介对（其他）人的**效果**时，尤其当你的思考转向诸如**依赖论**、侵犯、**麻醉**、残忍和无情等观念时，那么你就在以大众社会理论进行思考了。别这样！去看电视吧，然后问问自己为什么这些情况没有发生在你的身上。

JH

互文参阅：受众（audience），效果（effects），精英（elite），说服（persuasion）。

深入阅读：Biddiss（1977）；Swingewood（1977）。

意义（meaning）　* 任何**意指**的含义（import）。**文化**的产物。* 意义基本属于未被理论化的术语，尽管围绕意义之意义（the meaning of meanging）的争辩是出名的交谈障碍。在传播研究的语境中，值得记取的一点在于意义属于研究对象，而非属先于分析而存在的一种给定的或不言而喻的东

西。因此，意义不应被假定居于任何东西之中，不管它们是**文本**、言说、节日、行动或行为，即使这种活动和对象可能被理解为充满意义。意义是传播的产物或结果，所以，人们无疑会常常与之遭遇。Marshall Sahlins（1976）把意义称为某种无所不在的“第三术语”（the third term）——加诸物品（经济）和社会关系（政治）——以统一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因此，经济和政治安排中的意义就成为人类学的恰当主题；而意义就成为文化的产物。

JH

意义系统（meaning systems） ＊帕舍（Parkin）（1972）提出这一理论，以说明种种群体对其不同的社会状态所做的不同反应。它对人们如何理解其社会化世界做出解释，并被霍尔（Hall）[①] 等在《文化、媒介与语言》（1980）一书中用来说明人们理解**文**本的不同方式。＊帕舍（Parkin）区分了西方工业化民主体制中的三种主要意义系统：

（1）*主控系统（The dominant system）*

这种系统赞同当下社会、经济与政治关系的架构，使人们能在现存**权力**、财富与工作的布局中理解其社会地位。它在从属**阶级**中产生恭顺性反应或渴求性反应：恭顺性反应来自那些接受其社会地位者，而渴求性反应来自那些处于同一社会地位而寻求“改变”者。

（2）*从属系统（The subordinate system）*

这种系统整体上接受主控系统，但允许特殊**群体**享有追求其中更佳地位的权利。由此产生的协商性反应，就不断地、努力地开掘这个系统中对某个身处其中的特殊群体或阶级有利的内涵。

（3）*激进系统（The radical system）*

这种系统拒绝主控系统，并提出一种与之相反的替代系统。因此，它产生的是对抗性反应。

让我们以工资经济为例，来说明人们的不同反应。那些接受主控意义系统的人，往往以恭顺性反应或渴求性反应来理解其社会地位：他们感激

① 即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代表人物、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中心的S·霍尔。

地或者顺从地领受他们的工资，再不然就通过加班或升职来努力增加自己的工资。从属意义系统更可能被工会成员所采纳，他们对工资经济的反应就是尽力协商，以便为自己及其会员争取同一工作报偿的较大份额。另一方面，激进意义系统则导致人们的对抗性反应，它将质疑工资经济的基本原则。

霍尔认为，这些嵌入社会的意义系统并不互相排斥，人们由此可将各自的**社会语境**引入对某一电视（或其他大众媒介）**文本**的解码过程。这些系统产生三种用于对文本进行解码的等值符码——主控性的**霸权**符码、协商性的符码与对抗性的符码。

JF

互文参阅：倾向性解读（preferred reading）。

深入阅读：Morley（1980，1992）。

中介（mediation）　＊ 在双方之间进行调停以影响彼此关系的行为；通过一个制度性公共机构（agency）向受众传输社会知识与文化价值的行为。＊ 中介被视为大众媒介的基本效用之一：它们是现代社会各种分裂的**群体**、**阶级**与等级间的共同中介者。大众媒介本身用个性的专业主持人（presenter）充当中介者，如 Trevor MacDonald、Anna Ford、Brian Henderson、Mary Delahunty、Terry Wogan、Bryant Gumble等，他们对广播公司的价值与公共身份予以个性化处理，给观众提供借以识别的熟悉面孔和个性特征。

JH

互文参阅：享用（accessing），游吟职能（bardic function），文化再生产（cultural reproduction）。

媒介（medium/media）　＊ 一般来说，媒介是一种能使传播活动得以发生的中介性公共机构（agency）。具体点说，媒介就是拓展传播渠道、扩大传播范围或提高传播速度的一项科技发展。＊ 广义上讲的说话、写作、姿势、表情、服饰、表演与舞蹈等，都可以被视为传播的**媒介**。每一种媒介都能通过一条**信道**或各种信道传送**符码**。这一术语的这种用法正在淡化，如今它越来越被定义为技术性媒介，特别是大众**媒介**。有时它用来指涉传播方式（比如是用“印刷媒介还是广播媒介”），但更常用于指涉使这些方式成为现实的技术形式（比如收音机、电视机、报纸、书籍、照片、影片与唱

片）。麦克卢汉[①]的名言*媒介即讯息*，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个词语的。他以此表明，一种新技术媒介本身所包含的个人意义与社会意义大于对它的实际使用：电视的存在比起电视节目的内容，意义更为重大。

热媒介与凉媒介：麦克卢汉做的一种区分。热媒介以"高度界定"（high definition）延伸"某种单一感官"，也就是说，一种热媒介充满资料与数据，因而受众便处于完全接受或消极被动的状态。相反，凉媒介则是"低度界定"（low definition），即提供有限的资料与数据，所以受众不得不参与，不得不积极主动，以便完成这个讯息。照片是热的，而卡通是凉的；电影是热的，而电视是凉的（银幕上的视觉界定高于屏幕上的）；收音机是热的，而电话是凉的。麦克卢汉的分类在解释媒介的技术属性上可能有道理，但就其媒介影响受众参与的立论而言则肯定存在疑问。没有证据表明，广播或电影受众的主动性小于电视受众。

就媒介这个词语而言，有一种日趋强烈而不受欢迎的趋势，即在技术意味上它被用于单数形式。

JF

互文参阅：信道（channel），符码（code），大众传播（mass communication）。

深入阅读：Williams（1976a）；McLuhan（1964）[②]。

记忆（memory）　＊认知活动的一个方面，指储存与回想既往经验的能力。＊这类信息必须经过编码进入假定的记忆库，然后从储存状态中被调取出来，进而得到解码。

记忆有若干不同类型，其中最短暂的记忆是随某种刺激而产生的视觉余象：这种记忆被Neisser（1966）恰如其分地称为**肖像**记忆。它并不完全属于知觉（perception）状态，因为，这种肖像描绘的是既往事件。

---

① 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1911～1980），加拿大传播理论家，从1946年起一直执教于多伦多大学，1952年任英语文学教授，1963年任该校文化与技术中心主任。他的传播理论以奇崛著称，如其代表作《理解媒介：人的延伸》（1964），曾提出一个著名命题——"媒介即讯息"（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

② 即马歇尔·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Understanding Media：The Extensions of Man*），中译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2000）。

Atkinson与Shiffrin（1971）发展了一套包含两种储存功能的双重记忆理论：即短期记忆（STM）与长期记忆（LTM），前者虽未得到明确解释但常指过去几分钟所经历的事件，而后者储存的是经过短期记忆的信息。他们依据实验室中的调查，确认了这样一些在影响记忆的可能性上非常重要的因素：复述、新奇、强度与刺激的持续时间。不过，这种双重理论也有问题，它不能说明信息何以能在某种情况下被记住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却不能，信息何以不经过某些短暂的“缓冲”（buffer）阶段（被Miller［1956］界定为拥有一种有限的储存能力）。

Tulving（1972）倾向于另外一种二分法：其一是对前后相续事件的记忆，或称情节记忆（episodic memory），其二是对按意义与语境而重新组合的信息所做的记忆，或称**语义**记忆（semantic memory）。讨论传播效果时，许多研究者都认同首因效应（primacy effects）与近因效应（recency effects），即分别对某个**讯息**的开始部分或结束部分予以记忆，而这种情况被认为至少部分归结于这个讯息其他部分的干扰。许多**文本**经过精心设计以利用首因效应与近因效应。比如，一个30秒的电视广告，常常会在开头（“这是这个产品”）与结尾（“这是这个牌子”）提供许多信息。其余部分则留做消化这种信息，同时不制造任何干扰，而只是一直吸引你的注意。现在不清楚的问题在于，干扰是针对被遗忘信息的编码与储存过程施加影响，还是仅仅针对检索过程施加影响。对此一个有用的类比是图书馆中遗失的书籍：它是被偷走了，还是被放在不同的书架上。

同记忆有关的一个研究领域是记忆术（mnemonics），也就是在编码、解码与检索阶段有助于记忆的技巧。通过将复杂信息或大段信息压缩成易记的符码，我们就使自己检索所有原始材料的机会达到最大程度。比如，对这样一个句子——“Censorship of machine-made underground news incites crowd agitation through insidiously organized nicety”，如果我们取其中每个词的第一个字母，那么就比较容易记住：因为合起来就成为“传播”（communication）。

流行记忆（popular memory）超越于“个体”，成为由某个社会**群体**或**民族**对某种**神话**性历史的**文化**建构。媒介形态在重放流行记忆，可能对其流行过程及怀旧诉求具有影响。

DS

互文参阅：认知（cognition），信息处理（information processing），语言（language），知觉（perception）。

深入阅读：Gregg（1975，1986）；Lindsay and Norman（1977）。

讯息（message） * 在传播过程中得到传递的东西；发送者借以影响接受者的手段。* 它被视为一种存在于**编码**之前与**解码**之后的初始**内容**；编码将它转换成能被传递的**形式**，而解码则将它还原为初始状态（假定编码、解码与传递均按最高效率运作）。详细的讨论请参阅**文本**。

JF

互文参阅：发送者/接收者（sender/receiver），文本（text）。

元语言（metalanguage） * 从字面上讲，元语言就是关于语言的一种语言，通俗地讲就是针对文本或言语行为而进行讨论/写作/思考的一种方式。* 正如**语言**确定我们对自己周围世界的知觉与**解释**，元语言也确定我们对**文本**的知觉与解释：在这两种情形中，我们都需要将（元）语言同其**所指对象**区分开来，以便意识到（元）语言系统的任意性，从而意识到其他的（元）语言将会产生其他的**意义**这个事实。

雅格布森[①]采用"*元语言功能*（*metalingual function*）"一词，以指称所有由确认自己所用语言或**符码**的文本所表现的功能。"Beanz Meanz Heinz"这句话之所以有意义，无非是因为它确认自己使用的是广告一语言的符码。"Lucy in the Sky with Diamonds"这句话，对那些以"我在说诗人语言"来解释其元语言功能者产生一种意义；而对那些以"我在说毒品诱惑式话语"来解释其元语言功能者则产生另外一种意义。对受话者（addressee）来说，元语言学功能是个必要的阅读辅助。

JF

互文参阅：语言功能（language,function of）。

---

① 雅格布森（Roman Jakobson,1896～1982），原籍俄国的语言学家、"布拉格学派"的主要奠基人。早年曾任莫斯科"高等戏剧学校"俄语教授，1920年代在布拉格开创了语言学研究的布拉格学派。1941年流亡美国，先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后任哈佛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与普通语言学教授（1949～1967）。他的研究不仅对现代语言学建树颇丰，而且对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也影响广泛。特别是他所创立的布拉格学派，一方面前承索绪尔的开创性工作，另一方面又后启1960年代法国结构主义的一脉思潮。

深入阅读：Fiske（1982）[①]。

隐喻（metaphor） * 隐喻就是将未知的东西转换成已知的术语加以传播。* 例如，“轿车甲虫般地前行”这个隐喻就假定，我们不知道轿车怎么运动，但我们的确知道甲虫匆匆穿过地面的行进模样。这个隐喻即把甲虫的特征转换到轿车身上。

雅格布森主张，隐喻和**转喻**是两种传播意义的基本模式。他认为，隐喻模式具有诗的特征。它也具有广告的特征，即**形象**从已知的文化**神话**中产生，而神话的特征经过转换被赋予未知的产品。野性的西部成为某种牌子的香烟的隐喻，旧金山的明媚阳光成为某种牌子的化妆品的隐喻。

隐喻按照**联想关系**运作——即它们把未知的东西嵌入一种新的联想关系，未知的东西由此获得部分新的意义。在“航船犁开（plough）大海”这个隐喻中，“航行”（sail）一词作为未曾说出而属于未知的东西被嵌入“分开实在之物的方式”这个联想关系，同切开、撕开、锯开、割开、剪开、砍开、扯开等词语相并列。通过某种想像，读者将这个联想关系的一般特征同从中所选“犁开”一项的具体特征进行置换（transpose），从而赋予未知术语“航行”以一种新的意义。

于是，隐喻就要求一种积极的、富于想像的**解码**行为：读者不得不去发现哪个特征才能进行有意义的置换。**接收者**这种积极介入的行动为诗人和广告主所寻求，诗人们希望解码活动能够提供同编码相同对应的想像程序，广告主希望这种他们所期望的合作行为能使接受者更易受到产品广告词的影响。

明喻（simile）是一种将已知与未知同时呈现的隐喻：“轿车就像一只急匆匆穿过地面的甲虫沿着公路行驶。”广告与视觉隐喻都更像明喻，它们一般都将未知与已知同时交代出来。

内涵（connotation）总是按照联想关系发挥作用——一张用暖色光和软聚焦拍的茅草覆顶的农舍照片，就含蓄表达思乡怀旧之情。光线是文字性隐喻“透过玫瑰色的眼睛看去”的视觉等同物，软聚焦则是柔情的一种隐喻。

---

① 即J·费斯克的《传播研究引论》（*Introduction to Communication Studies*），中译本收入台湾远流出版公司的“传播学名著译丛”（1995），名为《传播符号学理论》（张锦华译）。

JF

互文参阅：浓缩（condensation），转喻（metonymy），联想关系（paradigm），符号（sign）。

方法论（methodology） ＊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中用来进行研究的技术手段所做的研究。＊这些技术手段通常是指资料搜集、人群抽样、证据分析与**实验**设计等。因此，用在理论化与说理化上的证据，其有效性与可靠性主要取决于用来搜集那种信息的方法论。可以看到，围绕**观察实验法**的争论主要是对证据与方法论偏差进行质询。在传播研究中，有些方法论比其他方法论更为严格。比如，建构信息流程的**实验**就比**精神分析理论**家与内省主义者所用的**无意识**分析更严格。而在**文化研究**的某些领域，方法论一类技术手段的有效性与可靠性则受到严肃质疑，原因在于它所制造的**客观性**与经验主义的假定。

DS

互文参阅：观察实验法（empiricism），人种志（ethnography），实验（experiment），实证主义（positivism），问卷（questionnaire）。

深入阅读：Stempel and Westley(eds)（1981）。

转喻（metonymy） ＊转喻是用某物的某个部分或要素来代表其整体。＊按雅格布森[1]的理论，**转喻**和**隐喻**是两种传播**意义**的基本模式。他指出，转喻是小说特别是**现实主义**小说的典型模式。一部现实题材警匪连续剧的各种场景，就是故事所在的整座城市的各种转喻，我们对这座城市的看法随着所选的转喻而变化。纽约或伦敦是肮脏的、昏暗的、腐朽的、作奸犯科层出不穷的地方，还是适宜大型商贸活动的繁华场所，均取决于对转喻的选择。

---

① 雅格布森（Roman Jakobson，1896～1982），原籍俄国的语言学家，"布拉格学派"的主要奠基人。早年曾任莫斯科"高等戏剧学校"俄语教授，1920年代在布拉格开创了语言学研究的布拉格学派。1941年流亡美国，先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后任哈佛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与普通语言学教授（1949～1967）。他的研究不仅对现代语言学建树颇丰，而且对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也影响广泛。特别是他所创立的布拉格学派，一方面前承索绪尔的开创性工作，另一方面又后启1960年代法国结构主义的一脉思潮。

新闻是转喻性的：一个得到报道的事件被当做整个现实的代表，而它只是这个现实的一部分。纠察线上的两三个罢工者，是一场纠纷中工会势力的转喻；贝尔法斯特大街上的士兵，是北爱尔兰英国驻军的转喻；由手持盾牌的防暴警察组成的防线，是相对于全民无政府状态的那种法律与秩序的强制力量的转喻。

转喻按照**组合关系**运作。如果某人的话还未说完，句子的其余部分还悬在“空中”，此时我们已能将它的剩余意思连接起来；同样，我们也能从已经获知的部分“故事”里，将它的其余部分连接起来。不过，转喻的运作总是看不见的：隐喻通过其人为性和对其**解码**所需的想像力，而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自身；转喻则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于是很容易被看成是天经地义的，从而使人认识不到另外一种转喻可能给出同一整体以完全不同的画面。一个激烈冲撞的罢工者与一个冷漠生厌的罢工者，虽然同属纠察线的一部分，但他们可能作为意义不同的转喻被呈现。

神话总是转喻式的发挥作用。一个转喻引发我们对其所属整体的构建，一个形象将以同样方式引发一系列的概念。

JF

互文参阅：隐喻（metaphor），意指（signification），组合关系（syntagm）。

少数派（minority） ＊某个匮权乏势的群体。＊这个术语使人们误以为，少数派的特征仅仅在于人数，尽管毋庸置疑人数越少在**权力基础上**的地位可能越低（但参阅**精英**）。关键问题还在于少数派**群体**所共有的**价值**、信仰与知觉：如果这些不能得到有意识的表现，那么，这个群体的存在在心理上就是不确定的，即便在社会中是真实的。正是通过经常表白苦衷，成员间的传播活动才得以加强（它又使苦衷进一步得到表白），并达到某种体戚相关的状态。这样，少数派便由一种认命的立场转为一种抗拒的立场，这一转变是基于对某种弱势权力基础的认识和对这种不平等的抱怨——这一点得到Tajfel（1981）有关**种族**研究与Spender（1985）有关妇女研究的着力强调。随着少数派共有认同而增长的是族群文化的发展。在媒介研究中，**刻板印象**一直受到深人细致的分析，因为它带有对少数派不利的、有害的形象，而少数派又没有多少权力改变这种流行的（错误）表述（参阅Howitt 1982）。

少数派也能同少数派文化挂钩，Williams（1981）曾将它与**大众文化**

相对比。这里，这个概念已同某种强势的权力基础相关，而这种权力基础又同精英相联，精英一方面要确保（通过赞助）经过选择的艺术形式、科学著作与技艺得以延续，而另一方面则又控制人们享用"伟大传统"（the great tradition）。因此，有时我们可能将少数派与高雅文化相联系，承认各种群体的人都能从这种赞助中获益。

DS

互文参阅：意识（consciousness），族群（ethnic），性别（gender），权力（power），偏见（prejudice），专业（profession），种族（race），角色（role），刻板印象（stereotype）。

深入阅读：Tajfel（1981）；Spender（1985）；Williams（1981）。

说话方式（mode of address） * 同某个**文本**或句子中那些建构表述的方面相对的、旨在确立说话者与听话者彼此关系的内容；媒介组织向受众与读者说话的方式。* 在面对面交谈中，说话方式一览无余；它包含某个句子或对话的语言、副语言（para-linguistic）与语境特征——它们根据双方关系的亲密程度、地位等面决定每个说话者对其他说话者的**定向性**，它还包含这一对话所发生的情景**类型**。在考虑如何面对朋友、法庭、日记、家信等描述同一事件时，你可能就在比较适合不同**话语类型**的说话方式。

说话方式是传播活动一个不可避免的构成部分；因此，它不仅总是呈现于面对面的情景中，而且也呈现于各方的接触非属直接而由文本的媒介。这些情景中的说话方式也有**意识形态**性；它是召唤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即**大众传播**将个体作为其话语对象进行"招呼"或召唤。简言之，媒介**文本**创造了其目标受众的一个虚构形象，然后对这种虚构人物说话。

英国的商业**广播**给这种对之说话的虚构人物还起了一个名字。她叫多琳（Doreen），住在Basildon，有个丈夫（比尔），她关注的事情不多，尽管并不蠢，但听收音机时总是心不在焉，所以对她的金科玉律是："告诉她，你将要告诉她；接着就告诉她；然后告诉她，你已经告诉她了。"多琳被假定对外部世界的政治事务不感兴趣，除非它们对其超级市场的供应发生影响——这里有一些针对实习生如何改写广播稿的建议：

> 如果你有需要告诉多琳的信息，那么得确定你很清楚她需要知道的事情及其原因。"嗨，多琳——斯里兰卡泰米尔猛虎组织封锁了该

岛的港口，这是一次重大军事袭击行动的一部分。”你是想说多琳需要的茶叶供应有危险吗？那么就这么说好了。

（National Broadcasting School/CBS Radio）

说话方式的问题，对媒介组织来说属于重大政策。这是因为它所传达的不仅是对受众的认识，而且也是对自身的认识。每家报纸或每个电视信道都想使自己在竞争中出类拔萃，都想向潜在的消费者、广告商或赞助商说明自己拥有什么样的全班人马。同样的事情可以借助不同的外表——比如，每个时事节目都可通过不同途径开发电视说话方式的资源，以将自己与同一频道或竞争频道上的其他节目相区别。某种节目可能是大众化的，另外一个节目可能致力于调查性报道，而第三个节目可能关注财经新闻等。每种节目的差异都以节目的徽标与音乐、演播室布景的风格等为标志，但最重要的还是节目主持人或**中介者**——他们的容貌与个性、谈话风格或语言风格、穿着打扮、镜头感、发型以及同对象的机智应答等，不管他们是不是新闻记者。收视率就依赖于这类**符号学**意义上的细枝末节，因为，通过这些东西人们将确定他们是否被这个节目的说话方式所包容或排斥。

以说话方式别具一格而著称的一个组织方面的例子，是英国广播公司（BBC）。这或许是因为历史上 BBC 似乎一直使自己保持着比实际对受众所做的要好得多的声誉。在 BBC 的里思[①]时期（从 1922 年直到约 1960 年代中期），它主要通过其说话方式而在公众头脑中为自己刻下一个独一无二的印象：这是一种正式的、上流风格的、权威的、有文化品味的方式；或从另一个角度说，就是一种妄自尊大的、高人一等的、傲慢的、自负的方式。这种“贵族风格”（house style）遍布于 BBC 的日常工作，从节目主持人的口音（“BBC 英语”）到节目制作的政策、播出的时间表、**类型**、全套节目等。但是，这不仅是个**方式/样式**问题——对 BBC 来说，它也是作为一种民族文化的**制度**而奉行的长期生存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旨在获

---

① 里思（John Reith，1889～1971），英国现代公有而独立企业的创建人。1922 年，任英国广播公司的总经理，1927～1938 年又任董事长。在此期间，他大力发展无线电广播，创办广播的短波业务和世界上第一个高清晰度的电视广播（1936）。后来担任联邦电信委员会主席，推动英联邦电信系统的整顿。1927 年被授予爵士。

得公众与议会的保护。

JH

模式（model） ＊对某一不同系列的全部元素所做的结构化呈现，旨在引导人们对复杂问题以及也许是新问题进行分析。＊按照Harré（1979）的论述，模式这个概念在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中处于一种核心而又不稳定的地位。在构建假说及在旧的研究领域进行新的研究时，模式被视为必不可少，因为它提供的参照系使情景与过程更易理解。就此而言，一个模式可能是一种**肖像**式的呈现，它使人们联想到真实事物——就像一幅照片或一个木偶的作用。模式也可指涉某种理想型（ideal type），其真实形态只能获得部分满足，就像某些拥有超级力量的**英雄/女英雄**。在模式所具有的许多其他用途中，还包括模式的解释性功能，其间在对比的过程之中往往并不存在两个相应元素一对一的严格相似。比如，**信息处理**模式就像Lindsay与Norman（1977）所言，在解释传播的**认知**性基础时可指计算机的系统、程序及运行，但没有一个十全十美的类比可用来与计算机的所有方面对应。传播学的通用模式包括：*直线模式（linear）*、*循环模式（circular）*、*螺旋模式（helical）*、**交流**模式、**人际传播**模式与人内传播模式等。使用模式的危险在于，对它们的理解可能过于胶柱鼓瑟，尤其当模式出于解释而非描述的原因被构建之际更是如此。于是，由于接受这种人为所加的（但在某些时候有其便利之处）界限，模式可能对进一步的理论思考构成限制。

DS

互文参阅：拟剧论（dramaturgy），皮下注射模式（hypodermic needle model），信息处理（information processing），精神分析理论（psychoanalytical theory），两级传播模式（two-step flow model）。

深入阅读：McQuail and Windahl（1981）①；McKeown（1982）。

道德恐慌（moral panic） ＊一个凸显社会反应及控制、大众媒介与某些异端行为等种种势力相互作用之过程的重要概念。＊Cohn（1972）将这个

① 即D·麦奎尔等《大众传播模式论》（*Communication Models*），中译本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1987）。

术语引入大众媒介及其触发社会普遍关注之能量的研究之中，他将这个过程描述为："某个情景、事件、个人或人群显现出来，并被界定为对社会价值与社会利益的一种威胁。"（1972，P.28；1980，P.9）于是，由于那些道德恐慌过程，某个社会与文化的成员便对加诸"其"认可**价值**与生活方式的挑战与威胁"在道德上变得很敏感"，这些挑战与威胁出自被界定为**异端行为**的**群体**。这个过程突出了大众媒介在提供、保持及"守卫"异端行为的现成框架与定义上的重要性，而这一框架与定义又建构了公众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与态度。这个术语也用来将这种被建构的公众关注同动用来应对这种问题的**制度化**控制以及其他形式的控制联系起来。就最明晰的形态而言，一个道德恐慌过程经过分析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一个初始事件已然发生并得到**意指**，它常常吸引媒介展开戏剧性报道，进而常常促使媒介进行严密监视和常规研究。这些情况经过安排与调整，就可以确认随后发生的任何可以套用类似**符码**的事件。

（2）随着初始事件的影响，媒介的报道开始从特殊事件转向据说是由这种事件所引发的、更广泛的社会意味与问题。主要凭借**初始解释者**与"可靠证人"（accredited witnesses）——他们代表"专家"与专业意见，可能再加上"卫道士"（moral entrepreneurs）——他们断言这个事件是道德与社会织体全面崩溃的象征，媒介便对公众的辩论、关注、义愤及敏感火上浇油。由于媒介对随后发生的其他事件与事情（常为监视功能在第一阶段所披露）进行确认，这种情况可能日趋强化与加剧。在某些条件下，这些情况可能被解释与理解为进一步的发现，即这个特殊问题或事件事实上只是一个普遍的、相应也更具危害性的社会问题的一部分。由此一来，初始事件就被建构成一座"冰山的一角"、一场"洪水"的第一"波"、一场"战斗"的最初"攻击"等等。这一公众关注的螺旋式发展，及其通过媒介特别是新闻形式而重演的过程，本身就可能导致下面这种日趋峻急与严厉的局面：

（3）尽管并非总是仅以国家反应形式应对得到极端化与戏剧化报道的"问题"，但社会控制还是专门实施起来。司法、立法及行政部门的反应及惩罚，常被清楚有力地表述在此前阶段的解释与框架之中。

理解这个概念的最佳途径，就是通过语境追寻其意味。支持它的术语

与理论，也为研究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核心领域。

TO

互文参阅:议程设置(agenda setting),异端行为扩大化(amplification),异端行为(deviance),标签理论(labelling theory),新闻价值(news value),初始解释者(primary definers)。

深入阅读:Cohen(1972);Young(1971)(moral panics and drug-takers);Hall and Jefferson(eds)(1976) (moral panics and young subcultures);Hall,*et al*.(1978)(moral panics and 'mugging');Golding and Middleton(1982)(moral panics and 'welfare scoungers');Weeks(1989)(AIDS and sexuality)。

动机(拍摄的)(motivation/of shot) * 在电影或录像的拍摄中对道具与情节进行安排以提示**叙述**特征的来源。* 一扇窗户、一盏台灯、一根蜡烛、一个外星人或其他来源，如果同明显出自它的光线一起显现于屏幕，那么这种光线就构成**动机**。然而——这是分析的焦点所在——人们极难发现场景的光线实际出自动机化的来源；动机是用来催生自然主义（逼真）的一种惯用手法。

动机属于某一**类型**的**分辨特征**，它是形成其**美学**传统的部分原因。比如电视中的肥皂剧就同非动机化的演播室光线相关；大量光线打在角色发亮的头顶，色彩鲜亮而场景平淡。相反，经过细腻处理的动机化光线往往同高额预算的戏剧演出相关，从而使这种（电影化）演出明显不同于演播室（录像）产品的“廉价”面貌。

Hartley and Montgomery (1985) 发现，在区别不同类型的新闻摄影时，*动机*这个术语非常有用。对动机化的新闻摄影来说，照相机“拖延”(defers) 情节与人物，通过摇摄、取景等手法跟随其行动。相反，非动机化的新闻摄影，则将自己强加于现场，而不考虑人物的实际所为。这就常得对某个微小细节予以特写拍摄，然后通过取景镜头的拉开/摇摄对主要情节进行广角拍摄。当动机化与非动机化的新闻摄影在一则新闻中同时呈现，并被用于对立派别就某项工业政策进行的争论时，那么争议焦点就在于这是一种视觉偏差，它产生某种**意识形态**上的倾向性，以有利于那些被“拖延”的一方。

JH

深入阅读：Hartley and Montgomery (1985); Hartley (1992)。

动机（符号的）（motivation/of the sign）　* 这个术语是指能指与所指的关系。* **能指**或一个符号的形式，能够完全独立于其**所指**或心理上的概念。“CAT”（猫）这个符号的形式，同这个动物在心理上的概念没有自然的联系。两者的关系纯粹由**惯例**所决定。因此，“CAT”这个符号就是非动机化的或任意的。另一方面，照片的能指则是高度动机化的，因为这里的符号（照片）之形式（景象）主要由所指的性质所决定。照片上的猫看上去不得不像猫。不过，这个能指并非完全由所指所决定，因为拍摄者能够选择拍摄的角度、距离、焦点等。所以，一张照片是高度动机化的，但是绝非完全动机化。实际上，完全动机化的符号是不可能的，尽管完全非动机化的符号很常见。

于是，能指的形式既可为单一的习俗（或选择）所决定，又可为一组习俗与所指的性质所决定；一个符号越是高度动机化，所指的影响就越大。非动机化符号被称做任意的（尽管皮尔士称之为“**象征**”）；动机化的符号就是**肖像**。

JF

互文参阅：惯例（convention）、肖像（icon），能指/所指（signifier/signified）。

多重意义（multi-accentuality）　* 符号的一种属性，体现于每一符号依据其使用情景而具有的表达多重意义的能力之中。* 这个术语是由Volosinov（1973）作为一个论点的一部分而提出来的。他提出这个论点是想表明，确定**符号**的意义不仅取决于抽象的语言（语言［langue］）系统，而且取决于决定意义潜在内涵的社会关系方面的**对话性**互动。

从原则上讲，多重意义是所有符号的属性，但实际上多数符号并非始终属于主体努力的对象。不过，这个概念在说明这类现象时依然有效，如**反一语**言或反抗的语言，就像18与19世纪西印度群岛的奴隶们所用的语言，其特征是完全颠倒现存的符号及其**价值**（如“黑”被颠倒过来，成为表达“好的”、“有力的”、“神圣的”等意的符号）。女性主义也表明，看似中性的符号（“他”、“男人”、“人类”）都承载着**意识形态**，代表着社会的权力关系。

JH

互文参阅：闭合（closure），多重话语（multi-discourse）。

多元文化/论（multi-cultural/ism） ＊ 对包含不同而相关文化传统与实践的社会予以的承认与研究；常与整个社会组合中不同族群的构成相联系。＊ 承认社会是多元文化的，需要有两个逻辑上的推论。

第一，需要对某种文化具有单一性（unity）的通行假定进行反思。“英国人”概念不得不进行修改，以顾及威尔士人、苏格兰人、爱尔兰人、亚洲人、非洲人、加里比海人、中国人、中东人以及其他定居的**族群群体**。这种修改不具有“同化”这些群体的那种企图，因为同化的观念意味着这些群体将被改变成主流**文化**中难以区别的“成员”，而并不对主流文化进行任何相应的调整。这是社会整合政策所需的效果，多元文化的研究将这种效果定为**霸权**性的。

第二，多元文化需要对某种文化具有多重性或多样性的通行假定进行反思。仅仅承认存在着许多不同种类的人民与文**化**活动还是不够的，因为，它忽略了这些不同群体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多元文化的研究则试图从文**化**权力的强弱关系方面，而不是从多少带有异域传统的个案方面来说明不同的文化实践。

JH

互文参阅：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

多重话语（multi-discursive） ＊ 这是我们编纂本书时不得不发明的一个概念。当发现概念依其不同话语中的用法而具有不可忽略的不同意义或内涵（connotations）时，它们就可说成多重话语。＊ 那些可以说成多重话语的词语如**文化**，相当程度上得依赖语境才能确定其意义。不过，即使如此，这个词语还会在其他**话语**中继续引起共鸣，正如在任何语境中的情形。例如，用**文化研究**的话语方式或用人类学的话语方式使用文化一词，都不会压抑它用“高雅”文化的**精英**话语所产生的回声。

这意味着多重话语，不同于那些隐匿某种废弃**隐喻**或过时用法的概念。比如，你可能这样说到电视上的某个乐队（band）：“他们太差劲儿了（chronic）。”这里，知道“差劲”有“过时”的意思并不重要，知道你用这个词的意思是“才能严重匮乏（糟糕）”也不重要，这些用法都是从这个词的医学用法上发展而来的，即慢性（因而也是比较严重的）疾

病，如“慢性支气管炎”（chronic bronchitis）。重要的是，一种用法完全不需要另一种用法。然而，凭借多重话语这个概念，不同用法（不同话语）常以不同方式动用同一词语，以至两个或更多意义立刻呈现，并往往互相限制、制约或干扰。

多重话语这个概念的一个含义是，意义不仅依赖语境与用法（在词语之内无法确定意义），而且在**意指**方面存在激烈的社会冲突，而词语总是代表某种凌驾他者的强势力量。例如，特殊词语可能被某种特殊的**制度化**话语所“殖民”（colonized），以至于如果不同所说的制度“共谋”就完全难于使用这个词语。以“上帝”一词为例，想一想下面的对话为什么听起来有点怪怪的：“上帝是黑人。”“不，她不是。”

JH

互文参阅：闭合（closure），文化（culture），话语（discourse），意识形态（ideology），多重意义（multi-accentuality）。

神秘化（mystification） ＊源于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术语，用来说明意识形态的实践活动被弄成仿佛自然之举（也就是说，没有其他选择）的过程，而实际上它们不过属于特殊文化，因此也就是任意性的（arbitrary）。＊马克思主义进行**文本**分析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对它们进行去神秘化，即显露其任意性与**文化**的特殊性，由此设定其他另类的（alternative）（潜在的）存在。

例如，对某一女性杂志的研究表明，它试图赢得女性不知不觉地赞同它对女性的这般社会建构：（1）消费者——有利于广告商；（2）主妇——有利于孩子与丈夫；（3）魅惑/性感的对象——有利于男人。在这个过程中所用的策略，不仅使这一社会建构显得自然而然，而且使人满意，并代表女性自己的利益。而这一研究可以说就是对这种**意识形态**的实践活动（或**霸权**）进行“去神秘化”。这一神秘化过程由两方面构成：（1）暗示对女性的其他界定并不存在（如果存在，也是非自然的）；（2）掩盖对女性的这种建构在于增进他人（广告商、男人、丈夫与孩子）利益的事实，而方法就是不断诈称这种建构是为了女性自己的利益。由于媒介的运作从未独立于其他的**社会制度**，所以这种神秘化也就由隐藏于家庭、企业、教育以及广泛社会秩序之中的社会实践所施行。

JF

互文参阅：文化（culture），霸权（hegemony），意识形态（ideology）。

神话（myth） ＊一个使用广泛而用法不同的术语，指某种文化对其作为一种文化而言的自我身份（self-identity）至关重要的概念本身予以理解、表达与传播。＊这个术语有三种主要用法，即礼仪/人类学用法、文学用法与符号学用法。

礼仪/人类学用法认为，神话是一种匿名创作的**叙事**，它提供了世界为何如此这般与人们为何如此行事的解释。它对自身**文化**是独特的，尽管它提供的解释是普适的或自然的。它是将自然变为文化的一种关键手段，因此也就作为一种**自然化**中介而在文化与自然之间交互作用。

在文学理论中，神话成为某个被视为永恒的、永久的人类真理的故事或**形象**，通常属于某种精神、道德或**美学**的范畴。它与**原型**象征的思想密切相关，这种**象征**具有一种跨文化的意义（如果不是普适的意义）。它属于一个反复强调宗教与文学的社会功能具有相似性的学派。这一用法，通常使神话成为一种理想的、含混的、最终无根据趋向文学的符号。

符号学的意义明显区别于这两种用法。它是指一系列连接得不相合（unarticulated）的相关概念，借助这种概念某种文化的成员才能够理解某些主题。它在无意识与**主体间性**的状态下运作。它是联想的而非叙事的；它属于特有文化而非跨文化或普适性；它与时俱变而非永恒常在；它是连接得不相合的表达而非文本化的表达。它的首要功能是使文化自然化，因此，这种用法同其他用法共有自然化的功能。符号学的用法正如巴尔特[①]所言，在**意指**下面得到更充分的讨论。

JF

互文参阅：文化（culture），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自然化（naturalizing）。

深入阅读：Fiske（1982）[②]。

① 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法国结构主义思想家，著名作家、文艺批评家、符号学家，对符号学理论颇多建树，1976年任法兰西学院符号学讲座教授，成为该讲座的第一位学者。主要著作有《神话集》（1957）、《符号学原理》（1964）、《S/Z》（1970）、《罗兰·巴尔特论罗兰·巴尔特》（1975）、《恋人絮语》（1977）等，这些著作均有中译本。

② 即J·费斯克的《传播研究引论》（*Introduction to Communication Studies*），中译本收入台湾远流出版公司的“传播学名著译丛”（1995），名为《传播符号学理论》（张锦华译）。

N

麻醉(narcotization) ＊用于说明大众媒介一项负面功能或曰“功能障碍”（dysfunction）的美国术语，其间**大众传播**被视为在大众化的受众中导致麻木不仁与政治惰性。＊这个术语的意义源于“麻醉剂”或类型毒品的**效果**，用以指涉这种吊诡式（paradoxical）的关系：一方面，媒介对关乎核心的社会问题与政治问题（比如，贫困）的信息披露得越来越多，另一方面，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组织化行动与介入却越来越少。由此得出的核心观点就是，媒介导致受众产生一种“麻痹”（stupor）或曰行动匮乏的状态，人们以牺牲实际参与为代价而变得见少识寡，漠不关心。正如拉扎斯菲尔德[①]与默顿[②]（1948）所指出的：“日渐增大的大众传播剂量，可能无意间使人们的精力从积极的参与变为消极的认知。”

---

① 拉扎斯菲尔德（Paul Felix Lazarsfeld，1901～1976），奥地利裔美国社会学家。曾就读于维也纳大学，获应用数学博士学位。1933年赴美，1940年开始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他领导的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学研究所，成为社会学实证研究的重镇。其间，他与罗伯特·默顿（Rorbert Merton）合作就大众传播问题做过一系列卓有影响的研究，从而与政治学家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社会心理学家卢因（Kurt Lewin）和霍夫兰（Carl Hovland）并称为传播学的“四大先驱”（W·施拉姆语）。

② 罗伯特·默顿（Rorbert Merton，1910～2003），声名卓著的美国社会学家，早年在哈佛大学科学史权威萨顿指导下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17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1938），被视为科学社会学的先驱性著作。此外，主要著作还有《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1949）、《理论社会学》（1967）、《科学社会学》（1973）等。他曾长期担任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还做过美国社会学会的主席。他与拉扎斯菲尔德（Paul Felix Lazarsfeld）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多年合作，不仅为社会学研究开宗立派，同时也对传播学研究产生深刻影响。另外，其独子罗伯特·C·默顿（Rorbert C. Merton）曾与M·S·斯科尔斯共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1997）。

TO

互文参阅：效果（effect），功能论（functionalism），皮下注射模式（hypodermic needle model）。

深入阅读：Schramm and Roberts（eds）（1971）。

叙事（narrative） ＊一则故事（虚构的或真实的）组织成前后相继的事件时，制约这一过程的手法、策略与惯例："然后如何如何"。＊叙事可进一步细分——尤其是被细分为"情节"（plot）（A遇见B；某事发生；重归原态）与"叙述"（narration）（"从前有个美丽的公主"，或"昨天总统说"）。情节是一则故事中不可再少的内容，而叙述是使这些内容发生关联的方法。由此说来，像直接引语、间接引语及相对于第三人称的第一人称（相对于"他/她"的"我"）等表现手法，均为叙事而非情节的属性。实际上无论情节如何，在任何故事中它们都能得到正式分析。在**结构主义**与文学批评中（参阅Barthes 1977；Propp 1968），叙事分析变得越来越常见，而且越来越精致。

叙事是非一虚构故事如广播新闻的一个特征，其间专业化**符码**决定着每个故事的某种结构、顺序及组成部分（参阅Hartley 1982）。吊诡的是（paradoxically），叙事内含于许多静态形象特别是那些广告形象之中——就像照片实际时刻的"此前"与"此后"都暗含于它的要素中间，我们需要识别这一暗含的时间流程才能完全理解这个形象。同样，许多新闻照片也仰仗于一个刚刚发生或即将发生的事件，而正是这种叙事感使这幅照片具有新闻价值。

近来，研究的重点集中在通过叙事策略理解我们自己与我们的日常生活上而：在使我们自己及我们的生活成为叙事（故事）方而，有种种可用的结构与既定的形式。**话语**分析与文化史学者，在这一新的、有趣的研究领域十分活跃，表明叙事是一种无所不在的文化实践。

JH

互文参阅：叙述（diegesis）。

深入阅读：Donald and Mercer（1982）；Woollacott（1982）。

窄播（narrowcasting） ＊通过诸如闭路电视（Closed Circuit Television，即CCTV）或民用波段（Citizen'Band，即CB）电台，向远方而确定的接收

者传送讯息的过程。*（与**广播**相对）。引申开来，这个概念也意味着向某个受制于兴趣与需求而非比如技术能力的**受众**传送讯息的过程。少数人的节目就用窄播**符码**去吸引确定而有限的受众。

JH

互文参阅：广播（broadcasting），**精致符码**（elaborated codes）。

民族（nation） * 被理解成一个不同于和有别于所有其他民族的“想象的共同体”。“民族”是个关系性的术语，如同任何**符号**一样，某个民族就是由其他民族所不具有的东西构成的。这个概念实际上属于**意指**的领域，而非任何永恒的、所指的世界。民族没有什么基原的或内在的属性；每个民族都是一种话语建构，其身份体现在它与其他民族的差异之中。*

“民族”常常用来指民族国家（*nation state*）——一个具有自己的政府、边界、国防力量等，以及国家的象征性标志如国旗、国歌、本土货币、国家元首、联合国成员身份等的主权国家。但也有许多民族没有民族国家。某些国家包含不止一个民族（比如，英国的威尔士、苏格兰与北爱尔兰）。还有一些民族跨越国家边界（比如，直到最近的两个德国）。而有些民族被纳入若干其他国家（如库尔德人）。有些民族则没有任何领土（比如，巴勒斯坦人）。

如果领土不能定义一个民族，那么**种族**或**族群**、**语言**与**文化**同样也不能——多数现代国家在某种程度上都属于多元种族、多元语言与**多元文化**，即使并不总为官方政策所倡导。所以，字典或常识给民族下的定义，什么具有共同的**族群**传统、语言及历史，居住在由明确边界所划定的领土之内的大部分人民等，就同事实圆凿方枘。

然而，“民族”指的不是永恒的“事实”世界，而是一种象征性的**所指对象**——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安德森①，1983），它由各种各样的**话**

①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1936～ ），当代美国学者，康乃尔大学讲座教授，以研究民族问题知名于世。其代表作《想象的共同体：论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扩散》（1983），对民族主义以及民族国家等一系列问题做出经典论述，提出民族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的论断，在国际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另外，与他一起生于中国昆明的弟弟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同样是位国际知名的学者，曾长期主编英国的《新左翼评论》（New Left Review），被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誉为“不列颠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

语制度所维系，从民族的文学与语言到教育中的民族课程体系。当然，在经济、政治、文化及话语生活等所有领域，都存在着曲折变化的民族化内容；但在为这个概念及其客体创造与保持一个不断演化的所指对象时，某些制度发挥着更突出与更常规的作用。这些制度中最重要的就是媒介。

对某个民族的归属感是“想象出来的”，因为除了其民族中的极少数成员，没有谁能认识更多的人，但它又是个“共同体”，因为每个人都完全确信自己同所有其他的人处于同时共存的状态。这种共同体的意识，是由印刷媒介与电子媒介日复一日翻来覆去的传播活动所建构所维系的，同时伴以本身又是经由媒介进行传播的定期性民族庆典。

随着日益频繁的迁移与流动，某个民族的这些象征性标志就成为它所具有的、惟一共同的“遗产”。当然，这些标志在媒介中更为普遍，成为广告、节目串联（continuity）以及诸如此类东西中的一个常见基调(motif)，在各种群体中提示一种欢乐融洽的统一性，否则这些群体就表现不出什么共同特征。这里，民族一直被跨国公司（*multi-national*）的影片作为一个“善待”（user-friendly）的隐喻而受到青睐，这些影片动员的不是公民而是消费者。

JH

深入阅读：Anderson（1983）[①]；Schlesinger（1991）；Hartley（1992）。

自然主义(naturalism) ＊一个常常作为**现实主义**的同义词而使用的术语。其影响源于戏剧，当时是指那些力图摆脱**符号**而以这种符号所代表的客体取代符号的戏剧(特别是易卜生的戏剧)。＊例如，一出起居室的戏会把一间起居室搬上舞台——蜘蛛抱蛋、印度印花布窗帘以及所有这一切。人物对话不按舞台道白写，而写得就像“实际说话”。演员不是表现他们所扮演的角色，而是成为角色(即所谓“体验派表演方法”[②])。当然，舞台上的每个演员都装着观众不在现场，因为，起居室里通常是不会发现受众的。所以，这种戏剧从受众的视点看就属窥视性的(voyeuristic)，一种以“第四堵墙”

---

① 即B·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中译本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03）。

② 体验派表演方法(the Method)，指美国采用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方法，主要强调以内心体验塑造角色。

(fourth wall)著称的视点,既然那是观众一向看戏的角度。

显然，自然主义是送给电影的礼物，对家居化的电视媒介来说就更是如此，这里的摄像机与拍摄人员代替了布景中的受众，所以，你甚至不会产生将“身在剧场”与“身在那人起居室”加以对比的感觉。自然主义艺术手法的**意识形态**生产力相当强大，因为，它所表现的客观事物与人物关系具有“真实性”，这种真实性使表述本身显得单纯透明（innocent），自我谦避（self-effecting）。我们的注意力都专注于“穿越”屏幕而直达现场，所以，我们对这出戏可能形成的任何理解，似乎都直接源于被拍摄下的场景而不是**表述**本身。比起那种依据公认**惯例**精心建构或“处理”的东西，偶然遇到的东西更具有强制力量。当然，这就是关键所在。电视利用舞台上的自然主义以促成银幕形象/表述的**自然化**。

JH

自然化（naturalizing） * 将文化与历史的东西作为自然的东西进行表述的过程。* 自然化是种种意识形态**话语**的一个**分辨特征**。自然化的**意识形态**生成力（productivity），体现为由社会、历史、经济与文化所**限定**的（因而是可以改变的）情景与意义被当做自然而然的东西—— 也就是说不可避免的、永恒的、普适的、遗传的（因而也是不容争辩的）东西而成为“经验”。

自然化是当代文化斗争与**意指**斗争的追求目标：比如，阶级的或男性的霸权地位就被当做自然而然的东西予以表达，相反对这种霸权地位的抵抗则被当做不自然的东西予以表述。所以，社会主义与女性主义的话语就不得不同时在两个方面据理力争，一方面是针对那些不断鼓励我们以繁殖**阶级**与**性别**不平等的方式去理解社会关系的自然化话语，另一方面则又面对将自己的替代性的话语与表述作为自然的（或作为不是不自然的）东西予以确立的困难。于是，自然化就成为维持**霸权**的一股主要力量。

JH

互文参阅：闭合（closure），共识（consensus），霸权（hegemony）。

自然/本质（nature） * 同其决定性力量一起构成一个整体的物质世界；某种客体所具有的决定其形式、内容与行为的固有性质或本原性质。* 因为它是一个**多重话语**的概念，拒绝任何对它进行确切解释的企图，所以在

研究工作中应该慎用这个术语。无论如何，某种客体的本质也好，自然的物质世界也好，或自然/本质这个词语本身也好，就任何性质、属性或特性而言都不应作为不言而喻的东西来看待；这些自然/本质均为研究的对象而非前提。

自然常与**文化**相对照；作为同人类相对的非—人类。不过，这种非—人类的自然/本质常被作为人类自身的一个固有性质或本原性质——就像在人性（human nature）中一样。按照这种用法，自然似乎最终成为上帝这个范畴的世俗化概念——超出我们的控制而又决定我们的特性与行为的一种非—人类的力量。就此而言，自然成为一个**意识形态**的范畴。

自然/本质用于分析性**话语**的其他主要方式，是作为某个客体的物质属性。因此，某物本质就得同它所获得的任何概念进行对比（地球的本质同它作为平面的概念进行对比）。因此，这个意义上的自然/本质成为科学研究的合适对象：通过分析某研究对象的“真正”本质（**决定论**的属性）而力图去显示、去发现什么。

JH

协商(negotiation) * 用于有关解读或意义的**符号学**理论的术语。解读一个**文本**时，读者就在与它互动或协商；这种协商过程就是读者将定位于社会**意义系统**的自身文化经验加诸文本。* 由这一解读过程赋予文本的意义，就是文本同社会化所建构的读者互相“协商”的结果——因此，它暗含着独一无二的意思。

于是，协商这个术语就意味着文本并不“具有”意义，而只是为潜在的种种意义划定范围：在某个特定解读中所产生的意义，怎么取决于文本也就怎么取决于读者。读者是一个交汇点，定位于社会的意义系统由此而同定位于文本的**倾向性解读**进行协商。

艾柯[①]（1980）用闭合这个术语以指涉那些力图通过自身的建构方式而将其影响加诸协商过程的文本：开放的文本允许读者在意义的协商过程中扮演更重要、更富创造性的角色。

---

① 艾柯（Umberto Eco，1932～ ），意大利当代著名学者、作家，波洛尼亚大学教授，以符号学的研究与理论著称于世。另外，他的第一部小说《玫瑰之名》自1980年出版以来，风行世界，畅销不衰。

JF

互文参阅：闭合（closure），意义系统（meaning systems），倾向性解读（preferred reading），文本（text）。

世界信息新秩序（new world information order） ＊ 1970 年代末以来广为流行的一个术语，指世界文化关系上专门由发展中国家提出的一系列根本性改革的目标 ＊ 这些改革力图反抗由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及其跨国公司支配的**全球化文化**经济，力图实现一种更加民主的、建筑在信息与其他文化产品相互交换与“自由流通”基础上的全球传播体系。因此，这些对某种“新的”世界信息秩序的呼吁，就不得不在现存的或“老的”历史秩序的语境中予以理解，新秩序是对老秩序的一种回应与挑战。

19 世纪以来，围绕着媒介技术与文化意象之国际分布的权力与控制，越来越高度集中在“发达”国家或“第一世界”国家，它们的文化支配了发展中国家的文化。结果，这些国家就越来越高度依赖进口的文化技术，依赖他们惯于播放的西方新闻、电影与种种电视娱乐节目。就许多情况而言，人们都认为这些文化形式是作为散播消费主义与其他西方价值观的工具而行事，这些价值观系统地剥夺发展中国家对其自身文化传统与视角的控制，同时也阻止他们按照自己意愿享用这一国际竞技场（arena）。这一系列进程，常被称为**文化帝国主义**。

争取世界信息新秩序的运动，主要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1980 年代初召集的一系列会议做出有力阐发。这些会议提出一套打破现存不平等格局的改革方案。简言之，这些提议旨在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物质手段以保护与促进其自身文化传统、文化产业与文化认同，同时提供马特拉[1]（1984）所谓“替代性视听空间”（alternative audiovisual space）的自由。这一切的目的在于扭转信息与娱乐之国际流通的不平衡状态、缩小信息-富裕社会与信息-匮乏社会之间的差距。这些提议也开始考虑新媒

① 马特拉（Armand Mattelart，1936～ ），法国著名的批判传播学者，巴黎第八大学传播学教授。1962 年至 1973 年曾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天主教大学任传播社会学教授和联合国社会发展专家，与传播学者 A·多夫曼（A. Dorfman）一起完成了批判传播学研究的经典之作——《如何解读唐老鸭：迪斯尼卡通片中的帝国主义》（1975）。他的《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1992）已有中译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年）。

体技术，特别是卫星广播的发展，以确保国际传播权不至于完全仰仗资本与发达的生产技术。显然，许多这些提议都遭到发达国家媒介行业的拒绝，但是，这并不能阻止世界信息新秩序这个概念获得广泛的国际支持。对理解国际传播与文化的政治学来说，它所提出的问题是核心性的。

TO

互文参阅：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民族（nation）。
深入阅读：Smith（1980）；UNESCO（1980）[①]；Tomlinson（1991）[②]；Downing *et al.*（1990）；Martin and Heibert（1990）。

新闻价值（news value） * 在公司化造就的主流报刊与广播中，用来选择、建构与表述新闻报道的专业化符码。* 新闻价值不是记者个人的属性（作为报道风格可能如此——尽管即便如此一般也受制于某种标准的“贵族风格”[house style]）。新闻价值是产业化的新闻公司由于生产性需要而导致的结果。为这种公司工作的人们，作为**个体**会表现出种种混合的追求、效忠、政治倾向与能力。在公司之内，他们隶属于环环相扣的劳动分工。在公司之外还存在竞争对手，以及记者与广播专业的**职业观**。处于这些**语境**之中，新闻**价值**的功能就在于从混杂着所有这些人物、实践与信仰的文稿中产生一种标准化的产品。

尽管如此，新闻价值还是一种非正式的**符码**。这是因为其正当性并非完全基于公司的需要。相反，当它们在专业领域被讨论之际（难得如此），其正当性是基于（1）有新闻价值事件的假定性质；与（2）新闻消费者的假定需要/需求。当然，不管是报道者还是新闻公司都假定既不能控制事件，也不能控制消费者的需求，所以，他们都不能认可一种正式的、明确的新闻价值的符码对他们指手画脚。于是，在这个行业里，新闻价值基本上就被解释为对读者或对故事本身的一种反应，许多记者赞同将这种反应的根源归于他们自身——记者据说对于“好”故事都有一个“新闻鼻”（good nose）或一种“本能感”（gut feeling）。

---

① 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国际交流问题研究委员会”的最后报告《多种声音，一个世界》（*Many Voices, One World*），中译本由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1981）。

② 即J·汤林森的《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中译本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9）。

多年来，想给新闻价值做出更明确定义的尝试数不胜数。但是，若把这些理论编成一个确定而可靠的**价值**一览表则难乎其难，因为，不同的研究是从不同的立场、使用不同的假定与术语而探究这一完整概念的。不过，下面的范畴可能有所裨益——但得记住新闻价值是有关新闻报道的价值，而不是有关事件本身的价值。

（1）新闻价值优先考虑的是报道这种事件，即最近的、突发的、确凿的、难以预料的、相关的与接近（相对于“自己”的**文化/阶级**/地域）的事件。

（2）此类事件随时都在发生而不具新闻价值。所谓优先考虑，乃是针对经济、国家政治、企业、外交事务、国内事务而言——不管它们是冲突性的还是具有人情味的，不管是灾难还是体育。

（3）这类报道应优先考虑有关**精英**国家（美国、苏联、西欧等国、日本）与**精英**人群的人情化、冲突化、暴力化、负面化的新闻（坏消息）。

（4）难以得到赞同的新闻价值常常能在实践中显示出来，包括都会中心主义（世界止于伦敦）、**种族主义**、**父权制**（新闻由男人提供、为男人服务、与男人有关）、**自然化**（将文化的/历史的作为自然的予以表述）、**共识**（人人都共享助理编辑与中层管理部门的**世界观**）。

（5）新闻报道不得不诉诸读者/观众的假定兴趣，所以，必须像小说（好故事）那样是**常识**性的、娱乐性的、戏剧性的、刺激性的、可视性的、同娱乐圈和电视有关的。

（6）报道必须能与**制度**性的日常事务相一致，所以，事件必须是日志式的事件（政党大会、周年纪念日、年度报告等），或已在其他的新闻广播、报刊发布或通讯社报道中得到报道。

JH

互文参阅：符码（code），框架（frame），职业观（occupational ideology），专业（profession）。

深入阅读：Cohen and Young（eds）（1981）；Chibnall（1977）；Hartley（1982）；Hall *et al*.（1978）。

噪音（noise）　＊ 出自**传播论**与**信息**论的一个概念：指任何加诸编码者与解码者间之**信号**的干扰，这种干扰使准确的解码更为困难，是差错的主要根

源。* 噪音有两大类型：

（1）机械性噪音：这是信道上的噪音，比如，收音机里的静电噪声，电视图像上的雪花，英国火车站里播放通知时的声音失真，结巴或口吃。

（2）符号学噪音：这种噪音是由意义失调（dissonance）而产生的讯息干扰所致；一般来说，它是由编码者（encoder）与解码者（decoder）的社会差异或文化差异所引起的。行话能形成**符号学**噪音（它能表达"难道我的话不巧妙吗?"、"难道我的意思不是难于理解吗?"或"难道我不是与你这个外人不同吗?"等意思），它能使所欲传达的**讯息**不被准确解码。某种装腔作势的声调也能形成噪音。

噪音遭到**冗余信息**与**反馈**的消解，它是限制某条**信道**传输**信息**之能力的因素之一。

JF

互文参阅：信道（channel），传播论（communication theory），反馈（feedback），信息论（information theory），冗余信息（redunancy），信号（signal）。

深入阅读：Shannon and Weaver（1949）；Merril and Lowenstein（1979）；Sereno and Mortensen（1979）。

非语言传播（non-verbal communication） * 非语言传播是指人们之间不用语言而进行的传播。* 形成非语言传播（NVC）的主要因素如下：

（1）目视（对他人身体与面部的注视程度）
（2）嘴唇（尤与注视有关的笑容或怪相）
（3）姿势（比如，坐姿的前倾或后仰）
（4）手势（谈话时的手臂动作）
（5）倾斜（身体倾向谈话对象）
（6）身体距离（如站得离他人太近或太远）
（7）气味（包括香水）
（8）皮肤（包括色素沉着、光泽与肌理）
（9）头发（包括长度、质地与式样）

（10）衣服（尤指时装）

非语言传播完全不同于“体语”（body language）；因为，一旦提到语言就必定涉及某种公认的、可以确认的语法及句法。而NVC并不总像语言那么清楚或发达；非语言**符号**的词汇比言说更受限制。即使如此，以为NVC孤立于言说则是错误的。相反，可以想像在词语与身体信号之间有某种复杂的互动，而这种互动并不总是互补（complementary）。想像一下你与一位求职者交谈的情形。你大概不会把工作提供给这样一位候选人吧：他不肯看着你，一直紧皱眉头，两肩肌肉隆起，汗流不止，还留着一个印第安马希坎部落（Mohican）的发型——尽管他对你的问题做出富于思想与饶有趣味的回答。正如Argyle（1978）所强调的，体语或NVC可能是个错综复杂的过程。

让我们以目视为例来讨论一下。双方的目视（两个人互相看着对方的眼睛）可以是一种喜欢的符号，但总盯着人看就会让人不舒服了。比如，戈夫曼[①]（1969）曾描述了偏执的美国白人看着黑人的“仇恨凝视”。这种直接的目光接触违反某种观看的**符码**，即目视应时断时续，从而导致受害者人格解体（depersonalization），因为挑衅者有意打破受害者所尊奉的**规则**。目视常因瞳孔的大小、眉毛的弯曲与动作以及笑容而得到强化。张大的瞳孔、专注的观看（直接的凝视）、微笑以及“眉毛的闪动”，一般都同性的吸引相关。

在NVC中，有许多**文化**上的决定因素与变异形式。比如，Mehrabian（1972）发现，在美国的犹太人与意大利人的**群体**中，典型的手势就有所不同。同样的差异也可从身体距离上看出，这种距离常被说成个人空间（参阅**空间关系学**），即与他人互动时每个个体所愿保持的距离。

关于非语言行为，不能进行简单的预测。它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人们之间的关系类型与传播类型。进行亲密而愉快的交谈，必须考虑我们自己

---

① E·戈夫曼（Erving Goffman，1922－1982），美国社会学家，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拟剧论的提出者。按照拟剧论，人生犹如演戏，社会好似舞台，每个人都分别扮演一定的角色。其间，又有“前台”（front stage）与“后台”（back stage）之分。活动在前台的是主我（I），退到后台的是宾我（me）。主我演绎着人生的戏剧，宾我则从这出戏剧中抽身出来，获得片刻的休整。

所处的有关情景。用自己的身体说话时，似乎往往在寻求某种传播的平衡。这里主要考虑的是回应问题，即以身体回答他人的身体询问。双方之间的微妙协商，被想像为贯穿始终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对他人动作的不断监视与自我调节：回应由此得到保证。如果某些我们刚刚认识的人站得离我们太近，那么我们总想与他们拉开距离。于是，他人可能意识到自己对我们的冒犯，而以怯怯的眼神与通红的表情反映自己的尴尬与歉疚。面对他们的尴尬，我们可能表现同样的尴尬等等。当然，所有这些都将影响语言传播：它或许是一次糟糕透顶的接触。

DS

互文参阅：符码（code），对话（dyad），接触（encounter），面具（facework），人际传播（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副语言（paralanguage），空间关系学（proxemics）。

深入阅读：Argyle（1978）；Mortensen（ed.）（1979）；Corner and Hawthorn(eds)（1989）；Burton and Dimbleby（1988）。

规范（norm/normative） * 那些产生并制约社会互动与社会传播的成套社会规则、标准与期待。* 确认准则的首要标志，在于它们具有正规的约束性与束缚性，或许最好将它们视为任何社会情景下的“可为与不可为”。准则指的是，我们往往依据自己认为合适的、可接受的或一般所期待的情况，确定自己在互动中的**定向性**。就此而言，准则不仅被视为经过协商的互动特征，而且强调的是它们对互动**个体**的制约。这种强调是基于这样的社会观，即迫使外在的“准则化秩序”进入个体的**社会化**过程。

因此，这个概念被视为引发许多相关的问题与讨论。对任何**群体**或社会都可说是普遍的或包罗万象的准则，形成进入这些讨论的一个有效切入点。想想两个不同的社会情景——比如，聚会中与朋友的互动和火车上与陌生人的互动。对这两种情形而言，什么准则可能更通用，什么准则可能对这种情形或另一种情形更独特；有什么明显的冲突或矛盾吗？这些问题凸显了将准则从实际的互动**语境**中剥离出来的困难，因为看似不同并常常矛盾的准则，赋予我们不断进行互动与参与其中的社会群体、**角色**关系与语境以特征。一个次要但又相关的问题是，所有的传播与互动被准则建构与决定的程度。比如，有种观点强调这样的思想，即一切社会行为实际上都倾向于同准则和他人的期待保持一致。这种观点自会主张，**遵从**与社会

秩序得由不同的社会控制与处罚予以保持和加强，这种惩罚常指所谓奖惩。实际上，正是经常通过奖惩的运用，我们才意识到准则的存在，它们在平常情况下确实不易看见或被视为自然而然，除非遭到破坏或违反（比如，在朋友聚会上的行为表现，竟好像把大家都当成火车上的陌生人）。对破坏准则或忽视准则的反应，从轻微的不赞成到愤慨、嘲笑以及一整套正式的与非正式的处罚。不过，这种观点面临两个主要问题。第一，认为所有的社会活动都由准则所制约的倾向，面临致力于创造性的、相对属于解构性的互动活动之挑战（比如，参阅**象征互动论**），即个体不仅遵从准则，而且不断与准则协调，不断打破准则。这里的第二问题涉及准则的定义与强化。准则所代表与支持的是与其他群体相对立的特殊支配群体或权势群体的利益、活动与价值呢，还是说准则代表的是一种基本的社会共识，社会由此而对自己进行制约与再生产呢？

TO

互文参阅：符码（code），遵从（conformity），共识（consensus），异端行为（deviance），制度（institutions），权力（power），规则（rules）。

深入阅读：Bilton *et al*.（1981）；Worsley(ed.)（1977）；Cuff and Payne (eds)（1979）；Browne（1992）。

O

对象（object） ＊对皮尔士[①]来说，对象是符号所指涉的东西，即其“所指”（designatum）。＊皮尔士的对象与索绪尔[②]的**所指**之间差异常常遭到误解。对象可以是一个东西、一个事件或一个概念，存在于该符号作为一个单元所属的意指系统之外——它有一个独立的存在形态。索绪尔的**所指**则是一个与**能指**联系起来以形成一个符号的心理概念，它并不具有独立于它以一个部分所属的符号系统。

JF

互文参阅：思想（interpretant），所指对象（referent），符号（sign），所指（signified）。

客观性（objectivity） ＊据信是由没有偏差的陈述（states）而赋予特征的一种科学取向（approach）。＊客观性是自然科学的一个重要主题。传播研究提出这个问题，是由于那些有志于分析人类行为的学者对那些自然科

① 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1839～1914），又译皮尔斯，美国哲学家、科学家、逻辑学家，实用主义的创始人，被视为美国最有创建和最多才多艺的学者，尽管他生前并不得志。在发展现代逻辑中，皮尔士曾对符号问题做过深刻而独到的论述，为现代符号学与传播学提供了影响深远的思想。比如，他曾经将符号（sign）分为三种，即肖像（icon）、标志（index）与象征（symbol）。

② 索绪尔（Ferdinand Saussure，1857～1913），瑞士杰出的语言学家、现代符号学先驱，其代表作《普通语言学教程》（1916）是他去世后学生们根据笔记以及他的一些手稿等材料编辑整理的。这部里程碑式的著作不仅对现代语言学具有首屈一指的意义，而且对20世纪以来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都产生深远的影响。本辞典所涉及的一系列辞条，特别是结构主义与符号学方面的辞条均与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相关。其中较常见的有“语言/言语”、“能指/所指”、“组合关系/联想关系”、“共时态/历时态”等。

学的仿效。如果我们考虑到**语言**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内在联系，考虑到针对某个事件而产生的无数**知觉**，那么，认为有个外在的现实——它"就在那里"等着被发现这类假定就得打折扣。

不过，追求客观性还是具有显见的益处。大家享用同样证据的做法还是得到鼓励。由于寻求观察结果的前后一致和调查人员的意见统一，许多乍见之下看似客观的证据随后却表明是不准确的、不确定的。这方面，实验室的**实验**或许是最流行的方法。但不幸的是，许多社会化的表述都被理所当然地当成公正的、真实的与客观的。

以每周排名前 40 的单张唱片销售榜（Top 40 Single Charts）为例。乍一看，据说它们在反映任何一周最佳销售量上，似乎具有客观性。但是，人们不可能监视所有的销售情况。所以，就选用音乐店作为调查样本。如果商店的那个销售榜后来泄露给唱片公司——就像 1970 年代发生在英国的情况——那么，很有可能促使某家唱片公司在那些选作样本的商店为某张唱片的销售进行大肆宣传。由于这张唱片的发行情况在销售榜上获得放大，所以，它又可能在广播里得到更多播放。至此，对这一销售榜具有"真实性"的任何信念就必须接受质疑了。

客观性与**偏差**，也是常常出现在新闻与新**闻价值**讨论中的术语。

JF

互文参阅：观察实验法（empiricism），实验（experiment），方法论（methodology），知觉（perception），实证主义（positivism），主观性（subjectivity）。

职业观（occupational ideology） * 某个**专业**或其他多少相关的工作类型的战略性特征（strategics characteristic），从业者由此得以对其精神生产的享用，对这种专业或工作的准入，以及对依其方法、目标及报酬所应有的个人职位上的内聚力（cohesion）保持控制。*

职业观是非正式的符码，尽管它们可能得到拥有相当广泛权力的**制度**性机构（如英国医疗协会）的支持。一旦被正式接纳，某个职业的从业者就得按照职业的期待，以一种自发与常规的方式遵从这个符码——它并不是一本犹如**角色**典范的**规则**手册。职业观的特征在于内行才懂的、专家的语言或行话，这种语言事实上是一种标识与约束这项工作的**话语**。本书就可以被视为一种非同寻常的直率尝试，旨在对传播与文化研究的职业话语

进行具体详细的解说，尽管从这个例子就能明白，仅仅是习得这套符码并不能获得这个职业的认可。

职业观也由非语言的形式予以表述。这方面的一个有趣例子，就是巴尔特①所说的“服饰”（vestimentary）符码——衣服的符码。教授的加长外衣（gown）、律师的假发、医生的听诊器、科学家的白色实验服以及工程师的衣裤连体服等，作为标识与排外性的意义并不亚于其功能。这种情况也可用来说明日常服装与其他类型的服装，它们往往为某些没有正式服装的职业角色所接受。

显然，职业观也包含历史上聚集的知识、**神话**与逸闻，它们都服务于所说**群体**的内部整合、工作流程与普遍的社会/政治利益。所以，它们既可以理解为日常的行为，也可以理解为那些行为的社会结果。但是，某个社会结果可能使这种职业观获得流行：某个职业群体在对其专业话语进行**自然化**上可能比其他群体更为成功，所以，今天看来相当专业的术语，明天就可能作为**常识**而得到表述与流传。

J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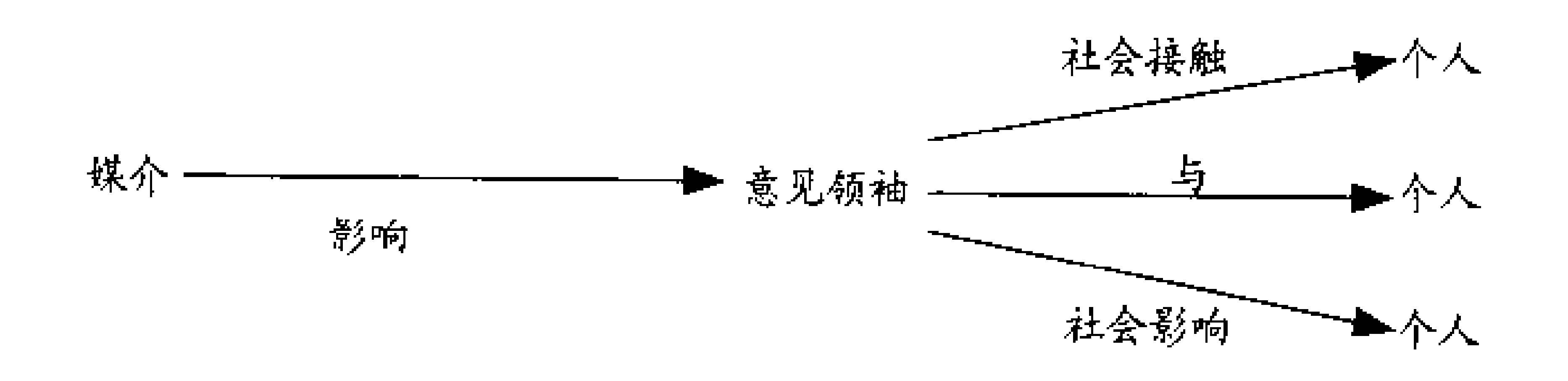
互文参阅：意识形态（ideology），制度（institutions），专业（profession）。

意见领袖（opinion leaders） * 在将媒介讯息传给社会群体的过程中，那些扮演某种有影响力的中介角色者。这个术语源于美国学者对媒介与投票行为所做的研究（拉扎斯菲尔德②等，1944）。 * 意见领袖通常比其同侪更关注媒介报道，然后将相关的信息转述给不直接接触媒介讯息的人。在这

① 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法国结构主义思想家，著名作家、文艺批评家、符号学家，对符号学理论颇多建树，1976 年任法兰西学院符号学讲座教授，成为该讲座的第一位学者。主要著作有《神话集》（1957）、《符号学原理》（1964）、《S/Z》（1970）、《罗兰·巴尔特论罗兰·巴尔特》（1975）、《恋人絮语》（1977）等，这些著作均有中译本。

② 拉扎斯菲尔德（Paul Felix Lazarsfeld，1901～1976），奥地利裔美国社会学家。曾就读于维也纳大学，获应用数学博士学位。1933 年赴美，1940 年开始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他领导的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学研究所，成为社会学实证研究的重镇。其间，他与罗伯特·默顿（Rorbert Merton）合作就大众传播问题做过一系列卓有影响的研究，从而与政治学家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社会心理学家卢因（Kurt Lewin）和霍夫兰（Carl Hovland）并称为传播学的“四大先驱”（W·施拉姆语）。

个过程中，这些意见领袖主动地选择与解释媒介上的材料，担负着媒介与社群之间的重要"向导"；他们将媒介里的现实"翻译"成当地**群体**的经验。这个术语的提出进一步显示了媒介**效果**的**皮下注射模式**及其同类模式之趋于没落，与它相关的**两级传播模式**力图将大众媒介的影响与现存社会关系的动力与结构联系起来考察。



TO

互文参阅：效果（effect），群体（group），皮下注射模式（hypodermic needle model），两级传播模式（two-step flow model）。

深入阅读：Lazarsfeld *et al.*（1944）；Karz and Lazarsfeld（1955）；McQuail and Windahl（1981）①。

口述（orality） ＊ 言说（speech）所具有的特征；某种以言说凌驾于其他种种表意形式（forms of signification）为基本特征的文化。＊ 与**书写文化**相反，口述一般是指某种**文化**的生活内容中那些致力于口头**语言**资源的方面。这些方面可能包含组织思想（**神话**）或者知识（**魔法**）的种种正式方法；也可能同确定意义与传播意义的**修辞**系统及其他系统关联。

认为在社会意识与个体意识层面上，口述文化完全不同于书写文化的思想同马歇尔·麦克卢汉②相关，并可能由Ong（1982）所延续。对思想的口述化系统进行分析多年来一直吸引着社会人类学家，对此列维·斯特

① 即D·麦奎尔等《大众传播模式论》（*Communication Models*），中译本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1987）。

② 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1911～1980），加拿大传播理论家，从1946年起一直执教于多伦多大学，1952年任英语文学教授，1963年任该校文化与技术中心主任。他的传播理论以奇崛著称，如其代表作《理解媒介：人的延伸》（1964），曾提出一个著名命题——"媒介即讯息"（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

劳斯[1]（参阅利奇[2]，1976；斯特罗克[3]，1979）的著述或许做出最佳阐释，其结构主义方法对西方有关"原始"神话的思考产生革命性影响，他把这些神话作为适合口述社会的某种理性化形式进行分析。

在工业化社会中，书写尽管得到官方提倡，从而无所不在，但在某些决定性的文化领域还不得不同永久不变的口述并存——其中最明显的或许就数幼儿的早期社会化。

JH

互文参阅：书写文化（literacy）。

东方学（orientalism） ＊ 将东方文化与人民当做"异域风物"（foreign）——在西方的观看或凝视中常常作为异己对象或奇异对象而展开的历史建构。＊ 这个概念与爱德华·萨伊德[4]影响广泛的专著相联，他将东方学确定为18世纪以来西方对待东方的态度与写作上一个关键性特征。最好是将东方学理解为一种话语，它既臆断又促进了西方的"我们"与东方的"他们"——同东方的、亚洲的渊源与传统有关的文化与

---

① 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1908～ ），法国社会人类学家、1960年代结构主义思潮的先驱之一，他的人类学研究对当代学术思想产生十分广泛的影响，堪称一代宗师。早年在巴西从事印第安文化的田野调查，1940年代初在纽约做访问教授期间受到结构主义语言学家雅格布森的影响，从1950年到1974年一直执教于巴黎大学，1959年当选法兰西学院的社会人类学院士。其代表作有《忧郁的热带》（1955）、《结构主义人类学》（1958）、《图腾崇拜》（1962）、4卷《神话研究》等。他把文化视为一个传播系统，进而按照结构主义语言学建构了文化传播的模式。

② 埃德蒙·利奇（Edmund Leach，1910～1989），英国结构主义人类学家，长期执教于剑桥大学，曾任剑桥大学国王学院院长。1937年，曾在我国台湾做过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工作。在《列维-斯特劳斯》（1970）、《文化与传播》（1976）、《社会人类学》（1982）等著作中，他系统而清晰地阐述了结构主义人类学理论，并为传播学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③ 约翰·斯特罗克（John Sturrock），英国《泰晤士文学增刊》副主编，由他所编的《结构主义以来：从列维-斯特劳斯到德里达》（牛津大学出版社1979年），是有关结构主义思潮发生、发展及演化的一部权威著作，1998年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其中译本。

④ 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1935～ ），生于耶路撒冷的阿拉伯裔美国学者，后殖民主义思潮的重镇，1963年以来一直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为国际知名的文学和文化批评家。他的代表作《东方学》（1978）一经问世，即获得世界性的反响，甚至被誉为影响当今学术方向的三部标志性著作之一（刘禾）。

人民——存在某种根本**差异**的意识。东方学的话语建立在由西方的作家、学者、官员及政治家所秉持的特定意识形态假定之上，历史性地体现在复杂的社会与政治实践中，而西方社会利用这些实践得以支配东方及东方文化，并获得对它们的权威。

不应把东方学理解为赤裸裸的**种族**主义或沙文主义，尽管它们可能赋予东方学以相关的价值观或假定。按照萨伊德的说法，它指的是种种传播实践，如系列化的旅行作品和新闻作品，学术性或政治性的解释，它们都力图向西方受众传达对东方现象的**客观性**分析。这些说法的一个特征是它们都倾向于将东方人性化（dehumanize），将东方作为一个固定的、不变的**他人**进行表述，而这种他人缺乏**主体性**与内在多样性，浓缩在相对西方意识与文化的二元对立之中。在这些与其他形式中，萨伊德认为东方学的话语最终显示的与其说是东方学所指涉的东方国家的特征，不如说是观看、研究以及力求施加规则于它们的西方群体的**意识**与**文化**。作为一组用于理解"陌生者"——东方——的历史观念，它们更多显示着"我们的世界"—— 西方欧洲文化的偏见与结构。在近来有关海湾战争与伊斯兰世界等中东报道的研究中，在针对当代旅行与旅游写作的分析上，东方学成为一个重要主题。

TO

深入阅读：Said（1978）[①]，Mills（1991）。

定向性（orientation） * 某种言语或其他表意行为（signifying performance）或文本中的符号所具有的一种**属性**；将这些符号组合起来以表达说者与听者关系的方式。*

符号学已表明，没有什么**符号**"具有"某种它所传达的固定意义或内在意义，相反，符号是从符号系统的系统化结构中获得其**意指**能力的，其中每个符号都只是作为某种区别性元素而得到确认。因此，抽象的系统（**语言**［langue］）生成具体的言谈（**言语**）。不过，每个言谈不仅根据语言的规则进行*内部建构*，而且也表现着说者与听者的某种社会关系——符号被定向于各方彼此相向的立场。

在**对话性**的言说层面，这种现象比较简单，没有争议——你说什么与你

① 即E·萨义德的《东方学》（*Orientalism*），中译本由三联书店出版（1999）。

怎么说，都依赖你与对方的关系。比如，她/他可能多少比你更有权势，或你对他/她多少更熟悉一点。但定向性是所有表达形态的特征，包括说者不知道听者是谁而听者同样不知道说者是谁的写作形态、印刷形态或广播形态。至此，这个概念的意味就已经清楚。定向性是表达形态本身的属性，而不是"外在于"它的实际各方之意图或经验的属性。因此，口头表达与**文本**可以经过分析而显示其定向性——它们可以显示符号的意味或**倾向性解读**的读者/听者，还可以显示这个表达由以发出的立场。由此说来，这种语境中的说者与听者都不属于个人，他们本身均属文本化的现象。

JH

互文参阅：对话性（dialogic），倾向性解读（preferred reading）。

他人：表意化他人与普遍化他人（other：significant and generalized other）

* 位于自我之外而与某个或多个其他个体相联系的象征化存在（symbol entity）。* 这个概念由米德①（1934）提出，同**象征互动论**的视角尤为相关，因为这个理论的重点在于自我与他人（以及同化于自我的他人）之间的传播。这种传播并不总是发生于面对面的接触。他人可以是真实的人物，也可以是虚构的角色。

也许，最早意识到他人存在是儿童将自我与非我（not-self）加以区别之际。然后，非我这个宽泛的范畴，又根据习得的他人差异而被逐步细分。最后，他人就指参与象征互动或有能力参与象征互动的人。此外，某些他人的行为似乎始终如一，并对自我的行为表现出特定的期待。

许多研究者都对儿童在自我与表意化他人方面逐渐形成的关系尤感兴趣。成人的奖惩行为，影响儿童的**社会化**、**语言**发展及**动机**。比如，在**精神分析理论**中，研究的焦点在于表意化他人是否使儿童受挫或满足。一开始，他们可能被判定为或好或坏，但这可能为随后对他人与自我的评判开

① Q·H·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1863～1931），美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实用主义代表人物，芝加哥学派奠基人，该学派以象征互动论著称。米德平生著述虽然不多，但身后由其学生编辑整理的《心智、自我与社会》（*Mind，Self，and Society*）却是一部社会学经典。他的主要学术贡献之一，是对自我起源的论述。他将"自我"（self）划分为"主我"（I）与"宾我"（me），而不论主我还是宾我都是在社会化的互动过程中形成的，这种互动过程主要通过象征（symbol）或符号进行的，比如语言就是一套象征系统。

启了一条线路。甚至这种表意化他人经由对自我的批评，而为评估、反省与良心提供了基础。日益增加的语言经验与涉及他人的象征行为，使人认识到表意化他人是某些更大**群体**的代表。由此说来，就有可能从识别表意化他人到逐渐认识许多普遍化他人。

尽管他人这个概念在讨论社会化与**互动**的经验上证明很有价值，但它在许多方面也受到批评。从非常极端的层面讲，它成为某种社会**行为主义**观的组成部分，认为他人通过奖惩而完全塑造、控制与决定着自我。而从比较一般的层面上讲，也没有多少证据显示在人生的某个时段表意化他人因普遍化他人而增加。表意化他人与普遍化他人的互动关系贯穿一生，尽管它们很难得到确认。

DS

互文参阅：初级群体（primary group）、象征互动论（symbolic interactionism）。

深入阅读：Schellenberg（1978）；Cuff and Payne（eds）（1979）；Laing（1969）。

P

联想关系（paradigm） ＊所谓联想关系就是一组同类元素（units），其中某个可能被选出的元素可以同选自其他联想关系的元素共同组成一个**组合关系**（即由各种元素合成的一个表意整体）。[①] ＊语言的联想维度涉及的是选择问题，而组合维度关乎的是合成问题。按照索绪尔[②]的语言学，所有的**语言与符码**都建筑在由这两个维度所构成的坐标上。字母表就属于一种联想关系，从中选出的字母可以组合起来以形成书写词语（组合关系）。某人的所有行头也形成若干联想关系，如针对衬衫、领带、袜子等系列的联想关系，将它们加以合成就形成一个组合关系（即他当天的穿着）。一个路标属于一个组合关系，它由两个联想关系（一为符号的形状，一为其中的象征）的元素所构成。

由此说来，一个联想关系就是一组总体上具有谱系相似性的元素。其中，每个元素都必须同其他元素相区别而获得意义。也就是说，其意义是由它与同一联想关系中未被选出的其他元素的关系而界定的。在外行人的

---

① 这里所谓的联想关系与组合关系，乃系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一对著名范畴，对20世纪以来的人文社会科学（包括语言学与传播学）均产生广泛影响。以“僧敲月下门”为例，其中五个词前后相续的关系就是组合关系，而每个词又都有自己的同类词，如与“敲”相对的有“推”、“拍”、“打”等，与“门”相对的有“户”、“窗”、“牖”等，而这些同类字词就属于联想关系。

② 索绪尔（Ferdinand Saussure,1857～1913），瑞士杰出的语言学家、现代符号学先驱，其代表作《普通语言学教程》（1916）是他去世后学生们根据笔记以及他的一些手稿等材料编辑整理的，这部里程碑式的著作不仅对现代语言学具有首屈一指的意义，而且对20世纪以来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都产生深远的影响。本辞典所涉及的一系列辞条，特别是结构主义与符号学方面的辞条均与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相关。其中较常见的有“语言/言语”、“能指/所指”、“组合关系/联想关系”、“共时态/历时态”等。

"农场动物"这个联想关系中，母牛元素所表示的农场动物是同马、猪、羊相区别的，而在农民的联想关系中它则表示不同的事物，因为它是同小母牛（*heifer*）、小公牛（*steer*）、阉牛（*bullock*）相区别的。

联想关系在同一文化的成员中一般可以共享，因为它们属于语言（langue）的领域。而组合关系则是为具体情景而创造的独特组合，它们属于言语方面的个案。

JF

互文参阅：选择（choice），换码测验（commutation text），隐喻（metaphor），组合关系（syntagm）。

深入阅读：Fiske（1982）①。

副语言（paralanguage） * 基于口头性表达但又不是非语言表达的传播。* 公认的副语言类型如下所示：

（1）音调（低—高声调，就像音乐里的低音—高音）

（2）语速（声音的频率与常规形态，比如，慢条斯理或吞吞吐吐的讲话与急急火火或噼里啪啦的讲话）

（3）音色（声音的音质与特性，如沙哑—洪亮的声音）

（4）音量（声音的强度，从窃窃私语到尖声呼叫或大喊大叫）

从说什么与怎么说的对比关系上，去思考语言与副语言过程的区别比较有效。

DS

互文参阅：语言（language），非语言传播（non-verbal communication）。

深入阅读：Myers and Myers（1976）。

---

① 即J·费斯克的《传播研究引论》（*Introduction to Communication Studies*），中译本收入台湾远流出版公司的"传播学名著译丛"（1995），名为《传播符号学理论》（张锦华译）

言语（parole） ＊依照索绪尔[1]的语言学理论，言语是指说话的行为。＊索绪尔用这个术语是想将言说中那些可变的、偶发的内容剥离出来，进而将其从语言学研究的核心排除出去。这个意义上的言语，需要同与其相对的术语即**语言**（langue）联系起来才能理解。言语代表着个人的、具体的言说活动；而语言则是构成其基础的抽象系统。尽管人们说话时的实际所为对生理学家或行为心理学家可能饶有趣味，但是，它不能形成语言学研究的基础，因为——在索绪尔看来——它太受制于任意随机（random）的变化。相反，语言学应该专注于潜在的规则与习俗，它们使言语活动成为可能，并确保它的可理解性。

语言系统与言语活动，仍然存在密切而互补的关系。言语活动可被视为形成于语言的潜在系统被不断凿实的过程；而言说活动的不断进行又对语言系统进行确认与调整，逐渐将它塑造成某种不同的形态。没有哪个个体能够控制或塑造语言；但是，一代代的言说者却能够而且的确使语言从某种特定的历史形态转变为另一种形态。

语言与言语同许多从索绪尔 1906 至 1911 年授课中发展出的术语一样，在 1960 年代到 1970 年代间，随着研究符号系统的符号学之兴起而重新风行。在这种研究中，某一特定的电影或时装可能被当作言语式的个别表达，从而同电影语言或时装符码中的潜在系统形成对比。如此使用这个术语的困难在于，很难想出办法使作为**意指**系统的电影可以不必通过其言语而得到研究，而语言由于其心理基础则通过自省即可获得更为普遍性的研究。

MM

互文参阅：符码（code），语言能力（competence），语言（langue），语言行为（performance）。

深入阅读：Saussure（1974）[2]；Culler（1976）；Montgomery（1986）。

---

① 索绪尔（Ferdinand Saussure，1857～1913），瑞士杰出的语言学家、现代符号学先驱，其代表作《普通语言学教程》（1916）是他去世后学生们根据笔记以及他的一些手稿等材料编辑整理的。这部里程碑式的著作不仅对现代语言学具有首屈一指的意义，而且对 20 世纪以来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都产生深远的影响。本辞典所涉及的一系列辞条，特别是结构主义与符号学方面的辞条均与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相关。其中较常见的有“语言/言语”、“能指/所指”、“组合关系/联想关系”、“共时态/历时态”等。

② 即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译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80）。

参与式观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 ＊ 被设计用来在一种非—实验室语境中收集信息的技术或过程，而这种语境至少部分取决于观察者的在场。＊因此，参与式观察是社会研究的一种**方法论**。其主要优势在于，它允许自我以群体一员的身份对**群体**进行观察。而其主要劣势在于，参与者可能将他或她的**价值**加诸观察过程，而如果参与观察者不公开他或她的真实身份，那么会构成有意欺骗的道德的问题。有个经典的例子是对某宗教群**体**的实际渗透，这个群体预言世界将于 1954 年 12 月 21 日终结，这项参与式观察就是记录那天平安度过时其信徒的谈话（Festinger 1957）。为了收集这类信息，研究者不得不装扮成皈依该教的群体成员，而他们是真诚相信其教主的末日预言。

与此相对，*田野调查*（*field observation*）既确保研究者同群**体**的接触，又不必成为群体的成员。在社会人类学领域可以见到许多田野调查的例子，其间某个亲密的群落将由某位得到容忍的外人给予描述。在近来的**文化研究**中，参与式观察也获得某种青睐（参阅 Willis，1978）。无论何时，只要转述化的互动活动是由田野调查者或参与式观察者所提供，那么有违**客观性**的指责（即参与式观察的记录站不住脚，因为其作者所观察的仅仅是那些她/他想要观察的）就频繁不断。将这种观察同更受控制、更具**实验观察法**的**实验**语境进行对比，这种情形就尤为突出。

DS

互文参阅：人种志（ethnography），方法论（methodology），客观性（objectivity）。

深入阅读：Festinger（1957）；Willis（1978）；Shimanoff（1980）；Aronson(ed.)（1988）。

父权制（patriarchy） ＊ 男人对女人的结构性、制度性与历史性的支配与利用。＊最早，这个术语仅用于指涉特定类型的部落、**群体**、家庭或家族等，它们的特征都在于有一位支配性的男性统治者即家长（patriarch），他具有控制这个群体及其社会关系的决断权。以家庭为例，家长就是将父亲的**权力**与男人的支配权合为一体。如今，这个术语的涵义更为广泛、更为普遍，它被用来指那种同**性别**关系、**制度**与社会进程有关的全方位社会组织，这种组织将女人作为在社会、政治与性方面附属于男人的东西而进

行生产与再生产。

这里有几个关键性问题值得强调。第一个问题是将父权制确认为一种体制的重要性。换言之，我们自身对性别身份的个体与主体意识，即身为女人或男人的意识——及其意味——归根结底是在某种体制的历史性结构中形成的，这种结构赋予男人凌驾于女人的权力。正如许多女性主义作家所言，父权制并不只是一种男女之间存在差异的体制，这些差异是被组织成某种依附与支配的结构性关系，这种关系在历史上得到一代又一代的再生产。

这样一种体制作为其历史性存在的首要条件之一而被极度**自然化**。结果，人们常以为男女的社会地位与社会权力由生物性所决定：比如，对男人来说支配与决断是“自然的”，而对女人来说顺从或痴情是“自然的”。这里，重要的是**凸显性**（sex）与性别（gender）的不同。性的差异是指男性与女性之间主要由遗传所决定的生理上的基本差别。而性别的差异则是由**文化**所决定的，其形式从一种文化语境到另一种文化语境可能相差悬殊。依据自身的社会与历史情景所具有的文化规则与符码，人们在性别的认同上被**社会化**成不同的类型与关系。这个过程并非由自然所决定，而父权制导致这样一种事实，即在许多著名的社会与文化中，男人都比女人拥有更大的权力与权威，并对女人实施权力。某些学者可能认为，男性对女性的压迫一直都是所有人类社会的一个特征。而与此相反，另外一些学者则主张父权制是在特定的物质条件与政治条件下出现的。不过，这两种观点都一致认为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生产方式的变化有助于在重要方面对男人权力的扩大化与法定化。比如，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力重组就拒绝给予女人以平等参与的机会，她们被限制在家庭的家务劳动中，从事受轻视、无报酬的各种劳动。资本主义国家的出现使男性户主对“其财产”的权力得到强化与合法化，这些财产不仅包括住所，而且包括生活于其中的女人与孩子。因此，许多学者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妇女由于这种结构以及父权体制与资本体制的相互联系而“加倍受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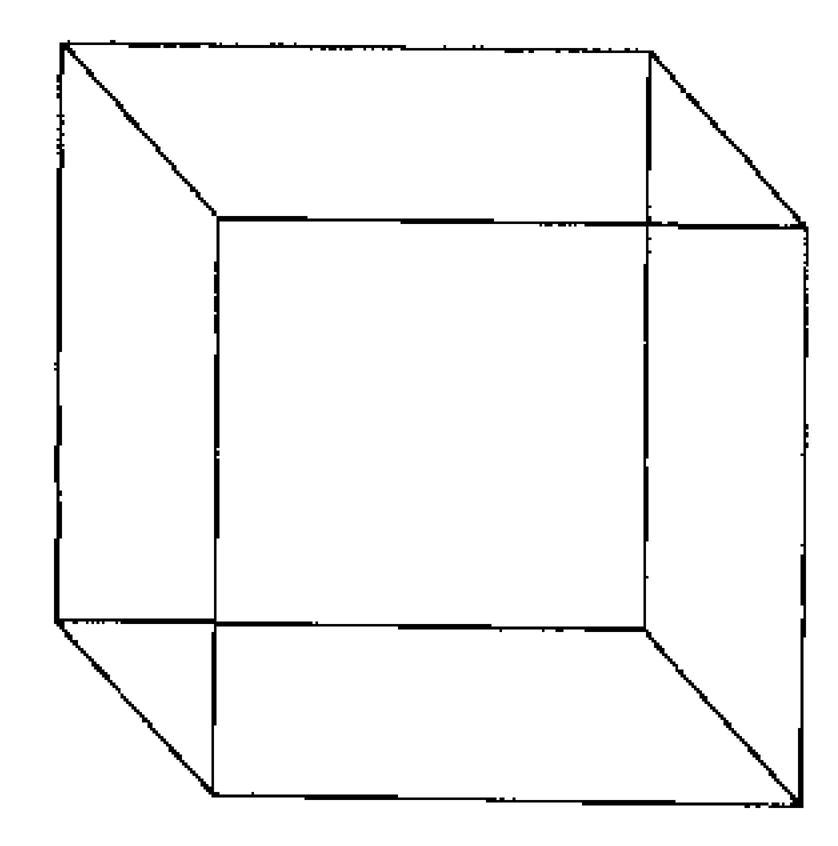
以一切形式展开并保持对父权制的一致批判，一直都是妇女运动与女性主义的大业。这场斗争旨在建构男女之间的全新关系，转变生产与政治权力上的社会关系。这一挑战不得不面对父权制关系在传播、文化及制度进程中的生产与再生产。比如，**语言**的研究（Spender 1985；Mills 1990）与媒介**表述**的研究（Root 1984），就为这种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焦点。

TO

互文参阅：文化（culture），性别（gender），权力（power）。
深入阅读：French（1986）；Hearn（1987）。

知觉(perception) ＊感官活动的初始意识；表明对周围刺激或事件产生意识与加以解释的过程。＊知觉不同于感觉（sensation），后者是指感受器（sense receptors）被触发的一种被动过程，而知觉则表示对来自整个直观世界的材料进行主动的选择与理解。

知觉也不同于注意（attention）。后者是指在某种更明确的知觉基础上所体现的明了状态或高度敏感状态。知觉为信息——经过感觉过程而被筛选的信息——提供基础，从而支持并指导随后的观察（monitoring）。知觉若想把握任何完型（configuration）[①]，就得大量依赖以前的知识、经验与记忆。把知觉想像为这样一个过程，即由此我们的感官赋予我们有关世界的信息，则过于简单化。这个过程不像那么简单。



哲学上任何解释客观现实的努力，都不断涉及有关世界的知识或证据的基础：人们的知觉在个体与文化间相差很大—— 可能是由于语言的差异所致。这就提出某种解释与另一种解释比较之际的准确性问题。一种结论认为，一切知识基本都是不确定的，甚或是虚幻的，因为一切答案都基于不同的证据，而这些证据又出自由不同语言所赋予的不同意义。这样的讨论不可避免地涉及对意义、结构、形象、符号及象征的估量，并成为传播

① 参见“完形”

研究的核心。

许多借助实验室与**跨文化**分析的心理学理论与研究，一直关注知觉的个体差异。如**行为主义**与新行为主义学者就强调，在学习过程中知觉的形成非常重要；因此，不同的解释可以归因于接受者文化语境的差异。具体的知觉研究包括，对视觉错觉与含混刺激（盯着下图看几分钟——你能看见两个立方体还是一个）的研究，还有言语知觉的研究。

DS

互文参阅：意识（consciousness），语言（language），记忆（memory），动机（符号的）（motivation, of the sign），客观性（objectivity），阈下意识（subliminal）。

深入阅读：Neisser（1976）；Gregory, Lindsay and Norman（1977）；Corner and Hawthorn（1989）；Roth and Frisby（1986）。

表演（performance）　* 有关自我的符号学。* 表演这个概念在近来的文化分析中安营扎寨：它既涵盖**制度**化、专业化的表演（戏剧、**礼仪**），又指对个体的自我表现与互相影响所做的非心理学探究。

作为一种通用的分析范畴，对表演的诉求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它的无所不包性：这个术语不仅用于指演员以及其他专业人士的行为，而且也指日常生活中不经排练的文化实践之“表演”，其中特别是**受众**、旁观者与读者的行为。尽管日常生活中的表演明显不同于大规模的剧场表演或媒介表演，但是，两者还是存在大量可以对比的联系。你可能对比分析过虚构性表演与政治性表演的差异（戏剧与政治）；表演手法的差异（**自然主义**与礼仪化）；媒介的差异（电影与电视）；**类型**的差异（肥皂剧与莎士比亚戏剧），等等。

第二，表演这个概念将研究的注意力不仅引向特定表演者的内在心理状态甚或行为，而且引向适合于特定表演类型的、受制规则的正式行为。如果你以这种方式开始看待寻常的**接触**，从医患对话到电话交谈，那么就能懂得其中的表演性礼仪。在对空间、动作、声音、时间、话题、姿势、气味以及其他表演项目进行操纵方面，这些礼仪都需要技巧与创新。

这个术语的一种专门用法出现于乔姆斯基的语言学，即与他所说的**语言能力**相对的语言行为（verbal performance）（参阅下面的辞条）。

JH

互文参阅：拟剧论（dramaturgy），面具（facework）。

语言行为（performance，linguistic） ＊实际的言语行为。＊这个术语被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①]用来指称言说性活动，以便与潜在的语言知识相对。按照乔姆斯基的论述，语言行为不能成为语言学研究的核心，因为日常言说行为被如下因素所损坏：假初学者[②]、口误、未完成句及语法错误等。这些表现性错误，不能为系统语言学描写提供可靠的基础，因为——按照乔姆斯基的说法——它们如同资料都是退化的（degenerate）。因此，乔姆斯基认为，语言学描写的核心不应是实际的行为，而应是缄默的知识与直觉——它们能使我们分清何为“错误”的言说，何为形式完美、合乎语法的言说。对**语言能力**的这种重视，使乔姆斯基将语言中的心理与认知基础作为普遍的人类能力予以强调。不过，日常的具体言说又因此遭到相应的忽视，被完全留给相似的学科如社会学（更关注具体的**交谈分析**）、人种志与社会语言学。令人吃惊的是，这些学科领域所做的大量研究都认为，许多这种特征（诸如假初学者或自我修正）都为语言学研究提供了一种系统化的基础，而这些特征却是乔姆斯基希望作为语言生成中的任意性错误而排除在考虑之外的。这就使某些论者拒绝他的这种划分或代之以另一种划分，比如*传播能力*（*communicative competence*）与*语法能力*（*grammatical competence*）。

MM

互文参阅：语言能力（competence），语言（langue），言语（parole）。
深入阅读：Chomsky（1965）；Hymes（1974）。

---

① 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1928～ ），美国语言学家、政治活动家，语言学上著名的“转换生成理论”的创始人，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代表作《句法结构》（1957）已成为语言学经典。同索绪尔的“语言”（langue）与“言语”（parole）的划分相似，他也提出“语言能力”（competence）与“语言行为”（performance）的对立——前者是隐含的语言知识而后者是具体的言说行为。另外，自1960年代以来，他始终反对美国以越战为开端的一系列侵略、扩张及霸权行径，由此赢得广泛的国际声誉。

② 假初学者（false start），即预先接受过一点语言知识的人，但其语言的应用能力又过于有限，因此常被归入没有接受过任何语言知识的初学者群中，如同初学者一样被对待。因此他们是“假的初学者”。

说服（persuasion）　＊由某一外在机构（agency）对观念、信仰、价值或态度所着意施加的影响。＊关于广告、政党、军方与宗教**制度**上的着意说服问题，Merton（1946）、Brown（1972）与Dyer（1982）已做过详尽论述。许多社会学研究一直专注于探讨社会中有权有势的**精英**对媒介的控制，这些精英可以通过对信息的建构、操纵或**检查**而最终遮蔽真实的事态，并展现有利于其控制性地位与利益的**形象**。

尽管心理学研究对说服的政治与商业背景也有所意识，但它们主要关注的还是分析与解释说服的过程。关键是注意这种研究也为许多说服性活动提供了战略性建议。1960与1970年代，这类建议往往与公共信息的宣传**运动**相联系：比如，反对**种族偏见**、实现饮用水的氟化与增加安全带的使用等（参阅Aronson,1988）。

尽管这种社会与卫生运动仍在继续（特别是针对艾滋病与环保问题），但是，更隐秘的用途一直都在于将政党推销给选民，以达到说服他们的目的（Atkinson 1984）。这里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国家对有选择的问题予以支持是否能够在说服运动上确立优先地位，从而推翻与超越多数商业化说服技巧的标准与伦理？

说服运动的一个不可避免的方面涉及态度的变化：即针对同一对象或事件的现存**态度**由不同态度所扭转、修改或完全取代。争论的焦点在于，由比如大众媒介所导致的、可能发生的态度变化究竟有多牢固、多持久。正如Brown（1972）所强调的，媒介里的广告为态度改变的讨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因为，“它所满足的需要要么非常肤浅而毫无价值，要么植根很深而无所不在”（P. 190）。

这里的看法是，媒介可以改变次要问题上的态度，但不可能对深心所持的态度产生多么强有力的影响。举例来说，某种洗涤剂的广告可能对我们下次选择这个牌子的产品产生直接的影响。但若声称某个政党的广播宣传将对我们在大选中的投票行为发生影响则远为困难。

DS

互文参阅：运动（compaign），遵从（conformity），宣传（propaganda），阈下意识（subliminal）。

深入阅读：Freedman *et al.*（1981）；Brown（1972）；Dyer（1982）；

Atkinson（1984）；Packard（1970）；DeFleur and Ball-Rokeach (1982)[①]；Aronson（ed.）（1988）；Roloff and Miller（eds）（1980）。

社交传播（phatic communication） * 旨在保持与加强社会关系而非传递**信息**、产生初始性或创造性**文本**的传播。* 它属于**冗余信息**，其形式取决于社会化与文本化的**惯例**，它依赖于共同的社会与文化经验。

许多随意的交谈、多数的民间艺术、礼貌行为等均属社交传播。**大众文化**大多具有某种重要的社交传播功能，正如朋客或嬉皮士之类**亚文化**所具有的服装风格、语言类型与音乐趣味。社交传播有助于将文化与共同体（communities）整合起来，因为，它是表达其共同的趣味、期望及经验的方法，所以，也是认同与确定其文化身份的方法。按照雅格布森[②]的论述，某一**讯息**的社交功能具有面向这一**信道**的**定向性**，这种功能就是确立与保持同受话者的接触。

JF

互文参阅：惯例（convention），冗余信息（redundancy）。

音位/语音（phonemic/phonetic） * 对某一表意系统（signifying system）中两类元素所做的有用的概念化区分——其中一类能够产生意义，而另一类则不能。* 这些术语出自语言学，但适用于任何符号系统。在语言学里，音位是指一组有限的声音（英语里大约有 40 个），作为这种声音系统的组成部分而得到*识别*（recognize）。口语表达的基础即在于选择与组合这些受制某一规则之序列（order）的一组组音位。

另一方面，语音则描述的是说话者实际发出的声音。语音的要点有两个：

---

① 即 M·德弗勒等《大众传播诸论》（*Theories of Mass Communication*），中译本由新华出版社出版（1990）。

② 雅格布森（Roman Jakobson，1896～1982），原籍俄国的语言学家，“布拉格学派”的主要奠基人。早年曾任莫斯科“高等戏剧学校”俄语教授，1920 年代在布拉格开创了语言学研究的布拉格学派。1941 年流亡美国，先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后任哈佛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与普通语言学教授（1949～1967）。他的研究不仅对现代语言学建树颇丰，而且对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也影响广泛。特别是他所创立的布拉格学派，一方面前承索绪尔的开创性工作，另一方面又后启 1960 年代法国结构主义的一脉思潮。

（1）每个说话者都会使用其生理的、地域的、语境的和其他的资源，以便在通用的语音中形成一种独一无二的口音。没有谁说“我”的方式会同任何其他人相同，但是当某个本国人说“我”的时候，这个语言共同体的每个人都会听出“我”这个音。

（2）所有的语言都能识别实际上不同的“同样”语音。比如，“k”音在说出的词语“kin”与“ink”里，对说话者与听话者来说听起来都是“同样”的。但实际上它们是不同的声音，形成于口腔中略微不同的部位。请试着说一下。

关于这一概念化区分的要点也有两个：

（1）如果我们关注所有人实际发出的声音，而非由这种语言所识别的声音，那么我们能够理解一切的机会就微乎其微——因为声音存在如此众多的差异。

（2）**语言**（与现实相对）的力量如此强大，离开语言中可以识别的元素我们很难把握任何东西：你可能断不赞同“k”的发音存在差异——但示波器会将它辨认出来。

语言的这种特性并不神秘。按照索绪尔的理论，我们可以说音位是抽象的，它们属于**语言**（langue），而语音是具体的，它们属于**言语**。

JH

互文参阅：差异（difference），音系学（phonology）。
深入阅读：Hawkes（1977）①。

音系学（phonology） ＊致力研究某种**语言**之音型（sound patterns）的语言学分支。＊人类的发声器官能够发出极为丰富的不同声音。然而，每种语言只是依赖这些声音中一小部分以达到传播的效果。音系学旨在考察哪些特殊的声音元素，构成某种语言中富有意义的基本组合。于是，它先得

① 即T·霍克斯的《结构主义与符号学》（*Structuralism and Semiotics*），中译本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1987）。

根据这样的原则确立各种对比的声音：即对任何语言来说，某些声音会引起词语意义的变化，而其他声音则不会。以英语为例，如果我们把/pig/的第一个音从/p/改为/b/，那么结果我们就会把一个词变成另一词——从猪(pig）变成大(big)。用这种所谓“最小对举法”（the minimal pairs test）进行测试，就有可能发现哪种替代性的声音能够引起意义的差异。而意义的每一变化，都将某种语言的基本声音结构中某个新的元素剥离出来，这种元素就是所谓**音位**。例如下面这些最小对举：

pig 与 big 的对举，就将音位/p/与/b/剥离出来
pig 与 pin 的对举，就将音位/g/与/n/剥离出来
ten 与 den 的对举，就将音位/t/与/d/剥离出来
rip 与 lip 的对举，就将音位/r/与/l/剥离出来

等等。以这种方法确立的整个音位系统就是语言特性(language-specific)。比如，英语/r/与/l/的对比，就与汉语**方言**中某种同样的对比不同。

音系学的分析应与**语音学**的分析区别开来，后者的重点在于对独立于意义的发声进行描述与分类。

MM

互文参阅：音位/语音（phonemic/phonetic）。

洋泾浜（pidgin） ＊洋泾浜是一种合成的简化**语言**，时常形成于没有共同语言的**群体**以便彼此进行接触。＊许多记录的洋泾浜，都涉及某个侵略性的欧洲殖民势力或商业势力与本地群落的接触。起初，洋泾浜主要用于这些群落相互接触时非常专门的目的，如贸易。这种情形下的洋泾浜从入侵势力的语言中借用关键的词汇术语，以表达诸如数目或牲畜等方面必不可少的**意义**。这种借用词汇以高度简化的语法被使用，其中词序是固定的，屈折变化被省略，介词能少就少，等等。发音可能主要依托本地音型。

然而，如果证明在本地群落中洋泾浜有传播效用，特别是这些群落操持彼此都不懂的语言时，那么洋泾浜起初有限的用途也可能拓展，甚至在殖民势力撤出之后依然如此。在非洲西海岸的喀麦隆，有至少 200 种本地语言被 8 百多万人所使用。尽管法语与英语仍然维持官方语言的地位，但

还是有一种重要的联系性语言——喀麦隆洋泾浜英语——它通用于所有这些人群，广布于这200余种**族群**群落，而且已被使用至少150年。在这种条件下，大量表意上的发展可能出现在这种洋泾浜中，以增加其细微表现力，扩展其所赋予的传播功能，包括书写传播方面的用法。

MM

互文参阅：混血语（creole）。

深入阅读：Mulhauser（1986）；Todd（1984）。

快乐（pleasure）　＊直至1980年代，传播与文化研究中一般比较忽略的一个概念，（针对个体的心理感觉）通常解释为对那种觉得想要或使人满足之物的预期与欣赏。近来，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快乐的社会、**意识形态**与话语内容。＊这种情况一定程度上是对许多**结构主义**与**符号学**批评的回应，因为它们总把文本作为理性化、逻辑化结构来考虑，总把解读过程视为一种信息的**解码**行为。这种分析忽略了欣赏文本时欲望、压抑等因素的重要性，忽略了将快乐作为某种社会交换物（**娱乐**）加以制约的重要性。

因此，近来的文化分析力图揭示文本如何以及通过何种方式触发不同类型的快乐；快乐如何像以往那样经过**制度化**而成为社会的可用形式。这种分析将注意力集中在快乐受制于文化监管（cultural policing）的程度：某些形式是可以公开"接受的"，而其他形式则是无法明说的，只能主要以其隐秘性而被视为令人快乐的。

语言与**无意识**的关系已表明属于快乐的决定性因素之一——甚至在看电视或看电影（尤其是后者）这类明显的去性化（desexualized）行为中，也存在着某种快乐由以产生的**窥视**因素。但这种快乐也是文本化的，即也是观者与文本的具体**表述**之间相互关系的一种产物。

除了快乐与性欲（sexuality）的相互作用，女性主义作家也对快乐的社会化再生产表现出浓厚的理论旨趣。她们将焦点引向这个方面，其中广告商与电影制片商力图使其讯息性征化（sexualize），而方式是把它们表述为女人的——但是，如此产生的欲望方面的快乐，对每个可能观看的女人来说并非没有问题。

JH

深入阅读：Mercer（1982）；Culler（1983）；Coward（1984）；Fiske（1989a[①]，1989b）。

多元论/自由多元论（pluralism/liberal pluralism） ＊有关西方发达社会的权力及权力关系之来源、分布与结构的一种理论视角。＊这种视角通过强调**权力**在某种多样（或多元）的、不断竞争的、独立的利益**群体**与**精英**之中与之间日益分散化的布局而得到界定。这样一来，它就与其他权力理论的视角发生冲突：比如，马克思主义或经典的精英理论，它们一般都强调权力高度地、比较一贯地、若非必然地**集中**在抱团的统治**阶级**或精英手中。

多元论源于一种悠久的自由民主的政治哲学传统，特别是在二战后的美国成为一种主流的视角，充满并指导许多针对权力以及具有最广泛的经济、政治与文化形式的社会变革过程上的研究与讨论。对多元论者来说（比如，Dahl 1961），现代工业化社会的关键特征在于它们是某种不断趋向分化与多样结构的运动。这个进程的结果，就是相应出现的由不同利益与集团所构成的某种"*多元状态*"，这些利益集团都想进入与控制每个政治与制度领域，并为此展开竞争。

多元论分析的特征，在于它所具有的分散化与去中心化的权力观，它倾向于贬抑竞争性关系上的冲突与权力。

就一般情况而言，这种视角引发大量**观察实验法**的研究与批判性的回应。它在涉及特定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制度**及其运作的分析时受到质疑。针对大众媒介体制的所有问题与控制问题，以及文化的生产及其同广泛的经济与政治架构的关系而展开的研究，形成近来讨论中的一个重要焦点。

TO

互文参阅：集中（concentration），制度（institutions），权力（power）。

深入阅读：Bilton *et al.*（1981）；Lukes（1974）。

多义性（polysemic） ＊所有符号的一种属性；能够表达多重意义的属性。＊

JH

① 即J·费斯克的《理解大众文化》（*Understanding Popular Culture*），中译本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2001）。

互文参阅：多重意义（multi-accentuality），多重话语（multi-discursive）。

大众/大众文化（popular/popular culture）[①] * 为普通民众所拥有；为普通民众所享用；为普通民众所钟爱的文化。[②] * 现在“大众”一词，在平日语言中通常是“好”的同义词，但早先它却暗含贬义。从其词源上看，大众最初不是用于指“普通民众”（people in general），而是指多数民众（the mass of the people），以与贵族阶级、富人阶级或知识阶级相区别。毫不奇怪，既然讨论这个主题的作者大多属于后者的成员或门客（clients），那么大众一词也就等同于粗俗、低劣、卑微、平庸、低下、粗野、普通、廉价（《牛津英语词典》）。

主要由于19世纪后这个术语在民主政治中的运用，这些最初的贬抑用法在某种程度上已被“去殖民化”（decolonized）。不过，它仍带有一个**多重意义**的术语所具有的明显历史烙印：某事的大众化可被视为其正面价值或负面价值的标志，这取决于你对“民众”的看法。

因此，这个概念不能脱离政治，其实在文化研究领域，政治一直尾随着其用法。特别是大众媒介的大众化（无所不在），一再导致学界与公众在讨论如下问题时的模棱两可：媒介产品是好的，因为它属于大众；媒介产品是坏的，因为它属于大众（即“越多越坏”的观念）。

这种模棱两可，不单是一个批评家个人成见的问题。它隐含在那些可被说成是大众的人民与产品之中。这种模棱两可有两层意思。第一，大众文化究竟是*加诸*普通民众（通过媒介公司或国家机构），还是*源自于他们自身的*经验、趣味、习惯等。第二，大众文化究竟是仅仅表现某一无权无势的下层阶级的状况，还是某种可与主流文化或官方文化相抗衡的自主而

① 这里权将popular/popular culture译为大众/大众文化。其实，众所周知，这个术语在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具有远为复杂的蕴涵，与法兰克福学派所说的“大众文化”（mass culture）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所以在使用中需要仔细辨析。详见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的《理解大众文化》（*Understandting Popular Culture*，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阿兰·斯威伍德（Alan Swingewood）的《大众文化的神话》（*The Myth of Mass Culture*，三联书店 2003），以及陆扬、王毅《大众文化与传媒》（上海三联书店 2000）。

② 原文“Of people in general；for people in general；well liked by people in general”，显然是有意模仿林肯总统*The Gettysburg Address*中的名句“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孙中山曾将此句译为“民有、民治、民享”。

具有潜在解放功能的源泉，属于认识与实践的替代性方式。

这些模棱两可对大众文化的研究造成巨大压力，因为，它们使评论某个公认的研究对象变得很困难。大众文化的“价值”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你是否对由“人民”或为“人民”而产生的意义感兴趣，你是否将这些**意义**当做“公众所要”或“公众所有”的证据。而且，大众文化的研究要求对文化而非大众予以相当的关注——特别是对所谓高雅文化的关注。不过，针对大众文化与高雅文化之**差异**的讨论，传统上一直集中于**趣味**与艺术价值。比如，类似“严肃”音乐与“流行”音乐的区分就隐含着一种评价，它常常在整个广播网的形态中得到制度化体现（就像英国的广播 3 台与广播 1 台）；再如，创造性精神（高雅文化）与商业化消费（通俗文化）的区分也是如此。这些区分最初似乎是源于每种类型作品的质量：莫扎特谱写的音乐比流行音乐排行榜上某一流行组合“更好”，而且，莫扎特的音乐不受制于时代、民族或阶级——它被视为人类普遍精神的表达。总之，对不同文化产品公认的（或至少是既定的）评价是被**自然化**的：它们被看做这些文化产品的内在属性，而不是由于归属不同文化范畴所导致的结果。

试图评论大众文化的问题在于这些已被自然化之评价的状况。因为，它们本身可能被解释为**意识形态**的战略，**阶级**关系（强势与附属）由此可能作为自然的差异而“存活”。实际上，如果不将意义方面的社会化生产与再生产同经济与政治方面的分化和阶级方面的对立联系起来，那么大众文化的研究不可能获得长足进展。

承认阶级与文化具有某种关系，就引发出深层的问题。首先，注意力超越原先对诸如文本这种明显的文化制品的关注，而扩大到实践、**生活方式**与“生活化文化”——特别在人种志的亚文化研究上尤为突出。其次，重新发现了“文化政治”（cultural politics），这个概念常与葛兰西①（1971）的著作及其**霸权**与“民族—大众”（nation-popular）等概念相联系。最后，关注阶级促使人们进一步思考存在于阶级与（特别是）**性别**、

① 葛兰西（Antonio Gramsci，1891～1937），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建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先驱。1921 年组建意大利共产党，1926 年被捕入狱，1937 年因病保释，旋即去世。他在狱中写的书信，1947 年以《狱中札记》结集出版，成为当代一部理论经典，产生广泛的影响。特别是他所论述的“霸权”思想，对当代学术思潮包括文化与传播研究更是构成不可或缺的核心观念。

族群关系间的复杂关系。

JH

互文参阅：阶级（class），文化（culture），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意识形态（ideology），亚文化（subculture）。

深入阅读：the Open University course Popular Culture（U203）together with its associated readers and broadcasts（1982）；Turner（1990）；McGuigan（1992）；Fiske（1989a[①]，1989b）。

实证主义/逻辑实证主义（positivism/logical positivism） * 一种关于科学的意识形态，最初提出时旨在解决自然物质世界中的现象与运动，尤与19世纪的物理学相关。这个术语通过**类比**而被用于对人与社会的研究（"社会科学"）——它被其最初的倡导者放弃后依然在这里得到沿用。*

逻辑实证主义的特征一是对可观察证据的全面考量，一是拒绝讨论任何不能得到公开证明的事物。因此，其视阈（outlook）本质上属于**观察实验法**，从而与任何主张超越可观察证据的研究方法相对立。对实证主义者来说，**客观性**与公开证明性至关重要，他们拒绝讨论内省的、个人的或存在性（existential）的事物。这种态度，加之强调以他们所进行的可观察性活动来解释对象，就形成一种严苛的科学方法，而这种方法若用来讨论想像或针对**符号学**所说的**意指**秩序时将难乎其难。

实证主义对**实验**研究的发展影响很大，其中尤其是促进了**行为主义**的发展和内省主义的摈弃。实际的正面（+）意义似乎远离其目标与对象，特别是没有对比性的负面意义（-）能被及时确认之际。

DS

互文参阅：行为主义（behaviourism），观察实验法（empiricism），实验（experiment），客观性（objectivity）。

后现代状态（postmodernism）[②] * 一个包罗广泛的术语，涵盖1970与1980

---

① 即J·费斯克的《理解大众文化》（*Understanding Popular Culture*），中译本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2001）。

② postmodernism通常有两种译法，一为"后现代主义"，一为"后现代状态"。"主义"强调是一种精神思潮，"状态"着眼的是一种历史格局。

年代知识分子文化、艺术与时尚行业的诸般发展。* 后现代思想的突出姿态，是拒绝早先理论体系中的“总体化”（totalizing）或“本质论”（essentialist）倾向，特别是经典马克思主义以及这些体系所声言的有关真理、科学性和对进步的信仰。与之相对，后现代所致力的思考与表述模式，则强调从思想体系到建筑设计的某个特定对象所具有的片段化、断裂化与不可比内容。

后现代理论常以写作形式为特征，这些形式比一般的批评著述更书卷化（literary），当然也更具自我投射性（self-reflexive）——根据研究对象他们自觉地创造新的意义，而对这个研究对象并不表现特别的尊重。后现代青睐的是蒙太奇而非透视法（perspective），是互文性（intertextuality）而非指称性（referentiality），是“片段复片段”（bits-as-bits）而非统一化总体。它兴高采烈地沉浸于放纵、嬉戏、狂欢、不对称、甚或混乱，沉浸于将意义从其束缚中解放出来，使之面对没有阶级意识的现实（mere lumpenreality）。

后现代的理论家有让·鲍德里亚①、吉勒·德鲁兹与Félix Guattari②、弗里德里克·詹明信③、Faul Virilio、Dick Hebdige、让·弗朗西斯·利奥塔④等。这个名单都是清一色的男性，对此并非无人留意（参阅Probyn 1987）。但是，一旦读到Meaghan Morris（1988）的代表性文

---

① 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1929～ ），法国思想家、社会学家、文化批评家，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主要著作有《物品体系》（1968）、《消费社会》（1970）、《模拟与仿真》（1981）、《传播的迷狂》（1988）等。

② 吉勒·德鲁兹（Gilles Deleuze，1925～1995），法国哲学家，与福柯和法国精神分析学家Félix Guattari交往颇深，福柯说过：“有朝一日，德鲁兹的时代也许会来临。”福柯去世后出版专著《福柯》（1986）。另外，他与Félix Guattari多年合作，具有共同的学术旨趣，曾一起出版过5部著作，1992年Félix Guattari去世，三年后他也从巴黎寓所坠楼自杀。

③ 弗里德里克·詹明信（Fredric Jameson，1934～ ），美国杜克大学比较文学讲座教授，“英语世界里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和文化理论家”（张旭东），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1985年曾应北京大学邀请来华讲学，讲演稿《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1986）对当代中国思想学术发生巨大影响。1984年发表于《新左翼评论》上的《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一文，已成为后现代主义的经典文献。

④ 让·弗朗西斯·利奥塔（Jean Francois Lyotard，1924～ ），法国哲学家，后现代主义思潮的著名理论家。他的《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1979），已成为后现代主义的经典文献。

章，就会当即反驳这一点。他的文章在后现代状态的多重动感间游走，在身体、世俗与文本间游走，甚至不为自我宣示后现代的地位。

JH

深入阅读：Foster (ed.)（1985）；Harvey（1989）；Clarke（1991）；Featherstone (ed.)（1988）。

权力(power)　＊某些个体与团体能够借以支配他人，甚至面临反对与抵制也能贯彻和实现自身特殊目标与利益的手段。＊这个术语主要是指支配、控制与顺从的*根源*、*方式与关系*，就像它们在具体的社会进程与情景中获得的历史性展现。**权力**可能是纯粹*强制性*的，包括直接使用惩罚性的有形力量以实施与保持对他人的支配。权力也可能指对社会基本资源的级差式(differential）拥有与分布所产生的结果；这种资源既指物质方面的财产、财富、技术或原材料，也指诸如知识、**书写文化**、科学以及其他类型的文化资本等符号形态。

尽管在其**制度化**与组织化的形式中，权力有时被认为局限在政治上的公共领域，但在互动的所有社会关系与时间中，在建构与划分**个体**与**群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上，权力都潜在地或实际地发挥作用或发生冲撞（play or contest)。由于这种核心意义，权力与权力关系就同时为互动与传播的研究，为其更广泛的结构性地位与决定性因素方面的研究，提供了一组基本问题与核心视点。因此，权力与权力关系的研究既无法同传播研究相分离，又成为传播研究的一个基石。

权力并非总以直接压制、强制的方式被动用或被体验。它可能被看做对*权威*(authority）的实施或体验，从而被认为是*合法的*。*权威*指的是权力关系的**制度化**，群体或个体由此而**社会化**地或习惯性地遵守与遵从某些**规则**、秩序与规章。权力转为权威的程度，取决于它的显在合法性，某种权威除非能够成功地宣布拥有合法性，否则它就必须不断地借助直接的强制手段以巩固其权力。*合法性*涉及这样一些进程，对权力与权威的拥有与行使由此而以“正确的”或“正当的”名义被动用与建构，而确保这种正确或正当的是权力自身“天然”的道德优势及其“理所当然”的不可避免性。

尽管*控制*这个术语在一般的意义上常常用于描述有权者的活动与目的，但*社会控制*常常更确定地用于指涉遍及社会的权威，即种种禁止性或

纠正性的社会规章制度（它们似乎是“脱离现实的”）。权力是从主动意义上给予解释，即通过个体、群体或社会**阶级**的冲突与斗争而争夺与行使统治权与支配权；而社会控制则常常意味着一种**共识**性的权威化社会秩序，社会由此而对自身实施管制。权力与社会控制的相互关系一直是争论的突出主题，属于如下社会进程的研究领域：这些进程既产生又防范被定义为或被归类为**异端行为**的结果与行为。

TO

互文参阅：阶级（class），遵从（conformity），共识（consensus），异端行为（deviance），霸权（hegemony），意识形态（ideology），制度（institutions），分层（stratification）。

深入阅读：Berger and Berger（1976）；Worsley（ed.）（1977）；Bilton *et al.*（1981）；Lukes（1974）；Cuff and Payne（ed.）（1979）。

语用学（pragmatics） ＊ 针对言说（utterance）的解释所做的研究，具体说来就是针对**情景语境**如何影响言说的意义所做的研究。＊ 以往对意义的研究一直集中在词语或句子的意义上，仿佛意义天生存在于语言的自身表达之内，并且最终取决于语言系统。然而，语用学则强调语境在确定意义方面的作用。当然，类似**指示词**与其他*指示性表达*的语言项目得依赖情景语境以确定其意义的情况，其实早已得到认识。特别是类似人称代词“我”、“你”与诸如“明天”等指示性表达，都有赖它们所处的言说情景才能确定其意义。比如，“我明天去看你”的确切意义，依据究竟谁在对谁说以及说这句话的时间而有所不同。

但不管怎么说即使在指示词之外，也还有许多词语具有多重意义。即使是一个简单的词语，比如“coach”（有公共马车、长途汽车、教练、领队等意）也有若干意义，包括“一种交通方式”与“在某项特殊的运动中对人们进行训练的某些人”。因此，其用法在诸如“出去叫一下coach”的句子里就可能具有模棱两可的指称，而我们得靠语境才能确定相关的含义。

但是，语用学的问题远不限于词语意义的问题，它还包括对种种复杂的语境效果进行考量，就此而言，某个言说的意义远远超过字面所说的内容。如果我们在一篇歌剧评论中读到这样的句子——“琼斯先生唱出的音符符合《利哥莱托》（*Rigoletto*）某首咏叹调的那些音符”，那么我们可以

推断他唱得很臭，*即使这句话实际上并没有这么说*。同样，在一座陌生的城镇驱车行驶时，如果我们问谁"这附近有什么地方能买到汽油吗"，而他们回答说"就在那个拐角有个garage（汽车库/加油站）"，那么，我们可以肯定那是卖汽油的garage（而不是让停车的garage），而且知道它在营业。这些超出字面意义的种种推断就是所谓**蕴涵**。

另外一种语境效果涉及**言语行为**理论。比如，命令是用来使某人去做某事的一种经常发生的语言行为类型。像"约翰，弹钢琴"这句话，不管说它时的情景怎么样，它都是一个命令。但是，诸如"你介意弹弹钢琴吗"、"你能弹弹钢琴吗"、"钢琴，约翰"等句子，依其情景语境就可能是或不是一个命令。如果一位教帅在音乐课上对一位学生说，"你能弹弹钢琴吗，约翰"，而钢琴又开着等人去弹，那么，这就很可能被听成一句命令。另一方面，如果一群熟人在议论他们能演奏什么乐器，某人问另一人"你能弹钢琴吗，约翰"，那么她/他就很可能将它听成是请求信息，而不是下的命令。如此说来，一个言说能被听来做什么（换言之，言说行为能用来做什么），就依其情景语境而有所不同。

语用学的目的首先在于描述不同类型的语境效果；但更重要的还在于解释语言的使用者面临上述种种不同的含混与模棱之际究竟如何理解彼此的言说。语用学对传播研究的潜在意义很大，尽管尚未成为现实，因为它深入到同**文本**与解释相关的某些最麻烦问题的核心（比如，"意义在哪里——在文本之中；还是在语境之中？"）。不过，与此同时，语用学最近同认知科学的探讨与人工智能的研究联系得越来越密切。这种联系促使人们高度重视传播者的所谓合理性（rationality）及其所用解释程序的普适性（universality），于是，针对社会化建构的语用学知识与程序的分布与组织，还有大量的研究有待完成。

MM

互文参阅：情景语境（context of situation），交谈分析（conversation analysis），话语（discourse），语言（language），意义（meaning），语义学（semantics），言语行为（speech act）。

深入阅读：Levinson（1983）；Leech（1983）。

倾向性解读（preferred reading） * 一个**文本**虽向若干潜在的解读开放，但通常"倾向于"（prefers）某种解读（有时是多种解读）。* 分析该文本

的内在结构，可以识别这种倾向性。

按照艾柯[①]的理论（1980），文本可能是开放的，也可能是闭合的。一个*闭合的文本*只有一种解读，其倾向性明显超过其他解读；而一个*开放的文本*则要求若干解读同时并举，以使其全部的“丰满内涵”或“文本肌理”都得到赏识（用文学批评的术语）。开放的文本总是需要较高的智商与丰厚的文化素养，而闭合的文本总是倾向于更通俗的大众文化。大众媒介的多数文本都是闭合的，以使其倾向于某种特定的解读。

对具有倾向性文本所做的另类解读，一般出自**作者**与读者或读者与读者之间社会地位与/或文化经验的差异。对此，艾柯曾用**自行解码**理论给予解释，不过，霍尔与莫利[②]根据帕金（1972）的**意义系统**理论又做出更加探幽析微的解释。霍尔等在 1980 年编辑的书中提出三种关于电视文本的主要解码方式或解读方式，它们所针对的是读者对其社会条件而非文本结构的反应。具体说来：

（1）*主控—霸权式*（*dominant-hegemonic*）解读：这种解读按照编码者的设定而“彻底地、直接地”接受文本。这就是倾向性解读，它对应着帕金的主控性意义系统。

（2）*协商式解读*（*The negotiated reading*）：这种解读承认主控符码的合法性，但通过调整使解读适应自己的特殊社会条件。这种解读对应着帕金的从属性意义系统。

（3）*反抗式解读*（*The oppositional reading*）：它产生的是一种激进的解码，与倾向性解读完全对立，因为它源于一种替代性的对立意义系统，即帕金所说的激进意义系统。

举例来说，把女人描述为性感对象、时装模特或母亲形象的广告，可能得到我们的不同解读。基于主控—霸权符码的倾向性解读，接受并赞同

① 艾柯（Umberto Eco，1932～ ），意大利当代著名学者、作家，波洛尼亚大学教授，以符号学的研究与理论著称于世。另外，他的第一部小说《玫瑰之名》自 1980 年出版以来，风行世界，畅销不衰。

② 即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代表人物、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中心的 S·霍尔与 D·莫利。

这种描绘，视之为自然的、准确的和迷人的。协商式解读可能出自中产阶级的职业女性，一般来说她们接受倾向性解读，但“适用别人而不适用我”。她保留自己对广告进行解读的权利，这与其作为独立女性的社会条件相一致。反抗式解读则可能出自女权主义者，她们将这种广告视为对女性的侮辱、贬损、限制以及男性压迫女性的证据。做出第一类解读的女性会去购买广告上的产品，第二类女性有可能去，如果产品能够符合她们的需要，而第三类女性则不去。

构成这一理论的基础在于将解读行为定义为意义的生成过程，它发生在文本的结构同植根社会的意义系统或读者的**话语**相遇之际。文本能够倾向于某种解读，但是，读者总是用其意义系统的资源以产生他们“自己的”解读。Morley（1980）对此做了论证。他将一部时事性广播节目《国内报道》（*Nationwide*）放给各种完全不同的**受众**听，然后研究他们给出的不同解读。然而，在为这项研究所写的一篇富有启发性的后记中，莫利提到针对这个概念及其运用于研究中一系列关键张力。这些张力涉及倾向性解读在何种程度上可被理解为有关文本的一种基本属性，又在何种程度上可被理解为该文本读者的一种基本属性，抑或研究文本与读者交互行为的学者的一种基本属性。这种张力在 1980 年代末和 1990 年代引发大量的研究与争论，其中许多都力图将读者置于语境之中进行理解，都力图更准确地说明人们针对给定文本而建构其“私人”解读的文化条件。这类研究工作大多关注家庭环境中收看的电视节目，并倾向于颠覆早期对纯粹文本化**权力**或**限定**的强调。

JF/TO

互文参阅：闭合（closure），符码（code），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话语（discourse），意识形态（ideology），意义系统（meaning system），协商（negotiation），大众文化（popular culture）。

深入阅读：Morley（1989，1992）；Turner（1990）；Fiske（1987，1989a[1]，1989b）；Moores（1992）。

偏见（prejudice） ＊ 针对某个**群体**及其成员的、先天的敌对倾向与负面意

① 即 J·费斯克的《理解大众文化》（*Understanding Popular Culture*），中译本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2001）。

向，依据由不完全信息所造成的简单特征而对他们产生的**刻板印象**。* 这种解释只关注偏见的负面问题，而未涉及针对任何类别的对象或事件所表现的所有倾向。

偏见的敌视与受害对象，在不同社会与**文化**中有所不同。他们往往没有**权力**，结果使他们不大可能进行有效的回击。受偏见冲击最明显的一些社会群体包括，亚洲人[1]（不管他们是比如印度人、穆斯林或锡克教徒）、非裔加勒比海人、妇女、同性恋者与失业青年。虽不明显但并非无效的对人糟贬，可能是基于说话口音、服饰风格、职业类型、精神健全与身体肥胖等因素。

歧视（就种族关系而言，"族群敌视" [ethnic hostility] 或"清除" [cleaning] 已委婉地取代这个词），意味着依照偏见式态度而行事。不过，某些研究已表明，歧视并不总是出于偏见，许多歧视还是有赖社会**语境**。对偏见的解释多种多样，各不相同，正如群体之内与之间的每个人所持的偏见程度不一。Bogardus（1928）曾总结道，某些人会接受某一所谓边缘族群（ethnic minority）的求职而不会与之达成亲密的婚姻关系，相反，其他人甚至不会接受该族群作为其国家的游客或公民。

受挫与敌对的心态常常被假定为偏见的根源：若个体通达某个目标的道路被堵塞，而这个障碍又那么强有力，以至于无法克服，那么随之而来的敌对心理就会转而指向某个更脆弱的目标。其他理论家则认为，遵从是解释偏见的一个重要因素：对有选择的群体表现出的负面评价可能植根于文化之中，成为社会化的一个内在环节。然而，其他学者则力图对某种权威人格（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加以解释，这种人格由于教条主义的思维方式而更可能带有偏见（参阅 Adorno *et al*. 1950、Rokeach 1960 对此所做的深入探讨）。

对偏见的研究依然是个分殊而复杂的领域，但在说明与解释社会群体间的相互关系上却是必不可少的，正如任何社会系统内的直接或间接的接触对这种关系的确切说明。在传播研究中，近来的许多关注焦点都在于探讨**媒介**如何在更广泛的社会与文化语境中植入种族主义（参阅 Hartman and Husband 1974，Hall *et al*. 1978）与性别歧视（参阅 Manstead and McCullouch 1981）。

---

① 英国人所说的Asians，是指印巴裔人。

DS

互文参阅：态度（attitude），遵从（conformity），置换（displacement），少数派（minority），民族（nation），投射（projection），种族（race），刻板印象（stereotype）。

深入阅读：Cottle（1978）；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1982）；Billig（1982）；Husband（ed.）　（1987）；Davey（1983）；Aronson（ed.）（1988）。

初始解释者（primary definers）　* 通常涉及官方的那些信息来源，它们针对特定事件、情景与问题而形成、控制与确立种种初始的解释。* 具体说来，它们包括国家与政府的**制度**、法庭、警方、政党、商业团体与压力集团、专业与行业的联合体等。新闻生产的日常活动，主要就依靠并被指向这些官方的、正统的来源及其代表。结果，大量的新闻报道往往都在复述与转述初始解释者所提供的解释框架与解释，如此一来，媒介通常就作为次级解释者（secondary definders）而行事了。Chibnall（1977）认为，这些控制性机构（agencies）同新闻媒介打交道时，通常承认三个宽泛的目标：

（1）他们最常考虑的是保护该机构的公共声誉与**形象**。

（2）他们可能想直接促进该机构的工作，比如控制与理解异端行为者。

（3）他们有志于促进该机构的目标、**意识形态**与利益。

因此，初始解释者在控制与管理社会信息的过程中，直接地、间接地发挥着一种重要而具有战略意义的作用。尽管依据“平衡”（balance）与“公正”或“享用”等制度化与专业化规则的要求，新闻媒介应在某种限度内设法探得非官方的解释或观点，但这些一般都是后来的事情，而且是要求在初始解释者所建构所确立的**话语**之内做出反应。“advocate”一词（拥护，提倡；拥护者，提出者）在美国常常用来解说这种功能。

TO

互文参阅：议程设置（agenda setting），意识形态（ideology），标签理论（labelling theory），道德恐慌（moral panic）。

深入阅读：Chibnall（1977）；Hall and Jefferson（eds）（1976）；Hall *et al*.（ed.） （1978）；Murdock（1981）；Golding and Middleton（1982）；Schudson（1991）。

初级群体（primary group） * 特点在于有限的成员之间进行频繁接触的一种群体。* 有关初级群体的研究通常定位于家庭、儿童与青少年同辈**群体**。这样是不恰当的，因为成人的初级群体就被严重忽略，比如工作场所的初级**群体**。

面对面接触及其密切的关系结构，是初级群体的一个基本特征。初级群体被视为**社会化**的主要中介环节，它构成对自我的化解，从而由此超越任何个体。这样的群体为**个体**提供社会人的最初**经验**。

有两个主要学科探讨了初级群体。社会心理学的兴趣往往集中在**非语言传播**与**对话**式互动方面。社会学的兴趣则围绕着各种社会里的**文化**习得与**价值**传播。由于某种暗含的次级群体（secondary group），这两种研究取向都遇到问题：次级群**体**，是一种建筑在假定缺乏密切性、互动性或共有价值基础上的、更加含混不清解释不明的集合体。

DS

互文参阅：对话（dyad），群体（group），人际传播（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社会化（socialization）。

生产/消费（production/consumption）

生产（production） * 经过社会化、组织化的转换过程，而使原材料成为一种新的但又具有先定形式的行为或结果。生产一向与一个相反的术语即**消费**相对。*

消费（consumption） * 将依托任何工序的任何**产**业之**产**品或产物加以耗费的行为或事实。*

生产与消费是从政治经济学借来的术语，如今被广泛用于（常常非批判性地）描述参与**传播**的各方及其对**传播**的处理。比如，**意义**、媒介**产**品、**文本**等都可以说是被人生产的，被人消费的。媒介**专业**人士被看做是行业生产者，而**受众**或**读者**则被看做是意义的消费者。

这种行业性的隐喻用法从字面上讲自然是有效的，可以引发人的联想，但是，如果过于拘泥字面意思也存在危险。这对消费而言尤其如此，

因为作为一个概念，消费意味着某个个体对某种已经完成的产品进行消耗。但是，意义与传播可并不是作为已经完成的产品而被消费的。所以说，消费讯息同时也是一种生产意义的行为。

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中，生产是一个常见的术语，它往往以若干方式中的某一种被使用：参阅**基础**。

JH

互文参阅：出处（authorship），阶级（class），文化生产（cultural production），文化再生产（cultural reproduction），文化（culture）。
深入阅读：Bennett（1979）；Wolff（1981）。

专业/专业主义/专业化（profession/professionalism/professionalization）

* 难以脱离医疗、法律与其他社会地位较高职业的描述性意义来思考专业。* 这个术语包含一堆意义与价值，从效率到财富；从体面到利他主义，再到公共服务。两种主要的分析方法，被用于研究专业以及与专业主义相关的实践活动。

与社会学中**功能论**学派具有特别关系的一种方法，试图将某些被视为专业化的职业特征或职业**角色**的特征孤立开来加以解释。这些特征一般包括：

（1）基于理论化的、非常识性知识的专门技巧；
（2）这些技巧是通过全面的、往往是深入的*教育*而获得的；
（3）这种教育使得常以“专业”名义的*对职业准入的控制*成为可能；
（4）它也通过*伦理符码*对从业者的行为进行控制；
（5）它更强调与个人利益相对的*公共服务*。

这一系列“专业化标准”（及其实施中的困难）中隐含着一种假定，即无论就它们与社会核心价值（比如，正义与健康）的关系而言，还是就专业的从业者与其顾客间的特殊双向关系来说，专业都是独一无二的。

近来出现的另一种替代性研究方法，则主张对专业与专业主义进行重新解释。正如约翰逊（1972）所言：“一种专业不是一种职业，而是控制职业的一种方法。”换言之，专业关乎**权力**，它们作为职业（occupation）或准确说作为高度的权力与控制是特殊的，这种权力与控制最终用来使从业者（与专业）而非顾客（或公众）受益。专业知识与实践，首先是用于

确保从业者与顾客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同时也为从业者所宣称的**自主**与报酬提供一个重要的根据。在这些用法上，专业完全不再是一种固定的描述性或本质性范畴，而成为更为广泛的权力关系与冲突的组成部分，成为历史上某一具体职业为专业的权力、地位与报酬进行抗争的演变结果。尤为重要的是，19世纪末以来，多数专业已赞同并越来越想争得国家的管制（许多职业此后都声称自己的专业化地位）。尽管所有专业都程度不同地属于权威传播者，但这个术语在大众媒介文本的生产语境中尤为常见。媒介专业人员、**广播员**、记者等，都可按照上述第一种方法所举的所有因素或至少某些因素加以描述。他们也在使之受制于各种控制与管制的、复杂的制度化与组织化**语境**中起作用。近来有关媒介组织的研究（参见下列深度阅读）都强调将专业主义作为一种**职业观**的重要性，以及作为一套用于协调、控制与反抗这些约束与压力之方略的重要性。这种大众媒介研究的关键在于这种关系，即一方面是由专业化的价值、习俗与实践所形成的具有潜在封闭性的文化——它塑造并编制大众传播，另一方面是与其相关的、更为广泛的社会与文化语境及决定性因素。

TO

互文参阅：新闻价值（news value），职业观（occupational ideology），权力（power）。

深入阅读：Johnson（1972，1973）；Bilton *et al.*（1981）；Elliott（1977）；McQuail（1975）。

投射（projection） * 投射的字面意思是向外或向前抛出；它指的是思想、形象与欲望加诸外部环境的一种过程或技术。* 尽管投射最明显的用法涉及工艺与电影，但这个概念在**精神分析理论**的研究中也非常通行。弗洛伊德发现，投射否认对自己的不快指责，而将这种指责投射到他人身上。阿多诺①等（1950）在研究**偏见**与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时也讨论过

① 阿多诺（Theodor Adorno，1903～1969），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法兰克福学派中坚人物。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逃避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而赴英国，后转美国，1949年重返法兰克福大学。他以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理论为基础，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与文化危机做了犀利的剖析与深刻的论述，尤其对所谓"文化工业"（culture industry）与极权主义（authoritatianism）做了入木三分的批评，从而影响了整个当代西方的学术思想。

这个问题：具有偏见的个人将其自身的动机与特征归于外群体（out-group），而未能认识到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他们的内**群体**（ingroup）。

DS

互文参阅：防御机制（defence mechanism），置换（displacement），认同（identification），偏见（prejudice），精神分析理论（psychoanalytical theory）。
深入阅读：Adorno *et al.*（1950）；Stafford-Clarke（1967）。

宣传（propaganda） ＊为了实现某些政治目标而对信息与形象有意进行的控制、操纵与传播。＊使用宣传一词应该非常谨慎。所谓宣传的有意成分往往晦暗不清。比如，在英语与戏剧的教学大纲中，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通常不会说成是有意的宣传，尽管它是一个反犹太人的**文本**。同样，某个政治目标并不意味着某个政党的政治目标。相反，宣传倒可能出自**社会制度**中某些主流**意识形态**的立场。举例来说，贷钱生利是某些社会所禁止的，然而，没有哪所学校在数学课上演算假定的银行贷款利率时，会置疑西方银行业的伦理。即便如此，将教育与宣传简单地相提并论可能并不确当，因为教育体制与国家控制相关（其间有许多例外）：宣传告诉人们想*什么*，而理想的教育更多关心的是*如何*想。说到这里，你肯定会注意到许多情形下这两者之间有部分是重叠的。

由于意识形态与宣传的密切关联，将宣传置于社会结构之中也许更为确切。于是，按照某种人为而相对的方式，一种宣传形式（比如，对马克思著作的解释）可同另外一种宣传形式（比如，资本主义）加以对比。这个术语最常见的历史关联，是战争或国内危机时期。在这些情况下，人们常按照情绪化、规模化与系统化的意图动用大众媒介，以宣扬某些针对特定问题的观念与**态度**。因此，最好是将宣传看做历史上一种特殊的大众说服形式（涉及对特别建构的文本与讯息进行生产与传输），其目的是在大众化的受众中产生或激发某些反应。

这些文本得以建构的方式与它们被用来达到的政治目标与目标间的密切关系，是宣传的核心特征。仅仅为了某个政党、事业或政策获得支持而捏造、限制或操纵媒介信息与舆论的权力，直接有违自由民主社会的政治理想。毫不奇怪，它往往被视为负面的东西，并与极权国家（totalitarian states）相关。这不应转移人们对那些已经发生并继续发生在民主语境中的宣传活动的注意力。

DS

互文参阅：运动（campaign），意识（consciousness），意识形态（ideology），神秘化（mystification），说服（persuasion）。

深入阅读：Brown（1972）；Foulkes（1983）。

空间关系学（proxemics） ＊ 对人际传播的距离、定位及空间关系的研究。＊ 这是个复杂的领域，Argyle（1987）将空间关系确定为仅属**非语言传播**过程中的若干社会性表意关系之一；其他的还包括手势、姿势、表情与状貌。就**对话**的合意距离（preferred proximity）而言，文化的差异总被提及：比如，交谈过程中瑞典人与苏格兰人就被认为比拉美人或阿拉伯人站得更开一些。当然，许多情景还是取决于**互动**的内容与主题，对比较亲密的谈话来说自然选择更近的距离与接触。

如下提法比较有趣，正如不同的情景有不同的合意距离，我们也能确认某种身体疆域或个人空间（*personal space*）：字面上指某种环绕身体的空间领域，如果未经明确准许，这个领域就不应被他人所侵入。个人空间随着个人的**权力**与**地位**而扩展。这可能是由于个人的需求与偏爱，也可能是由于他人的畏惧与期望。这个方面，参与互动者被假定不断就空间关系进行协商。正如戈夫曼[①]（1963）所认识到的，在人口比较密集的城市环境中，任何一套有关空间的**规则**都常遭破坏，结果可能导致一种事实上的人格解体（depersonalization）。这或许说明在诸如高峰时段的地铁中或拥挤的电梯中，为什么明显地缺乏目光的接触或对他人的注意。

DS

互文参阅：人际传播（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非语言传播（non-verbal communication）。

深入阅读：Argyle（1987）；Hall（1973）；Aronson（ed.）（1988）。

---

① E・戈夫曼（Erving Goffman，1922～1982），美国社会学家，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拟剧论的提出者。按照拟剧论，人生犹如演戏，社会好似舞台，每个人都分别扮演一定的角色。其间，又有“前台”（front stage）与“后台”（back stage）之分。活动在前台的是主我（I），退到后台的是宾我（me），主我演绎着人生的戏剧，宾我则从这出戏剧中抽身出来，获得片刻的休整。

精神分析理论（psychoanalytical theory） ＊最早由弗洛伊德系统阐述的一种涉及种种内在精神结构及其复杂关系的理论视角。＊源于这一精神岩层（psychi matrix）的传播系统，对分析人内传播（intrapersonal communication）、**动机**、**社会化**与成长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弗洛伊德对治疗神经机能病尤感兴趣，而这种兴趣最初是由这样的发现所触发——其许多病人身体上的痛苦实际上并没有任何生理上的原因，而是由心理根源造成的。

借助自由联想法（取代催眠术）以及对病人所记的生活经历的解释，弗洛伊德建构了一个有关人类心灵之心理功能以及人们同外在世界所形成之关系的精致**模式**。精神分析理论的核心是一个简单的假定，即冲动、欲望及需求都趋向满足，因此，**动机**基本上被视为享乐性的或对快乐的寻求。挫折源于动机的受阻，结果导致痛苦与自我—批判，并对我们自身寻求快乐构成问题。

弗洛伊德天才性地指出，这种经验在**意识**中受到禁止，通过压抑而转人**无意识**，或者说转换为更为遥远的事件——比如，通过**投射**或**象征**（就像在梦中）。于是，无意识就指精神器官里未曾组织的部分，由此而形成弗洛伊德所说的本我（id）。控制本我的事情属于意识即自我（ego），与此同时，通过**社会化**加上对个人缺陷的逐步认识而使**他人**最终内在化，又形成一种更具批判意识的良心（conscience），即超我（super-ego）。

基于弗洛伊德思想的精神分析理论一直受到批评，原因在于它的还原论与重情化，及纠缠于性冲动。然而，人们应记得这种理论对研究**符号**、**象征**与**形象**无疑贡献良多。弗洛伊德也激发后来的理论家去构建自己更精致的模式。比如，荣格①建立了*分析心理学*（*analytical psychology*），阿德勒②提出了*个体心理学*（*individual psychology*）等，他们二人都是精神分析学派的学生，一生至少有部分时间都与弗洛伊德关系密切。

---

① 荣格（Carl Jung，1875～1961），又译容格，瑞士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曾与弗洛伊德合作研究达5年（1907～1912），后因性情与思想不同而分道扬镳。他是弗洛伊德之后最重要的心理学家，他提出的集体无意识、原型等概念对现代学术思想影响甚大。

② 阿德勒（Alfred Adler，1870～1937），奥地利精神病学家。他提出的个体心理学，旨在帮助人们克服自卑感，成为对社会有用之人。1902年，曾与弗洛伊德合作，后来产生分歧，1911年终于分道扬镳。

近来，精神分析学派通过拉康[1]的著述进一步得到流行。他坚持语言结构与无意识相联系的观点，在**文化研究**中产生深刻的影响。对社会关系上的性征（sexuality）与性别歧视的分析，也吸引许多女性主义者的兴趣——但是，这个过程伴随着对某些19世纪观念的彻底重写（参阅Mitchell 1974）。

DS

互文参阅：原型（archetype），宣泄（catharsis），意识（consciousness），防御机制（defence mechanism），置换（displacement），投射（projection），下意识（subconscious），象征（symbol），无意识（unconscious），窥视者（voyeur）。

深入阅读：Billig（1982）；Badcock（1980）；Mitchell（1974）；Stafford-Clarke（1967）；Reppen（ed.）（1985），Gallop（1982）。

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public and private spheres） ＊对当代**文化**中的如下分野加以描述的一种方式：一方面是个人、生平与家庭所组成的“封闭”（closed）世界，另一方面是工作、政治、大众媒介及更广泛的**制度**化事务所组成的“公开”（open）空间。＊文化与**意识**中这些二元世界的当代分野，其源头与动力植根于19世纪与20世纪工业化进程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家庭”与“工作”关系的重新界定。这些用于文化与传播领域的概念及其政治学，近来关注两个不同的问题。第一，女性主义者与其他学者将注意力引到劳动的**性别**划分上，以及由这种划分所导致并被自然化的种种权力上。第二，近来的**大众传播**研究力主保持某种公共领域的重要性——它对一切人都是公开的、可以进入的——因为，它是现代参与性民主生活的关键构成。

TO

互文参阅：制度（institutions），公共广播系统（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

深入阅读：Garnham（1986），Bonner *et al.*（eds）（1992）。

---

① 拉康（Jacques Lacan，1901～1981），法国精神分析学家、结构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因对弗洛伊德的独创性解释而获得国际声誉。他强调语言的意义，认为语言最能反映无意识心灵，所以力图将语言研究特别是结构语言学引入精神分析学说。

公共广播系统（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 ＊作为公共物品而非私人物品的广播与电视**频道**及其提供的节目。它需将其组织机构作为全国性的文化**制度**，以便拓展信息、**表述**与**娱乐**的公共资源。＊在许多**民族**国家，广播的发展史都深受公共事业之话语的影响，它们或采用国家垄断形式，或在近来的一种混合系统中作为一个重要的公共因素而存在，从而常常得以同种种商业化的广播与电视系统展开竞争。就英国情况而言，公共广播系统（PSB）的"核心"构成一般包括如下原则。首先，作为一项公共事业，广播应一视同仁地面向所有公民，在全国性的**文化**及其产品中尽量提供多样而统一的节目。其次，这种公共事业应通过一个简化的公共捐助系统而获得资助，并担负责任，以使广播从业人员同政府、政党、商家或公司等权势集团的受托利益相隔绝。最后，公共广播系统所提供的服务应属优"质"（近来讨论的一个关键术语），应满足现代文化中所有群体的需要而不论其**权力**、地位或影响。

从历史角度看，留意有关PSB的理想（ethos）与实际所出现的某些关键张力与变化至关重要（参阅Kumar 1977）。在英国，确立已久的文化**精英**论与家长制（paternalism）批评中，近来又出现一种市场导向的、解除管制的批评。在后者看来，大规模的公共广播系统效率低下，又不能提供通俗的节目，而它主张当代**受众**具有多样化的需求。这个时期偏又遭遇新的多频道媒介技术，以及诸如有线电视、卫星电视和录像机等新产品，这些都加剧了对许多国内广播系统之僵化与**霸权**的挑战。这种情况与其他形式的分割化（fragmentation），使目前许多研究者认为PSB属于一个大一统（monolithic）的概念，它已走过其历史阶段，完成其实用价值。与这种意见相对，鉴于**解除管制**系统的发展经验，某些对PSB的近期评价则力求重申其重要性，即对当代大众民主而言，平等**享用**一种共有的公共广播文化是非常重要的。按照这种观点，削弱公共广播系统被理解为从政治上削弱公民一项重要的历史权利，同时也被视为当代社会与文化分崩离析的一个标志。

TO

互文参阅：广播（broadcasting），解除管制（deregulation），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里思模式（Reithian）。

深入阅读：Scannell（1989，1990）；Kumar（1977）；MacCabe and Stewart（ed.）（1986）；Schlesinger（1987）；Hood（1986）。

Q

问卷（questionnaire） * 为了搜集人们对某个特定问题的**态度**、**价值观**、观点或信念等信息而设计的一系列问题。* 问卷可以是手写的，也可以是口头的，它们能将有关某个或某组题目的问题组合起来。

答案的构成可以是完全随意的，以便被试回答时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它们的组合也可以更有组织，以使被试在提供给他的若干可供选择的答案中挑选一个（有时这也被称为*多项—选择技术*）。答案可以直截了当，如果其意图非常明显；也可以迂回曲折，如果其目的比较隐蔽，难以识别。

问卷应该是平衡的，以便它们就某个特定题目而要求被试划出的是与否答案能够均匀分布。比如，如果测试**受众**对电视**暴力**的态度，那么一张问卷应该有一半的表述属于赞同暴力过多的意见，还有一半的表述属于不赞同暴力过多的意见。同样，设计问卷之际，问题的顺序也应有所变化。因为，针对某个问题的遣词用语与/或答案能够影响随后的回答。另一个关键性的变量涉及抽样的范围与代表性，因为所谓样本就是从广大的人口中筛选有限而有代表性的个体。显然，如果样本太少，或在某些方面存有**偏差**，那么，任何基于这种样本并用于样本所代表的普遍人群之结论，都被认为是大可怀疑的。

讨论大众媒介分析、社会心理与市场研究中受众调查的有效性（validity）时，应该铭记上述因素。如果问卷设计不好，实施不当，比如没有提供不合作者的比例、提问组合得很糟糕而且不必要的晦涩难解、回答问题的自由受到过多限制等，那么就会出现许多不成功的情况。

DS

互文参阅：态度（attitudes），方法论（methodology），客观性（objectivity）。

深入阅读：Stempel and Westley（eds）（1981）；Shimanoff（1980）；de Vaus（1986）；Fink and Kosecoff（1985）。

R

种族(race) * 一个据信可按遗传与不变的特征对人民进行划分的社会性范畴。* 鉴于种族作为某个人群状貌的简单刻画可以一望而知，它就带有其“**本质**”的某种隐含的**议程设置**，而这种本质是关于他们如何行事以及如何被期待行事的。因此，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宣称，基本的基因特征与心理特征决定着某一人群，就此而言他们别无选择，正如他们被**刻板印象**化一样。正是这种认识，为Tajfel（1981）提供了针对人类**群体**（可以选择）与社会范畴（不可选择）所做的区分。应该强调，这在社会科学中是一种很不恰当的分类形式，然而对日常谈话而言这种划分形式又很通行。为了具体说明这个概念的混乱，我们不妨想一想“人种”（human race）这个词组，作为一个基因术语它指的是所有的男—女人类。然后，再想一想人类学家对人种的划分—— 诸如高加索人、黑人、蒙古人。再下来就涉及**族群**——这个术语常常假定，需要为某一人群进一步附加文化的特征（有关这些问题的深入讨论可参阅Van den Berghe,1967）。如此说来，当凯尔特人或犹太人通常是指种族群体时（尽管没有体质方面的遗传特征），当亚洲人在英国通常也被说成是一个种族时（但比如在印度或巴基斯坦就不认为是一个种族），当女人与男人从种族的范畴中被排除时——尽管他们存在体质上的差异，这个概念就多少让人感到混乱了。最后，我们还不得不鉴别一堆与种族相关的、非正式的观念与假定：一个种族群体都有其历史性遗产，这些遗产的起源都与确定的地域与文化相关，而这种群体通常可以通过肤色加以确认等。因此，恐外与偏执的舞台便搭建起来，因为这种人群被视为“不同的”与“异域的”（移民）。正如Husband（1987）与Billig（1976）所强调的，这种“不同的”标记能够很快转换成为“下等的”——尤其是过去某些学者（最值得注意的有Eysenck与Jensen）还坚持认为种族与智力之间存在关联。

如果有关劣等种族的观点得以提出，那么由此就一定会认为某些种族天生优越——这里隐含着**制度化种族意识形态**的精髓，这种意识形态常常建筑在从下人到超人的某种群体的等级制假定上。观察与解释种族主义的人，被优等种族＝社会或世界秩序中的主流社会秩序这一反复提及的等式弄得有点困惑。因此，种族主义被视为**偏见**与歧视的一种制度化政策，它所针对的少数人群之特征取决于肤色及由强势的定居群体所赋予的其他**差异**形式。Lawrence（1982）剖析了支撑种族主义的**常识**性种族观，揭示了这种主流价值与信仰的内在矛盾。最后，他提醒读者注意，虽然对这种常识性意识形态的根源做了剖析，种族主义的思想还是不可避免。

当今的刻板印象与偏见，无疑同传统的、制度化的假定与实践相联系。突出的问题在于反对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工作似乎进展不大——对此，Hartman与Husband（1974）以及Husband（ed.）（1987）在论述媒介组织与生产的**表述**时曾给予着力阐发。的确，只有当暴力行为被发现之际，权力机关似乎才注意到种族政治，而暴力常常是对所有其他合法的抗议渠道均被堵死的反应——这里的突出例子就是骚乱（Tumber 1982；Gilroy 1987）。这种反应表现出一种转变，即从一种对劣等地位的接受态度到一种拒绝立场（与诸如**反—语言**、社会流动、脱离初级群体、探究文化遗产等多种主题相联系）。

对维护法律与秩序的关注，最终将种族问题置于同面对面的社会传播相关的专业与职业的训练日程上——最明显的就是警察。然而，鉴于种族意识形态的制度化形式，教育项目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根深蒂固的价值与态度，或者说它们是否仅属装点门面之举就应受到质疑。如果只是装点门面，如果社会不被视为多元化而只是口惠实不至地改变种族不平等，那么就英国情况而言，Gilroy的说法——“英国国旗无黑色”——就是可信的。世上没有所谓“种族”——而只有种族主义。

DS

互文参阅：阶级（class），意识（consciousness），族群（ethnic），群体（group），少数派（minority），神话（myth），民族（nation），东方学（orientalism），权力（power），偏见（prejudice），刻板印象（stereotype）。

深入阅读：Gilroy（1987）；Husband（ed.）（1987）；Tajfel（1981）；Van den Berghe（1967）；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1982）；Donald and Rattansi（eds）；Van Dijik（1991）。

现实主义（realism） ＊ 采用表述性（representational）的技法（**符号**、**惯例**、**叙事**策略等）以描写或描绘一种物理的、社会的或道德的世界，这种世界被当作客观存在而超越于这些技法所形成的表述，从而成为这种表述之真实性的仲裁者。＊ 现实主义常与其他术语，如19世纪艺术/文艺理论所确立的**自然主义**或*逼真*（*verisimilitude*）几乎可以交替使用。在这类用法上，这个概念经常不过是指表述性细节与我们已有的对象（可能是一种情感、一个主题或观念、一件事情等）知识，在多大程度上相像或一致。如果我们发现一位角斗士戴着手表，那么就不会觉得这是古罗马"现实"中的竞技场——但我们一般不会因为他说的是英语这个事实而觉得别扭。因此，这种类型的现实主义超越所有的**惯例**——我们借助某些技法而逐渐把一种虚构的世界确认为"真实的"（real）。

现实主义这个概念常常或含蓄或明确地同其他概念相对。比如，在哲学上，它相对于*理想主义*，但也能与想像、感伤主义、牵强（the far-fetched）等相对。就此而言，现实主义不仅往往用来描绘外延方面（denotational）的真实性（即逼真），而且也总是显示着对生活中肮脏或没有教化等问题的关注。这里，记得现实主义是个**多重话语**的概念非常有用——在哲学与政治学中也能见到它。在政治**修辞学**中，现实主义常常用来为不循既定道德准则的权益政策辩护。在**表述**上也是如此，现实主义这个概念可以用来为打破习俗的努力进行辩护，因为习俗一旦成为陈规就总是过于规训（discipline）某种艺术形式或媒介。

现实主义的这种"进步"观在19世纪非常盛行，它赋予这个概念以一种更具体化（理论化）的用法，而这种用法主要源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卢卡奇①的著作。他认为，某些作家——比如巴尔扎克与狄更斯——在作品里能够摆脱其自身的阶级**偏见**与**意识形态**，从而将一个**阶级**社会的社会全貌表现出来。这种语境中的现实主义属于写作或其他表现形式的一种特性，它在意识形态的外表下揭示了人民与其阶级斗争根源的"真实"关系。于是，在这种公式化的表述中，表述即使不遵从自然主义或逼真的

① 卢卡奇（György Lukács，1885～1971），匈牙利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文艺评论家，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先驱。其代表作《历史与阶级意识》（1923），以对马克思主义的独特阐释而著称于世，被视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圣经"。

要求也可能是现实的。相反，表述就算是自然主义的、非常逼真的，却不被视为现实主义。在这种情形下，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逼真的区别完全不是某个给定文本的属性，就像不是意识形态的属性一样——正是被感知的“生活真实”（truth to life），赋予某部作品以现实主义，当然，“生活真实”的意味取决于你所观看的东西。所以，作为一个批判性概念，现实主义也是不同的批判性立场进行意识形态斗争的平台。

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用来分析表述问题的现实主义概念没有失去多少其本源的（哲学）力量。也就是说，它依然依赖于对一种客观的、外在的现实（不管是永恒的、普遍的抽象观念，如“人类自然”，还是历史的、但又是客观的事实，如阶级斗争）之意识形态性尊奉。无论是什么，外在现实的地位总是优越于任何媒介的表述；我们的注意力通过表述而指向外在的“真实”。

为反拨这种趋势，为坚持相反的主张即永恒的观念与客观的事实均为“显示”它们的话语策略之产物，近来**结构主义**与**符号学**研究所关注的主要不是“何为”现实主义，而是“如何”成为现实主义。这也是对现实主义尤其在影视媒介中成为一种常规形式所做的反应。现在，我们很难发现某种电视或电影类型不在某种程度上主张现实主义。在这类分析中，现实主义被视为资产阶级表述（但宣称代表所有阶级）的某种表意实践的特征。从字面上讲，它由诸如性格化、**叙事**及**说话方式**等表现技法所构成，这些技法在种种伪装（guises）下得到一而再、再而三的复制。因此，尽管现实主义本身力图抑制表述性行为，以便呈现外在那个现实的真实摹本，但对现实主义的分析却颠覆了这一点，这种分析恢复了表述性行为的首要地位，表明现实主义如何不属于一种“生活”的效果而属于**文本**的效果。

JH

深入阅读：Bennett *et al.* （eds） （1981a）；Belsey （1980）；Donald and Mercer （1982）；Fiske （1987）。

现实（reality） ＊ 话语的意味（sense）或产物（product）。＊

JH

冗余信息（redundancy） ＊ 为了有助于进行精确编码或加强社会联系—

或两者兼而有之而加进某个讯息或文本的可预计内容（predictability）。
* 冗余信息帮助进行精确**编码**的方式有：

(1) 它被用于抵消**信道**中的**噪音**：为了抵消收音机里的静电干扰，我们就把关键词拼读出来，通过逐个核实每个字母而不断增加冗余信息——如apple（苹果）里的A，sugar（糖果）里的S等。

(2) 它被用作一种觉察与纠正错误的方式：因为**语言**约有一半属于冗余信息（或者说有一半是可预计的），于是我知道"seperate"的拼写是错的，并能将它纠正为"separate"，从而防止这个错误影响交流。如果语言中没有冗余信息，我们就不能辨认潦草的字迹，不能理解方言浓重的口音，不能略过拼写的错误。

(3) 它有助于克服与**受众**有关的问题：如果编码者预计受众对于他/她所说的不那么提劲儿，如果他/她知道自己的讯息针对的是具有不同背景与各种动机的一大批形形色色的受众，那么他/她就会把更多的冗余信息加入**讯息**。比如，流行艺术比高雅艺术的冗余信息多，一个为深褐色酒吧做的广告，其冗余信息多于专业期刊上的专门性广告。

(4) 它有助于克服媒介的缺陷：一次演讲应比一部书包含更多的冗余信息，因为读者能够通过反复阅读要点以制造冗余信息，而听众则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使用某种媒介以复制或支持另一种媒介的种种直观教具（visual aids），也是制造便于精确编码之冗余信息的方式。

这四种功能基本上都是技术性的，源于香农与W·韦弗①（1949）的过程**模式**：当讯息的首要目标在于传播**信息**之际，这些功能就非常切题。但是，冗余信息也有属于社会而非技术的功能，如果传播的目标在于**社交传播**，那么它们就开始发挥作用。

① 香农（Glaude Shannon，1916～　　），旧译申农，美国应用数学家、信息论的奠基人。1941年，在美国贝尔电话实验室工作，1957年任MIT（麻省理工学院）通讯与数学教授。另外，他还是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美国科学院院士。1948年，他提出著名的信息论，翌年与W·韦弗出版《通讯的数学理论》，对此进行详细论述，从而为现代通讯与现代传播的研究奠定科学的基础，在诸多学科领域均产生巨大影响。

冗余信息强化的是讯息中的社会联系，而这些讯息是高度**惯例化**的，因此也是非常容易预计的。见人说声"你好"可能完全是冗余的，但它却加强或维持了彼此的关系。一首民歌的副歌是冗余的，大家一起同唱无非是借以确认**群体**成员或**亚文化**成员的身份。通俗的电视节目比如警匪系列片的内容都是可预计的、冗余的，因为它们都依赖自己所取悦的文化体成员的共同趣味、期待及经验。因此，观赏一部通俗节目，就是一种间接的表达方式，以示自己与千百万同在观看的他人同所好焉；这种表达往往变得直截了当，如果我们是与朋友或同事一起议论某个节目以便凿实自己同该群体的共享趣味与经验。说声"你好"、唱唱民歌的副歌以及参与通俗文化以求分享他人的趣味与期待等例子，均属旨在加强社会联系而非传递信息的**社交传播**。

但是，不管冗余信息是在信息传播还是在社交传播中发挥作用，它总是表明对**接收者**或受众的某种关注。包含大量冗余信息的讯息之发送者或流行**文本**的生产者，更多考虑的是其受众而非自身或其独一无二的、不得不说的内容。他们关注的是同其受众建立同所好焉的关系，而不是表现与受众的差异——他们不希望强调其自身的专门知识、原创能力、独特个性或个性差异等。因此，冗余信息在传播中就扮演了一个重要的、积极的角色，而将它看成"一些不必要内容"的潜在念头就必须从我们的思考中抹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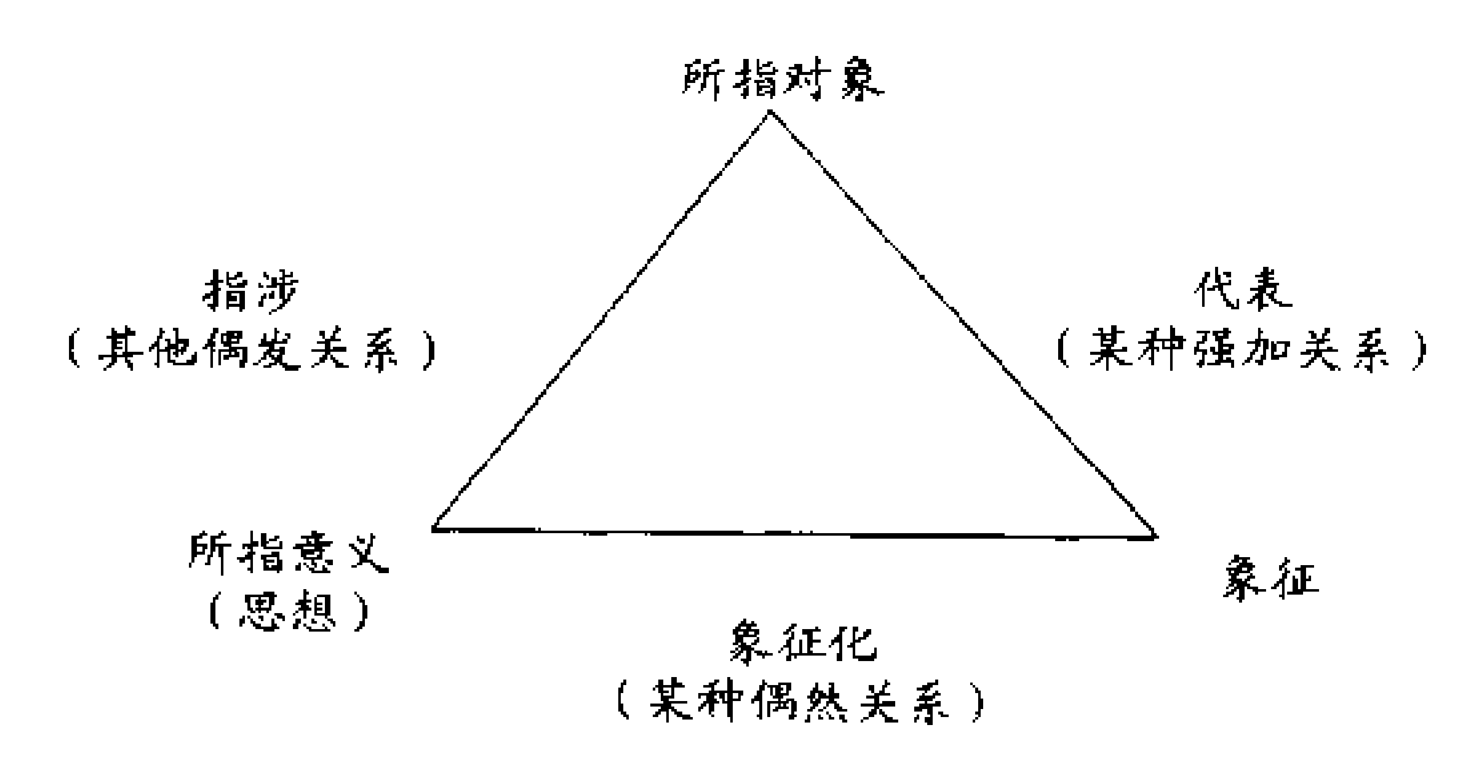
JF

互文参阅：惯例（convention），精致符码与限制符码（elaborated and restricted codes），社交传播（phatic communication）。

所指意义（reference） * 奥格登与理查兹①所用的术语，指由符号或象征以及使用者对其**所指对象**的经验所形成的心理意象（the mental image）。 *

① 奥格登（C. K. Ogden，1989～1957），英国作家、语言学家，Basic English的创始人。里查兹（I. A. Richards，1893～1979），英国评论家、诗人。他们曾合著《意义的意义》（1923）。

它类似于皮尔士[①]所说的**思想**。奥格登与理查兹为所指对象、所指意义与象征建构了一个意义的三角模式：



注意奥格登与理查兹所用的术语“**象征**”，是指现在更常用的所谓**符号**。

JF

互文参阅：思想（interpretant）（见皮尔士的类似模式），所指对象（referent）。

所指对象（referent） ＊ 奥格登与理查兹[②]所用的术语，指某个**符号**所指称的东西或其外延意义。＊ 它类似于皮尔士所说的**对象**，并作为**所指意义**的对立面而被界定。

符号的所有理论与界定都包含着这个概念，即符号必须代表除自身之外的某些东西，以及使用符号者之外的某些东西：这就是符号的*所指对象*或*对象*。有时我们会遇到类似“外在现实”（external reality）或“前一文化现实”（pre-cultural reality）之类的术语，它们提出了各类关于现实之

---

① 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1839～1914），又译皮尔斯，美国哲学家、科学家、逻辑学家，实用主义的初始人，被视为美国最有创建和最多才多艺的学者，尽管他生前并不得志。在发展现代逻辑中，皮尔士曾对符号问题做过深刻而独到的论述，为现代符号学与传播学提供了影响深远的思想。比如，他曾经将符号（sign）分为三种，即肖像（icon）、标志（index）与象征（symbol）。

② 奥格登（C. K. Ogden，1989～1957），英国作家、语言学家，Basic English的创始人。里查兹（I. A. Richards，1893～1979），英国评论家、诗人。他们曾合著《意义的意义》（1923）。

性质的问题，以及若非借助某个符号系统我们是否能够理解现实的问题。而所指对象这个术语则没法避开这个问题领域，因为它将其释义限定为“符号所指称的东西”。

JF

互文参阅：所指意义（reference）。

反映论〔镜像隐喻〕（reflection theory）（mirror metaphor） * 任何秉持如下主张的学说——研究对象可有自己的形式、内容或行为，而它们是从某种外在于它的形式、内容或机构方面进行解释的。* 与传播相关的反映论，实际上有两种常见形式。其一是这样一种学说，即媒介的**表述**与**话语**反映着一种既存的、自明的**现实**，它独立存在于表述它的话语之外，包括那些媒介话语。当然，这种反映论通常会被当作负面的东西遭到反驳：媒介没有反映这种现实，而它应该反映这种现实。我们可能遇到的第二种反映论，是一种比较具体化的反映论——某些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假定，文化与传播的实践与形态都是特定社会的经济**基础**的反映。

反映论难于明确说明；在上述两种反映论中，它一般都是作为一种不加说明的**模式**或假定而在某种主张中得到复制，而这种模式或假定却从不加以检视，因为它属于某种“显而易见”的知识。反映的**隐喻**实际上已被如此**自然化**，以至于很容易就不知不觉地使用它——哪怕你意识到直接采用镜像隐喻的危险。

JH

语域（register） * 语言依其**情景语境**而显示的风格变化。* 语言的使用者对词语与结构的选择，深受这一情景之特征的影响。实际上，各种言语都典型地带有其语境的深刻烙印，这一点非常明显，而我们又确实随语境的变化而变化，结果就常常能从非常零碎的、孤立的语言表达上推断其初始情景语境的特征。比如，多数读者都会充满自信，觉得自己能为下列例句重构初始的情景语境：

(1)“我给你个止疼药方。”

(2)“新型Tubifast。管状包扎绷带。勿刺。勿钉。勿戳。”

同样，得知其答案也不奇怪：第一句是医患的谈话，第二句是一则杂志广告。而比较难于解释的是，我们是如何识别每句话的初始语境的。比如，第一句话为什么不会发生在药房，第二句话为什么不会出自事故现场两个护士的交谈？

语言与其情景语境的相互调适，按照三种独立的参数进行。首先，谈话所依凭的活动或主题影响所用语言的类型，特别是影响词汇的选择。其次，社会关系的性质会影响语言：比如，朋友间的谈话就会避免使用正式的表达方式，除非为了嘲讽的效果。最后，所用的传播媒介——不管是面对面的讲话还是书写的文本，不管是电话还是录音电话抑或其他什么媒介——都会影响言语组合的方式。这三种参数分别以语旨（*field*）、基调（*tenor*）、方式（*mode*）而称名。集纳起来它们就形成某个特定**文本**的语域。

MM

互文参阅：情景语境（context of situation），类型（genre）。
深入阅读：Halliday（1978）；Montomery（1986）。

里思模式（Reithian） ＊这个术语是指一系列体现在**公共广播系统**的风格与政策中的文化价值、目标和实践，它们是在 BBC 首任总经理约翰·里思[①]爵士的领导时期形成的。＊有关英国广播及 BBC 的大多数研究（若非所有研究），都强调里思在其主政时期留下的丰厚遗产及其对现代公共广播事业的独特构想（比如，参阅Burns，1977）。从本质上讲，里思有关广播之社会角色的思想强调的是自治、非商业化、全民性等观念，它具体体现为某种类似于教会的**制度**，这种制度通过提供信息、教育与娱乐等服务而致力于塑造公共趣味并尽可能保持最高水准。将这一理念落实到制度化、专业化的广播实践中——先是广播后是电视，就招致两种主要的批评性反应。

第一种批评凸显了 BBC 的**自主**问题，特别是来自政治上的干预与控

① 里思（John Reith，1889～1971），英国现代公有而独立企业的创建人。1922 年，任英国广播公司的总经理，1927～1938 年又任董事长。在此期间，他大力发展无线电广播，创办广播的短波业务和世界上第一个高清晰度的电视广播（1936）。后来担任联邦电信委员会主席，推动英联邦电信系统的整顿。1927 年被授予爵士。

制。研究BBC自1926年大罢工以来在全国性特殊危机中的**角色**，得出自主在实践中并非总能得到实现或得到坚持的结论（比如，参阅Tracey 1977）。第二种批评直指里思所致力的最高文化水准，以及其中令人不快的悖论。这种意见认为，BBC表达与复制的是一套狭隘的**精英**标准与**价值**，而不是满足作为一个整体的英国公众的多样化需求。因此，使用这个术语就需要认识与考虑这些问题，需要审视里思模式在历史上的衍变。

TO

互文参阅：自主(autonomy)，广播(broadcasting)，解除管制(deregulation)，精英(elite)，公共广播系统(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

深入阅读：Burns (1977)；Tracey (1977)；Curran and Seaton (1991)；MacCabe and Stewart (eds) (1986)。

表述(representation) * 表述是表述活动（representing）的社会化过程以及这一过程的产物。因此，这个术语同时指制造**符号**以代表其**意义**的过程与产物。* 这是一个有用的概念，因为它把乍看似乎没有联系的、各种各样的概念化片段整合在一起。表述是将一种抽象的**意识形态**概念纳入具体形式（也就是说，不同的**能指**）的过程：所以，你才能看到有关女人、工人、威尔士人的表述；看到有关家庭、爱情、战争的表述；看到有关个人主义、工业化、阶级等表述。

表述是在一切有效的**意指**系统内形成意义的社会化过程：讲话、写作、印刷、录像、电影、磁带等等。所以，举例来说，如果你在找有关性欲（sexuality）的表述，那么你会马上发现其表述通过不同的媒介并在不同的**话语**中被组织化、条理化。它不仅同时作为色情与身处色情而得到表述，而且也在广告、电影、文学、各种定型的言说话语中得到表述，在诸如立法与教育活动上官方的、权威的话语中得到表述。我们很快就会清楚，性（sex）并没有什么"自然本质"（natural being），就像所有这些**形式**与话语所统一表述的。比如（举个简单明了的例子），在类似精神病院、监狱、公学①与军队等强制**制度**下，同性恋行为实际上比异性恋行为更不被看做"丑闻"，尽管异性恋在其他地方绝对被表述为符合**规范**的、

① 所谓公学（public school），乃指英国一种贵族化的私立付费学校，实行寄宿制，属于"上流社会"的组成部分。

自然的、惟一可接受的类型。而且，被表述为性的东西在不同形式与不同时代也各不相同；表述本身也在变化。因此，表述的概念便完全承认再度—表述（re-presentation）的观念；即重新加工能指，并将它带入针对“同一”所指的能指视野。

这个术语也具有某种政治蕴涵，这是从其议会**修辞学**的用法上保留下来的。在这种修辞学中，它是指对民主代议制的想像——即专业化的领导层代表其他据说由他们所代表的人从事社会活动（执行**权力**）。这种用法若搁到这个术语的**符号学**意味上，那么势必引起嘈杂一片的反响，因为它表明任何一种表述要“代表”（stand for）许多其他有可能用到的表述都是多么相距遥远。

JH

反应(response)　＊ 对某种可能是内在（身体之内）或外在（身体之外）的**刺激**所做的反应。在媒介研究中，这个术语常常用来指某个**受众**由于对来自**信道**与**发送者**的**讯息**特征加以解释而表现的行为。＊ 第一种解释主要用于学习论（learning theory）[①]、行**为主义**与**实验**控制，而第二种解释更多用于社会心理学、**群体**互动、市场研究与问卷调查。

DS

互文参阅：行为主义（behaviourism）。

深入阅读：Walker (1975)。

修辞学（rhetoric）　＊ 使用**语言**以说服或影响他人的活动及源于这种活动的语言。关于演讲术、阐述与**说服**的正式研究。＊ 修辞学在中世纪是一门正式的学术分支；是七种人文技艺或科学之一，其他六种分别是语法、逻辑（辩证法）、当时所谓算术、地理、几何、天文与音乐。在宗教改革运动中，它们大都分崩离析，不再延续。然而，修辞格（rhetorical figures），却与某些融入日常语言的修辞学术语（如**隐喻**）一同保留下来。

---

① 学习论（learning theory），社会心理学有关社会态度形成与转变的一种理论，与之相对的另一种理论是认知学派的平衡论（balancing theory）。按照学习论，人的社会态度是通过学习而形成的，是一种习惯。所以，为了使人形成某种态度，就需要不断提供行为主义的刺激，以激发人的反应，从而逐渐使之成为一种习惯。

自从**结构主义**开始揭示我们的知识与**经验**多是由我们承继与面对的**符号**系统所建构以来，对修辞学的兴趣便明显恢复。这里有两个主要原因。其一，作为一门学术分支的修辞学要求我们关注符号系统本身（不管是语言符号还是视觉符号），关注运用于**文本**本身的手法与策略 它提供了一套我们可以用来理解意义如何生成的、稳固精致的术语与分类，它所指涉的不是**作者**的意图或“生活的真实”之类大而无当的东西，而是实际的**话语**。

其二，如果当初修辞学未被保留，那么毫无疑问它也不得不被发明出来，因为我们周围那么多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文化产品，本身都是高度修辞化的。宣传品、广告、报纸、电视、学术著作、政府声明等，无不大用特用修辞格以诱导人们按照其方式看待事物。如果我们有一种便利方式破解这些策略，那么我们就能以一种较多批判性而较少惧怕性的态度对待它们了。

JH

深入阅读：Dyer（1982）；chs 7 and 8，for a modern application of rhetorical analysis to advertising；Ong（1982），pp. 108-12，for an account of its history。

礼仪（ritual） ＊组织化的象征活动与典礼活动，用以界定和表现特殊的时刻、事件或变化所包含的社会与文化意味。＊关于礼仪的研究一直是人类学家普遍关注的一个焦点，他们对前工业化时期**文化**中的宗教与巫术所做的分析尤具影响。

这种研究常常区分了礼仪的两项主要内容。第一种涉及根纳普①（初版 1909：1977）所命名的通过礼仪（*rite de passage*），即在**个体**与**群体**的生活中标志着明确的社会性变化的那些庆典（celebrations）与典礼（ceremonies）。比如，生日、结婚以及许多其他涉及身份关系或亲属关系、法律地位或社会地位的变化，均属由这种礼仪化的活动排定顺序并赋

① 根纳普（Arnold van Gennep，1873～1957），法国人种志学者和民俗学家，以研究各种文化的通过礼仪而著称。代表作《通过礼仪》（1909）系统比较了个人从一种身份过渡到另一种身份时所举行的仪式，发现其中有三重顺序：分离、过渡、组合。他还研究了欧洲的民俗学，把民间文艺和风俗习惯看成是活文化的各个方面，而不是死文化的残余。卷帙浩繁的《当代法兰西民俗学手册》（1937～1958）颇具影响。

予意味的时刻。于是，通过礼仪就象征着文化上对这种从某一社会阶段或状态到另一社会阶段或状态的过渡与表现予以承认。Mair（1972）认为，它们往往构成种种象征性入会仪式（initiation）、分离（segregation）与同化（integration）等礼仪的交汇点，人们由此获得或被赋予某种“新的”社会身份。Berger（1973）认为，它们同时用于现代社会与前工业化社会，以便“将个人事件转换为某种典型个案，正如它们将个人传记转换为社会历史的某个片段”（p. 62）。就此而言，通过礼仪标志与突出的是时光的流逝，表达的是一个群体、群落或社会的过渡性节律。在这里，可以通过显示自然变化而进行普遍的礼仪化表达，比如庆贺收获、雨水或生长等，或如特殊历史事件的礼仪化庆典，就像圣诞节、独立日、元旦等。

然而，这样的礼仪不仅标记着时光（从而用以构建与确认某种个体与集体的认同感，以及文化与历史的方位感与变化感），而且也常常用以向有关个体或社会群体担保成功、安全或某种确然的安逸状态。这是礼仪的第二项主要内容，它关注的是礼仪发挥作用的方式，即通过这种方式礼仪在实现某些所欲达到的目标时获得象征性的（常常是超自然的）干预与帮助。比如，Worsley（1957）对美拉尼西亚的货物崇拜（cargo cult）所做的研究，就表明特殊的膜拜礼仪（对外人来说显然是荒谬的）如何用于表达与表现针对殖民化时期剧烈的社会与文化变化经验所产生的某种象征性反应与印象。就此而论，许多人类学证据都指出，社会动荡之际或者个人或群落的“常态”在某些方面觉得受到威胁之际，礼仪活动就随之加剧。

这个术语从这一人类学基础上很不平衡地发展起来，尽管它已明显深入到对现代工业化的文化、形成这些文化的制度以及种种社会互动的分析之中。因此，它常常用在某种更普遍的、更世俗的意义上，以指涉种种周期性的受制规则的活动，这些活动无论对个体还是对特殊的社会群体无不具有象征性意味。如此说来，这个术语可能面临意义超载（*over-inclusion*）问题，它已“拓展”到难于区分哪些行为在某些方面不属于礼仪化行为的地步。下面提供的是一些文化与传播研究中新近采用这个术语的有用例子。

TO

互文参阅：文化（culture），制度（institutions），非语言传播（non-verval communication），礼仪浓缩（ritual condensation）。

深入阅读：Bocock（1974）；Leach（1976）；Mair（1972）；Turner（1974）。

具体例证：Goffman（1967）；Elliott（1980）；Marsh *et al.*（1978）；Hall and Jefferson（eds）（1976）。

礼仪浓缩（ritual condensation） ＊一种文化的推理（reasoning）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抽象的观念、**神话**等以某种浓缩的形式被投射给外在世界，通过这种形式它们才能得到检验与修改或肯定与赞美。而所谓投射就是将它们展现在**礼仪**之中，这种礼仪可使抽象的概念以具体而主动的方式被把握。＊

礼仪浓缩的思想源于人类学。在人类学中，它用来指抽象的概念如何浓缩成简单的物质形式或自然形式，比如好与坏的概念浓缩成黑与白的形式。通过这种浓缩形式，人类推理的过程与产物才能作为客体被社会分享，并得到理解。正如利奇[①]（1976）所指出的，人们在进行复杂运算时，用计算器或是纸与笔要比用心算更容易；同样，文化在按照其方式思考抽象问题时，用制造物（artefacts）也比用“天然物”（mentifacts）更易理解。

在当代文化中，礼仪浓缩可以发挥作用的一个途径就是电视媒介。在日常的时事系列与文娱系列节目中，电视将抽象的、普遍的观念**浓缩**为具体**形式**，然后按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的戏剧化形式“透视”（think through）这些观念的意味。人物并非仅仅作为冲突性个**体**才具有意义，他们也**表述**抽象的二元对立——比如，好与坏、正常与反常、有效与无效、自然与文化、个体与制度、积极与消极等。于是，这些浓缩的抽象意味就能在戏剧化冲突的形式或**暴力**的形式中被**礼仪化**，所以，一场酒吧间的斗殴实际上就成为一个“计算器”，抽象的思想由此可以按照一种有序的、逻辑化的方式被“透视”，而这场酒吧斗殴的结局则类似于一个数学定理的证毕（QED）。

JH

互文参阅：游吟职能（bardic function），二元对立（binary opposition），

① 埃德蒙·利奇（Edmund Leach，1910～1989），英国结构主义人类学家，长期执教于剑桥大学，曾任剑桥大学国王学院院长。1937年，曾在我国台湾做过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工作。在《列维—斯特劳斯》（1970）、《文化与传播》（1976）、《社会人类学》（1982）等著作中，他系统而清晰地阐述了结构主义人类学理论，并为传播学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浓缩（condensation），话语（discourse），礼仪（ritual）。

深入阅读：Leach（1976）；Fiske and Hartley（1978）。

角色（role/roles） * 由社会给予界定的、以一系列特定的规则、准则及期待赋予特征的、用于对社会情景下个体的互动、行为与活动加以定位与管制的身份与行为模式 * 我们常在剧院或戏剧的意义上思考角色问题，就像指称一场演出或戏剧中由演员表演或扮演的角色。研究社会与文化关系时，由这种戏剧观延伸的角色概念是指，**个体**（演员）在某个特定社会（整出戏剧，不管是剧本还是剧场）的不同**语境**（场与幕）中发生**互动**（演出）之际所“表演”的所有不同“角色”（parts）。不管上台还是下台，在社会中具有某种身份或角色的个体，都将以某些可预期的方式、按人们的期待去“行事”与做事，并按人们的期待去遵循和遵从某些似乎独立于有关特定个体的**规则**与**规范**。通过**社会化**，我们被纳入这些期待之中，常将它们所界定的社会化世界，将这个世界所区分的男人、女人、面包师傅、兄弟、政治家、朋友之间似乎无穷无尽而显而易见的关系视为理所当然。这里的关键在于，角色总是存在于相对其他角色的关系之中：比如，医生的职业角色就隐含并指涉病人、护士与会诊医师（consultant）的角色，不同的角色带有人们不同的期待以及不同程度的**权力**与**地位**。

如同演员一样，人们终其一生都会扮演许多不同的、不断变化的角色，而且，任何时候都会陷入不同角色与角色关系的某种多重状态。比如，作为一个学生，你可能还是女人、朋友、工会会员、姑表姊妹，有时还是客人、小车司机、顾客等等。并非所有这些角色都能在同一时间扮演——重要的是它们有时可能互相矛盾，从而导致“角色冲突”——它们也不可能等量齐观或一模一样。比如，人类学对角色以及不同文化中的“角色系统”所做的研究就区分了两种角色，一是由于年龄或亲属关系而由社会赋予个人的与生俱来的角色，一是凭个人的表现、竞争及资格而从社会获得的角色（Linton 1963）。

尽管这个术语常用于有关社会互动与传播的讨论及描述，但其分析问题的价值与解释力却一直遭到质疑。它常常假定一种静态的、**共识**性的、过于决定性、过于简单化的社会关系视野，因而既忽略个体，又忽略权力与不平等的结构。

DS

互文参阅：拟剧论（dramaturgy），制度（institutions），规范（norm/normative），表演（performance），规则（rules），互动（interaction）。
深入阅读：Worsley(ed.)(1977)；Banton(1965)；Bilton *et al*.(1981)。

规则(rules)　* 一切社会与文化关系在不同的程度上得以制度化、引导化与管制化的方式。* 在这种宽泛的意义上，有关规则的讨论与研究就被当做一条有用的途径，以深入传播研究方面的许多核心争论与问题。规则可以在许多层面并按照不同功能予以解释。需要考虑的一个首要问题是，社会与传播的一切活动在多大程度上受制于规则。这里马上遇到一个困难，即我们在**互动**中往往不会意识到规则及其作用。我们确认显性（*explicit*）规则，尤其当它们对调节我们自身的目的与行为具有直接后果之际，远比确认隐性（*implicit*）规则或曰“底层”规则（ground）容易，后者可以说为那种互动建构了更为广泛的边界与框架。

Cicourel（1964）将后一类型的规则称为“基本规则”（basic rule），强调它们普遍具有无法言说和无法检验的性质，它们用以解释世界的方式被视为“天经地义”。无论怎样说不清道不明，它们总是在构筑与调节集体与个人的“常态”意识，为我们所期望与预期的世界图景安排秩序，划定界限。从这个意义讲，隐性层面的规则可被视为大多是隐秘的社会与文化**符码**中的重要元素，这些符码以富于社会意义并可预期的方式使人们与群体发生关联、相互传播、进行互动。作为一项表露隐性规则的策略，许多关于隐性规则的讨论都在“真实生活”情景或社会性遭遇等内容与游戏之间加以**类比**。我们很容易理解游戏是怎么构建的，或者说理解游戏是因其规则结构而成为可能。如果没有游戏的规则“图”，那么任何游戏（经过界定）都是不可能的，这些规则用来界定游戏者必须或可能进行运动、展开活动及发生关联的构架与“空间”（空间的、时间的或战略的）。参与某项特定游戏的玩家，往往对显性规则即决定你在某些情形中具体能做什么或不能做什么的正式规定予以承认，加以协商。在这些规则的下面是隐性的、被认为天经地义的规则，这些规则甚至连游戏者本人也很少质疑或检验（如足球赛两边都有一个球门的规则就不受质疑）。Brittan（1973）就此指出，“游戏被有意玩去的时候，不过是从象征层面对基本社会过程的一种定形”（p. 130-1）。

在许多社会互动与传播的情景中，因为我们都是经验丰富或老练的

"玩家"，所以，不用明说我们就认可那些界定"游戏"的规则。虽不明说它们依然在场，通过接受与排斥、**编码**与**解码**、**定向性**与关联性而化定范围，组织游戏。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之所以常常不把自己的行为与隐性规则相联系，主要原因是因为它们都被我们所内化，即通过**社会化**而成为隐含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们已成为我们自身的组成部分，成为我们的习惯、信念及信仰的组成部分，从而使我们懂得正常情况下事情该怎么做。

另一方面，显性规则总会得到确认；同相对的隐性规则相比，它们一般都更显得直截了当，并且以某种更具规定性与可视性的方式调节社会互动。将它们看做不同程度的开放与闭合（允许与禁止的形态）可能比较有用。最明显的具体化显性规则是禁止性与强制性的，如符码化的规章、命令与禁令。这些规则明确规定，在某些情景下什么是人所期待的，什么是人所要求的（不准穿牛仔裤；不准吸烟；不准谈话；靠右行驶；星期五交文章等）。对于**异端行为**或漠视规则的行为，它们一般都带有正式的制裁或惩罚。显性规则的允许形态，赋予个人更多独立权、协商权或决断权。它们并不明说或指定某种狭窄的路径或选择；相反，它们提供一系列可行的、能被允许的**遵从**方式及其选择。这些规则比较接近于**规范**与**惯例**，典型例子包括为正常情况下事情该怎么做所提供的参考（衣帽整洁；开车小心；吃饭文雅；说话规范等等）。

因此，规则在各种移动层面并以不同形态发挥作用。牢记于心的一个重点在于，它们总是属于特定**语境**的。也就是说，它们是某个特定的情景、（**亚**）**文化**、历史时期等的组成部分。同样重要的是承认，我们总是有可能面对"打破"规则或偏离规则的潜在选择。一般来说，规则一旦打破就会变得更加明显，更加清楚，尽管打破规则者将面临各种制裁或惩罚。

鉴于规则在社会与文化关系中所处的核心地位，它总是引发大量理论上的辩论与争论也就不足为奇。比如，**共识**的视角往往强调的是规则的整合（构成）方面的社会功能，即把规则的存在解释成某种证据，表明社会生活归根结底是个大家共享组织有序的统一体。与这种观点相对，冲突的视角则强调管制与控制问题以及规则所蕴涵的权力关系问题，这种关系分布于基本属于*统治者*集团与多少已被成功统治的*被统治者*集团之间。在这个意义上，规则对种种支配性（以及相应的种种隶属性）得以实现、界定

与繁殖的方式而言就是核心所在。拿这两种视角来说，针对规则在互动与传播领域内的研究，就无法同针对社会与文化之过程与结构的更为深厚的理论相剥离。在某种程度上，它们都遇到**象征互动论**学者的反驳。后者强调，规则是构成创造性情景语境的反复（再）协商的元素，总是“需要去攫取”，因而具有潜在的不确定性。

DS

互文参阅：符码（code），遵从（conformity），共识（consensus），惯例（convention），异端行为（deviance），规范（norm/normative），权力（power），模仿（simulation）。

深入阅读：Douglas(ed.)(1973)；Worsley(ed.)(1977)；Brittan(1973)。

谣言(rumour) * 非正式（非官方）的（unofficial）、未经认可的**话语**；某个传播系统中历经若干发展阶段而未加证实之信息的最终结果。* 信息每经过一个阶段，准确性就常常发生某种偏差。谣言的基本特征在于，信息的**接收者**并不考虑它是否准确，因此力图将这种信息传播到某个社会网络的下一环节。经过若干这样的偏差，结果自然同最初的信源大相径庭。信息随着时间发生的选择性流失，可归结到**知觉**、**注意**、**记忆**与**图式/基模**的建构等相关的**认知**过程。

媒介传播活动的增长放大了这种效果，改变了传统上对谣言的理解，即谣言总是同人们面对面的接触相关。从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针对英国皇室婚姻即将破裂所做的持续报道就是一例。许多谣言遵循着同一模式：先是围绕着可能发生的罗曼史而出现的非正式说法，接着这种说法经过报纸的报道而得到放大，最后又是官方的否认。从面对面层面开始流行的信息，最后在社会层面上成为正式的说法。由于这种与某些大众媒介相关的、几乎同时进行的信息传播，将谣言当做事实加以报道便使这种信息实际上合法化，并使之成为某个社会的口头或文字传统的组成部分。这种合法化过程消弭了谣言特有的短命性，使历史中的不准确信息在所难免，还把谣言比作民间传说。

DS

互文参阅：认知（cognition），媒介（media），记忆（memory），图式/基模（schemata）。

深入阅读：Hunter（1964）；Evans（ed.）（1969）；Shibutami（1966）。

S

图式/基模（schema/schemata）　＊最好将图式视为一个**模式**（Baddeley 1976），或一个微型一系统（Phillips 1981），由此我们才能内化、建构或理解某个事件。＊这个术语被用来解释认识的既定方式或建构经验的方式是如何用来理解新的情景的。这种新的情景被调整得适合于那种熟悉的情景。

这表明新信息都经过扭曲以适合既定的期待：这一解释对说明传播过程中的信息流失与变形非常有用。就**认知**的形成而言，皮亚杰①将图式等同于**象征**性表述，它被消化在某种知识框架（intellectul framework）中。比如，一个小孩消化了“童车”（pram）这个**符号**，就会进 -步理解或指认其他限制性但又是活动性的物体。

各种互为补充的图式，最终可能被组织到某种相关的结构或心理图谱（mental map）之中。这样一来，随着越来越多的事件与关系被消化、被加诸这种图谱，或随着认知构造变得越来越复杂，这些图式就可能得到修改或替代。

DS

互文参阅：认知（cognition），记忆（memory）。

深入阅读：Phillips（1981）；Neisser（1976）。

---

① 皮亚杰（Jean Piaget，1896～1980），瑞士心理学家、儿童发展心理学的奠基人、20世纪发展心理学的代表。早年曾师从荣格。1925年起，在日内瓦大学执教。1955年，在日内瓦创建国际发生认识论中心，并任主任。一生出版了50多部著作，尤以对儿童心理发育的研究著称。他认为，儿童的心理发育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其中每个阶段都在不断地形成认识现实的模式，通过将简单概念集合成为高级概念而逐步完成智力的增长。

语义学（semantics） ＊ 从语言学角度对意义的研究。＊ 语义学旨在分析与解释意义如何在语言中得到表达。当前的语义学研究似乎围绕三对重要的关系而构建：

（1）*含义与所指意义*（*sense versus reference*） 某种语言表达式——比如，一个词语——的意义，可从其语言之外的现实联系上予以讨论。例如，“椅子”一词的意义在于，它能由语言向外指涉诸如你在说这个词语时可能正坐在其上的物体。然而，从不同的角度看，某个词语的意义也可从其语言之中的词汇关系上予以考虑。例如，“椅子”一词的意义，又取决于它与“家具”、“桌子”、“凳子”、“长凳”等其他词语的关系。有关含义与**所指意义**之别的一个著名例子，就是客观上为同一天体的行星——金星——可同样恰当地被指称为“晨星”与“暮星”，因为它既能在早晨的天空闪耀，又能在晚上的天空闪耀。因此，“晨星”与“暮星”两个词语便具有相同的**所指对象**，尽管每个词语的含义当然完全不同。语义学更关注含义关系而非所指意义，用维特根斯坦[①]的名言来说：“一个词语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使用。”

但是，忽略含义与所指意义这对关系的哪一边都往往导致失衡的意义理论，而其后果可能超逾语言学领域。比如，值得注意的是，对立的**美学**理论依据它们更倾向于所指意义还是含义而能被分为两个阵营：**现实主义**理论总喜欢将艺术看得好像是一面镜子，或者说以尽可能直接的方式**反映现实**；而其他更注重形式主义的理论则强调艺术**表述**的**惯例**性，将艺术以及更具体的文学视为意义（或“含义”）的一种反复实验。当代文艺理论往往非常注重意义的习俗性基础，以至于有时似乎否认语言之外还可能存在任何现实。至少它坚持认为，现实不是直接传递给我们的，而是通过意义的形成过程被建构的，所以，我们没有路径直接通达语言之外的现实。这种认识的一个隐含问题在于，它能导致某种唯心主义，即现实是经过语

① 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1889～1951），20世纪杰出的哲学家，生于奥地利，后半生执教于剑桥大学。他一生创立两套各自独立甚至彼此对立的哲学体系，而每一体系都具有精深博大的风格，并极大影响了当代西方哲学。前期的代表作是《逻辑哲学论》（1921），后期的代表作是《哲学研究》（1953）。就影响20世纪各种思潮的“语言”问题而论，如果说他前期的思考着眼于“体系”，那么后期的探讨则转向了“实践”——这也正是这里提到的这句名言所概括的精髓。

言的言说才成为现实存在的，而各种关于阐释的争论都堂而皇之地成为**主观性**的，从而排除**文化**与历史的物质性进程。

在现代语义学中，含义关系一直按照词语之间的下列主要关系进行讨论：

(1) *同义关系*（*synonomy*）：可用同样的方式被使用的词语就被看做是同义的；按照这种标准，类似思考的某种表达就被认为与*深思*同义，*愚笨的*就被认为与*笨拙的*同义。

(2) *反义关系*（*antonymy*）：用某种方式颠倒彼此意义的词语就被看做是反义的。如*女人/男人*、*快/慢*、*上/下*、*好/坏*等对举，都表达着反义的关系。

(3) *下义关系*（*hyponomy*）：词语也可在意义的等级关系上使用，其间某个词语的意义包含另一词语的意义。例如，*狗*这个词语就是*动物*这个词语的下义词，后者是个等级更高的术语，它居于同狗相关的一系列同等下义词之上，这些下义词有*猫*、*猴子*、*长颈鹿*、*兔子*等。当然，狗本身又是个等级更高的术语，它居于另外一系列下义词之上，如*terrier*、*猎狗*、*拾猎等*。

因此，同义词、反义词、下义词便构成某种语言词汇中可能具有的、不同种类的含义关系。它们提供了一种方式以对意义的建构进行概念化，就像这种方式在语言系统中的运行一样。这方面值得强调的是，它们展示的是语言的分类而不是“真实世界”的分类。真实世界中没有什么理由，以表明有关动物的术语何以应按英语所用的这种特定的含义关系进行组织，当把各种语言的特定意义领域进行比较后，这一点立刻就变得显而易见。比如，根据沃尔夫①的研究（1956），北美的霍皮部落（Hopi）只用一个词masaytaka以指示除鸟类外的所有飞行物。因此，他们实际上是用同一个词指示昆虫、飞机和飞行员，而英语对此提供了各自独立的词语。

① B·L·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 1897～1941），美国语言学家。他受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Edward Sapir）的影响，发展了一套以“萨丕尔—沃尔夫假说”（Sapir-Whorf hypothesis）闻名的理论。按照这个假说，不同的语言决定了不同的世界景观，从而塑造了不同的文化。

（2）*词语意义与句子意义*（*word meaning versus sentence meaning*）探究词语意义的其他方式，涉及诸如语义学特征与搭配的思想。然而，无论采用什么方式，仅仅通过构成一个句子的单个词语相互累积，恐怕不可能说明它的意义。否则，“人咬狗”就可能表示与“狗咬人”相同的意思。虽然如此，在上述那种词语中的含义关系与那些存在于句子中的含义关系之间，看来还是可能具有相似之处。举例来说，诸如同义的某种含义关系，可视为不仅存在于词语之间，而且存在于完整的句子之间。于是“希拉卖书给悉尼”这句话，就能被看做与“希拉从悉尼那里买到书”这句话同义。同样，这种关系也可以说存在于“警察拘捕了矿工”与“矿工被警察拒捕”之间。存在于句于间的其他种类的关系，还包括**推断**与*预测*（*presupposition*）。*推断*关系是说，假定有两个句子A与B，如果在所有条件下A是真的B就是真的，那么凭借推断关系就可在语义上由A推断B。例如，从“阿喀琉斯杀了赫克托耳”这句话，就可推断“赫克托耳已经死了”。在这些情形中，B作为一个符合逻辑的结果而从A中推导出来。如果阿喀琉斯杀了赫克托耳是真的，那么作为逻辑结果赫克托耳必死无疑。*预测*关系则多少有所不同。大致说来，否定式虽会改变某个句子的推断，但还是会留下适当的预测。想想这个句子（1）“悉尼想及时停止”。由此我们可推断两层意思：（2）“悉尼及时停止了”，或（3）“悉尼试图及时停止”。然而，这些推断的句子，并非按照完全相同的方式起作用。句子（2）“悉尼及时停止了”是句子（1）的逻辑结果——推断，而它在句子（1）的否定式——“悉尼不想及时停止”下不起作用。但是句子（3）是个预测；于是，尽管原初的推断不再有效，但是“悉尼试图及时停止”这个预测还是依然成立。

这些差异，对分析所有种类的话语意义都至关重要。比如，对**意识形态**种种主张的宣扬常常是隐性的而非显性的，是隐蔽的而非公开的；它们常常需要从某个话语的预测或推断上而非其表而的断言上予以重现。例如，一份国防部的小册子强调“英国必须倾其实力……以推迟俄国下一步的入侵行动”，而这里各种未经辩论的论点不过是预测而已；比如，最明显的例子就是：（1）“英国有实力”和（2）“俄国正在展开入侵行动”。

（3）*文本与语境*（*text versus context*） 第三个需要探究与辨析的主要方面是针对这样的问题，那就是有多少意义是由语言系统创造的、传递的，又有多少意义以及这些意义通过什么方式而被任何言说所处语境的关

键性特征决定的。实际上，前面视为语义学意义的某些方面——即语言系统本身的组成部分，现在被当作**语用学**的组成部分了。

过去 60 年的语言学历史，可以解读为意义方面的研究不断推延的过程。当然，这期间也取得了许多进展，从较小的语言组织单位如**音位**到较大的组织单位如句子或**文本**；这也是从本质（**音系学**）到意味（语用学）的一种进展。然而，意义最后还得进入核心地带，而过去十年语用学与语义学都做了大量研究。当然，意义不可能只是语言研究的最终目的；这个领域的发现无疑会对相关的学术领域发生重大影响，如媒介研究、文艺批评、阐释社会学或**认知**科学等，在这些领域意义问题常常也都处于讨论的核心地带。

MM

互文参阅：搭配（collocation），话语（discourse），多重意义（multi-accentuality），语用学（pragmatics），符号学（semiotics），言语行为（speech act）。

深入阅读：Lyons（1981）。

符号学（semiotics/semiology）[①]　* 从符号系统对意义的社会性生成所做的研究。* 符号学与其说是一种学术性的学科（discipline），不如说是一种理论取向（approach）及其相关的研究方法。它还未被完全地制度化为一门学院化的“科目”（subject）。

表明符号学这种临时而边缘地位的证据，就是通常它依然按照“符号学之父”、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②]最初所用的术语加以界定。在 1916 年出

① 按照特伦斯·霍克斯（Terence Hawkes）的说法：“符号学在英语中有两个意义相同的名词：semiology和semiotics，这两个词都用来指这门科学，它们的惟一区别在于，前者由索绪尔创造，欧洲人出于对他的尊敬，喜欢用这个名词；操英语的人喜欢使用后者，则出于他们对美国人皮尔士的尊敬。”（《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年，页 127）

② 索绪尔（Ferdinand Saussure，1857～1913），瑞士杰出的语言学家、现代符号学先驱，其代表作《普通语言学教程》（1916）是他去世后学生们根据笔记以及他的一些手稿等材料编辑整理的。这部里程碑式的著作不仅对现代语言学具有首屈一指的意义，而且对 20 世纪以来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都产生深远的影响。本辞典所涉及的一系列辞条，特别是结构主义与符号学方面的辞条均与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相关。其中较常见的有“语言/言语”、“能指/所指”、“组合关系/联想关系”、“共时态/历时态”等。

版的一部著作里，他提出了一门“研究社会中符号生命的科学”。这一设想主要由法国**结构主义**学者罗兰·巴尔特[①]所承继，他在1960年代对普及与拓展符号学发挥了关键作用。

作为一项艰巨的精神探求(intellectual enterprise)，符号学力图揭示与分析**意义**是如何产生于任何**符号**系统所具有的结构性关系，而非产生于看似由符号天然描绘的外在现实。既然它依赖系统关系的思想，而这种关系又体现在抽象的结构(也就是说，不能被直接观察的结构如语言)之中，所以符号学就趋向于抽象化、形式主义及对历史渊源的轻略。然而，既然它同样得依赖意义的社会性生成(语言不能由个人发明)，所以符号学又总是致力于将意义的生成同其他类型的社会性生成和社会关系相联系。

作为一种方法，符号学从语言学获得其术语，并以口语为某一符号系统的首要例证。然而，符号学的发展与成功与其说在于分析言语，不如说在于分析其他的符号系统，特别是文学、电影、出版、照片与电视。实际上，符号学主要同与日俱增的、针对不同形式的**大众文化**所做的严肃研究相关连。在这种语境中符号学尤为有用，因为大众文化在以往的学术研究中是个被严重忽视的领域，而现在的这般关注往往要么对其极尽贬损，要么将它局限为美国**观察实验法**社会学探讨的一个分支。符号学至少原则上不会以评判某个特定**文本**的那种艺术或道德的优越感探究大众文化（这种探究在某些文艺批评中很常见），也不会像经验社会学只能而对单独的文本而无法涉及广泛的类型。

因此，符号学起初是以文本为中心的，因为它致力于分析**意义系统**如何通过文本产生意义。但随着它的发展，注意力便越来越放到读者以某种互动形式从文本化信源识别或产生意义的作用上面。例如，符号学开始揭示，文本是如何对其特定符号系统的符号、**符码**等进行重新加工，从而建构起来的，而这些建构又如何使**神话**、内涵（connotation）等普遍化。符号学进而表明这种文本化结构以及诸如观点、**说话方式**、**倾向性解读**等策

① 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法国结构主义思想家，著名作家、文艺批评家、符号学家，对符号学理论颇多建树，1976年任法兰西学院符号学讲座教授，成为该讲座的第一位学者。主要著作有《神话集》（1957）、《符号学原理》（1964）、《S/Z》（1970）、《罗兰·巴尔特论罗兰·巴尔特》（1975）、《恋人絮语》（1977）等，这些著作均有中译本。

略如何提出甚或确立某种立场，而读者通过这种立场才能理解意义——**主体**的定位化。如下这点已经清楚，“实际的”读者可能不必持有**意识形态**文本与**话语**赋予他们的立场，而迄今为止注意力过多放在有关解读的**认知**活动或理性活动上，对相关的**快乐**与欲望问题则关注不够。因此，符号学被迫考虑文本所处的社会化进程，考虑在这些社会化进程上快乐的作用。

显然，类似这些问题并非符号学所独有，事实上在符号学与其他艰巨的精神探求之间存在富有成效的相互影响与受益，这些探求中比较突出的有**精神分析理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以及各种各样的社会学理论。

不过，符号学的独特面貌依然存在，它依然力图从普遍性与具体性上详细说明意义如何生成于社会（而不是由个人所创造），意义又如何受制于**权力**关系与权力斗争，就像其他类型的社会性生成一样。即使它把注意力转向个体读者，那么这也不应理解为回归独立而抽象的**个体**，而是说这种个体/主体的个体性基本属于一种意识形态话语与表意行为的产物，而这些话语与行为是她/他在社会关系中所栖居或遭遇的。

JH

互文参阅：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

深入阅读：Culler（1976，1983）；Hawkes[①]（1977）；Fisk（1982）[②]。

发送者/接收者（sender/receiver）　＊一般来说，发送者与接收者分别是指处于直线传播模式的起点与终点的关键环节(the key points)，尽管在某些模式中，发送者前面可能还有*信源*(source)，而接受者后面可能还有*反应*(reaction)。＊*发送者*与*接收者*都是最普通的术语，即使非专业者也不难理解。但在其所指领域我们会遇到一些更专业的术语，这些术语中最常见的有：

编码者/解码者(encoder/decoder)　使用这些术语就意味着，我们将**讯息**看做某种抽象的存在，编码赋予它某种能被传输的具**体形式**，而解码

---

① 即T·霍克斯的《结构主义与符号学》（*Structuralism and Semiotics*），中译本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1987）。

② 即J·费斯克的《传播研究引论》（*Introduction to Communication Studies*），中译本收入台湾远流出版公司的“传播学名著译丛”(1995)，名为《传播符号学理论》（张锦华译）。

则将它恢复为原初的抽象内容或意义。这是过程学派①使用它们的意味。但这些术语（或更常见的动词形式*编码与解码*），也在**符号学**、语言学的学派中使用。这里，它们意味着一个**文本**是由若干符码所构成，而这些符码又来自其他文本与文化产物：拥有几乎相同**符码**（作为几乎相同的**文化经验**之结果）的编码者与解码者，在文本中会产生几乎相同的意义，而那些拥有不同文化经验以及不同符码的编码者与解码者，可能会发现完全不同的意义。

说话者/听话者（addresser/addressee） 这是语言学家雅格布森②所用的术语，表明双方间的某种关系，其间某种说话方式是恰当的。针对听话者，说话者具有某种定向性，这种定向性影响着讯息的形式与功能。

传输者/接收者（transmitter/receiver） 这是些用于拓展人类的传输能力因而也是传播范围的技术③，但有时也被过程学派用来指人类。

作者/读者（author/reader） 这些术语涉及编码与解码的符号化行为（见上）。读者像作者一样具有创造性，因为双方都是通过自己所用的符码为**文本**带来自己的文化经验。作者也可通过文本化的方式，尽力将其“作者性/权威性”（authority）④强加给读者（也就是说可以将读者导向某种**倾向性解读**），但是作者不可能绝对做到这一点。读者是**文本**的意指系统与文化的**价值**系统相互交集之处，而解读过程就是由此导致的意义生成过程。

JF

---

① 过程学派（the process school），即把传播活动看做一个有始有终的过程，其起点对信息进行发送，而其终点则对信息加以接收。

② 雅格布森（Roman Jakobson，1896～1982），原籍俄国的语言学家，“布拉格学派”的主要奠基人。早年曾任莫斯科“高等戏剧学校”俄语教授，1920 年代在布拉格开创了语言学研究的布拉格学派。1941 年流亡美国，先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后任哈佛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与普通语言学教授（1949～1967）。他的研究不仅对现代语言学建树颇丰，而且对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也影响广泛。特别是他所创立的布拉格学派，一方面前承索绪尔的开创性工作，另一方面又后启 1960 年代法国结构主义的一脉思潮。

③ transmitter在英语里有话筒、发射机、发射台等意思，而receiver有听筒、耳机、收音机、电视接收机等意思。所以，这里先说它们是传播技术。

④ authority的字面意思通常是一种强制性的威权，而从词源上考察它又是来自拉丁语的“作家”（author）。所以，这里使用authority有一语双关的意思：一者指文本中所体现的作者意图即所谓作者性，再者又指这种意图在解读活动中所具有的权威性。

含义/含义关系（sense/sense relations） ＊某个词语或表达式（expression）由于在某个语言系统内的位置而具有的传播价值。＊某个词语或表达式的精确价值，可以依据它与这种系统中其他词语的含义关系加以探究。含义关系的特殊类型包括反义、同义与下义(参见**语义学**)，它们分别属于相反意义、相同意义与包容意义等关系。当然，所有的词与表达式都能保持多重含义，尽管语境通常会突出某种含义而排除其他含义。

MM

互文参阅：意义（meaning），多重意义（multi-accentuality），多义性（polysemic），语用学（pragmatics），语义学（semantics）。

深入阅读：Lyons（1981）。

符号(sign) ＊一个符号具有三个基本特征：它必须有某种物质形式、它必须指自身之外的某种东西、它必须被人们作为某种符号使用与承认。＊巴尔特[①]举玫瑰为例：通常情况下一朵玫瑰就是一支花，但如果某位年轻男子将它献给女朋友，那么它就成为一种符号，因为它代表其浪漫激情，而她也承认玫瑰的这种意义。

符号和符号被组成**符码**或语言的方式，是任何传播研究的基础。符号可以具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如词语、手势、相片或建筑特征。研究符号、符码与文化的**符号学**所关注的是，确认符号的基本特征以及它们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的方式。

索绪尔[②]将一个符号剖为两个构成性元素——**能指**（被我们感官所把

---

① 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法国结构主义思想家，著名作家、文艺批评家、符号学家，对符号学理论颇多建树，1976年任法兰西学院符号学讲座教授，成为该讲座的第一位学者。主要著作有《神话集》(1957)、《符号学原理》(1964)、《S/Z》(1970)、《罗兰·巴尔特论罗兰·巴尔特》(1975)、《恋人絮语》(1977)等，这些著作均有中译本。

② 索绪尔（Ferdinand Saussure，1857～1913），瑞士杰出的语言学家、现代符号学先驱，其代表作《普通语言学教程》(1916)是他去世后学生们根据笔记以及他的一些手稿等材料编辑整理的。这部里程碑式的著作不仅对现代语言学具有首屈一指的意义，而且对20世纪以来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都产生深远的影响。本辞典所涉及的一系列辞条，特别是结构主义与符号学方面的辞条均与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相关。其中较常见的有“语言/言语”、“能指/所指”、“组合关系/联想关系”、“共时态/历时态”等。

握的物质形式）与**所指**（所指之物在心中形成的概念）。皮尔士[①]认为，符号有三种类型——**肖像、标志与象征**。这两位理论先驱，都对这一领域的此后研究产生重大影响。

索绪尔强调，一个符号只有在与同一符码或系统的其他符号的相对关系中才能得到恰当的理解：从一定程度上讲，其意义是由其他不具有该意义的符号所确定的。圆顶高帽的意思只在人们说它不是高顶黑色大礼帽，也不是软毡帽的情况下才是明确的。男孩这个符号是作为非—男人或非—女孩被理解的，男人是作为非—动物或非—上帝被理解的。作为语言学家，索绪尔主要感兴趣的是某套符码中符号的相互关系，以及某个符号的能指与所指关系。他对符号同其**所指对象**——现实的关系（他称之为**意指**）不感兴趣。

与之相对，皮尔士至少将这种关系看得同其他关系一样重要。他像其追随者奥格登与理查兹[②]一样都采用哲学家的观点，相信某个符号仅在同其他两个元素的关系中才能得到研究，这两个元素可简单地表述为*心智（mind）与指涉现实（referential reality）*。他用来表达这两个元素的术语分别是**思想**与**对象**；奥格登与理查兹的术语是**所指意义**与**所指对象**。

JF

互文参阅：意指（signification），能指（signifier），象征（symbol）。

信号（signal） * 在传播理论中，信号是指讯息为了得到传输而被赋予的物质形式：这个术语不关乎内容与意义，而仅指讯息的物质实体（the physical existence）或形式。*

JF

---

① 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1839～1914），又译皮尔斯，美国哲学家、科学家、逻辑学家，实用主义的初始人，被视为美国最有创建和最多才多艺的学者，尽管他生前并不得志。在发展现代逻辑中，皮尔士曾对符号问题做过深刻而独到的论述，为现代符号学与传播学提供了影响深远的思想。比如，他曾经将符号（sign）分为三种，即肖像（icon）、标志（index）与象征（symbol）。

② 奥格登（C. K. Ogden，1989～1957），英国作家、语言学家，Basic English的创始人。里查兹（I. A. Richards，1893～1979），英国评论家、诗人。他们曾合著《意义的意义》（1923）。

意指(signification) * 对索绪尔[①]来说，某个**符号**或符号系统与其指涉现实(referential reality)的关系即为意指。* 巴尔特[②]充分采用这个概念以指符号在某种**文化**中的作用：他在索绪尔对这个术语的使用上增加了种种文化**价值**的向度（dimension）。

巴尔特识别出两个*意指序列*(orders of signification)：一是外延（即索绪尔所说的“意指”）序列，二是*内涵*与*神话*序列，它是在第一序列的符号意义遭遇文化的价值及文化的既定话语之际显现的。

意指的第一序列：外延(denotation)　它是指某个符号与其**所指对象**间的简单关系或字面关系。它假定这种关系具有**客观性**而无涉价值——不管它们存在多少差异，“马”、“骏马”、“驽马”等词语都表示同一种动物。当照相机对着什么东西产生其影像时，照相机的机械/化学功能就属于外延。这个概念一般只用于分析的目的；实际上不存在类似客观的、不关价值的意指序列这类东西，除非像数学那种高度专业化的语言：4＋8＝12属于一个纯粹的外延表述。

意指的第二序列：内涵(connotation)　内涵出现在符号的外延意义用来代表文化或文化使用者的价值系统之际。于是，它形成意义中那些联想的、意味深长的、有关**态度**的或是评价性的隐秘内容。以照相为例，机械/化学过程产生外延意义，但是，人对焦距、取景与光线之类特征的有意选择则形成内涵。因此，内涵是由能指的形式所决定的：即是说，改变第一序列的能指而保持同一所指，是控制内涵意义的方法。举例来说，同一姑娘的两张相片，一张聚焦清晰，另一张则聚焦朦胧；同一个词用不同声调说出，或用不

① 索绪尔（Ferdinand Saussure，1857～1913），瑞士杰出的语言学家、现代符号学先驱，其代表作《普通语言学教程》（1916）是他去世后学生们根据笔记以及他的一些手稿等材料编辑整理的。这部里程碑式的著作不仅对现代语言学具有首屈一指的意义，而且对20世纪以来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都产生深远的影响。本辞典所涉及的一系列辞条，特别是结构主义与符号学方面的辞条均与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相关。其中较常见的有“语言/言语”、“能指/所指”、“组合关系/联想关系”、“共时态/历时态”等。

② 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法国结构主义思想家，著名作家、文艺批评家、符号学家，对符号学理论颇多建树，1976年任法兰西学院符号学讲座教授，成为该讲座的第一位学者。主要著作有《神话集》（1957）、《符号学原理》（1964）、《S/Z》（1970）、《罗兰·巴尔特论罗兰·巴尔特》（1975）、《恋人絮语》（1977）等，这些著作均有中译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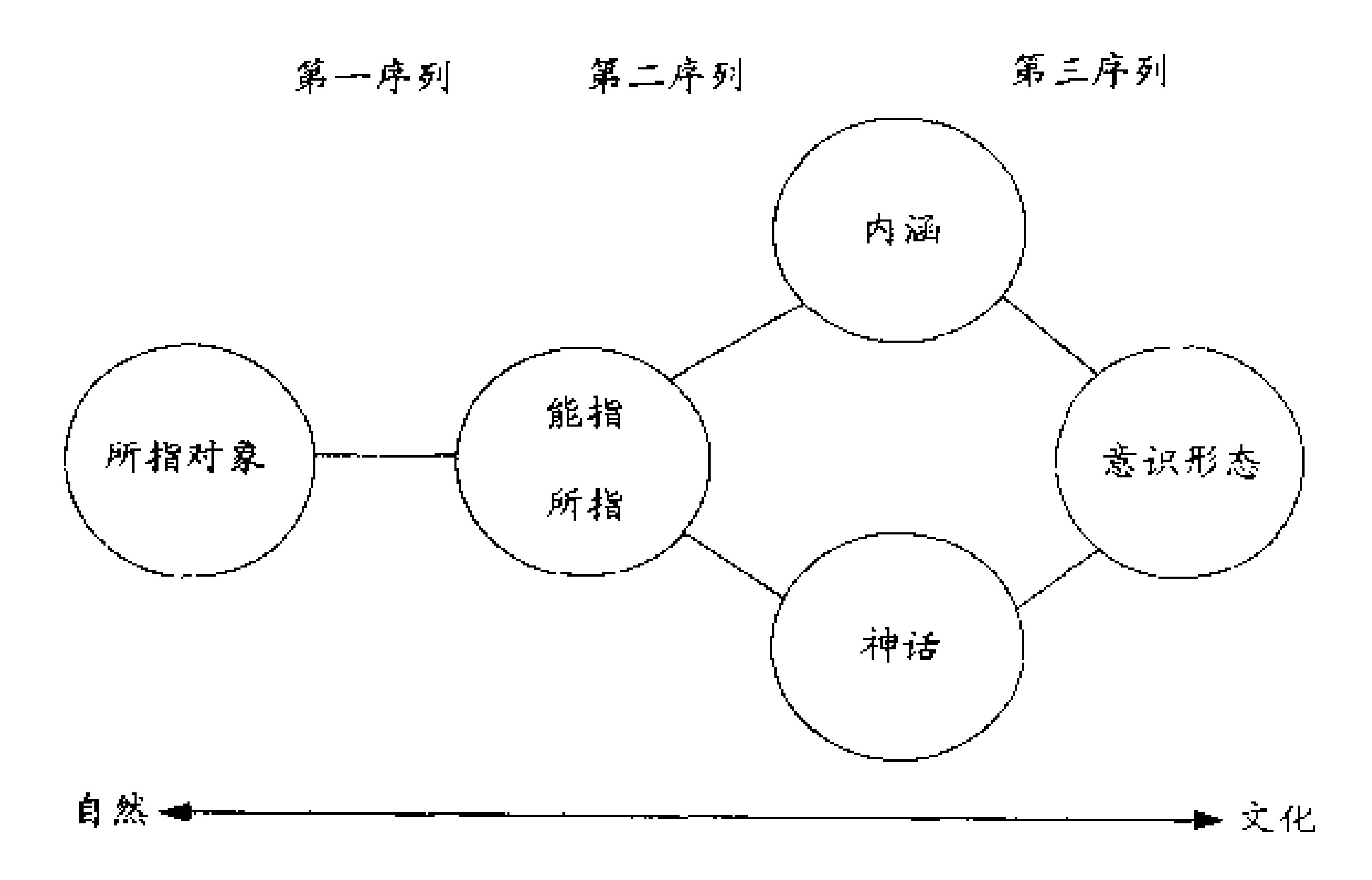
同字体印刷；或者在“马”、“骏马”、“驽马”间的选择。内涵通过风格与色调而起作用的，它关注的是*如何*传播而不是传播*什么*。

意指的第二序列：神话(myth)　巴尔特对**神话**这个术语的使用非常特别，它是指遍及某种文化的一系列广为接受的概念，其成员由此而对自身社会经验的某个特定主题或部分进行概念化或理解。比如，我们的乡村神话就包括一系列这样的概念，像什么乡村是美好的、自然的、心清神爽的、宁静的、优美的、休闲养身的等等。相反，我们的城市神话则包含这样的概念，像什么违反自然的、壅塞的、劳作的、紧张的、压迫的等等。这些神话对其指涉对象而言是任意的。比如 18 世纪，城市就被*神话化*为美好的、文明的、优雅的、彬彬有礼的；而乡村则是丑恶的、不文明的、粗野的、原始的。一幅典型的 20 世纪广告所表现的幸福家庭，就是全家在农场的小溪旁野餐，背景处停着他们的小车。妈妈在准备食物，爸爸与儿子在踢球，女儿在摘花。这幅广告作为一个引子，激活我们有关乡村、家庭、性别角色、工作与休闲的*神话*。为理解这幅广告，我们必须将自己对这些主题“进行概念化的方式”（或我们的神话）引入其中：如果没有这些神话，那么这幅广告对我们来说就意味着某些不同的意思，或者可能完全没有意思。因此，*神话*这个术语不仅用在外人说的某种“虚假信仰”这层含义上，而且用在人类学说的“将某一抽象主题加以概念化的某种文化方式”这层含义上。神话是概念化的，在所指的层面上发挥作用；内涵是评价性的、诉诸感情的，在能指的层面上发挥作用。

意指与意识形态：第三序列　费斯克与哈特利[①]（1978）认为，某种文化的内涵与神话是其**意识形态**的显性符号（manifest signs）。不同的内涵与神话合在一起形成某种协调的类型或整体的意味，也就是说它们可以“讲得通”（make sense），而这就证明存在某种隐而不彰的、潜在的组织化原则——意识形态。巴尔特将内涵意义（内涵的所指）称为“意识形态的**修辞学**”时，已经确认了某种类似的关系；而费斯克与哈特利认为，将意识形态看做意指的第三序列可能更有助于思考意识形态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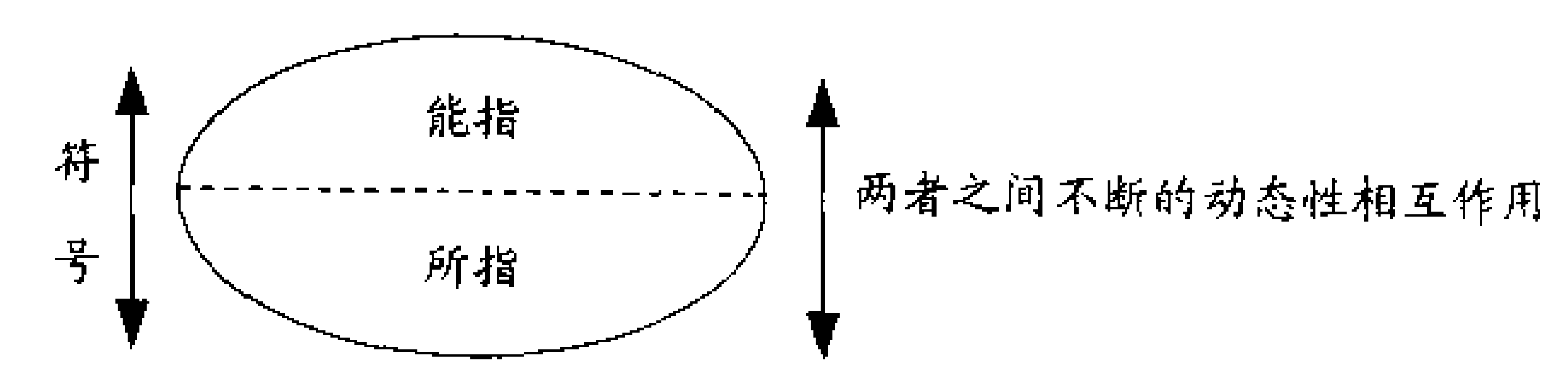
---

① J·费斯克与 J·哈特利，均为英美著名的传播与文化研究学者，与 S·霍尔、R·威廉斯、R·霍加特、D·莫利等同属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即 CCCS）。1978 年，二人曾合作出版了《解读电视》（*Reading Television*）一书，他们也是本书的作者。



互文参阅：符码（code），意识形态（ideology），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能指/所指（signifier/signified）。

能指/所指（signifier/signified） ＊按照索绪尔①的理论，它们是共同构成一个符号的一对概念。他用模式予以说明：



能指是我们通过自己的感官所把握的符号的物质形式（the physical form）——如一个词的发音或一张相片的外观。所指是符号使用者对符号指涉对象所形成的心理概念（mental concept）。＊两者的关系或是任

① 索绪尔（Ferdinand Saussure，1857～1913），瑞士杰出的语言学家、现代符号学先驱，其代表作《普通语言学教程》（1916）是他去世后学生们根据笔记以及他的一些手稿等材料编辑整理的。这部里程碑式的著作不仅对现代语言学具有首屈一指的意义，而且对20世纪以来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都产生深远的影响。本辞典所涉及的一系列辞条、特别是结构主义与符号学方面的辞条均与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相关。其中较常见的有“语言/言语”、“能指/所指”、“组合关系/联想关系”、“共时态/历时态”等。

意的（arbitrary），或是肖像的。在任意符号中，所指与能指之间不存在什么必然的关系：能指的形式是通过惯例或使用者的赞同而获得的。在肖像符号中，所指的性质会影响能指的形式：能指看起来或听起来像其所指（参见（符号的）动机）。

只是为了分析的便利才用到这些术语，认识这一点很重要：一个符号实际上不可能分为能指与所指，就像一枚硬币不可能切出正面与反面一样。索绪尔相信，口头语言的任意性是它具有错综复杂性、精微表现力以及有能力承担广泛功能的主要原因。

JF

互文参阅：（符号的）动机（motivation,of the sign），符号（sign），意指（signification）。

模仿/游戏（simulation/game） ＊ 为了边做边学的目的而对现实进行的一种工作性表述过程（working representation）。＊ 严格说来，模仿行为容易让人想到诸如模式与实验等其他概念，因为它们也在建构人为的活动世界，而这些世界也被认为是对现实的反映。传播与文化研究所关注的，是将模仿与游戏用作一种人类学工具，而这种工具证明有助于进行实验性学习（experiential learning）。这是一种以学生为中心的方法，旨在对有关传播的许多问题进行实际的学习与探究。这些方法在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中获得迅速普及，并对传统的“板书加灌输”教学法给予补充（甚至取代）（见 Jones，1985；Marshall and Williams，1986；Crookall and Saunders编，1989）。游戏的概念可以作为模仿的同义词使用，因为两者都涉及对虚幻情景中的规则与角色进行协商，并常常包含某些相关的竞争因素。如果能在游戏与模仿之间做一划分，那么一般来说游戏总得确认赢家与输家，而模仿的参与者则既有竞争又有合作。

媒介的模仿与游戏，可以作为具体解说的例证。比如，《Front Page》（Jones 1986）要求参与者以事先提供的虚构报道编辑一张日报的头版。《What's News》（Gamson 1984）包含同样的编辑过程，但这次是做电视新闻，而且是用真实的报道。在这种练习之后，就可能将完成的作品与一家美国电视网实际播出的新闻节目进行对比。另一相关的活动是角色扮演（van Ments 1983），它用以展示人际传播和群体之间与之内发生的种种冲突。最具说服力的例子是《Starpower》（Shirts 1971），它允许某个特殊

群体在半途改变游戏规则——这样一来无一例外会使自己受益，对许多社会情景而言这个过程都反映着支配、歧视及**权力**关系的格局。

进行这些活动时应该小心，因为牵涉竞争与获胜的游戏因素极易伤人或是在群体内制造敌意。当然，对模仿性游戏的频频批评——即它是虚幻的，因而是了不相干的——往往遭到反驳，因为一旦人们参与其间，那么这种人为状态就被忘却。游戏结束以后对它进行彻底讨论，属于组织者或促进者（而非“教师”）的职责——按字面意思讲即所谓汇报（*debriefing*）。对许多游戏来说，这是最严重的失败：由于计划不周，或因参与者被这项活动所吸引而无法平静下来，结果不能在分析活动的开展上投入足够时间。而成功的汇报，则包括对这些理论主题的讨论，如发现、改变与打破规则、活动符码、甚至自我认同，这些问题同角色扮演情景下的某部分表演有关。概念化问题也将得到探究：以前面提到的媒介模仿为例，汇报中的典型问题包括**刻板印象**、煽情主义、编辑活动、**检查**、**议程设置**与**异端行为扩大化**（参见 Dyer 1982）。因此，模仿活动的主要益处在于提供实际的经验，而这种经验能被用来解释与探讨传播研究中的主流问题。正如Williams所说（1976b），一个重大问题是某些教育权威——我们且称他们为“教师老朽”（pedagogic dinosaurs）——能够禁止这种活动，因为以往一向是反对成人通过游戏进行学习。

DS

互文参阅：拟剧论（dramaturgy），经验（experience），实验（experiment），方法论（methodology），角色（role）。

深入阅读：Crookall and Saunders（eds）（1989）；Williams（1976b）；Jones（1986）。

社会化（socialization） ＊ 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讲，这个核心概念是指把生物人改造为积极参与某个社会的成员而进行的所有那些错综复杂与多重面向的过程与互动。＊ 简言之，这个术语是指我们成为社会人与被造成社会人的途径；比如，White（1977）提出，它描述的是“学习在社会生活中的那种漫长而复杂的过程”（p. 1）。尽管许多学者同意这种通用的解释，但有关社会化的研究最好被视为一个针对许多疑难与问题的平台，这些疑难与问题本身就属于有关社会结构、社会关系与文化关系之性质以及个体等不同观念相互冲突的产物。这里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是，个体或**群体**经

过社会化而成为什么。这个问题可以用多种方式提出。首先，我们或人们出生之际进入的是什么环境？经过社会化我们面对的是什么文化，是什么成套的**价值**、**规则**、**意识形态**与社会情景？这个过程就是常常所说的文化传染（cultural transmission）。其次，作为对这一过程的结果或反应，我们成为什么？这个问题同有关我们的**主体性**、自我意识与**个体**认同之起源与发展的争论交织在一起。这些问题本身又进一步提出一系列涉及社会化之“如何进行”的问题——这样的过程是如何完成的，是通过什么机构完成的。这个过程是由一个预先限定的、几近刻板的社会逻辑——它将个体“齿轮”嵌入社会的“大机器”——所主导呢，还是说我们应该更多地考虑对自我一意识与认同通过实际**互动**与**语言**习得而得到的协商式发展进行检验呢？

关于社会化那种直觉的、理所当然的观点认为，它基本上关注的是儿童与儿童时期；它是所有儿童都经历的一种早期的“全面训练”或“塑型”。这种观点在许多方面支撑着传统社会学与心理学的研究。不管怎样，注意到这种观点中常常蕴涵的决定论、机械式、单方面意味都是重要的。从定义上看尚未成熟与尚未调教的儿童，正如Campbell（1975）所言，“对社会秩序构成巨大的、无法估量的威胁”，他们通过指导、奖励与处罚的程序化系统而被改造为成熟的、合格的、调教好的社会化成年人。儿童是个“空器皿”，等着由其社会的社会与文化积淀去填充。按照这种观点，如果他们未得到填充，或者说未得到恰当的社会化，那么就会导致某种有缺陷行为或**异端行为**。这种正统的社会化观点，近年来越来越受到批评、反对与补充。

首先，问题出在某种**限定**与社会一体化上。Wrong（1961）曾指出，正统的**功能论**观总是夸大社会化的保守性功能。他力斥这种思想，即“社会”通过使个体简单而毫无疑问地“适应”预先确定的社会**角色**而保存与复制“自己”。他将这种观点称为“过分社会化”，进而指出它不能恰当地说明社会变迁与个体差异。从这种批评中产生有关个体积极参与的问题。

像米德[①]与Schutz这样的**象征互动论**者就论述到，涉足社会化的个体是个积极的参与者，能够越来越多地对学习情景的界限与规则进行协商与重新解释。这就意味着远离那种消极的“吸纳”（absorption）**模式**，这种模式以家长—儿童、教师—儿童等关系而成为传统观的特征。

近来的研究隐含着从逻辑上对这一模式的进一步背离。按照正统观点，社会化是个随着主体由童年经少年到成年而渐渐停止的过程。在许多方面，教育都被看做是至关重要的，而完成学校教育被等同于这个过程的终结或至少是这个过程中一个意义重大的突破。这里有两个问题比较重要：社会化应被视为一个有限的过程——在发达社会结束于十七八岁呢，还是应看做实际上是个终生的过程——体现于所有新与旧、熟与生（familiar and unfamiliar）的互动之中呢？比如，Berger与Luckmann（1977）区分了初级（primary）形式与次级（secondary）形式的社会化，但是，在其讨论中他们也注意到“社会化从来不是全面的，绝对不是已经完成的”（p. 157）。其次，这个问题反过来又提出儿童期的社会化与后来经验的关系问题。在多大程度上，基本的、不能改变的行为与思想特征是在儿童期确立的？尽管这个问题大家都已提出，但是，比如在戈夫曼[②]的研究中（1968）还是显示，某些进入职业或类似监狱与精神病院等制度化环境的*再社会化*过程，可能强烈地挑战与改变个体的认同与自我意识。

最后，许多当代研究都触及**权力**关系的问题，都提到不平等与社会控制的问题常被主张共识的正统研究所忽略。在这个意义上，不仅社会化而且儿童与青少年的全部概念都经受批判性的重新检视（Aries 1962;

---

① Q·H·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 1863～1931），美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实用主义代表人物，芝加哥学派奠基人，该学派以象征互动论著称。米德平生著述虽然不多，但身后由其学生编辑整理的《心智、自我与社会》（*Mind, Self, and Society*）却是一部社会学经典。他的主要学术贡献之一，是对自我起源的论述。他将“自我”（self）划分为“主我”（I）与“宾我”（me），而不论主我还是宾我都是在社会化的互动过程中形成的，这种互动过程主要通过象征（symbol）或符号进行的，比如语言就是一套象征系统。

② E·戈夫曼（Erving Goffman, 1922～1982），美国社会学家，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拟剧论的提出者。按照拟剧论，人生犹如演戏，社会好似舞台，每个人都分别扮演一定的角色。其间，又有“前台”（front stage）与“后台”（back stage）之分。活动在前台的是主我（I），退到后台的是宾我（me），主我演绎着人生的戏剧，宾我则从这出戏剧中抽身出来，获得片刻的休整。

Murdock and McCron 1976）。更具体地说，社会化者与被社会化者——父母、教师、儿童等等之间的关系，都被置于**阶级**关系与**性别**关系的语境。这一取向完全改写了社会化的功能，它从种种具体的价值、思想与行为的社会再生产与**文化再生产**方面重新界定了社会化的功能，它认为这些方面都在标举与维持社会的阶级、性别与其他关系，从而使源于它们的不平等与意识形态永久化。

因此，社会化是个需要仔细考量的术语。它的种种含义通过这些讨论与不同解释而得到有效的透视；其中呈现出一些根本性的问题。

TO

互文参阅：阶级（class），文化再生产（cultural reproduction），性别（gender）。

深入阅读：White（1977）；Halliday（1978）；White and Mufti（eds）（1979）；Berger and Berger（1976）；Bernstein（1971）。

言语行为（speech act） * 由属于某一互动过程的某个言语表达（utterance）所实施的行为。* 这个概念出自哲学家J·L·奥斯汀[①]的著述，他表明许多言语表达的价值主要不在于它们所说的内容，而在于它们所做的事情。实际上，就许多言语表达的情形而言，与其问“它所说的是真是假”，不如问“这种言语表达想要做什么?”更有意义——我们若是想想下列这些在平常的言语表达中非常普通的例句，也许就明白了：

“我打赌他不会来。”
“停在左边。”
“你好。”
“请系好安全带。”

---

① J·L·奥斯汀（John Langshaw Austin,1911～1960），英国语言哲学家、日常语言学派的代表人物，以对日常语言的独特分析而知名。早年曾就读牛津大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英国情报部门服役。战后回到牛津，成为怀特道德哲学讲座教授，并推动“日常语言研究运动”。其代表作有《哲学论文集》（1961）、《如何以言行事》（*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1962）等。日常语言学派与理想语言学派相对，是当代影响最大的两大语言哲学流派：一者青睐鲜活多义的日常语言，一者追求逻辑严密的理想语言。

"好的。"

"滚开（或其他达到这种效果的词语）。"

"现在我宣布花园节开幕。"

这些言语表达为所有言语行为提供了具体例证，包括*打赌*、*命令*、*招呼*、*请求*、*知晓*、*伤害*等等。这些言语表达没有哪个只限于确认某种陈述是真是假。这类观察所得就使奥斯汀得出结论，陈述或断定（以可被判定是真是假的方式）仅仅是**语言**可能实现的许多行为之一——其他不同的行为还有警告、承诺、命名、例示、评论、挑战等。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没有词语，那么我们很难设想许多这类言语行为该如何实施。从奥斯汀所做的开创性工作以来，大量的研究都致力于识别确切的言语行为，同时针对询问或命令这类最普通的言语行为而确切说明其识别标准。

对传播与文化研究而言，这是一个重要的概念，部分原因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反拨简单化的线性传播模式的方式，按照那种模式，传播只是"信息的传输"或"意见的交换"；它在有关社会互动的研究领域也产生影响，因为，它为不同的研究传统——从**话语分析**到传播的人种志研究提供了一种分析工具。

MM

互文参阅：**话语**（discourse），语言功能（language, functions of），语用学（pragmatics）。

深入阅读：Austin（1962）；Montgomery（1986）；Searle（1969）。

言语共同体（speech community） ＊一组使用某一共同语言或**语言变体**的人群。＊从最明确的意味上讲，一个言语共同体在使用共同的语言上表现出共同的方式，并在某个特定社会内对这种语言表现出共同的态度。这个概念的重要性在于凸显**语言**的这个方面，即语言不仅是作为一种抽象系统而存在，就像语法书籍与词典所写的那样；语言同时也融会在日常的社会生活中，并最终属于其使用者所构成的共同体。正是他们使语言反复融入其日常接触中。

与此同时，这个术语又陷于重重困难。首先，提到"言语"就使人想到过去那种面对面接触的社会，而对于印刷与电子传播方式所全面开启的一系列不依赖言语的媒介化互动社会来说，这似乎是不恰当的。有些语言

学家现在就以*语言共同体*取代这个术语。

其次，所谓“共同体”在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似乎属于某种用词不当的东西。这不仅仅是劳动分工的问题。比如，拿英国社会来说，物质利益方面的总体不平等状态继续加剧着**族群**、**性别**、**阶级**与区域的分化，这一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明显。如果这个社会不仅显示差异，而且显示基本的分化，那么，言说活动本身就不可能独自维持一种共同状态，它将在互相对立的情形中表现得越来越活跃。

MM

互文参阅：反一语言（anti-language），标准语言（standard language）。
深入阅读：Montgomery（1986）。

言语事件（speech event） * 具有明确界限、依赖某些既定而公认的程序化言说的一种文化上的显著事件。* 言语事件包括：“演讲”、“求职面谈”、“测验活动”、“布道”、“课堂授课”、“宴会后的演说”，等等。典型的言语事件都有一个可识别的开端、过程与结尾，以便其**文化**（或者更具体一些说**言语共同体**）成员能够明确地识别进出它们的转换时刻。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某个言语共同体的突出言语事件，无不潜在地要求不同类型的参与行为。同样情景中的同样参与者，从一种言语事件到另一种言语事件时，可能就从一套言说活动转向另一套言说活动。比如，在一间教室里，老师与学生上课前不分彼此随意交谈；但是，一旦开始上课（这将由老师以某种方式公开表示），那个决定谁对谁说、什么时候说以及如何说的规则就如期发生变化。比如，喊叫与发誓这类对某些言语事件可能是恰当的言语行为，对大多数课堂授课来说就被视为不恰当的。

这个概念在社会语言学与传播的人种志研究方面尤为重要，在这两个领域它现在常常被看做*传播事件*（*communicative event*）。

MM

互文参阅：性别（genre），语域（register），言语行为（speech act）。
深入阅读：Sackville-Troike（1982）。

标准语言（standard language） * 在某个语言共同体中假定具有优势的一种方言，以至于其内在规则成为整个共同体所尊奉的正误标准。* 某种标准语言的威望与权威不是来自它的丰富多彩而是来自它本身，这主要因为

一般它是从统治集团的方言发展而来的。某种标准语言的出现，往往同民族的建构过程相联系；正如民族是社会领域的想像共同体（imaginary communities）[①]，标准语言同样是语言领域的想像体系——我们许多人其实并不说标准语言，尽管我们大多认为自己在说或相信自己应该说。标准语言出于想像的性质，被编撰规范性语法书籍、使用指南及词典的人为过程所冲淡。所有这些过程都有助于赋予这种标准语言以某种虚假的真实感，或许比英国女王的圣诞电视讲话还获得更大的成功，那种讲话力图使我们相信我们全都属于同一个民族（或联邦）。

MM

互文参阅：方言（dialect），语域（register），语言变体（variety）。
深入阅读：Milroy and Milroy（1987）；Leith（1983）。

明星(star/stardom)　＊由于在银幕与其他媒介上的公开表演而出名，并被视为各种文化群体之内与之间重要**象征**的个体。＊明星属于现代的、世俗的肖像（icons），是公众从其舞台与银幕之上——与之外——的虚构外貌与表演中产生的种种理想与**价值**的化身。按照Monaco（1977）的说法，明星的**权力**或魅力部分在于这个事实，即他们似乎属于“普通人……而又被莫名其妙地弄成重要人物”。通常我们在看待明星时都受到这样的暗示，认为明星的优越超群不仅仅是因为其广为流传的、来自电影及其他媒介的形象。他们的地位与荣誉通常都被凿实在他们的个性、独特的才能与其承担的**性别**类型等解释之中。针对明星的批判性研究指出，它支持了**个人主义**，促进了现代的“个人崇拜”。迄今为止，生产明星的最主要的大众媒介是电影，它运作于国家与国际的背景之中与之间。与此相关的最有力的电影**制度**是所谓“明星制”（star system），它与二战前后好莱坞的制片业尤为相关。

将明星作为**文化**现象所做的研究，试图包括三个相关的部分。首先，

① 所谓“想像共同体”，是出自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一个概念。这位康乃尔大学的讲座教授，以研究民族主义而知名于世。他在其代表作《想像的共同体：论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扩散》（1983）中，对民族主义以及民族国家等一系列问题做了经典论述，提出民族是一种“想像的共同体”的著名论断，在国际学术界产生广泛的影响。参见本书“民族”条。

把明星理解为代理人与物品，用以推销电影与其他商品，用以打动观众，从而获取票房与其他形式的利润。其次，明星无论在他们所承担的角色与演出中，还是在其得到报道的、"被披露的"、"个人隐私"生活中，都浓缩着、代表着有关行为、活动、**方式**、情感的某些典范。就此而言，他们在文化**符码**与文化进程中，作为**权力**的**符号**、**形象**与类型而发挥作用。最后，近来某些研究更多地关注明星—**受众**的关系。明星是流行的，因为他们获得某种形式的尊崇，并被赋予文化的价值。他们在特定的**生活方式**与**亚文化**中引发共鸣，受制于不同形式的认同，比如依据**性别**与性征（sexuality）的认同。

明星现象一般与20世纪、当代历史条件及电影相关。某些学者已注意到，近来明星现象的发展已同音乐、体育、电视以及其他流行文化领域发生广泛联系。这种争论的一个有趣方面，是当今对"媒介名人"（media personality）研究的注重，它被视为一种不同的、摩登而相关的现象。这方面的范例一直是那种"电视名人"（televison personality），他们被看成当代文化中一种后电影时代的变化标志。**广播**的需求以及播音员在各个方面如长相与形象上都需要切合日常的家庭环境，同1940和1950年代电影明星及电影所体现的文化关系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些变化及其蕴涵的意味，为研究与分析提供了一个可持续的重要领域。

TO

互文参阅：受众（audience），刻板印象（stereotype），窥视者（voyeurism）。

深入阅读：Dyer（1979a，1987）；Ellis（1982）；Langer（1981）；Lewis（ed.）（1992）。

地位（**status**） ＊与不同社会情景中的劳动分工相关的名望（prestige）。＊若将地位与其他处于同样情景中的**角色**地位相对比，那么地位就变得更有意义。在一种竞争性的等级制中，一个人的地位是同低级与高级的**他人**进行比较而确定的。一般来说，人们并非拥有一种地位；相反，我们可以依据**权力**、角色扮演以及表现角色的能力等而识别各种不同的地位**群体**（status group）。

问题主要取决于个人的向上或向下的社会流动性：名望既考虑过去的事件与未来的前景，同时也考虑眼前的**语境**。比如，举个有可能引起争论

的例子，曾是下上的年轻将领比离开桑赫斯特[1]即直接进入军官系列的老将地位更高。

这个概念最早是由马克斯·韦伯[2]提出的，它对人们理解社会中的**分层**颇为有益。它还深化了任何关于**阶级**以及那些处于不同地位群体中人所理解的阶级之讨论。比如，一位贵族女儿嫁给管子工，成为一位没有报酬的家庭主妇，若给她贴上工人阶级的标签会显得莫名其妙，除非我们再补充一下这位妇女的具体情况。

地位不是来自我们自己对自己的评价，而是由某个社会组织规定的。因此，它可能保持某种**价值**判断，而这种判断并不总与这个人对自我的**知觉**相一致。而且，地位总与社会情景相联系：如果社会情景发生变化，那么赋予个人的名望也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毕竟，某种社会情景的变化往往也意味着他人环境的变化。然而，在许多社会学文献中，所论及的地位群体好像是持续不变的，这一点表现得很明显，尽管那些群体的成员拥有不同的工作与休闲活动。

TO

互文参阅：权力（power），角色（role），分层（stratification）。

地位授予（status conferral） * 媒介报道可以赋予个人、**群体**、**制度**、事件或问题以显赫声望，并且通常还使它们的威信合法化的能力。这个术语主要由美国**功能论**学者用于分析大众媒介的社会角色。* 它表明，媒介可以授予**地位**，或者说可以提升那些在媒介报道中获得青睐的对象在社会中的位势，这种功能属于若干相互关联的社会功能之一。正如拉扎斯菲尔

① 桑赫斯特（Sandhurst），英格兰南部一村庄，英国陆军军官学校所在地。

②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哲学家。其学说对当代社会科学产生巨大影响，代表作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经济与社会》等。

德[①]与默顿[②]（1948）所指出的："大众媒介的受众显然同意这种循环观念：'如果你真的了不起，那么你就会成为大众注意的焦点，而如果你的确属于大众注意的焦点，那么显然你肯定真的了不起。"

TO

互文参阅：功能论（finctionalism），权力（power），地位（status）。
深入阅读：Wright（1975）；Schramm and Roberts（eds）（1971）。

刻板印象（stereotype/ stereotyping） ＊ 常以高度简单化和概括化的符号对特殊群体与人群所做的社会分类，或隐或显地体现着一系列关乎其行为、个性及历史的价值、判断与假定。＊ 这个概念最早由李普曼[③]从印刷术语引入社会科学（1922 初版；1965），此后在社会心理学领域得到较大发展，占据有关**认知**过程、**态度与偏见**等方面研究的核心地位（参见 Tajfel

---

① 拉扎斯菲尔德（Paul Felix Lazarsfeld，1901～1976），奥地利裔美国社会学家。曾就读于维也纳大学，获应用数学博士学位。1933 年赴美，1940 年开始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他领导的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学研究所，成为社会学实证研究的重镇。其间，他与罗伯特·默顿（Rorbert Merton）合作就大众传播问题做过一系列卓有影响的研究，从而与政治学家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社会心理学家卢因（Kurt Lewin）和霍夫兰（Carl Hovland）并称为传播学的"四大先驱"（W·施拉姆语）。

② 罗伯特·默顿（Rorbert Merton，1910～2003），声名卓著的美国社会学家，早年在哈佛大学科学史家萨顿指导下完成的博士论文《17 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1938），被视为科学社会学的先驱性著作。此外，主要著作还有《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1949）、《理论社会学》（1967）、《科学社会学》（1973）等。他曾长期担任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还做过美国社会学会的主席。他与拉扎斯菲尔德（Paul Felix Lazarsfeld）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多年合作，不仅为社会学研究开宗立派，同时也对传播学研究产生深刻影响。另外，其独子罗伯特·C·默顿（Rorbert C. Merton）曾与 M·S·斯科尔斯共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1997）。

③ 李普曼（Warlt Lippmann，1889～1974），美国新闻评论家，现代历史上最著名的政治专栏作家之一。1909 年毕业于哈佛大学，与杰出的左翼记者、历史名篇《震撼世界的十天》作者约翰·里德为大学同学。1914 年协助创办《新共和》周刊，是为一生新闻生涯的起点。1920 年代曾为《世界报》撰写社论，后转到《纽约先驱论坛报》，开辟《今日与明日》专栏。他的专栏文章日益流行，最后被不下 250 家美国报纸与约 25 家外国报纸同时刊用，并两次获得普利策新闻奖（1958，1962）。最有影响的著作，是《舆论》（1922 年初版；1956 年重印）。

1963 and Cauthen 1971）。

在这方面的许多研究中，刻板印象一直被看做是分门别类这种基本认知过程的一个特别延伸，由此人们得以为事件、客体及**经验**赋予条理与意义。这一过程本身，就要求将纷繁复杂的现象简单化与条理化，进而将其纳入一般化、标签化的类型之中。如此一来，注意力自然就集中于某些相似的、具有识别作用的特性或**分辨特征**，从而同许多其他的差异形成对比。然而，刻板印象不仅用于识别人群的一般类型：**民族**共同体（如爱尔兰人）、**种族**（如拉丁人种）、阶级（如工人阶级）、**性别**（如男人或女人）、职业（如会计）以及**异端行为**群体（如吸毒者）等，而且对其指称对象所做的*一律化判断*（*undifferentiated judgements*）也具有区别性。虽然就其情感的诉求与强度而言这些判断可能差别很大，但它们一般都体现着隐含的权力关系、紧张或冲突（比如，"愚蠢的"爱尔兰人、"容易冲动"的拉丁人、"劳工阶级"形象、"沉默的"白人、"乏味的"会计师、"邪恶的"吸毒者等等）。总之，它们以某些方式将种种人群解释与确认为总体相似的，即遵从于特定的价值、激动于同样的目标、拥有共同的个性、气质及其他特征的群体。就此而论，刻板印象在其潜在假定中助长着某种*知觉信念*（*intuitive belief*），并在构建**常识**的**话语**上发挥核心作用。

不管人们怎样相信或默认、拒斥或反对刻板印象，这些行为都在社会心理学中引发大量研究。近来，文化研究的探讨转而分析它们在社会与政治上的流传情形及其在大众媒介中的意味，其中尤其关注媒介表现种族、女性、政企关系以及种种异端行为的语境。

举例来说，这类研究都指出，新闻生产的惯例与符码作为其定势（orentation）的一种逻辑结果而助长着不同形式的刻板印象，而这种定势就处于某种独特的制度化语境与某套专业化的**新闻价值**中。对"惊耸"（extraordinariness）（被 Hall 等称为"本原的或基本的新闻价值"，1978，p. 53）的寻求以及随后的夸张与戏剧化的趋势，不仅能够产生刻板印象，而且还能赋予或否认那些通行的刻板印象以合法性。特别突出的是，近来的研究已将刻板印象的概念与**意识形态**理论和**霸权**理论结合起来。

尽管刻板印象只具有简单的诉求，但它却是一个难度大而要求高的概念，它提出一些重要的问题，并成为讨论中的一个有效视点。

TO

互文参阅：态度（attitude），标签理论（labelling theory），民族

(nation)，偏见（prejudice），种族（race）。

深入阅读： Perkins (1979)；Hartmann and Husband (1974)；Aronson (ed.) (1988)；Cohen and Young (eds) (1981)；Tajfel (1981)；Eiser (1986)；Forgas (1985)；Dyer (1979b)；Barker (1989)。

分层/社会分层（stratification/social stratification） * 这个概念是指社会的等级式结构与分类化组织，特别是指人们依其*不平等享有*的资源、权力与特权而被社会明显分为相对固定的群体。* 尽管这个术语含有社会与岩石的构成具有*相似关系*的意味，即它们都组成为和分化为不同的层次或*层*（*strata*），但重要的是承认社会构成迥异于相对固定与静止的地质构成。社会分层主要关注统驭与附属、强势与弱势之关系的本质与基础，这种强弱之势划分出社会群体及其相互关系并赋予其特征。指出所有社会都以某种方式被分层，无论如何并不表明它们完全相同或不可变更，因为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跨文化**上，社会都展现出不同形式或不同体系的社会分层。为应对这些差异，就得关注分层的不同根源与范围，这一点非常重要。

在许多情形中，社会各个群体间的社会关系，都取决于**客观性**的经济或物质标准。比如在封建社会中，某人的地位与**权力**大多是由其出生于拥有土地或地产的阶层，还是出生为农奴或无地劳工所规定的。同样，拥有财富或不拥有财富，归根结底将许多现代社会划分为不同的社会**阶级**。不过，分层也可能表现为非直接的经济形态，就像**地位**的差异也决定于年龄、**性别**、种族或种姓划分。分层的重要性在于它建构了群体与个体的关系。对传播研究来说，这些关系都属于基本性的，并形成一个首屈一指的焦点。

TO

互文参阅： 阶级(class)，文化(culture)，权力(power)，地位(status)。

深入阅读： Bilton *et al*. (1981)；Worsley (ed.) (1977)。

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 * 一项知识上的"宏图大业"（intellectual enterprise），其特征在于关注那种使任何文化活动或人工制品（artefact）的意义生成成为可能的系统、关系与形式——结构。* 它同1960年代及其后产生影响的若干法国学者有关。

结构主义不是一种针对**意义**的解释性探讨。与某些十分定型的文学

批评与文化批评不同，它并不想对某个**文本**或人工制品的隐含意义、本质意义或固有意义予以揭示。相反，结构主义拒绝的正是本质意义或固有意义的思想，以及与之相关的个体化文本或个体化人民是其意义之源的观念。结构主义属于一种分析性的或*理论性的*的“宏图大业”，它致力于系统而详细地论述**规则**与限定（constraints），这些规则与限定如同一门**语言**（language）的规则一样，首先在于使意义的生成成为可能。

因此，早期的结构主义比较突出的就在于采用索绪尔①的语言学及其术语：尤其是**能指**与**所指**；**语言**（langue）与**言语**；**共时态**与**历时态**；**联想关系**与**组合关系**等概念。采用这些术语以及其他有关某一语言结构的**区别性特征**，旨在表明看似零七碎八互不相属的现象实际上如何成为同一结构类型与关系的表征，正如所有能够得到言说的不同事情无不依赖于**语言**（langue）的规则与限定一样。进而言之，结构主义还被用于表明这种结构可在各种文化活动中发现。例如，针对建筑、服饰、食物、亲属关系与无意识，以及电影、电视与文学等更为明显的表意“系统”，都可进行结构主义分析。

对结构主义来说，最知名的人物是罗兰·巴尔特②（文艺评论）与克

---

① 索绪尔（Ferdinand Saussure，1857～1913），瑞士杰出的语言学家、现代符号学先驱，其代表作《普通语言学教程》（1916）是他去世后学生们根据笔记以及他的一些手稿等材料编辑整理的。这部里程碑式的著作不仅对现代语言学具有首屈一指的意义，而且对20世纪以来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都产生深远的影响。本辞典所涉及的一系列辞条，特别是结构主义与符号学方面的辞条均与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相关。其中较常见的有“语言/言语”、“能指/所指”、“组合关系/联想关系”、“共时态/历时态”等。

② 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法国结构主义思想家，著名作家、文艺批评家、符号学家，对符号学理论颇多建树，1976年任法兰西学院符号学讲座教授，成为该讲座的第一位学者。主要著作有《神话集》（1957）、《符号学原理》（1964）、《S/Z》（1970）、《罗兰·巴尔特论罗兰·巴尔特》（1975）、《恋人絮语》（1977）等，这些著作均有中译本。

劳德·列维-斯特劳斯[①]（人类学）。另外，与此“宏图大业”相关的著名学者还有阿尔都塞[②]（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拉康[③]（精神分析学家）与福柯[④]（依据权力、话语与知识的理论而对性、癫狂与监禁进行研究）；参阅斯特罗克[⑤]所编《结构主义以来：从列维斯特劳斯到德里达》（牛津大学出版社 1979）。

1970 年代，结构主义发生转变。其部分原因在于这一“宏图大业”中不同立场的分歧越来越大，从而使它最终变得过于分殊，以至于不能再被理解为一种统一的探讨。同时，转变的产生也源于某些结构主义的早期倡导者开始表达的一种忧虑，即结构主义本身正在成为它创立时所挑战的那种精神正统（intellectural orthodoxy）。这种转变的结果，形成至少三种非常不同的研究领域：

---

① 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1908～ ），法国社会人类学家、1960 年代结构主义思潮的先驱之一，他的人类学研究对当代学术思想产生十分广泛的影响，堪称一代宗师。早年在巴西从事印第安文化的田野调查，1940 年代初在纽约做访问教授期间受到结构主义语言学家雅格布森的影响，从 1950 年到 1974 年一直执教于巴黎大学，1959 年当选法兰西学院的社会人类学院士。其代表作有《忧郁的热带》（1955）、《结构主义人类学》（1958）、《图腾崇拜》（1962）、4 卷《神话研究》等。他把文化视为一个传播系统，进而按照结构主义语言学建构了文化传播的模式。

② 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1918～ ），法国结构主义哲学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1948 年，在著名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加入法国共产党。他的思想包罗广泛，影响深远，诸如“症候式阅读”、意识形态理论等，均为当代学术思想的重要发展。

③ 拉康（Jacques Lacan，1901～1981），法国精神分析学家、结构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因对弗洛伊德的独创性解释而获得国际声誉。他强调语言的意义，认为语言最能反映无意识心灵，所以力图将语言研究特别是结构语言学引入精神分析学说。

④ 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法国当代杰出的思想家，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尽管他自己并不承认甚至否认这一点。早年就读于著名的巴黎高师，师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1970 年以后，一直任法兰西学院思想体系史教授。他的“知识考古学”、“话语/权力”等学说对 20 世纪末以来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产生巨大影响。著作有《疯癫与理性》、《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1966）、《知识考古学》（1969）、《规训与惩罚》（1975）、《性经验史》（1976～1984）等。

⑤ 斯特罗克（John Sturrock），英国《泰晤士文学增刊》副主编，由他所编的《结构主义以来：从列维-斯特劳斯到德里达》（牛津大学出版社 1979 年），是有关结构主义思潮发生、发展及演化的一部权威著作，1998 年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其中译本。

（1）*符号学*（*Semiotics*）迄今为止一直与结构主义同义，但在**大众文化**的研究中已确立为一个主要的组成部分。

（2）*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完全属于文学分析的一种方法，它由德里达[①]的著述发展而来。作为一位哲学家，德里达指出隐含于作品中的哲学假定，无论如何都不是意义的担保者——相反，倒是这种假定得以系统表述的**话语**在侵蚀哲学的基础。这种探讨引发一场全面的解构主义运动，它尤其对美国的文学研究产生影响。在这一外表下，这种探讨成为一种“方法”，其惟一的戒律就是认为什么都不是理所当然的——怀疑与质疑被提到教义层面。于是，解构主义就成为结构主义合乎逻辑的结论之一。结构主义试图挑战一种**常识**性假定，即意义是作者意图的产物，或语言仅仅是一套指涉性的名称（一种仅仅为已经存在的世界进行命名的工具）。解构主义进一步发展了这些观念，并且只关注**能指**（而不是**所指**或社会“既定”符号）。解构主义用于文学研究后产生一种别具一格的评论，其间批评家的文字技巧同研究对象一样受到明显批评。这种研究对象（如一部文学作品）实际上并不享有特权地位；它不是对其自身进行解读的根据与保证。相反，解构主义被用于梳理所选话语中压抑的、边缘的以及缺席（absent）的内容。

（3）*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实际上难同结构主义相分离。比起早期结构主义那些高度的唯理论者（rationalist），它对**精神分析理论**与**快乐**在产生与制约意义上的作用更加留心。比起主要关注*内部*或“内在”（immanent）文本性结构的早期理论，后—结构主义也更加关注使意义生成成为可能的*外部*结构（社会进程、**阶级**、**性别**与**族群**划分、历史变迁）。由此一来，结构主义便将其焦点由文本转向读者，但这种转向不应视为根本性的突破——后—结构主义就内含于结构主义本身。

结构主义一直被看做理解世界的一种 20 世纪的典型方式。在许多不

---

① 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　　），当代著名的法国哲学家，解构主义思潮的先驱。生于阿尔及利亚，曾执教于巴黎高师、耶鲁大学、厄湾加州大学等。代表著作有博士论文《言语和现象：胡塞尔现象学中符号问题概论》（1967）、《论文字学》（1967）、《写作与差异》（1967）等。

同领域，19世纪的工作是以寻求原因与起源（达尔文主义、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作为解释性框架而引人注目的。结构主义与20世纪其他方面的“宏图大业”——特别是物理学与天文学——都对作为解释框架的关系与系统予以关注。结构主义与物理学并不把世界当做拥有自身固有属性的种种事物的集合体，它们分别把世界解释成为一种关系的体系，其中某个“事物”的属性（如一个原子、一个符号或一个个**体**）源于其内部与外部的关系。

TO

互文参阅：差异（difference），话语（discourse），后现代状态（postmodernism），符号学（semiotics）。

深入阅读：Hawkes[①]（1977）；Culler（1983）；Norris（1982）；Sturrock[②]（ed.）（1979）。

方式/样式（style） ＊文化认同与社会定位得以协商与表达的**方法**手段（means）。＊首先，我们总是将style看做对许多类型的*事物*所做的分类：如服饰、绘画、建筑、小车等产品、**文本**或人工制品。此外，我们通常承认style涉及*某些事情如何去做*，比如，如何演奏音乐、如何发表演讲、如何穿着打扮、如何理发、如何著书等。在这两个意义上，它往往被解释为难以表述的，是一种无法解释的“什么东西”，常常含蓄地**意指**或表达可辨认的**差异**或相似。承认这点是使“事物”或“做事方式”富于意义的题中之意。这两种情形中，我们都将特殊事项同一组更广泛的、**方式**上的**联想关系**、**话语**或精神“地图”相联系，其作用是对我们在具体事项上所赋予的**意义**与**价值**加以组织。

于是，方式是可以辨认的，因为它们将某些周期性与模式化的要素（elements）合并为某种特殊的、结构化的整体或形式，而它表示和提出某种广泛的社会与文化关系上的同一立场。就此而言，甚至我们自己的认同及对方式的解释，都属于我们与自己的文化认同进行协商的组成部分。

---

① 即T·霍克斯的《结构主义与符号学》（*Structuralism and Semiotics*），中译本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1987）。

② 即J·斯特罗克所编《结构主义以来：从列维—斯特劳斯到德里达》（*Structuralism and Since：From Lévi Strauss to Derrida*），中译本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1998）。

我们常常用以理解与评价其意义的方式，某种程度上就是显示我们在广泛的社会与文化关系上的自身地位。因此，方式成为种种**规则**、**符码**与**惯例**的构成部分，以种种社会互动、传播与认同加以组织，并得到争论与表达。正如Hebdige（1979）所言："归根结底，如果不论其他，那么它们就是表达相对于'异端'的'常态'。"（p. 101）

因此，有关方式的分析与讨论，可能旨在有效地将两个层面的问题合为一体并使之互相关联。第一，何为特殊方式的可确认要素？它们是如何归并、编码与相互关联的？何为其分**辨特征**？第二，它们表达的是什么内容？它们如何表示某种认同，并阐明某种文化定位感？将这类问题归拢起来，便不可能将方式从广阔的历史、社会与政治进程中剥离开来，从社会中的统治群体、下属群体与反对群体间的相互作用中剥离开来。同样重要的是，无法将对方式原由的解释限定在有关个体的个性或独创性的支离破碎层面。

比如，青年**亚文化**研究所关注的，就是如何检验为年轻人所采纳的、往往一目了然的样式与总体效果同其亚文化定位及决定性因素之间的复杂连结。就此而言，方式可能被当做特殊社会**群体**的**象征**性属性，明确有力地表达他们在广泛的社会、**文化**与方式关系上的**定向性**与姿态。

TO

互文参阅：拼贴/拼装（bricolage），文化（culture），性别（genre），生活方式（lifestyle），亚文化（subculture）。

深入阅读：Hebdige（1979，1988）；Epstein（1978）；Melly（1972）。

下意识（subconscious） * 对脱离**意识**或通常处于**无意识**的信息呈现部分知觉的一种心理结构。* 因此，下意识所呈现的是心理系统内的一种过渡性的朦胧状态，尽管还不清楚具体的经验与**记忆**在这种**阈下意识**与居间的知觉状态中能够保持多久。在**精神分析理论**里，这个术语与无意识的概念在相同的意思上被使用，尽管荣格[①]更详细地讨论了下意识问题。前缀*sub*容易产生误导，因为它意味着存在某种低级层面的意识。而在荣格

① 荣格（Carl Jung，1875～1961），又译容格，瑞士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曾与弗洛伊德合作研究达5年（1907～1912），后因性情与思想不同而分道扬镳。他是弗洛伊德之后最重要的心理学家，他提出的集体无意识、原型等概念对现代学术思想影响其大。

（1969）看来，这种认识等于屏弃人类某些普遍的、原型化的、甚至通过遗传获得的知觉所具有的高级理解力。

DS

互文参阅：原型（archetype），意识（consciousness），精神分析理论（psychoanalytical），阈下意识（subliminal），阈（threshold），无意识（unconscious）。

深入阅读：Jung（1969）。

亚文化(subculture) * 正如前缀*sub*所示，亚文化是更广泛的文化内种种富于意味而别具一格的协商(negotiations)。它们同身处社会与历史大结构中的某些社会群体所遭际的特殊地位、暧昧状态与具体矛盾相应。* 这个术语及其支撑理论几乎仅在有关青年的研究与解释领域获得发展，其中尤其突出的是针对**异端行为**的研究。这里，它通过将年龄与社会阶级综合起来作为区分亚文化认同与年轻人行为的决定性因素，以取代早期那种与所有年轻人相应的、既统一一律又各不相关的“青年文化”观念(Eisenstadt 1956；Persons 1954)。就此而言，这个概念依若干重要的假定而确定。

第一，西方社会的特征基本上取决于社会**阶级**的划分，这种划分所基于的是**权力**与财富的不平等以及由此生产的支配与附属关系。第二，这些不平等的、对立的划分与关系通过种种阶级**文化**即其自身对特殊的社会阶级地位所做的种种复杂的文化反应，而得以实现并获得系统表达。第三，在这些阶级文化（这种语境中常常指“母文化”）中，年轻人协商和发展了“他们自己”特殊的、尤具象征意味的亚文化，以应对那些不仅由年龄或代际地位、从属与控制所提出，而且也来自阶级地位与不平等状况的问题，特别是当这些问题在教育、工作与休闲方面得到体验与汇合之际。正如Clark等（1976）论述的：

> 因此，亚文化首先得涉及“母文化”（parent cultures），它们是其中的一个从属部分。但是，亚文化也得依据它们与支配性文化——作为一个整体的文化权力在社会的总体分布——的关系进行分析。

按照这种框架，亚文化研究针对二战后英国不同青年群体的外貌、行为与意义，形成并不断提示一种进行解构与理解的重要方法。具体研究

（了解梗概参阅 Brake 1980；Hebdige 1979）大量集中于工人阶级的青年亚文化群体，其中特别强调他们那些往往"惊世骇俗"的外貌（比如其服饰样式）与"惊世骇俗"的行为（特别是那些被界定为异端性与威胁性的行为），通过专门的亚文化认同与礼仪而呈现的种种富于意味的亚文化反应与抵制。因此，亚文化的功能在于为其成员赢得，或者至少争取"文化空间"；如此一来，它们也就产生和确认了集体与个体认同的重要方式，以及针对更大社会与文化秩序中主流价值的定向性。

亚文化理论已然确立，现在它包含着有关青年研究的正统方法。然而，这种正统性并未使之免除批评，正如近来的讨论与研究所显示的。简言之，这里有两个特别的问题值得注意。第一，仅从反抗的角度解释亚文化，认为其意义仅在于此的趋势。比如，如此一来就导致一种畸轻畸重：一方面关注那些可被理解为表现对抗或极端对立的亚文化行为与式样，另一方面又轻略遵从、认可与合作。第二，有关青年亚文化的描述，针对性别划分表现出一种更突出的不平衡。正如 McBobbie（1980）所言，由于其焦点主要对准工人阶级而又完全属于男性的对象，"妇女与整个性别划分的问题就被忽略了。"

TO

互文参阅：反文化（counterculture），文化（culture），方式/样式（style）。

深入阅读：Hall and Jefferson（eds）（1976）；Bilton *et al.*（1981）；Brake（1980）；Middleton and Muncie（1981）；Mungham and Pearson（eds）（1976）；Hebdige（1979，1988）。For critical accounts see Clarke（1982）；Cohen（1980）；McRobbie（1980）。

主体/主体性（subject/subjectivity） * 在近来的文本理论中，主体性已成为关注的主要焦点。在此语境下，这个术语表达了所有由于听任"主体"一词的三种既定意思彼此冲突或纠结所能表示的内容。* 这些意思是：

（1）*政治学理论中的主体*——将公民当做国家或法律的主体。这层意思表明，这种主体相对于他/她所受制的权力而言缺乏行动的自由。

（2）*唯心主义哲学中的主体*——思考的主体；意识的场所。这层意思表明，主体与客体、思想与现实或自我与他人之间发生分化。因此，在这层意思上，主体性表达的是那种看似属于自我而与被当做实际存在之物相

对的东西。

(3) 语法中的主体——一个句子的主体（就像“主—谓—宾”），以及由此而来的**话语**或**文本**的主体；与行动有关或决定行动的东西。

这三种意思之所以能够同时奏效，是因为人们想应对单取意思（2）的不足问题。按这种意思，主体属于意识的场所，但它所说的意识是某种自由漂浮的东西或某种一元化的同一性（identity），而它们似乎成为行为与意义的来源而非产物。这种哲学立场所隐含的个人主义，无法解释社会关系与**语言**在确定、调整与形成任何“思考主体”（thinking subject）上所起的作用。

就此而言，其他两种意思就变得比较有效。意思（1）可以将主体理解为某种社会关系——我们的主体性不是我们拥有的某种属性，相反，我们是属于不同机构（agencies）的主体。于是，我们的个体身份就像一种关系的结构一样得到确定、调整与复制。举例来说，我们可能属于（隶属于）父母的慈爱/权威之下的主体；得到法律保护/强迫的主体；商业化的企业/剥削的主体；民族的或文化的特征/刻板印象的主体，等等。于是，引人意思（1）就在倡导这样一种主体观，即主体性不是“内在”于个体，也非一元化的——正如我们属于和隶属于这些不同的机构，我们的主体性也是确定与争夺“各种身份”（identities）的一种矛盾体。

将意思（3）引入讨论，就允许语言、话语与意义制造（sense-making）具有确定、调整与生成的作用。近年的文本分析学者全神贯注于这种意思。按这种思想，某种文本或话语不管使用什么指涉术语（referential terms），当它在阅读或言说活动中得到复现之际，其主体都是读者或言说者。于是，文本与话语就成为社会（意思［1］）与个体（意思［2］）之间的关系借以沟通的方式。但是，正如意识不是一种自由漂浮的实体，所以，文本与话语本身也是在时间、地点与结构的历史环境中得到**限定**、调整与形成的。因此，我们才能识别特定的话语——比如，那些有关**民族**的话语（对威尔士人来说任何时候都有效的**能指**），或有关**性别**的话语（作为男人或女人意味着什么取决于话语之中性别化的主体地位，凭借这种话语我们才能识别自己或区分自己），等等。

主体性是对文本/读者的关系加以概念化而又无需将它们复制为固定的一元化范畴的一种方式。在分析的层面，人们做了大量研究以表明文化

产品（特别是电影与电视）如何利用文本化的手段与策略，如观点、**说话方式**、**叙事**等以提出或固定某种主体立场，通过这种立场它们才能在解读之际获得意义。实际上，这类研究的某些成果认为，解读行为只是一个占据由这种文本所提供的“空间”之过程。因此，在这个领域就存在一种趋势：文本由于作为我们主体性的建构者或生产者而被赋予特权；而个体则多少被视为消极的“**意识形态**之主体”，不断地被改编到（reconstituted）他们所栖居的任何话语形象之中。

实际上，这样一种极端决定论的立场，对一般所持的那种认为我们的主体性是我们所固有的而非社会关系与意义生成之产物的观念提供了一种有效平衡。虽然将它推向及至可能站不住脚，但认为主体性属于社会关系与话语资源之产物的观念还是值得继续探讨的。

JH

互文参阅：文化（culture），话语（discourse），意识形态（ideology），个体（individual）。

阈下意识（subliminal）　＊表露得如此短暂以至于不容人们有意识地处理该信息的那种刺激显现（stimulus presentation）之产物。＊**个体**可能觉得有什么东西显露了一下，可又不能确切说明是什么，或者压根就没有意识到。Packard（1970）将这些情况称为广告中的“阈下效果”（sub-threshold effects），其中某个品牌与/或产品微乎其微的显露都可能刺激其后的消费性购买。

速闪广告（subliminal advertising）最早在1956年问世，当时一段速闪的冰激凌商品广告被插播到一部故事片中。这种显露的效果一直是个引起争论的话题。把这种阈下意识的方法视为侵扰与作祟而予以激烈抨击，受到诸如Dixon（1970）等心理学家的批评。比如，他们可能辩驳说，这种阈下性显露惟有在它所暗示的东西是我们已经知道并事先有所倾向时才有效果。这种显露并不能将任何问题的任何**讯息/态度**植入我们的头脑。

许多**媒介信道**都很不适于阈下效果，因为其呈现过程都非常缓慢——这里包括电视屏幕。然而，情况主要还是决定于**接收者**的状态与接受力、刺激内容的模棱两可程度及先在于和/或内在于阈下刺激的其他刺激。尽管针对其广告效果存在争议，但阈下知觉（subliminal perception）却得到某些**实验**数据的支持。Smith等（1959）就曾发现，如果给志愿被试看

一张没有表情的照片前，先借阀下意识向他们显露相对“生气”的“高兴”一词，那么他们就会觉得这张面孔比较快乐，讨人喜欢。

DS

互文参阅：防御机制（defence mechanism），道德恐慌（moral panic），知觉（perception），下意识（subconscious），阀（threshold）。

深入阅读：Packard（1970）；Dixon（1971）。

象征(symbol) ＊广义上讲，象征就是凭借使用它的文化体成员所达成的一致意见而代表（stands for）某些非自身物的某个符号（sign）、客体（object）或行为（act）。＊这个词语的使用比较随意，要确定其特殊用意就应该考察它的每种语境。其主要用法包括：

（1）香农与韦弗[①]、奥格登与理查兹[②]及Berlo等，都倾向于在一种宽泛的意味上使用这个词语，以指称任何类型的符号。只要可能，这种用法都应避免。下面是比较精确尽管有时互相矛盾的用法。

（2）皮尔士[③]用这个术语指称那类与其**对象**不存在任何相似性的符号。他将象征与他划分的其他类型符号相对举——**肖像**与**标志**。一个词语是象征，表示女性的♀也是象征。

（3）弗洛伊德用它指称某个属于禁忌或想起来不舒服的客体与行为。

① 香农（Glaude Shannon，1916～ ），旧译申农，美国应用数学家、信息论的奠基人。1941年，在美国贝尔电话实验室工作，1957年任MIT（麻省理工学院）通讯与数学教授，另外，他还是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美国科学院院士。1948年，他提出著名的信息论，翌年与W·韦弗出版《通讯的数学理论》，对此进行详细论述，从而为现代通讯与现代传播的研究奠定科学的基础，在诸多学科领域均产生巨大影响。

② 奥格登（C. K. Ogden，1989～1957），英国作家、语言学家，Basic English的创始人。理查兹（I. A. Richards，1893～1979），英国评论家、诗人。他们曾合著《意义的意义》（1923）。

③ 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1839～1914），又译皮尔斯，美国哲学家、科学家、逻辑学家，实用主义的初始人，被视为美国最有创建和最多才多艺的学者，尽管他生前并不得志。在发展现代逻辑中，皮尔士曾对符号问题做过深刻而独到的论述，为现代符号学与传播学提供了影响深远的思想。比如，他曾经将符号（sign）分为三种，即肖像（icon）、标志（index）与象征（symbol）。

在这种弗洛伊德的用法中，象征与其所代表的事物之间存在某些相似性，尽管这种相似可能是间接的或隐喻的。阳物经过象征化而成为洒水壶。

(4) 巴尔特[①]用它指称某种代表抽象事物或价值的客体或行为。一枚金币可以象征财富，牧羊人与羔羊可以象征基督与其信徒的关系。宗教性活动与社会性礼仪往往具有这种意义上象征意味，比如，洗礼活动或圣诞节的礼物交换等。

(5) 这个术语还有一种文学与艺术上的用法，它同用法（3）与用法（4）所说的象征与其对象之间具有相似性的看法类似。在文学与视觉艺术中，要求关注象征本身有时甚至比要求关注它所代表的对象更重要。

这个词语的意思如此不同，以至于使用它都显得不够明智，除非在诸如皮尔士与弗洛伊德所明确界定的意义上使用它。

JF

互文参阅：肖像（icon），形象（image），标志（index），（符号的）动机（motivation [of the sige]），所指意义（reference），所指对象（referent），礼仪（ritual）。

象征互动论（symbolic interactionism）[②] * 一种探讨社会关系的方法，强调自我与他人在互动行为中协调意义与交流符号（symbol）的重要作用。

---

① 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法国结构主义思想家，著名作家、文艺批评家、符号学家，对符号学理论颇多建树，1976 年任法兰西学院符号学讲座教授，成为该讲座的第一位学者。主要著作有《神话集》（1957）、《符号学原理》（1964）、《S/Z》（1970）、《罗兰·巴尔特论罗兰·巴尔特》（1975）、《恋人絮语》（1977）等，这些著作均有中译本。

② 象征互动论，亦译符号互动论，是美国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代表性理论，由 Q·H·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提出而由其学生 H·布卢默（Herbert Blumer）、E·戈夫曼（Erving Goffman）等发展，symbolic interactionism一语即由布鲁默于 1937 年首创。

* 米德[1]（1934）在建构**角色**理论与反对当时某些流行的**实验**主义过程中，系统阐述了象征互动论的大多数概念。在他看来，人类行为所涉及的问题远非仅仅对外部环境的种种刺激做出反应。相反，各种人类行为都是经过思考的，而自我可同时被视为**社会互动**中的主体与客体。从这个意义上讲，自我意识的形成源于我们对那种由**他人**目睹与理解的自身不同的外在状貌所做的不断评估。**语言**的习得成为意识形成的基本特征，因为语言可使人们进行更富意义的交流。

通过讨论有关思考、参与及想像的可能性（比如儿童玩耍时通过协商而不断建立**规范**与**规则**），坚持**观察实验法**的学者一直对象征互动论展开批评。但是，正如米德（1934）与布卢默（1969）所指出的，对行为进行分析不能总是通过将可疑的变量加以系统的分割而完成。相反，互动行为的**社会语境**必须同各种情景下变量的相互依赖一并加以强调。因此，对典型的、日常的、发生在真实生活情景中的经历或场景进行"生态学"研究就得到青睐。

TO

深入阅读：Cuff and Payne（eds）（1979）；Schellenberg（1978）；Rosenberg and Turner（1981）；Mortensen（ed.）（1979）；Bilton *et al.*（1981）；Denzin（1992）。

共时态（synchronic） * 一对具有特定意义的术语之一——另外一个是**历时**

---

① Q·H·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1863～1931），美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实用主义代表人物，芝加哥学派奠基人，该学派以象征互动论著称。米德平生著述虽然不多，但身后由其学生编辑整理的《心智、自我与社会》（*Mind, Self, and Society*）却是一部社会学经典。他的主要学术贡献之一，是对自我起源的论述。他将"自我"（self）划分为"主我"（I）与"宾我"（me），而不论主我还是宾我都是在社会化的互动过程中形成的，这种互动过程主要通过象征（symbol）或符号进行的，比如语言就是一套象征系统。

态——它们均出自索绪尔[①]的著作：在这种语境中，它们指的是研究符号学/语言学的两条不同而并非相互排斥的途径。共时性研究着眼于某一时刻的语言（langue）状态。* *历时性分析着眼于某一给定语言的与时变化*。

索绪尔十分确信共时性研究的必要性——他要将**语言**（language）作为一个结构化的整体以理解其内部关系。共时性研究基本上属于抽象性的，因为从经验上讲不可能使一种沿着其轨迹变化的语言停止下来，然后观察其状态。但是，抽象正是索绪尔所青睐的，因为按照他的论点，过去人们胶柱鼓瑟于特定语言及其词语一储备（语文学）的经验性事实，以至于未能发展出可以理解经验性事实的一套有关普通语言（language-in-general）的理论。

共时性研究成为许多**符号学**探讨的规范，其中的要点就是将许多不同符号体系的某一抽象体系（**符码**）里种种元素（**符号**）及其内部关系孤立出来。索绪尔预计，共时性研究最终将导致一种理论上更适用的历时性研究，甚至导致一种两者结合的研究，他称之为*泛历时态*（panchronic）。这可能正是如今**符号学**的发展情形，其间人们更多地关注特定媒介与**制度化话语**的历史发展而非迄今为止的状态。

JH

互文参阅：历时态（diachronic），话语（discourse），语言（langue），联想关系（paradigm），言语（parole），符号（sign），意指（signification），组合关系（syntagm）。

组合关系（syntagm） * 为了形成一个表意整体（a signifying whole）而对选自**联想关系**的种种元素（units）进行的某种组合。* 一个句子是词语的组合关系，一则广告是视觉**符号**的组合关系，一段旋律是音符的组合关

① 索绪尔（Ferdinand Saussure，1857～1913），瑞士杰出的语言学家、现代符号学先驱，其代表作《普通语言学教程》（1916）是他去世后学生们根据笔记以及他的一些手稿等材料编辑整理的。这部里程碑式的著作不仅对现代语言学具有首屈一指的意义，而且对20世纪以来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都产生深远的影响。本词典所涉及的一系列条目，特别是结构主义与符号学方面的条目均与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相关。其中较常见的有“语言/言语”、“能指/所指”、“组合关系/联想关系”、“共时态/历时态”等。

系。组合关系可以是空间上的组合（视觉的组合关系），也可以是时间上的组合关系（听觉的或音乐的组合关系）。这些元素可以互相作用，从而改变彼此在组合关系中的含义。所以，每个组合关系都具有自己一套独一无二的意义。设想有这么两张安全海报，每张都在表现一位 10 岁小姑娘正准备过马路：一张海报上她牵着 4 岁弟弟的手，另一张海报上她拉着父亲的手。在这两个组合关系中，她都“意味着”某些完全不同的意义。同样，同一词语在不同的句子中可能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所以，在某个组合关系中，某个因素的意义取决于它与其他因素如何*相互作用*(*interacts*)，然而在某个联想关系中其意义则取决于它与其他因素如何*相互区分*(*distinguished*)。

JF

互文参阅：选择（choice），转喻（metonymy），联想关系（paradigm）。

句法/语段（syntax/syntagmatic） ＊ 表情达意过程中的线性模式或关系：在语言中，指一系列将词语组织或组合成句子的限制条件。＊ 词语按照基本的类型或规则，即所谓某种语言的*句法*而组合成句子。在某种语言中，某些词语的顺序是被允许的；而其他则否。类似“点钟是新闻播报 9 现在”的排列顺序，在英语中不能成为一个句子，但下面这种排列顺序就组合得非常完美：“现在是 9 点钟的新闻播报。”因此，某些排列组合由于不符合基本的类型被排除在外。这可能使线性**规则**系统即句法似乎多少有点限制性。然而，句法的功能在于为句子的构造规定一系列可能性，遵守它们就能保证人们在某种程度上相互理解。实际上，由基本的核心句型可以组成无穷无尽的句子。而且，只要符合这些句型，它们就可得到解释，即使它们属于“一次性”的构造或独一无二的事件。比如，接受这种定义的读者会轻易解释类似这样的句子——“紫色是她暗淡的口红”，即使他们以前不大可能见过这种句子。正是这种潜在的规则系统——部分由句法所致，才使我们能够组成这些小说语言，并理解其意义。

有关前接后续的限制条件，不单单适用于语言中的句子。相似的限制条件——*语段关系*——也可追溯到其他符号系统，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电影。将种种镜头剪辑连接以组成故事片中一段有序情节的方式，大都符合一系列反复出现的惯例（conventions）。而这些惯例都可以类比为电影的句法。

MM

互文参阅：语言能力（competence），深层结构（deep structure），联想关系（paradigm），转换（transformation）。

深入阅读：Chomsky（1965）；Metz（1974）。

T

文本/讯息（text/message） ＊这两个术语常常可以交替使用，指由传播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符号与符码所组成的某一表意结构。＊这种结构可以具有千差万别的形式，诸如讲话、写作、电影、穿着、小车设计、手势，等等。

尽管这两个术语常常交替使用，但它们又确有不同，保持或拓展这些差异都是值得一试的冒险。一般来说，*文本*是指那种具有自身的物质形态、倚赖其**发送者**或**接收者**、因此由表述性符码（representational codes）所组成的一则讯息。书籍、录音带、书信、照片都是文本，一场电视秀的录像或一篇讲话的记录同样是文本。然而，一个手势或面部表情虽然发送一则讯息，却没有产生一个文本。*讯息*一语总是被那些属于传播过程学派的社会学家、心理学家与工程师所使用，并以这种简单的定义使用——"被传输的东西"。他们往往认为，这种定义无可置疑，并视之为理所应当。而另一方面，*文本*一词更多是源于**符号学**或语言学学派，因而隐含这样的定义——"**意义**生成与交换的核心"。于是，一个文本便由一个运行于许多层面的**符码**网络所组成，从而能根据读者的社会—文化**经验**产生不同的意义。因此，文本是有问题的，需要进行分析的。

JF

互文参阅：讯息（message），倾向性解读（preferred reading）。
深入阅读：Fiske（1989a①）。

阈（threshold） ＊处于至少两层觉察意识（awareness）相交处的一种经验

① 即J·费斯克的《理解大众文化》（*Understanding Popular Culture*），中译本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2001）。

状态（experienced state）。* 当两个刺激（比如，光线）将要合为一个，或某个单一刺激逐渐消褪而变得察觉不到之际，某个阈就可能得到启用。在**阈下意识**的情形中，如果完全的觉察意识被禁绝而信息依然可被吸收，那么某个阈就被穿越。这同**精神分析理论**所讨论的**意识**、**无意识**与**下意识**之间区别相类似，其间的阈都被假定为每种心理状态之间的过渡点。

DS

互文参阅：意识（consciousness），平衡（homeostasis），知觉（perception），阈下意识（subliminal）。

交流（transactional） * 基于协商与互惠而交换信息或彼此影响的传播。* 因此，针对知觉而言，交流的概念就取代比较僵化的单向模式——在这种模式中，接受者只是观察环境而决不影响环境。Mortensen（1979）将这种僵化模式比做一排倒塌的多米诺骨牌，其间 A 影响 B，接着 B 影响 C，以此类推。而更具能动性的交流过程则表明，B 被 A 影响之际也在影响 A。

交流模式比较适合分析比如**非语言传播**。Argyle（1978）识别出若干不能孤立完成而得依赖相互之间不断进行**反馈**的身体信号。交流分析（transactional analysis）是 Berne（1964）所用的一个比较独特的概念，指的是一种显露社会关系中的游戏元素的过程。

JF

互文参阅：互动（interaction）。

深入阅读：Mortensen（ed.）（1979）；Berne（1964）；Burton and Dimbleby。

转换（transformation） * 一种特殊类型的**句法规则**，按照这种规则就可将句法范畴或象征的某一语符列（string），经由增添、删节或改变的过程而转换为另一语符列。* *在转换生成语法（transformational-generative grammar）*[①] *中，深层结构（deep structure）与表层结构（surface structure）*之间的关系就是由一组转换规则予以说明的。不过，这个概念不必局限于句子的句法规则。在某些有关民间故事与神话的论述看来，这些五花八门的故事与神话无非都是依据少量非常简单的潜在结构与套路而加以转换的结果。

---

① 美国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提出的著名理论。

MM

互文参阅：深层结构（deep structure），句法（syntax）。

深入阅读：Chomsky（1965）；Lévi-Strauss（1967）；Propp（1968）。

及物法（transitivity） ＊ 及物法是一种描述句子构成过程中参与者和过程之间关系的方法——概括说就是，“谁（或什么）对谁（或什么）做了什么”。＊ 及物性关系与参与者的角色，关键都取决于由句子的主要动词加以编码的过程类型。就英语而言，可以区分四类基本的过程（更详尽的论述可参阅 Fawcett 1988；Halliday 1985）：

（1）*物质的*（*material*）：“约翰砸了锁”。
（2）*心理的*（*mental*）：“她马上明白了”。
（3）*言语的*（*verbal*）：“米切尔说他很饿”。
（4）*关系的*（*relational*）：“主菜真香”。

（1）*物质的行为过程*（由“砸”、“擦”、“掘”、“开”等动词来实现）同如下固有角色相关联，诸如动因（表现这种行为的某人或某物）和受其影响的（对象）（处于这种行为之接受终端的某人或某物）。举例来说：

约翰	砸了	锁
动因	过程	影响对象

当然，作为参与者角色的动因与作为句法元素的“主语”之间并不一定非得相符。被动语态便使某种明显的非一致形态成为可能，比如：

锁	被约翰	砸了
影响对象	动因	过程
主语		谓语

被动语态由此使影响对象主体化或主位化。

它也允许动因省略或不表述，例如：

锁	被砸了
影响对象	过程

（2）*心理的过程*（由“知道”、“觉得”、“认为”、“相信”等动词实现）同如下固有角色相关联，诸如感知主体（承担“知晓”、“思考”或“感觉”等行为的主体）以及感知主体所感受的现象（PHENOMENON）。举例来说：

詹姆斯	想到	这个问题
感知主体	过程	现象

玛丽	明白	这个信息
感知主体	过程	现象

这个信息	震惊了	我
现象	过程	感知主体

十分常见的是，现象可能不会出现于句子的表层结构，但其中可能提及某些行为的条件：

医生	想得	很吃力
感知主体	过程	条件

玛丽	马上	明白了
感知主体	条件	过程

（3）*言语的过程*就是说的过程，尽管这个过程可能以许多形式出现——如“提议”、“答应”、“打听”、“告诉”、“通知”等。典型的参与者角色有说者（SAYER）、措辞（VERBIAGE）与间接宾语（RECIPIENT）。举例来说：

我	说	该到走的时候了
说者	过程	间接宾语

我	告诉	他	该到走的时候了
说者	过程	间接宾语	措辞

（4）*关系的过程*就其最简单的形式而言涉及某些实体，这种实体通过提及某些属性而被识别。这个过程可能由诸如“成为”、“似乎”、“是”、“有”等动词来实现，典型的角色是识别符（IDENTIFIER）与被识者（IDENTIFIED）。

天空	是	蓝的
被识者	过程	识别符

其他重要的角色还有拥有者（POSSESSOR）与被拥有者（POSSESSED），就像下列句子：

我	没有	钱
拥有者	过程	被拥有者

“真实世界”的任何事件与关系通过上述某类或他类过程而得到过滤（filtered through），并被赋予语言形态。因此，及物关系是语言的构造化与经验的中介化（mediation）的核心。在任何文本中，选择及物法的类型都可能显示着依某种方法而非其他方法对经验进行建构的关键倾向。因此，及物法分析就为探讨文本的种种**意识形态**向度（dimensions）提供了一个现成而重要的工具。

M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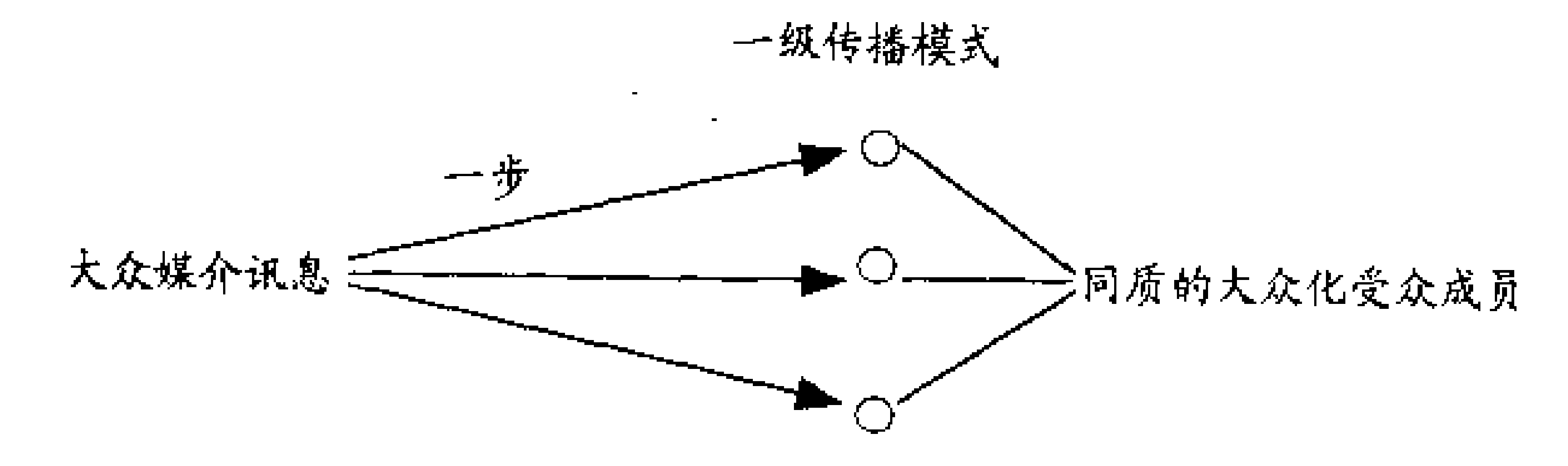
互文参阅：意识形态（ideology），语义学（semantics），句法（syntax）。
深入阅读：Halliday（1985）；Montgomery（1986）。

置换（transposition） * 改变事件或者关系以使彼此互相换位的行为。* 对传播研究来说，置换的概念在语言分析上证明行之有效，其间词语、短语或句子都可能得到调换；或者说，任何**讯息**与**文本**的构成部分在字面上都可能得到对换。意义总受置换的影响。比如，“狗咬了女人”这个句子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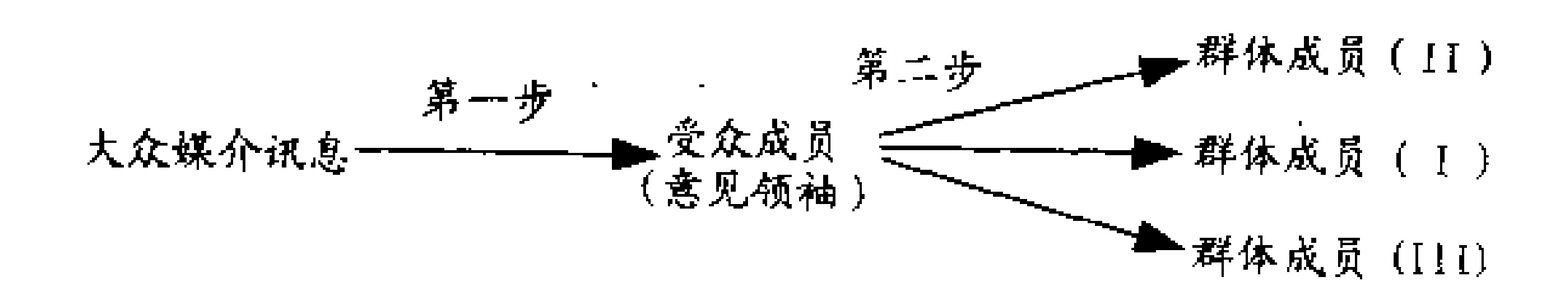
其置换形式“女人咬了狗”（在这个例子里，就是颠倒）形成戏剧性的对比——正如每个记者都会告诉你的那样。这个过程在广告中也至关重要，其中产品的元素和为它创造的广告形象得到**隐喻**式的置换。万宝路香烟与美国西部就彼此置换了隐含意义，正如薄荷型香烟与山涧彼此置换意义一样。

JF

两级传播模式（two-step flow model） ＊ 有关媒介讯息经由人际网络的中介化（mediated）而进行传播的一种早期重要理论。＊ 正如两级传播模式所示，它摆脱先前将大众传播视为“一级”（one-step）流通过程的那种直截了当或“皮下注射”的视角：



进而形成讯息通过社会群体进行扩散的一种更复杂的理论，即两级传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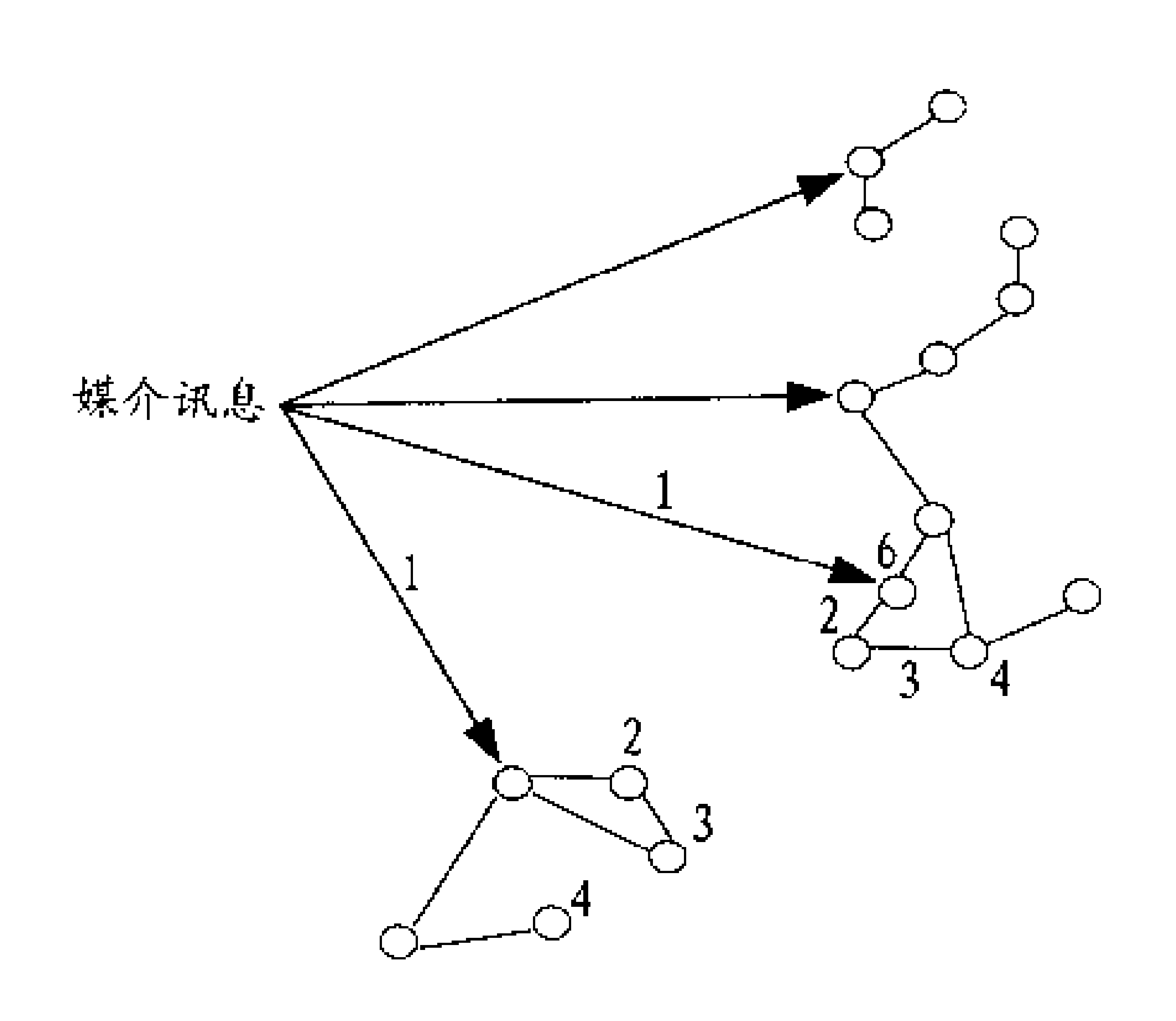


这个模式主要通过**受众**感受大选报道（Lazarsfeld *et al.* 1944）的**实验观察法**分析与群体关系的研究而获得发展，其重要性在于对先前所持的有关受众与媒介讯息的思想提出挑战。受众不再被视为一群互不相关的**个体**；他们具有社会化的联系，而这些联系影响他们中转与接收媒介信息的途径。这也意味着媒介讯息本身对所有人来说不是固定的、限定的与通用的，而是由不同的人进行不同的解释。两级传播模式同**初级群体**的“重新发现”

具有密切关联，并同卡茨与拉扎斯菲尔德①(1955)的研究紧密相关。

多级传播模式(multi-step flow model)是"两级"模式的一个合乎逻辑的扩展，它进一步强调大众媒介受众间那种传播关系与社会关系的重要性。多级传播模式对两级传播模式的拓展，只是通过在受众的接收过程中建立更多的"节点"或阶段而实现的。就此而论，它显出更加包罗万象的意图，即更准确地衡量媒介讯息经由群体关系进行传播的重重"步骤"与发生影响的复杂网络。其重要性在于进一步摆脱如下看法，即把受众看做松散的、被动的而把媒介讯息视为对所有个体都显示同一面向、都具有同一意义。它明确显出从关注"媒介对人民做了什么(what the media do to people)"到关注"人民用媒介做了什么(what people do with the media)"的转向：

多级传播模式



① 拉扎斯菲尔德(Paul Felix Lazarsfeld，1901～1976)，奥地利裔美国社会学家。曾就读于维也纳大学，获应用数学博士学位。1933年赴美，1940年开始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他领导的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学研究所，成为社会学实证研究的重镇。其间，他与罗伯特·默顿(Rorbert Merton)合作就大众传播问题做过一系列卓有影响的研究，从而与政治学家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社会心理学家卢因(Kurt Lewin)和霍夫兰(Carl Hovland)并称为传播学的"四大先驱"(W·施拉姆语)。

TO

互文参阅：效果（effects），皮下注射模式（hypodermic needle model），意见领袖（opinion leader）。

深入阅读：McQuail and Windahl（1981）①；Schramm and Roberts（eds）（1971）。

① 即D·麦奎尔等《大众传播模式论》（*Communication Models*），中译本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1987）。

U

无意识（unconscious） ＊（1）一个描写性术语，指演员与/或受众均未察觉的行为；（2）一个同其他假定的心理结构相关的过程或系统，与**意识**相对。＊无意识由弗洛伊德在建构**精神分析理论**时首次给予描述，按照他的假定，无意识属于同寻求**快乐**或复仇的欲望相关的那种狼奔豕突的心理能量之核心。弗洛伊德怀疑，他的许多病人都受到早先**经验**的影响，这种经验实际上不可能得到原原本本的记忆，而只能出现在已经置换的情景中。例如，梦中**形象**对做梦者来说可能具有特别的含义，尽管对意义的全面理解在通过**检查**时可能受到阻挠。弗洛伊德在《*日常生活的心理病理学*》（1904）中表明，当**意识**方面的**记忆**受到抑制时，对某个单词或短语的遗忘（而在其他情景下记得很牢）、甚至舌尖的滑动都可能富有深意。

无意识不同于前意识（preconscious），后者包含的经验记忆与动机能够进入意识但又不是立刻呈现。如果遵循Hilgard *et al.*（1979）对无意识与下意识（弗洛伊德把这两个术语当作同义语使用）所做的划分，那么下意识（subconscious）所指的经验分布于意识外围的周边，无法予以密切关注，因为它处在那个解释得多少有点糟糕的阈下。在*精神分析*中，荣格①假定有一种集体无意识（collective unconscious），它属于种种一以贯之的类型或**原型**的来源。这些原型对人们来说已是习焉不察，它显露于神话、梦境与文学形象之中。

DS

互文参阅：意识（consciousness），形象（image），投射（projection），

① 荣格（Carl Jung,1875～1961），又译容格，瑞士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曾与弗洛伊德合作研究达5年（1907～1912），后因性情与思想不同而分道扬镳。他是弗洛伊德之后最重要的心理学家，他提出的集体无意识、原型等概念对现代学术思想影响甚大。

精神分析理论（psychoanalytical theory），下意识（subconscious）。
深入阅读：Stafford-Clarke（1967）；Jung（1969）；Hilgard *et al.*（1979）；Corner and Hawthorn（eds）（1989）。

使用与满足（uses and gratifications） ＊研究媒介受众的一种取向（approach）。按照其论点，受众成员对媒介产品的消费是有目的的，旨在满足某些个人的、经验化的需求。＊这一取向的核心主张是，人们观看电视与电影或阅读报纸与书籍等，实际上都在不同程度地使某些需求获得满足与满意。借助参考书使自己对具体信息的“需求”得到解决与满足，可能是最易理解的例子。

这种学术传统植根于美国1940年代的有关研究，除了其他问题，它直接面向的是探究收听广播“肥皂剧”的**受众**对满足的寻求与获得（Herzog 1944）。现在，这一探究已发展为并被表述为一种受众—媒介之关系的理论。这种理论尤与Katz *et al.*（eds）（1974）的研究相关，而且正如McQuail and Windahl（1981）[1]在其论述中所言，“最适宜在美国立足”。

由于其着重点在于*能动的*受众，而组成这些受众的个体在*积极地*从各种被选择被“使用”的媒介产品中寻求多样化的满足，所以，这一取向就显示出一种颇受青睐的剧变，即背弃媒介—受众**效果**上被动而僵化的**皮下注射模式**。用Halloran（ed.）（1970）广受征引的话来说，它使研究者并鼓励研究者“别总想着*媒介对人民做了什么*（*what the media do to people*），而应考虑*人民用媒介做了什么*（*what people do with the media*）”。

依照这种传统进行研究，McQuail等人（1972）建构了一套媒介—个人相互作用的类型学（typology）；其研究为“彻底考虑”这一通用取向提供了一种有用的代表性方法。他们指出，媒介的功能在于以不同的方式提供属于/针对如下需求的各种满足：

（1）*消遣娱乐*（*diversion*）　媒介提供的材料被人们用来“逃避”或避开[2]例行公事——比如工作上的事务，以及各种各样直面

---

① 即D·麦奎尔等《大众传播模式论》（*Communication Models*），中译本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1987）。

② 这里用的“避开”一词（divert）兼有避开与娱乐之意，可谓一语双关。

与限制自己的问题。这样一来，媒介就使人们获得情感的宣泄，并从这些以及其他限制中获得解脱，即使是暂时的。

（2）人际关系（*personal relationships*） 媒介提供的材料可以满足人们结伴与结群的需求。这种功能通过两种途径实现。第一，我们独处之际可以打开收音机与电视以便“给自己找个伙伴”，我们可以渐渐“了解”媒介中的名流与角色，仿佛他们都是自己的私人朋友。第二，对媒介节目与产品的了解与消费常常可使我们与他人的互动更加便利，或者成为互动的一个焦点。

（3）个人认同（*personal identity*） 这里，媒介内容可被象征性地用于探究、挑战、调整或确认个体的认同感与自我感，包括对自我、自我的情景意识、同媒介情景相连的种种价值与看法以及种种事态（scenarios）所做的比较。按照这种方式，媒介便提供了对自我进行“评估”与“定位”的途径，进而使自己在处理个人认同问题上做出相应的反应。

（4）监视（*surveillance*） 媒介提供的材料可满足有关身边社会与远方世界的信息需求：关于种种问题与事件的信息，都直接与间接地影响着个人的生活。

总之，使用与满足的取向着眼于个人“需求”在社会与心理方面的起源与动力，假定这些需求会导致对各种媒介的不同使用，而这反过来又促使个体受众成员获得不同层面的满足。每种媒介都被理解为在提供一套独一无二的内容与属性，产生不同种类与不同范围的满足（Katz *et al*. 1973）。这种取向提供了一种独特的理论与方法，从而使我们能够探讨不同的媒介受众成员如何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解释和使用媒介的内容。然而，从它招致的许多核心批评的情况看，对它进行评估也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人们认为，这种取向包含对个体与心理的过分强调，结果忽略或无法完全考虑社会结构的基础以及受众需求与满足的性质。这种认识通常伴以对**功能论**的批判，而功能论是媒介消费观的基础。按照这种观念，个体的需求是由满足予以“平衡”的，某些功能由此得以实现。比如，Elliott（1977）在其批判性的论述中，就指出这个模式所固有的循环论证以及确定“使用”、“需求”与“满足”何者优先等问题。最后，

研究使用与满足的学者遭遇诟病，是因为他们或将大众媒介的讯息视为天经地义，或对其忽略不计，而事实上媒介讯息本身可能“青睐”某些意义而拒斥其他意义。这种看法意味着，受众成员的“能动性”不仅受制于自己的“需求”，而且受制于媒介文本自身的结构。对此，Morley（1980）、Elliott（1974）与McQuail and Windahl（1981）等都做出有效的批判性总结。

TO

互文参阅：受众（audience），功能论（functionalism），皮下注射模式（hypodermic needle model），倾向性解读（preferred reading）。

深入阅读：Morley（1980）；McQuail and Windahl（1981）[①]；Katz *et al.*（eds）（1974）；Elliott（1974）；McQuail（ed.）（1972）；Fiske（1982）[②]；McQuail（1987）；Lull（1990）。

---

① 即D·麦奎尔等《大众传播模式论》（*Communication Models*），中译本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1987）。

② 即J·费斯克的《传播研究引论》（*Introduction to Communication Studies*），中译本收入台湾远流出版公司的“传播学名著译丛”（1995），名为《传播符号学理论》（张锦华译）。

V

价值(value) * 对知觉到的属性和通达目标的路径所做的判断，通常与某种态度相关联。* 这种判断可能包括善良、诚实、坚强以及其他类似的特性，并根据这种价值判断而表现不同的强度。

应区分道德价值与其他价值。依据道德价值，个人将按照 Brown（1965）所称的“道德义务”做出判断。个人所用的“应该”语气就暗示着这种义务，以及迥异于其他价值陈述的某些判断，这种价值陈述仅仅意味着某种渴望的意识；比如，“我喜欢”或者“我想要”。有关价值的分析同**文化**与传播研究密切相关。群体之间的关系作为不同的**社会与文化**定位的结果，可能就建筑在不同价值体系的运行上。当然，价值的内在化主要依据传播的信息，并且常常经由**社会化**的过程而达成。

在语言学的语境中，索绪尔[①]（1974）曾把价值界定为同一系统中的某个词语同其他相关词语的关系，这种系统是由差异或**分辨特征**所确立的。比如，“羊肉”的价值就在于它是非—羔羊、非—绵羊、非—牛肉。语言学的价值就是这种系统内种种差异的一种功能。

DS

互文参阅：态度（attitude），文化（culture），初级群体（primary group），社会化（socialization）。

---

① 索绪尔（Ferdinand Saussure，1857～1913），瑞士杰出的语言学家、现代符号学先驱，其代表作《普通语言学教程》（1916）是他去世后学生们根据笔记以及他的一些手稿等材料编辑整理的。这部里程碑式的著作不仅对现代语言学具有首屈一指的意义，而且对20世纪以来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都产生深远的影响。本辞典所涉及的一系列辞条，特别是结构主义与符号学方面的辞条均与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相关。其中较常见的有“语言/言语”、“能指/所指”、“组合关系/联想关系”、“共时态/历时态”等。

深入阅读：Tajfel and Fraser(eds)(1978)；Brown(1965)；Fiske(1982)[①]；Abrams *et al.* (eds) (1985)。

语言变体（variety） ＊ 使用某种语言（比如英语）的具体而系统的方式，这种方式不是取决于使用者所处社会阶层的地位，就是取决于由典型的**情景语境**所决定的特殊而反复的需要。＊ 从这个意义上讲，流行音乐节目主持人的谈话、法律用语、卡车司机的俚语、Tynesiders 语、**混血语**、土语以及英格兰西南部诸郡的方言等，都可以视为英语的语言变体。

这是一个重要的概念，用以质疑**语言**是一种稳定的、统一的、同质的实体之观念。作为一个概念，它提供了一种视角，由此可以发现所有语言经过时间与社会空间的变化都内在地出现差异、变化与异质。当然，它还意味着一种语言变体与另一种语言变体之间存在泾渭分明的界限，就此而言这个术语承受了“语言”概念本身的种种困难。因为，说到底，把一种语言变体与另一种语言变体相区别的界限，无法用任何方法论进行描述。我们试图发现的是随着空间（包括地域与社会两层含义）与时间不断变化而出现的持续的、微妙的变体。因此，眼下的研究工作想要推进就需要区分某种可变特征或变体（variant）——比如元音、辅音、停顿缀词（pause filler）或者**话语**标识等，然后研究这个变体如何从这个群体到那个群体、从这个语境到那个语境的变化。

MM

互文参阅：口音（accent），反一语言（anti-language），混血语（creole），方言（dialect），双言制（diglossia），洋泾浜（pidgin），标准语言（standard language）。

深入阅读：Downes（1985）；Montgomery。

暴力（violence） ＊ 包含紧张成分、指向某物或某人的敌对行为之构成因素。＊ 正如Tutt（ed.）（1976）所强调的，暴力可能是合法的，也可能是非法的，比如昨天的某些非法行为今天成为合法的，反之亦然。暴力的表现形式可能大不相同，从明显的肉体攻击到口角相争，进而甚至到缄默或退

① 即J·费斯克的《传播研究引论》(*Introduction to Communication Studies*)，中译本收入台湾远流出版公司的“传播学名著译丛”(1995)，名为《传播符号学理论》(张锦华译)。

计。暴力的指向可能同样大相径庭（参阅**置换**）。人们可能直面真正的“对手”，如果对手太强大也可能选择比较脆弱的目标。

对**媒介**暴力节目影响受众的效果问题感兴趣的传播学理论家，都特别重视模拟与社会学习理论。尽管由 Bandura 与其他研究者所做的**经验**性研究证明，儿童在观看一段描写暴力的电视画面后，其行为表现的确更具暴力性，但由 Hall 等人（1978）重新检视的调查研究（survey studies）则得出情况远为复杂的结论。有攻击性的人可能更喜欢看暴力内容，有些人可能比其他人对模拟/模仿更敏感，其他未被论及的偶然因素也可能使**媒介效果**混乱不清。而且正如 Gunter（1980）提醒我们的，媒介描写的人间利他行为与友善行为可能相互作用，从而冲淡对暴力行为的模仿。

暴力的概念在说明**议程设置**、媒介协调、**道德恐慌**与政治论争等问题上也得到探讨。它证明是个通行的话题——和一个轰动性的话题——对法律与其他**框架**都是如此。比如，“暴力”演变为暴力*升级*，导向社会失控，从而促使人们呼吁增加警力资源。暴力中所隐含的恐惧与混乱主题，在政治中证明是些便利而通用的、分散人们注意力的策略（distractors）。比如，伦敦的市内骚乱可能被描述为“无法无天”和一种“对文明的威胁”——由此导致媒介对有关更为有效的治安、设施与训练问题的讨论。于是，针对这种暴力发生的*原因*所做的别样讨论，以及与此相关的、旨在提高城市贫民区社会群体生活质量的策略就成为次要问题了。

DS

互文参阅：置换（displacement），偏见（prejudice）。

深入阅读：DeFluer and Ball-Rokeach（1975）[①]；Corner and Hawthorn（1989）；Howitt and Cumberbatch（1975）；Fiske（1987）；Gunter（1980）。

窥视者（voyeur）[②] * 从某个隐藏或隐秘位置看到特别景象的人或角色。 *

---

① 即 M. 德弗勒等《大众传播诸论》（*Theories of Mass Communication*），中译本由新华出版社出版（1990）。

② voyeur的本义是窥淫癖者、窥阴部色情者等，因而兼有“窥视”与“窥淫”的意思。

窥视者最初是指某些不经许可而观看他人性行为者——这是窥视者汤姆[①]这个概念的意思。近来针对**媒介受众**的讨论，也涉及窥视者问题，其中特别涉及那些观看银幕与荧屏上的演员的受众（这里同收听广播或阅读书刊不同：观看人们身体是基本的前提）。这一窥视者的身份可同社会情景中的旁观者进行有效的对比：旁观者是公开现身的，他们所看的行为也是公共性的，而窥视者则深入一种基本属于私人的世界。这种深入通常产生危险知识，而这种知识一旦公开将导致当事人身败名裂——最常见的例子就是通奸男女的蝇营狗苟。然而，读者应该留意，在受众的窥视中还有其他问题——比如，以间谍场景为例，窥视者的位置实际上包括在**叙事**结构中（窥视者汤姆被分派的角色可能是**英雄**，也可能是罪犯），观看者窥视着间谍（spies on the spy）！

从**精神分析理论**的角度对窥视者进行解释的学者，着迷于挖掘某人早年可能遇见的痛苦场景，比如婴儿妒忌地目睹父母的性交活动。而对我们来说，可能更富有意义的是思考雅格布森[②]（1982）的提示，即成人的性行为世界深藏于锁闭的门后，由此不可避免地产生有关他人性交能力与性

---

① 窥视者汤姆(Peeping Tom)，英国传说中的人物，系Coventry的一个裁缝。相传11世纪时，这个城市在利奥弗里克伯爵的统治下，赋税沉重，民不聊生。伯爵夫人Lady Godiva(1048～1080)为民请命，请求减轻百姓的重税，她的丈夫为此激怒，宣称只要她裸体骑马通过闹市，即准其所请。为了解除民困，Lady Godiva忍着羞辱，脱下衣服，让长发披身，骑马过市。事先传谕市民，她一路行经时，全城百姓都待在屋里，紧闭门窗。而惟独窥视者汤姆(Peeping Tom)偷偷窥视，结果遭到报应，双目失明，并且受到众人的唾骂。这个传说最早由Roger of Wendover(卒于1236年)写入其《年代史》(1057年项下)，遂成为历代诗歌、戏剧、绘画的题材。从1678年起，历届考文垂博览会上都要举行Godiva游行，以示纪念。如今的市中心广场上，矗立着Lady Godiva的青铜像，雕像底座上刻着英国诗人丁尼生的叙事诗《*Lady Godiva*》中的诗句：

她骑马而回，冰清玉洁的身子。
她推翻了苛税，替自己
建立了流芳百世的美名。(陆玉澄译)

② 雅格布森（Roman Jakobson，1896～1982），原籍俄国的语言学家，“布拉格学派”的主要奠基人。早年曾任莫斯科“高等戏剧学校”俄语教授，1920年代在布拉格开创了语言学研究的布拉格学派。1941年流亡美国，先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后任哈佛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与普通语言学教授（1949～1967）。他的研究不仅对现代语言学建树颇丰，而且对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也影响广泛。特别是他所创立的布拉格学派，一方面前承索绪尔的开创性工作，另一方面又后启1960年代法国结构主义的一脉思潮。

欲的深层好奇。如此吸引观看者的场景"吸引力"无论由何形成，至少窥视者的凝视中有两层涵义：一是某种鬼鬼祟祟的位置（因为这个场景属于私人，而你不应该在那里），一是某种权力的位置（摄像机的神奇在于它蔑视自然的法律，它所展现的东西一旦公开就将损害当事人）。有趣的是我们注意到，无论什么时候只要窥视者作为当事人被包括在实际场景之中，那么他们总被描绘为极端分子（extremes）——如作为有罪的弄臣（《哈姆雷特》里的波洛涅斯），或是作为超人（詹姆斯·邦德）。

由于摄像机镜头无所不看的特征，窥视者最终就意味着无所不能。尽管我们在观看媒介产品时很少想到它，但镜头穿墙越户，对准人们而不必担心被发觉（即使被发觉，那么被镜头所惊骇的实际上是演员，而这常常是问题的核心所在—— 参考Michael Powell的《*Peeping Tom*》，或者参考Mel Brooks那部可笑的《*High Anxiety*!》）。以Dervin(1985)对希区柯克[①]的《*Psycho*》分析为例：摄像机拍下一位正在偷钱与私通的美丽女子，但开始我们是透过一扇窗户偷看进去的，然后不知怎么地就进入卧室。这并没有破坏这段情节的可信性，也没有影响我们对这个场景的注意力，然而，最终它透露给我们一位女角的秘密信息，按这部影片的表述她在道德上是可疑的。也许这是由于我们在过去的媒介产品中形成的条件反射，但我们现在期待她受到惩罚— 当然是在可耻的沐浴场景。注意到这一点就使我们对窥视者这个概念有了另一层理解，这时观看者所了解的秘密信息不仅涉及过去，而且关乎未来。知道或至少怀疑人们身上会发生什么事情，当然就进入一种有权有势的位置——而高明的导演一方面会让你觉得已经知道，另一方面又会在片尾陡然逆转，使你的得意落空。通过这种窥视式探险的风格，观看者享受着猜测复猜测的乐趣—— 涉及神秘、谜团与叙事的秘密。

DS

互文参阅：受众（audience），精神分析理论（psychoanalytical theory），象征互动论（symbolic interactionism）。

深入阅读：Dervin（1985）。

---

① 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1899～1980)，英国出生的大师级电影导演，以拍摄惊险悬念片著称。经典作品有《三十九级台阶》(1935)、《蝴蝶梦》(1940)、《西北偏北》(1959)、《群鸟》(1963)等。1979 年被美国电影学院授予终生成就奖，1980 年被英国女王封为爵士。从 1940 年代起，他都在自己执导的每部影片中露次面。

W

世界观（worldview） * 被视为可赋予特别的个体或社会群体以特征的一系列特别的态度、信仰与价值。* 这个术语常常意味着这样一种关系，其中一方面是这种**个体**与**群体**所处的社会地位或处境，另一方面是随之产生的他们对社会现实的看法或观点。对此，由**意识形态**这个术语可以得到更加系统的解释。

TO

互文参阅：话语（discourse），意识形态（ideology）。

2002 年 12 月 6 日初译稿
2003 年 7 月 20 日二译稿
2003 年 8 月 11 日三译稿

推 荐 书 目

(REFERENCES)

Abrams, M., Gerard, D. and Timms, N. (eds) (1985) *Values and Social Change in Britain*, London, Macmillan.
Adorno, T. W. (1991) *The Culture Industry: Selected Essays on Mass Culture*, edited by J. M. Bernstein, London, Routledge.
Adorno, T. W., Frenkel-Brunswick, E., Levinson, D. J. and Sanford, R. N. (1950)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New York, Harper & Row.
Allport, G. (1980) *The Nature of Prejudice*,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Allport, G. W. and Postman, L. (1948) *The Psychology of Rumour*, London, Holt.
Althusser, L. (1971)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Harmondsworth, Penguin.
Alvarado, M. and Buscombe, E. (1978) *Hazell: The Making of a TV Series*, London, BFI/Latimer.
Anderson, B. (1983) *Imagined Communities*, London, Verso.
Ang, I. (1991) *Desperately Seeking the Audienc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Argyle, M. (1978) *The Psychology of Interpersonal Behaviour*, 2nd edn, Harmondsworth, Penguin.
— (1987) *The Psychology of Interpersonal Behoviour*, 4th edn, Harmondsworth, Penguin.
— (1988) *Bodily Communication*, London, Methuen.
Aries, P. (1962) *Centuries of Childhood*, London, Cape.
Aronson, E. (1980) *The Social Animal*, 3rd edn, Reading MA, Freeman.
— (ed.) (1988) *Readings about the Social Animal*, 5th edn, New York, Freeman.

Aronson, E. and Mills, J. (1959) 'The effects of severity of initiation on liking for a group', *Journal of Abnormal Social Psychology*, 59, 177–81.

Atkinson, J. M. (1984) *Our Masters' Voices*, London, Methuen.

Atkinson, J. M. and Heritage, J. C. (eds) (1984) *Structures of Social Action: Studies in Conversation Analys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tkinson, P. (1985) *Language, Structure and Reproduction*, London, Methuen.

—— (1990) *The Ethnographic Imagination*, London, Methuen.

Atkinson, R. C. and Shiffrin, R. M. (1971) 'The control of short term memory', *Scientific American*, 225, 82–90.

Austin, J. L. (1962)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adcock, C. (1980) *Psychoanalysis of Culture*, Oxford, Basil Blackwell.

Baddeley, A. D. (1976) *The Psychology of Memory*, New York, Harper & Row.

Bandura, A. (1973) *Aggression: A Social Learning Analysi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1978) 'Introduction', in Rosenthal and Zimmerman (1978).

Banton, M. (1965) *Roles*, London, Tavistock.

Barber, P. J. and Legge, D. (1976) *Perception and Information*, London, Methuen.

Barbera-Stein, L. (1979) 'Access negotiations: comments on the sociology of sociologists' knowledg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74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Boston, August.

Barker, M. (1989) *Comics: Ideology, Power and the Critic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Barthes, R. (1973) *Mythologies*, St Albans, Paladin.

—— (1977) *Image–Music–Text*, London, Fontana.

Bartlett, F. C. (1932) *Remember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ateson, G., Jackson, D., Haley, J. and Weakland, J. (1956) 'Toward a theory of schizophrenia', *Behavioural Science*, 1, 251–64.

Beattie, J. (1966) *Other Cultures*, London, Cohen & West.

Becker, H. (1963) *Outsiders*, New York, Free Press.

Beechey, V. and Donald, J. (1985) *Subjectivity and Social Relations: A Reader*,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Belsey, C. (1980) *Critical Practice*, London, Methuen.

Bennett, T. (1977) 'The media and social theory: mass society theories and conceptions of class', Unit 3, OU: DE353 *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 (1979) *Formalism and Marxism*, London, Methuen.

Bennett, T., Boyd-Bowman, S., Mercer, C. and Woollacott, J. (eds) (1981a) *Popular Television and Film*, London, BFI/Open University.

Bennett, T., Martin, G., Mercer, C. and Woollacott, J. (eds) (1981b) *Culture, Ideology and Social Process*, London, Batsford.

Berger, A. A. (1992) *Popular Culture Genres*, London and Newbury Park, Sage.

Berger, B. and Berger, P. (1976) *Sociology: Biographical Approach*, Harmondsworth, Penguin.

Berger, P. (1973) *The Social Reality of Religion*, Harmondsworth, Penguin.

Berger, P. and Luckmann, T. (1971)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Harmondsworth, Penguin.

Berlo, D. K. (1960) *The Process of Communicati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Holt, Rinehart & Winston.

Berne, E. (1964) *Games People Play: The Psychology of Human Relationships*, Harmondsworth, Penguin.

Bernstein, B. (1971) *Class, Codes and Control*, St Albans, Paladin.

Bettelheim, B. and Janowitz, M. (1964) *Social Change and Prejudice, Including Dynamics of Prejudice*, New York, Free Press.

Beynon, J. (1985) *Initial Encounters in the Secondary School: Sussing, Typing and Coping*, London, Falmer.

Biddiss, M. (1977) *The Age of the Masses*, Harmondsworth, Penguin.

Billig, M. (1976) *Social Psychology and Intergroup Relations*, London, Academic Press.

—— (1982) *Ideology and Social Psycholog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Bilton, T., Bonnett, K., Jones, P., Stanworth, M., Shearth, K. and Webster, A. (1981) *Introductory Sociology*, London, Macmillan.

Birdwhistle, R. L. (1970) *Kinesics and Context*, London, Allen Lane.

Blackman, D. (1974) *Operant Conditioning: An Experimental Analysis of Behaviour*, London, Methuen.

Blumer, H. (1969)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Perspective and Method*,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Bocock, R. (1974) *Ritual in Industrial Society*, London, Allen & Unwin.

—— (1992) 'Consumption and lifestyles', Ch. 3. in R. Bocock and K. Thompson, (eds) *Social and Cultural Forms of Modernity*, Oxford, Polity/Open University Press.

Bogardus, E. S. (1928) *Immigration and Race Attitudes*, Lexington, Heath.

Bonner, F., Goodman, L., Allen, R., Janes, L. and King, K. (eds) (1992) *Imagining Women*, Cambridge, Polity/Open University Press.

Bourdieu, P. (1984)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Bourdieu, P. and Passeron, J. C. (1977) *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 Society and Culture*, Beverly Hills, Sage.

Box, S. (1971, new edn 1981) *Deviance, Reality and Society*, London, Holt, Rinehart & Winston.

Boyd-Barrett, O. (1977) 'Media imperialism: towards an international framework for the analysis of media systems', Ch. 5. in Curran *et al.* (eds) (1977).

Brake, M. (1980) *The Sociology of Youth Culture and Youth Subculture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Brittan, A. (1973) *Meanings and Situation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Brown, J. A. C. (1972) *Techniques of Persuasion*, Harmondsworth, Penguin.

Brown, R. (1965) *Social Psychology*, New York, Free Press.

—— (1986) *Social Psychology*, 2nd edn, London, Collier Macmillan.

Browne, K. (1992) *An Introduction to Sociology*, Cambridge, Polity.

Brunsdon, C. and Morley, D. (1978) *Everyday Television: 'Nationwide'*,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

Burns, T. (1977) *The BBC: Public Institution and Private World*, London, Macmillan.

—— (1992) *Erving Goffma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Burton, G. and Dimbleby, R. (1988) *Between Ourselves: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London, Edward Arnold.

Campbell, E. Q. (1975) *Socialization: Culture and Personality*, New York, Brown.

Carey, J. W. (1989) *Communication as Culture*, Boston, Unwin Hyman.

Cauthen, N. R. (1971) 'Stereotypes: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1926–68',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84, 241–53.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1982) *The Empire Strikes Back: Race and Racism in 70's Britain*, London, Hutchinson.

Cherry, C. (1957) *On Human Communicatio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Chibnall, S. (1977) *Law and Order News*, London, Tavistock.

Chomsky, N. (1965) *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1968) *Language and Mind*,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Cicourel, A. (1964) *Method and Measurement in Sociology*, New York, Free Press.

Clarke, G. (1982) *Defending Ski-jumpers: A Critique of Theories of Youth Sub-Cultures*, Stencilled Paper 71,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Birmingham University.

Clarke, J. (1991) *New Times and Old Enemies*, London, Harper Collins.
Clarke, J., Hall, S., Jefferson, T. and Roberts, B. (1976) *Subcultures, Cultures and Class*, pt 1 of Hall and Jefferson (eds) (1976).
Cohen, P. (1968) *Modern Social Theory*, London, Heinemann.
Cohen, S. (ed.) (1971) *Images of Deviance*, Harmondsworth, Penguin.
— (1972, new edn 1980) *Folk Devils and Moral Panics*, Oxford, Martin Robertson.
Cohen, S. and Young, J. (eds) (1973, new edn 1981) *The Manufacture of News: Deviance, Social Problems and the Media*, London, Constable.
Cormack, M. (1992) *Ideology*, London, Batsford.
Corner, J. (1991) 'Meaning, genre and context: the problematics of "public knowledge" in the new audience studies', Ch. 13 in J. Curran and M. Gurevitch (eds) *Mass Media and Society*, London, Edward Arnold.
Corner, J. and Hawthorn, J. (eds) (1989) *Communication Studies: an Introductory Reader*, London, Edward Arnold.
Cottle, T. (1978) *Black Testimony*, London, Wildwood House.
Coulthard, M. and Montgomery, M. (eds) (1981) *Studies in Discourse Analysi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Coward, R. (1984) *Female Desire: Women's Sexuality Today*, London, Paladin.
Crookall, D. and Saunders, D. (eds) (1989) *Communication and Simulation: From two Fields to one Theme*,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London, Sage.
Cuff, E. C. and Payne, G. C. F. (eds) (1979) *Perspectives in Sociology*, London, Allen & Unwin.
Culler, J. (1976) *Saussure*, London, Fontana.
— (1983) *Barthes*, London, Fontana.
Curran, J., Gurevitch, M. and Woollacott, J. (eds) (1977) *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London, Open University/Edward Arnold.
Curran, J. and Seaton, J. (1991) *Power without Responsibility*, 2nd edn, London, Routledge.
Curran, J., Smith, A. and Wingate, P. (eds) (1987) *Impacts and Influences: Essays on Media Power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Routledge.
Dahl, R. (1961) *Who Govern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Dance, F. E. (1967) *Human Communication Theory*,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Davey, A. (1983) *Learning to be Prejudiced: A Growing up in Multi-ethnic Britain*, London, Edward Arnold.
DeFleur, M. and Ball-Rokeach, S. (1975, 4th edn 1982) *Theories of Mass Communication*, New York, McKay.

DeFleur, M. and Dennis, E. (1981) *Understanding Mass Communication*, Boston, Houghton-Mifflin.
Denzin, N. K. (1992)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and Cultural Studies*, Oxford, Blackwell.
Dervin, D. (1985) *Through a Freudian Lens Deeply: A Psychoanalysis of Cinema*, Newbury Park, Analytical Press.
de Vaus, D. A. (1986) *Surveys in Social Research*, London, Allen & Unwin.
Dixon, N. F. (1971) *Subliminal Perception: The Nature of a Controversy*, New York, McGraw-Hill.
Dominick, J. and Rauch, G. (1972) 'The image of women in network TV commercials',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16, 259–65.
Donald, J. (1982) 'Language, literacy and schooling', Unit 29, OU:U203, *Popular Culture*,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Donald, J. and Mercer, C. (1982) 'Reading and realism', Unit 15, OU:U203, *Popular Culture*,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Donald, J. and Rattansi, A. (eds) (1992) *'Race', Culture and Difference*, London, New York and New Delhi, Open University Press/Sage.
Donnelly, M. (1986) *Managing the Mind: A Study of Medical Psychology in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Britain*, London, Tavistock.
Dorfman, A. and Mattelart, A. (1975) *How to Read Donald Duck*, New York, International General.
Douglas, M. (ed.) (1973) *Rules and Meanings*, Harmondsworth, Penguin.
Douglas, M. (1987) *How Institutions Think*,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Downes, B. (1985) *Language and Society*, Glasgow, Fontana.
Downes, D. and Rock, P. (1982) *Understanding Devianc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Downing, J., Mohammadi, A. and Sreberny-Mohammadi, A. (eds) (1990) *Questioning the Media: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Newbury Park and London, Sage.
Duck, S. (1986) *Human Relationships: An Introduction to Social Psychology*, Newbury Park and London, Sage
Durkheim, E. (1950)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 New York, Free Press.
Dyer, G. (1982) *Advertising as Communication*, London, Methuen.
Dyer, R. (1979a) *Stars*, London, BFI.
— (1979b) 'The role of stereotypes', in J. Cook and M. Lewington (eds) *Images of Alcoholism*, London, BFI.
— (1987) *Heavenly Bodies: Film Stars and Society*, London, BFI.
Eco, U. (1965) 'Towards a semiotic enquiry into the television message', in Corner and Hawthorn (eds) (1980), pp. 131–50.
— (1981) *The Role of the Reader*, London, Hutchinson.

Eisenstadt, S. N. (1956)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New York, Free Press.
Eiser, J. R. (1986) *Social Psychology: Attitudes, Cognition and Social Behaviou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lliott, P. (1972) *The Making of a Television Series: A Case Study in the Sociology of Culture*, London, Constable.
— (1974) 'Uses and gratifications: a critique and a sociological alternative', Ch. 12 in Katz *et al.* (eds) (1974).
— (1977) 'Media organisations and occupations: an overview', Ch. 6 in Curran *et al.* (eds) (1977).
— (1980) 'Press performance as political ritual', in H. Christian (ed.) *The Sociology of Journalism and the Press*, Sociological Review Monographs, no. 29, Keele, University of Keele Press, pp. 141–79.
Ellis, J. (1982) *Visible Fiction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2nd edn, 1992.
Enzensberger, H. M. (1970) 'Constituents of a theory of the media', in McQuail (ed.) (1972); see also H. M. Enzensberger (1974) *The Consciousness Industry*, New York, Seabury Press.
Epstein, E. (1978) *Language and Style*, London, Methuen.
Evans, R. R. (ed.) (1969) *Readings in Collective Behaviour*, Skokie, IL, Rand McNally.
Fawcett, R. (1980)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Social Interaction*, Heidelberg, Julius Groos Verlag.
Featherstone, M. (1987) 'Lifestyle and consumer culture',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4, 55–70.
— M. (ed.) (1988) *Postmodernism*, London, Sage.
— M. (ed.) (1990) *Global Culture: Nationalism, Globalisation and Modernity*, London, Sage.
Felski, R. (1989) *Beyond Feminist Aesthetics*, Harvar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Ferguson, C. A. (1972) 'Diglossia', in P. P. Giglioli (ed.) *Language and Social Context*, Harmondsworth, Penguin.
Festinger, L. (1957) *A Theory of Cognitive Dissonanc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Festinger, L. and Carlsmith J. M. (1959) 'Cognitive consequences of forced compliance', *Journal of Abnormal Social Psychology*, 58, 203–10.
Festinger, L., Riecken, H. W. Jr and Schacter, S. (1956) *When Prophesy Fail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Fink, A. and Kosecoff, J. (1985) *How to Conduct Surveys: A Step by Step Guide*, Beverly Hills, CA, Sage.
Fiske, J. (1982) *Introduction to Communication Studies*, London, Methuen.
— (1987) *Television Culture*, London, Methuen.

— (1989a) *Understanding Popular Culture*, London, Unwin Hyman.
— (1989b) *Reading the Popular*, London, Unwin Hyman.
Fiske, J. and Hartley, J. (1978) *Reading Television*, London, Methuen.
Forgas, J. (1985) *Interpersonal Behaviour: The Psychology of Social Interaction*, Oxford, Pergamon
Foster, H. (ed.) (1985) *Postmodern Culture*, London, Pluto. (Published in North America as *The Anti-Aesthetic: Essays on Postmodern Culture*, Townsend, WA, Bay Press.)
Foucault, M. (1971) *Madness and Civilisation: A History of Insanity in the Age of Reason*, London, Tavistock.
Foulkes, A. P. (1983) *Literature and Propaganda*, London, Methuen.
Fountain, N. (1988) *Underground*, London, Comedia.
Freedman, J. L., Sears, D. O. and Carlsmith, J. (1981, 1982) *Social Psycholog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French, M. (1986) *Beyond Power: On Women, Men and Morals*, London, Abacus/Sphere.
Freud, S. (1904) *The Psychopathology of Everyday Life*, in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vol. 6 (1966), London, Hogarth.
Gallop, J. (1982) *Feminism and Psychoanalysis: The Daughter's Seduction*, London, Macmillan.
Gamson, W. A. (1984) *What's News? – a Game Simulation of TV News*, San Francisco, Collier Macmillan.
Garnham, N. (1986) 'The media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P. Golding, G. Murdock and P. Schlesinger (eds) *Communicating Politics*, Leicester,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Garnham, N. and Williams, R. (1980) 'Pierre Bourdieu and the sociology of culture; an introduction',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2:3, 209–23.
Gerbner, G. (1956) 'Toward a general model of communication', *Audio Visual Communication Review*, IV:3, 171–99.
Gerbner, G. and Gross, P. (1976) 'Living with television: the violence profil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6:2, 173–99.
Gerbner, G., Gross, P. and Melody, P. (1973)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and Social Policy: Understanding the New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Wiley.
Giddens, A. (1978) *Durkheim*, London, Fontana.
— (1982) *Sociology: A Brief but Critical Intraduction*, London, Macmillan.
— (1991) *Modernity and Self Identity*, Oxford, Polity press.
Giddens, A. and Held, D. (eds) (1982) *Classes, Power and Conflict*, London, Macmillan.
Gilroy, P. (1987) *There ain't no Black in the Union Jack: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Race and Nation, London, Hutchinson.
Gitlin, T. (1980)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Glasgow Media Group (1982) *Really Bad News*, London, Writers and Readers Publishing Co-operative.
Goffman, E. (1963) *Behaviour in Public Places*, New York, Free Press.
— (1967) *Interaction Ritual*, Harmondsworth, Penguin.
— (1968) *Asylums*, Harmondsworth, Pelican.
— (1969) *Behaviour in Public Places: Notes on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Gatherings*, New York, Free Press.
— (1971)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Harmondsworth, Penguin.
— (1974) *Frame Analysis*, Harmondsworth, Penguin.
Golding, P. (1974) *The Mass Media*, London, Longman.
Golding, P. and Middleton, S. (1982) *Images of Welfare*, Oxford, Martin Robertson.
Gordon, A. (1986) 'Thoughts out of season on counter culture', in D. Punter (ed.)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Longman.
Gramsci, A. (1971) *Prison Notebooks*,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Gray, A. (1987) 'Reading the audience', *Screen*, 28:3, 24–36.
Green, J. and Hicks, C. (1984) *Basic Cognitive Processes*,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Press.
Greene, J. (1975) *Thinking and Language*, London, Methuen.
Gregg, V. (1975) *Human Memory*, London, Methuen.
— (1986) *An Introduction to Human Memor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Gregory, M. and Carroll, S. (1978) *Language and Situation*,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Gregory, R. L. (1977) *Eye and Brain: The Psychology of Seeing*, 3rd edn,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 (1988) *Odd Perceptions*, London, Routledge.
Grice, H. P. (1975) 'Logic and conversation', in P. Cole and J. L. Morgan (eds) *Syntax and Semantics*, vol. 3,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Grossberg, L., Nelson, C. and Treichler, P. (eds) (1992)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Guilford, J. P. (1959) 'Traits of creativity', in H. H. Anderson (ed.) *Creativity and its Cultivation*, New York, Harper & Row.
Gunter, B. (1980) 'The cathartic potential of television drama', *Bulletin of the British Psychological Society*, 33, 448–51.
— (1985) *Dimensions of Television Violence*, London, Gower.

Gurevitch, M., Bennett, T., Curran, J. and Woollacott, J. (eds) (1982) *Culture, Society and the Media*, London, Methuen.

Hall, E. T. (1973) *The Silent Language*, Bishop's Stortford, Anchor.

Hall, G. (1983) *Behaviour, an Introduction to Psychology*, London, Academic Press.

Hall, S. (1977) 'Culture, the media and ideological effect', in Curran *et al.* (eds) (1977).

— (1982) 'The rediscovery of ideology', in Gurevitch *et al.* (eds) (1982).

Hall, S., Critcher, C., Jefferson, T., Clarke, J. and Roberts, B. (1978) *Policing the Crisis: Mugging, the State and Law and Order*, London, Macmillan.

Hall, S., Hobson, D., Lowe, A. and Willis, P. (eds) (1980) *Culture, Media, Language*, London, Hutchinson.

Hall, S. and Jefferson, T. (eds) (1976) *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 London, Hutchinson.

Halliday, M. A. K. (1973) *Explorations in the Functions of Language*, London, Edward Arnold.

— (1978) *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 London, Edward Arnold.

— (1985) *Functional Grammar*, London, Edward Arnold.

Halliday, M. A. K. and Hasan, R. (1975) *Cohesion in English*, London, Longman.

Halloran, J. D. (ed.) (1970) *The Effects of Television*, St Albans, Panther.

— (1977) 'Mass media effects: a sociological approach', Unit 7, OU:DE 353, *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Hammersley, M. and Atkinson, P. (1983) *Ethnography: Principles in Practice*, London, Tavistock.

Harding, L. (1985) *Born a Number*,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Hardt, H. (1992) *Critic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Hare, A. (1985) *Social Interaction as Drama: Applications from Conflict Resolution*, London and Newbury Park, Sage.

Harré, R. (1979) *Social Being: A Theory for Social Psychology*, Oxford, Blackwell.

Harris, M. (1977) *Cows, Pigs, Wars and Witches*, London, Fontana.

Harris, P. (1986) *Designing and Reporting Experiments*,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Press.

Hartley, J. (1982) *Understanding News*, London, Methuen.

— (1992) *Tele-ology: Studies in Television*, London, Routledge.

Hartley, J. and Montgomery, M. (1985) 'Representations and relations:

ideology and power in TV and press news', in T. Van Dijk (ed.) (1985) *Discourse and Communication*, Berlin and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Hartmann, P. and Husband, C. (1974) *Racism and the Mass Media*, London, Davis-Poynter.
Harvey, D. (1989)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Oxford, Blackwell.
Hawkes, T. (1977) *Structuralism and Semiotics*, London, Methuen.
Hearn, J. (1987) *The Gender of Oppression: Men, Masculinity and the Critique of Marxism*, Brighton, Wheatsheaf/Harvester.
Hebdige, D. (1979) *Subculture: the Meaning of Style*, London, Methuen.
—— (1988) *Hiding in the Light: On Images and Things*, London, Routledge.
Held, D. (1980) *Introduction to Critical Theory*, London, Hutchinson.
Henriques, J., Holloway, W., Urwin, C., Venn, C. and Walkerdine, V. (1984) *Changing the Subject: Psychology, Social Regulation and Subjectivity*, London, Methuen.
Herridge, P. (1983) 'Television, the "riots" and research', *Screen*, 24:1, Jan./Feb., 86–92.
Herzog, H. (1944) 'What do we really know about daytime serial listeners?, in P. F. Lazarsfeld and F. N. Stanton (eds) (1944) *Radio Research*, New York, Duell, Sloan & Pearce.
Hewstone, M., Fincham, F. D. and Jaspars, J. (eds) (1988) *An Introduction to Social Psychology: A European Perspective*, Oxford, Blackwell.
Hilgard, E. R., Atkinson, R. L. and Atkinson, R. C. (1979) *Introduction to Psychology*, 7th ed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Hoggart, R. (1957) *The Uses of Literacy*, Harmondsworth, Penguin.
Hood, S. (1986) 'Broadcasting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from consensus to crisis', in P. Golding, G. Murdock, and P. Schlesinger (eds) *Communicating Politics*, Leicester,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Howitt, D. (1982) *Mass Media and Social Problems*, Oxford, Pergamon.
Howitt, D. and Cumberbatch, G. (1975) *Mass Media Violence and Society*, London, Elek.
Hughes, A. and Trudgill, P. (1979) *English Accents and Dialects*, London, Edward Arnold.
Hunter, I. M. L. (1964) *Memory*, Harmondsworth, Pelican.
Husband, C. (ed.) (1987) *'Race' in Britain: Continuity and Change*, London, Hutchinson.
Hymes, D. (1971) *On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Jackson, S. (1982) *Childhood and Sexuality*, Oxford, Blackwell.
Jakobson, R. (1960) 'Concluding statement: linguistics and poetics', in T. Sebeok (ed.) *Style in Languag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Jaspers, J. M. F. (1978), Chs 10 and 11 in Tajfel and Fraser (eds) (1978).

Johnson, T. J. (1972) *Professions and Power*, London, Macmillan.
—— (1973) 'The professions', Ch. 9 in G. Hurd, (ed.) *Human Societie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Jones, K. (1985) *Designing your own Simulations*, London, Methuen.
—— (1986) *Graded Simulations*, London, Lingual House.
Joyce, J. (1916) *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 Harmondsworth, Penguin.
Jung, C. (1969) *Four Archetype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Jung, J. (1971) *The Experimenter's Dilemma*, London, Harper & Row.
Katz, D. and Braly, K. W. (1933) 'Racial stereotypes in one hundred college students',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28, 280–90.
Katz, E., Blumer, J. G. and Gurevitch, M. (eds) (1974) *The Uses of Mass Communication*, Beverly Hills, Sage.
Katz, E., Gurevitch, M. and Haas, E. (1973) 'On the uses of mass media for important thing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8, 164–81.
Katz, E. and Lazarsfeld, P. F. (1955) *Personal Influence*, New York, Free Press.
Keenan, E. (1974) 'Conversational competence in children', *Journal of Child Language*, 1:2, 163–83.
Klein, M. (1932) *The Psychoanalysis of Children*, London, Hogarth.
Kumar, K. (1977) 'Holding the middle ground: the BBC, the public and the professional broadcaster', in Curran, Gurevitch and Woollacott (eds) (1977).
Laclau, E. (1977)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Marxist Theory*, London, New Left Books.
Laing, R. D. (1969) *Self and Others*, London, Tavistock.
Langer, J. (1981) 'Television's "Personality system" ', *Media, culture & Society*, 4, 351–65.
Larrain, J. (1979) *The Concept of Ideology*, London, Hutchinson.
Lasswell, H. D. (1948)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communication in society', in L. Bryson (ed.) (1948) *The Communication of Ideas*, New York, Harper & Row, also in Schramm and Roberts (eds) (1971).
Lawrence, E. (1982) 'In the abundance of water the fool is thirsty: sociology and black "pathology" ', Ch. 3 in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1982).
Lawson, H. (1985) *Reflexivity: The Post-modern Predicament*, London, Hutchinson.
Lazarsfeld, P. F., Berelson, B. and Gaudet, H. (1944) *The People's Choi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Lazarsfeld, P. F. and Merton, R.K. (1948) 'Mass communication, popular

taste and organised social action', in Schramm and Roberts (eds) (1971).

Leach, E. (1976)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82) *Social Anthropology*, London, Fontana.

Leech, G. (1966) *A Linguistic Guide to English Poetry*, London, Longman.

Leech, G. N. (1983) *Principles of Pragmatics*, London, Longman.

Leiss, W., Kline, S. and Jhally, S. (1986) *Social Communication in Advertising: Persons, Products and Images of Well Being*, London, Methuen.

Leith, D. (1983) *A Social History of English*, London, Routledge.

Lévi-Strauss, C. (1967) *The Structural Study of Myth*,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evinson, S. (1983) *Pragma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ewis, L. A. (ed.) (1992) *The Adoring Audience: Fan Culture and Popular Media*,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Leymore, V. L. (1975) *Hidden Myth: Structure and Symbolism in Advertising*, London, Heinemann.

Lindsay, P. H. and Norman, D. A. (1977) *Human Information Processing*, 2nd ed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Linton, R. (1963) *The Study of Man*,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Lippmann, W. (originally published 1922, republished 1965) *Public Opinion*, New York, Free Press.

Lorenz, K. (1966) *On Aggression*, London, Methuen.

Lovell, T. (1981) *Pictures of Reality*, London, BFI.

Lukes, S. (1969) 'Alienation and anomie', in P. Laslett and W. G. Runciman (eds)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Society*, Oxford, Blackwell.

—— (1974) *Power: A Radical View*, London, Macmillan.

Lull, J. (1990) *Inside Family Viewing*, London, Routledge.

Lyons, J. (1977) *Semantics*, vol. 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81) *Language, Meaning and Context*, Glasgow, Fontana.

McBurney, D. H. and Collings, V. (1977) *Introduction to Sensation/Perception*,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MacCabe, C. and Stewart, O. (eds) (1986) *The BBC and 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McCroskey, J. C. and Wheeless, L. R. (1976) *Introduction to Human Communication*, Newton, Allyn & Bacon.

McGuigan, J. (1992) *Cultural Populism*, London, Routledge.

MacKay, D. M. (1972) 'Formal analysis of communicative process', in

Hinde, R. A. (ed.) (1972) *Non Verbal Communic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cKeown, N. (1982) *Case Studies in Communication*, London, Methuen.

McLellan, D. (1975) *Marx*, London, Fontana.

McLeod, J. M., Kosicki, G. M. and Pan, Z. (1991) 'On understanding and misunderstanding media effects', Ch. 12 in J. Curran and M. Gurevitch, (eds.) *Mass Media and Society*, London, Edward Arnold.

McLuhan, M. (1962) *The Gutenberg Galax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1964) *Understanding Media*,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Abacus edn, 1973).

Macpherson, C. B. (1962)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Possessive Individualism: Hobbes to Lock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cQuail, D. (1969) *Towards a Sociology of Mass Communications*, London, Macmillan.

—— (ed.) (1972) *Sociology of Mass Communications*, Harmondsworth, Penguin.

—— (1975) *Communication*, London, Longman.

—— (1977) 'The influence and effects of mass media', Ch. 3 in Curran *et al.* (eds) (1977).

—— (1987)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 An Introduction*, Beverly Hills, Sage.

McQuail, D., Blumler, J. G. and Brown, J. R. (1972) 'The television audience: a revised perspective', Ch. 7 in D. McQuail (ed.) (1972).

McQuail, D. and Siune, K. (eds) (1986) *New Media Policies*, London and New York, Sage.

McQuail, D. and Windahl, S. (1981) *Communication Models*, London, Longman.

McRobbie, A. (1980) 'Settling accounts with subcultures: a feminist critique', *Screen Education*, 34, spring, 24–43.

Mair, L. (1972) *Introduction to Social Anthropolo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anstead, A. S. R. and McCulloch, C. (1981) 'Sex-role stereotyping in British television advertisement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0, 171–80.

Marcuse, H. (1972) *An Essay on Liberation*, Harmondsworth, Penguin.

Marsh, P. *et al.* (1978) *Aggro: The Illusion of Violence*, London, Dent.

Marsh, P., Rosser, E. and Harré, R. (1978) *The Rules of Disorder*,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Marshall, S. and Williams, N. (1986) *Exercises in Teaching Communication*, London, Kogan Page.

Martin, L. J. and Heibert, R. (1990) *Current Issues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Marx, K. (1971)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 (1977) *Karl Marx: Selected Writings* (edited by David McLella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attelart, A., Delcourt, X. and Mattelart, M. (1984) *International Image Markets*, London, Comedia.
May, A. and Rowan, K. (eds) (1983) *Inside Information: British Government and the Media*, London, Constable.
Mead, G. H. (1934) *Mind, Self, and Society from the Standpoint of a Social Behaviouris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ehrabian, A. (1972) *Non Verbal Communication*, Hawthorne, NY, Aldine Atherton.
Melly, G. (1972) *Revolt into Style*, Harmondsworth, Penguin.
Mercer, C. (1982) 'Pleasure', Unit 17, OU:U203, *Popular Culture*,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Merrill, J. C. and Lowenstein, R. L. (1979) *Media, Messages and Men: New Perspectives in Communication*, London, Longman.
Merton, R. K. (1946) *Mass Persuasion*, New York, Free Press.
—— (1957)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New York, Free Press.
Mestrovic, S. (1991) *The Coming Fin de Siècle*, London, Routledge.
Metz, C. (1974) *Film Langua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iddleton, R. and Muncie, J. (1981) 'Pop culture, pop music and post-war youth: countercultures', Unit 20, OU:U203, *Popular Culture*,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Milgram, S. (1974) *Obedience to Authority*, New York, Harper & Row.
Miller, G. A. (1956) 'The magical number seven, plus or minus two: some limits of our capacity for processing inform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63, 81–97.
—— (1965) 'Some preliminaries in psycholinguistics', *American Psychologist*, 20, 15–20.
—— (1966) *Psychology: The Science of Mental Life*, Harmondsworth, Penguin.
—— (ed.) (1973) *Communication, Language and Meaning*, New York, Basic Books.
Miller, G. A., Galanter, E. and Pribham, K. H. (1960) *Plans and the Structure of Behaviour*, London, Holt, Rinehart & Winston.
Miller, S. (1984) *Experimental Design and Statistics*, London, Methuen.
Mills, J. (1990) *Women and Words*, London, Virago.
Mills, S. (1991) *Discourses of Difference*, London, Routledge.

Milroy, J. and Milroy, L. (1987) *Authority in Language*, London, Routledge.

Minority Press Group (1980) series 1: *Here is the other News*; series 2: *Where is the other News*, London, Comedia.

Mitchell, J. (1974) *Psychoanalysis and Feminism*, Harmondsworth, Penguin.

Monaco, J. (1977) *How to Read a Fil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ontgomery, M. (1986) *An Introduction to Language and Society*, London, Methuen.

Moores, S. (1992) 'Texts, readers and contexts of reading', in P. Scannell, P. Schlesinger and C. Sparks (eds) *Culture and Power*, London and Newbury Park, Sage.

Morley, D.(1980) *The 'Nationwide' Audience*, London, BFI.

— (1981) 'Interpreting television', Unit 12, OU: U203, *Popular Culture*,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 (1986) *Family Television: Cultural Power and Domestic Leisure*, London, Comedia.

— (1989) 'Changing paradigms in audience studies', Ch. 1 in E. Seiter *et al.* (eds).

— (1992) *Television, Audiences and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Morris, D. (1977) *Manwatching: A Field Guide to Human Behaviour*, London, Cape.

Morris, M. (1988) 'At Henry Parkes Motel', *Cultural Studies*, 2:1–47.

Mortensen, C. D. (ed.) (1979) *Basic Readings in Communication Theory*, 2nd edn, New York, Harper & Row.

Mulhausler, P. (1986) *Pidgin and Creole Linguistics*, Oxford, Blackwell.

Muncie, J. (1981) 'Pop culture, pop music and post-war youth: subcultures', Unit 19, OU:U203, *Popular Culture*,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Mungham, G. and Pearson, G. (eds) (1976) *Working Class Youth Culture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Murdock, G. (1977) 'Patterns of ownership; questions of control', Unit 10, OU:DE353, *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 (1980) 'Class, power and the press: problems of conceptualisation and evidence', in H.Christian (ed.) *The Sociology of Journalism and the Press*, Sociological Review Monograph, 29, University of Keele.

— (1981) 'Political deviance: the press presentation of a militant mass demonstration', in Cohen and Young (eds) (1981) pp. 206–26.

— (1989) 'Class stratification and cultural consumption: some motifs in the work of Pierre Bourdieu', in F. Coulter (ed.) (1989) *Freedom and Constraint: The Paradoxes of Leisure*, London, Comedia/Routledge.

Murdock, G. and Golding, P. (1977) 'Capitalism, communication and class relations', Ch. 1 in Curran *et al.* (eds) (1977).

Murdock, G. and McCron, R. (1976) 'Youth and class: the career of confusion', in Mungham and Pearson (eds) (1976).

Murdock, G. and McCron, R. (1979) 'The television and delinquency debate', *Screen Education*, 30, 51–69.

Murphy, J., John, M. and Brown, H. (1984) *Dialogues and Debates in Social Psychology*, 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Myers, G. E. and Myers, M. T. (1976) *The Dynamics of Human Communication: A Laboratory Approach*, New York, McGraw-Hill.

Myers, K. (1986) *Understains . . . the Sense and Seduction of Advertising*, London, Comedia.

Nan Lin (1973) *The Study of Human Communication*,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Nash, J. (1985) *Social Psychology, Society and Self*, St Paul, West.

Negrine, R. (1989) *Politics and the Mass Media in Britain*, London, Routledge.

Neisser, U. (1966) *Cognitive Psychology*,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 (1976) *Cognition and Reality: Principles and Implications of Cognitive Psychology*, San Francisco, Freeman.

Newell, A. and Simon, H. A. (1972) *Human Problem Solving*,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Noble, G. (1975) *Children in Front of the Small Screen*, London, Constable.

Norris, C. (1982) *Deconstruc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Methuen.

Noyce, J. (1976) *Directory of British Alternative Periodicals 1965–74*, Brighton, Harvester.

Ogden, C. and Richards, I. (1923; 2nd edn, 1949) *The Meaning of Meaning*,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Ong, Walter J. (1982) *Orality and Literacy*, London, Methuen.

Open University (1982) *Popular Culture*, OU:U203,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Press.

Packard, V. (1970) *The Hidden Persuaders*, Harmondsworth, Penguin.

Parkin, F. (1972) *Class Inequality and Political Order*, St Albans, Paladin.

Parsons, T. (1954) 'Age and sex in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Essays in Sociological Theory*, New York, Free Press, pp. 89–103.

Peirce, C. S. (1931–58) *Collected Papers* (8 vol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erkins, T. E. (1979) 'Rethinking stereotypes', in M. Barrett, P. Corrigan, A. Kuhn and J. Wolff (1979) *Ideology and Cultural Production*, London, Croom Helm.

Phillips, J. L. Jr (1981) *Piaget's Theory: A Primer*, San Francisco, Freeman.
Philo, G. (1990) *Seeing & Believing: The Influence of Television*, London, Routledge.
Piaget, J. (1959) *The Language and Thought of the Child*, 3rd edn,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1973) *Memory and Intelligenc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Probyn, E. (1987) 'Bodies and anti-bodies: feminism and the post-modern', *Cultural Studies*, 1:3, 349–60.
Propp, V. (1968) *Morphology of the Folk Tale*, Austin, Texas University Press.
Rank, O. (1924) *The Trauma of Birth*, New York, Harper & Row.
Reppen, J. (ed.) (1985) *Beyond Freud: A Study of Modern Psychoanalytic Theorists*, 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Robbins, D. (1991) *The Work of Pierre Bourdieu*,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Press.
Robinson, M. (1984) *Groups*, New York, Wiley.
Rock, P. (1973) *Deviant Behaviour*, London, Hutchinson.
Rokeach, M. (1960) *The Open ond Closed Mind*, New York, Basic Books.
Roloff, M. and Miller, G. (eds) (1980) *Persuasion: New Directions in Theory and Research*, Beverly Hills, Sage.
—— (1987) *International Processes: New Directions i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Beverly Hills, Sage.
Root, J. (1984) *Pictures of Women: Sexuality*, London, Pandora.
Rose, N. (1985) *The Psychological Complex: Psychology, Politics ond Society in England 1869–1939*,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Rosenbaum, M. (ed.) (1983) *Compliant Behaviour: Beyond Obedience ond Authority*, New York, Human Sciences Press.
Rosenberg, M. and Turner, R. H. (1981) *Social Psychology: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New York, Basic Books.
Rosenthal, T. and Zimmerman, B. J. (1978) *Social Learning and Cognition*, London, Academic Press.
Roszak, T. (1971) *The Making of a Counterculture*, New York, Doubleday.
Roth, I. and Frisby, J. (1986) *Perception and Representation*,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Press.
Rowan, J. (1978) *The Structured Crowd*, London, Davis-Poynter.
Royal Commission on the Press (1977) *Periodicals and the Alternative Press*, series 6, London, HMSO.
Rubington, E. and Weinberg, M. S. (eds) (1978) *Deviance, the Interactionist Perspective*, London, Macmillan.
Rycroft, C. (1968) *A Critical Dictionary of Psychoanalysis*, Windsor, Nelson.

Sackville-Troike, M. (1982) *The 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 Oxford, Blackwell.

Sahlins, M. (1976) *Cultural and Practical Reason*,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Said, E. (1978) *Orientalis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Samuels, A. (1985) *Jung and the Post-Jungian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Saunders, D. and Turner, D. (1987) 'Gambling and leisure: the case of racing', *Journal of Leisure Studies*, 6, 281–99.

Saussure, Ferdinand de (1974)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first published 1916), London, Fontana.

Scannell, P. (1989) '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 and modern public life', *Media, Culture & Society*, 11, 135–66.

— (1990) '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 the history of a concept', in A. Goodwin and G. Whannel (eds) (1990) *Understanding Television*, London, Routledge.

Schellenberg, J. (1978) *Masters of Social Psychology: Freud, Mead, Lewin and Skinn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chlesinger, P. (1987) *Putting Reality Together*, London, Methuen.

— (1991) *Media, State and Nation*, London and Newbury Park, Sage.

Schramm, W. and Roberts, D. F. (eds) (1971) *The Processes and Effects of Mass Communication*, Champaig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Schudson, M. (1991) 'The sociology of news production revisited', Ch. 7 in J. Curran and M. Gurevitch (eds) *Mass Media and Society*, London, Edward Arnold.

Scott, M. B. (1968) *The Racing Game*, Chicago, Aldine.

Searle, J. (1969) *Speech Ac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edgwick, P. (1982) *Psychopolitics*, London, Pluto.

Seiter, E., Borchers, H., Kreutzner, E. and Warth, E. M. (eds) (1989) *Remote Control: Television Audiences and Cultural Power*, London, Routledge.

Seligman, M. (1975) *Helplessness: On Depression, Development and Death*, San Francisco, Freeman.

Sereno, K. K. and Mortensen, C. D. (1970) *Foundations of Communication Theory*, New York, Harper & Row.

Seymour-Ure, C. (1974) *The Political Impact of Mass Media*, London, Constable.

Shannon, C. and Weaver, W. (1949) *The 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Champaig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Shibutami, T. (1966) *Improvised News: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Rumour*,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Shimanoff, S. B. (1980) *Communication Rules: Theory and Research*, Beverly Hills, Sage.

Shirts, G. (1971) *Starpower*, La Jolla, CA, Simile II.

Skinner, B. F. (1953) *Science and Human Behaviour*, New York, Free Press.

— (1957) *Verbal Behaviour*,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 (1974) *About Behaviourism*, New York, Knopf.

Smith, A. (1980) *The Geopolitics of Information*, London, Faber.

Smith, G. J. W., Spence, D. P. and Klein, G. S. (1959) 'Subliminal effects of verbal stimuli', *Journal of Abnormal Social Psychology*, 59, 167–76.

Spender, D. (1985) *Man Made Languag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Sreberny-Mohammadi, A. (1991) 'The global and the local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s', in J. Curran and M. Gurevitch (eds) *Mass Media and Society*, London, Edward Arnold.

Stafford-Clarke, D. (1967) *What Freud Really Said*, Harmondsworth, Penguin.

Stempel, G. H. and Westley, B. H. (eds) (1981) *Research Methods in Mass Communication*, Ea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Storr, A. (ed.) (1983) *Jung: Selected Works*, London, Fontana.

Sturrock, J. (ed.) (1979) *Structuralism and Since*, Oxford, Opus.

Swingewood, A. (1977) *The Myth of Mass Culture*, London, Macmillan.

Tajfel, H. (1963) 'Stereotypes', *Race*, 2, pp. 179–87.

— (1981) *Human Groups and Social Categor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ajfel, H. and Fraser, C. (eds) (1978) *Introducing Social Psychology*, Harmondsworth, Penguin.

Taylor, L., Cohen, S. and Taylor, I. (eds) (1973) *Violence*, London, Sociopack.

Thompson, K. (1982) *Emile Durkheim*, London, Tavistock.

Thomson, G. (1977) *Capitalism and After*, London, China Policy Study Group.

Todd, L. (1984) *Modern Englishes: Pidgins and Creoles*, Oxford, Blackwell.

Tomlinson, A. (ed.) (1990) *Consumption, Identity and Style*, Loodon, Comedia/Routledge.

Tomlinson, J. (1991) *Cultural Imperialism*, London, Pinter Publishers.

Tracey, M. (1977) *The Production of Political Television*,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Tuchman, G. (1978) *Making the News: A Stud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New York, Free Press.

Tudor, A. (1974) *Image and Influence: 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Film*, London, Allen & Unwin.

Tulving, E. (1972) 'Episodic semantic memory', in E. Tulving and W. Donaldson (eds) *Organisation of Memory*, London, Academic Press, pp. 381–403.

Tumber, H. (1982) *Television and the Riots*, London, BFI.

Tunstall, J. (1970) *Journalist at Work*, London, Constable.

—— (1977) *The Media are American*, London, Constable.

Turner, G. (1990) *British Cultural Studies*, Boston, Unwin Hyman.

Turner, V. W. (1974) *The Ritual Process*, Harmondsworth, Penguin.

Tutt, N. (ed.) (1976) *Violence*, London, HMSO.

UNESCO (1980) *Many Voices One World* (Final Report of the McBride Commission), London, Kogan Page; New York, Unipub; Paris, UNESCO.

Van den Berghe, P. L. (1967) *Race and Racism: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2nd edn, New York, Wiley.

Van Dijk, T. A. (1991) *Racism and the Pres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Van Gennep, A. (originally published 1909; translated 1960; 1977) *Rites de Passag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van Ments, M. (1983) *The Effective Use of Role Play: A Handbook for Teachers and Trainers*, London, Kogan Page.

Vernon, P. E. (ed.) (1970) *Creativity*, Harmondsworth, Penguin.

Volosinov, V. (1973) *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New York, Seminar Press.

Vygotsky, L. (1964) *Thought and Languag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Walker, S. (1975) *Learning and Reinforcement*, London, Methuen.

Warren, N. and Jahoda, M. (1976) *Attitudes*, 2nd edn, Harmondsworth, Penguin.

Weeks, J. (1989) *Sexuality*, London, Routledge

Wells, J. C. (1982) *Accents of English* vols 1–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hite, D. M. (1950) 'The Gatekeeper: a case study in the selection of news', *Journalism Quarterly*, 27, 383–90.

White, G. (1977) *Socialisation*, London, Longman.

White, G. and Mufti, R. (eds) (1979) *Understanding socialisation*, Understanding Social Science Series 1, Nafferton, Nafferton Books.

Whorf, B. L. (1940) 'Linguistics as an exact science', *Technological Review*, 43, reprinted in Whorf (1956).

—— (1956) *Language, Thought and Realit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Wilkins, L. T. (1964) *Social Deviance*, London, Tavistock.

Williams, R. (1958) *Culture and Society*, Harmondsworth, Penguin.

—— (1974) *Television: Technology and Cultural Form*, London, Fontana.

— (1976a) *Keywords*, London, Fontana.
— (1976b) *Communications*, 3rd edn, Harmondsworth, Penguin.
— (1977) *Marxism and Litera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81) *Culture*, London, Fontana.
Willis, J. and Wollen, T. (eds) (1990) *The Neglected Audience*, London, BFI.
Willis, P. E. (1978) *Profane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Wilmot, W. W. (1975) *Dyadic Communication: A Transactional Perspective*,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Wolff, J. (1981) *The Social Production of Art*, London, Macmillan.
Wollen, P. (1972) *Signs and Meaning in the Cinema*, London, BFI.
Woollacott, J. (1982) 'Class, sex and the family in situation comedy', Unit 23, OU:U203, *Popular Culture*,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Worsley, P. (1957) *The Trumpet Shall Sound*, London, MacGibbon & Kee (Paladin, 1970).
— (ed.) (1977) *Introducing Sociology*, Harmondsworth, Penguin.
— (1982) *Marx and Marxism*, London, Tavistock.
Wright, C. R. (1975) *Mass Communications: A Sociological Approach*, New York, Random House.
Wrong, D. (1961) 'The oversocialised conception of man in modern socie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6, 184–93.
Young, J. (1971) *The Drugtakers*, St Albans, Paladin.
— (1981) 'The myth of drugtakers in the mass media', in Cohen and Young (eds) (1981).